

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

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臺灣作家研究叢書

台灣作家研究叢書

樊洛平 著

作家出版社

第三卷

丛书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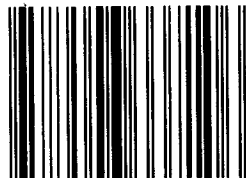
赵遐秋

金坚范

这十一部专著，或评传，
或作家论，或作品论；同是评
传，有的偏重文学传记，有的
则多一些评论色彩。不论专
著形式是什么，它们无不真
实地总结了台湾文学发展在
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的文
学实绩、文学创作的经验。
这，确是值得我们台湾文学
研究界可喜可贺的。

——陈映真

ISBN 7-5063-3710-X



9 787506 337106 >

ISBN 7-5063-3710-X

总定价：200.00 元（全十一卷）

樊洛平 著

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
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家出版社

丛书主编 赵遐秋 金坚范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

第三卷

研究叢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樊洛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7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赵遐秋,金坚范主编)

ISBN 7-5063-3710-X

I. 冰… II. 樊… III. ①杨逵-人物研究②杨逵-文学评论 IV. ①K825.6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4463 号

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樊洛平

责任编辑:冯京丽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308 千

印张:12.5

插页:3

版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710-X

总定价:200.00 元 (全十一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樊洛平 祖籍山西，生于洛阳，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客家文化与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台港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独著《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台湾女作家的中国大陆冲击波》、《台港小小说百家精品》、《巾帼不让须眉》等，合著《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简明台湾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国当代戏剧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工业文学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

- 第一卷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 第二卷 张我军评传
- 第三卷 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 第四卷 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 第五卷 乡之魂——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
- 第六卷 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 第七卷 林海音评传
- 第八卷 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
- 第九卷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 第十卷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 第十一卷 自我完成 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

丛书顾问：金炳华
陈映真

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学

——代总序

陈映真

在金炳华先生指导下,由赵遐秋、金坚范两位先生主编的“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批研究成果、十一部专著就要出版了。

这十一部专著是:刘红林的《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田建民的《张我军评传》,樊洛平的《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石一宁的《吴浊流:面对新语境》,江湖的《乡之魂——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沈庆利的《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周玉宁的《林海音评传》,汤淑敏的《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赵遐秋的《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肖成的《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以及白舒荣的《自我完成 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这十一部专著,或评传,或作家论,或作品论;同是评传,有的偏重文学传记,有的则多一些评论色彩。不论专著形式是什么,它们无不真实地总结了台湾文学发展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的文学实绩、文学创作的经验。这,确是值得我们台湾文学研究界可喜可贺的。

这套“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的主编请我为该丛书作序,我备觉荣幸,却也诚惶诚恐,深感自己才疏学浅,力不从心。再三思忖,又觉盛情难却。近期,我曾有一篇题为《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学》的演讲辞,似

能勉强交差,征得主编同意,放在卷首,以为“代总序”,是为敬意。

一、前 言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的一个璀璨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学,以那个民族的语文之审美的形式,表现其民族文化的心灵;而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酿造了那个民族的文学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这都是毋庸赘言的共识。

而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中华文化和与之相应的中华文学丰富多彩,丰富繁荣。其中既有鲜明的民族共性和同一性,同时也有突出的地方的、历史的独特性。

时间的限制,不允许我们在此论及台湾原住各民族的文化 and 他们的口传文学。

中华民族最早在台湾留下劳动与生活的踪迹,可上溯到第3世纪的三国时代。然而中华民族的典章制度和文明教化在台湾岛上实践,要等到明郑入台时的17世纪60年代以后,设立府、县,任命府尹、知县。同时,随着郑成功入台的大陆著名文人学士,借着明郑当局广设官学,积极建设以科举为经纬的文化教育体系,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影响。由较早的沈光文及后来的沈佺期、辜朝荐等人的创作,留下了台湾第一批台湾地方文学作品,动情地表现东渡流亡之人对故园乡关的怀思和立志恢复明室的情怀。

1683年,与清王朝对峙的明郑败亡,台湾收复后,大量的大陆闽粤移民涌入。在清统治下,官学更加普及,而科举制度更加正规化,中华文化和文学更加昌盛。此时大陆来台的游宦作家,例如郝永和,留下杰出的游记、诗歌、散文和地理学笔记。而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国势遭到沉重打击。这期间的各家作品,或关怀民生疾苦,或歌咏亚热带宝岛乡土风光。另有姚莹、沈葆楨、丘逢甲等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写下了保国忧时、抗击帝国主义的视野空前开阔的作品,表现

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壮怀激越,动人心弦。

二、台湾的殖民地化和台湾新文学的发展

1895年,台湾依耻辱的《马关条约》割让日帝,沦为殖民地。在异族统治下,遗民作家如丘逢甲、洪弃生和连雅堂等人,留下了哀国破之惨痛、砥砺汉节的作品,使他们成了殖民地台湾的第一代反帝抗日作家。

1915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台湾农民武装抗日斗争全面失败。1920年左右,台湾人民改变抗日策略,展开“非武装抗日”时期。与之相适应,台湾新文学运动便在这一波现代抗日民族、民主斗争中发轫、成长与成熟。受到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以东京为基地,以汉语白话文为主要语文,由留日台湾知识分子先后编刊的杂志《台湾青年》、《台湾》和《台湾民报》等为言论阵地,发动了一场台湾的新旧语文革命和相应的新旧文学革命。在理论资源和文学创作上,台湾新文学直接受到陈独秀、胡适之、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影响。岛内主张以汉语白话文和新文学体裁创作的阵营,与主张仍然使用文言文和旧文学体裁的一方展开激烈的争锋,结果旧派不敌新派,台湾新文学在日帝统治下的台湾宣告其胜利。

台湾新文学的登场,是作为台湾反日民族、民主运动之一翼而发展的。而在日帝强权统治下已经二三十年,强行日语同化教育的环境下,台湾新文学作家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朱点人、杨华、张深切、吕赫若、吴浊流等小说家,绝大多数仍坚持以汉语白话文写作,在题材上一律宣扬反日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表现了他们在日帝统治下

坚守中华文化、顽强不屈的抵抗的英姿。

三、殖民地坚决守卫民族精神 和民族语文的斗争

台湾居民大半为大陆闽粤移民,口说闽粤方言,与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颇难相通,加以日帝据台,使台湾人民无法共有中国现代共同语形成的经验,又加上日人处心积虑收夺台湾的闽客方言,以强制教育灌输日本语剥夺台湾人民的母语,有识之士痛感到在殖民地丧失民族语的危机。19世纪30年代初,台湾抗日进步文坛内部,为了文学大众化和提倡大众语文,发生了所谓“台湾话文”论争。

以黄石辉、郭秋声为中心的一派,觉察到白话文对一般台湾劳动人民无异新的文言文,因而主张把闽南方言文字化。这显然是当时“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建设”在殖民地台湾条件下特殊的提法。另外则有以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等为中心的,坚持自学地推广汉语白话,使白话文进一步大众化而以“台湾话文”的建设为多余的一派。这使人想到鲁迅和瞿秋白也主张不同策略的大众语方策。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方方的表记和表音从来会遇见难解的问题。激烈主张建设“台湾话文”的黄石辉、郭秋声皆反对以罗马化解决,避免母语脱离民族语言表现系统,主张以传统六书的原理研究方言表记,也主张方言文字化最终形成全民族可以共通的表音和表记。激烈的语文革命,目的在解决殖民地下的大众语问题,以寻求对广泛大众宣传、教育、启蒙和煽动手段的答案。而欲达到此目的,又决不牺牲中华文化的语文资产与传统!

80年代“台独”文学论起。其论者以“台湾话文运动”为“台湾

文学抗拒中国白话文”，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之表现。但新的数据显示，黄石辉在对白话文派究问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何需倡导“台湾乡土文学”时，黄石辉明确回答，正因台湾非独立国，才倡导“台湾乡土文学”而未倡导“台湾文学”。“台独”文论的曲解捏造，在史实面前成为徒劳！

四、在残暴的“皇民文学”高压下 坚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气节

殖民制度带给被殖民民族最大的灾难是收夺其民族母语，以制度化的民族歧视挫折其民族自尊，迫使被殖民者在社会、政治和精神上奴隶化。

1940年后，日帝扩大对华南及南太平洋的侵略，除了强化对台湾、朝鲜及其在华日占区的劫掠与镇压，并在这些地区施展各种精神和心智的控制，强力宣传日本皇国思想与战争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上，则在台湾等地推广支持和宣传向日同化和日帝侵略战争的“皇民文学”。

但是，“皇民文学”除了周金波和陈火泉等极少数汉奸文学家，日统下台湾作家都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引起日本当局与在台日本官方作家的不满。1943年以西川满、滨田隼雄为首的战争派作家，公开抨击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鄙陋”和缺乏为“圣战”服务的意识，为“狗屎现实主义”文学。在严峻形势下，以杨逵为首的一些台湾作家公开反驳。杨逵发表《拥护狗屎现实主义》，为台湾人现实主义文学辩诬，维护了战时下台湾文学的尊严。

环顾当时日帝支配下的东北亚，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威暴下，在日本、朝鲜和伪满都有大量的作家——包括曾经抵抗过日本侵略政策

的左派进步作家,大面积向日本法西斯军部“转向”投降,写下不少支持日帝扩张政策的作品,至今成为日本与韩国文学史的耻部与痛处,无法清理。相形之下,台湾的转向附日作家只有周金波、陈火泉等极少数,作品粗糙、数量极少,影响不大。应该指出,自鸦片战争及日帝据台以来,“帝国主义加诸中国最大的伤害在于台湾,中国文学中反映对帝国主义之抗争最为动人的作品也在台湾”(陈昭瑛,1996)。

五、克服民族内伤,坚持台湾文学的 中华民族属性

1945年8月日帝战败投降,10月,中国政府代表在台北正式受降,台湾从殖民地枷锁中解放。台湾人民在欢庆之余,自动地提出了去殖民化,积极自觉地推动“中国化”和“把我们的母语抢回来”的运动。在语言政策上,主张“恢复闽南话作为中国方言的地位”予以尊重与重权,禁止日语,从而在民族方言基础上推行“国语”(普通话)。

可惜国民党当局无心顺应当时全国性要求“民主化”、“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广泛舆情,加上接收日产官员贪渎成风,朋比为奸,1946年夏,国民党打响国共内战,致社会动荡、政治不安、民生凋敝。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二·二八事变,民众的要求也是民主化、反内战、高度自治、和平建设。3月,国府当局以武装镇压,造成流血惨变,两岸民族团结与和睦受到重大内创。

但就在3月流血镇压后八个月,来台进步的省外知识分子歌雷、雷石榆、骆驼英、孙达人、萧荻等人,与团结在杨逵身边的本地知识分子欧阳明、赖明弘、周青、张光直、赖亮等人,以当时《新生报·桥》副刊为基地,热情洋溢地展开“如何重建台湾新文学,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学无愧的一部分”的议论。经1947年11月到1949年4月长期论

议,取得了这重要成果:

(1)参与议论的省内外人士,即使在1947年3月血洗后,也取得了这重要共识,即“台湾和台湾文学是中国和中国文学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2)省外作家和文论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30年代以迄40年代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的理论。

(3)对杨逵先生所主张深入台湾社会、深入台湾民众、写台湾人民生活与心声的作品,为当时所急切需要的“台湾文学”这一见解,议论各方都取得了共识。

(4)杨逵高瞻远瞩地提出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国际“托管”台湾,说凡有为“台独”、“托管派”服务的文学是“奴才的文学”,今日视之,尤有重大意义。

可惜的是,1949年4月,国府在台当局发动“四六事件”,逮捕台北进步学生和《新生报·桥》副刊的重要作家。杨逵被捕入狱,判刑十二年,给予当时校园内和文化界民主力量巨大的打击,“重建台湾新文学”之议论戛然而止,至今绝响。

六、反抗文学之恶质西化,主张台湾文学 复归于中国人立场和中华主体

反共文学和现代主义文艺自1950年后支配了台湾文艺界长达二十年之久,而弊端丛生:即极端的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对西方文论、西方创作技巧的恶质模仿,表现语言的晦涩,失去文艺创作上的民族风格和形式等,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

1970年保卫钓鱼台运动在海外激发了左右分裂。保钓左派推动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30年代以降文学和文论的运动。这运动头一次冲破了内战与冷战文艺的统治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大众

文学、民族文学的理论冲击着一代被西方现代主义统治的知识分子。1971年,留美回台的知识分子唐文标向台湾现代主义诗提出了严厉批判,主张诗歌的大众性和民族性,引起轩然大波,沉重地打击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威信。

1977年至1978年,国府当局以有人主张“工农兵文艺”的红帽子,扣向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的大众性、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反对外来殖民性文学的一批人,在大报上搞点名批判,并筹开“国军文艺大会”,准备全面镇压。后来经过胡秋原先生、徐复观先生、郑学稼先生向当局力谏,才阻止了一场大的文字狱。

在这一场论争中,“乡土文学”派主张在思想上、创作方法上反对外来西方文论的统治,使台湾文学复归于中国人立场和中华文化,在创作方法上要深化现实主义,表现中华文学的民族特质与风格。

七、反动、反民族的80年代及其斗争

1979年,在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民族经济脱钩,而以独自的“国民经济”在依附外资下成长出的台湾资产阶级,有要求其阶级政治份额的“党外”反蒋、亲美、反共的“民主化运动”。1979年,这运动在高雄点燃了“高雄美丽岛事件”,冲毁了国民党长期的排外独占的政治。而由于美国护航,加上运动本身反共亲美性格,台湾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很快浸染了同样具有反共、亲美、反华性质的“台独”倾向。

1987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位,出人意外地利用政权资源全面推动“台独”反民族进程。2000年陈水扁取得政权,把反民族“台独”政治又推上一个台阶。

与之相应,“台独”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台湾有显著发展。“台湾民族论”、“爱台湾论”、“台湾土地与血缘论”、“台湾意识论”、“台湾主体意识论”等,一时沸沸扬扬,一定程度冲击了台湾政治和社会生活,取

得论述霸权。

而台湾文学界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文论上“台独”派提出了“台湾文学独特性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无关论”和“台湾文学主体性论”，基本上是“台独”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在文学教育上，受到“台独”当局的直接支持，广设独立的台湾文学系所，宣传和教育反民族的台湾文学论，形势是严峻的。

另外，台湾当局“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也以丰沛的资金与资源，组建“国家台湾文学资料馆”，以台湾文学为“国家文学”。此外，并结交外国、特别是日本右派学者为反民族“台独”文学写书写文章、出版书刊，办“国际研讨会”，出钱出力为“支独”外国学者出书，鼓励他们为皇民文学史翻案，为“台独”文学论的建构出谋献策，形势也比较严重。

然而，十多年来，在反对净化和美化皇民文学的批判上，在反对以日本藤井省三为首的日本支独台湾文学研究上，在反对“台独”派以“台独”台湾史观炮制台湾文学史分期理论的斗争上，我们坚持了及时的，切中要害理论和学术的批判与斗争，没有让“台独”派占上便宜。

八、结 论

大约在1935年，即日帝窃据台湾已四十年，离日帝自台败退仅十年之时，台湾总督府编纂了《台湾警察沿革志》。其中第二大卷依据殖民地大量公安档案，历述自1920年代以降台湾反日抗日思想启蒙运动、民族运动、政治运动、阶级暨社会运动。在其总序中说，台湾改隶日本已四十年，但人民反日抗日运动前仆后继，殆无间断。究其主因，乃在台民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以中华五千年文化为荣。其原文如下：

……关于本岛(台湾)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方面仍沿袭旧貌,可见其不轻易抛除民族意识……本岛人又视(福建、广东)为父祖坟茔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故自改隶后,……仍有一些本岛人频频发出不满之声,以至引起许多不祥事件,此实为本岛社会运动勃兴之主要原因……

(《台湾社会运动史》卷一,创造出版社,台北,1983)

这说明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为什么表现出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之根源所在。

中华文化独一的特质,在于它以汉字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典章、典律、人文、思想体系。

这一文化体系,在境内成为强大的文化、思想及感情的凝聚力,藉以将以汉族为中心,边境各非汉族民族群体为成员,化育凝合起来,创造一个大汉族共同体的想象,而逐渐形成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我族意识。而在境外,一直达至19世纪中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崩解之前,在东北亚的朝鲜和日本、法国入侵前的越南,都形成以汉字、汉语音及中华文化为主要根干的汉文化圈,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前面说过,中华文化泽被台湾始于16世纪的明郑。自斯三百余年以来,历经中国统一,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港,日帝割台后沦为殖民地,光复后又成为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前沿基地,至80年代又吹起一股自1940年初日帝“皇民化”运动以来未曾有过的反民族的分裂主义风潮。然而正是在这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磨难中,特别激起了台湾近三百年来历代遗民和移民,以数千年中华文化的积淀和基因,抗击外来势力,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认同,发而为历代不息的强

烈的爱国主义传统。

而从台湾文学史以观,台湾是帝国主义侵袭中国最集中、最严重的受灾区。因此,在国破家亡的现实中成长的台湾文学,不论是以传统体裁或现代体裁表现,其反映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誓不臣夷,而奋力抗击帝国主义的艺术表现、最大无畏、而且最动人的作品,较诸包括伪满在内的广泛日占区,也以台湾最多。

台湾文学有伟大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有强烈的以中华文化为根柢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台湾文学的骄傲。虽然在当下台湾文学正遭逢自 40 年代日帝“皇民文学”压迫以来未曾有过的反动,即反民族“台独”文学的逆流,但只要 we 坚持台湾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不动摇,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克服一时的横逆,取得胜利!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4
一、远离祖国的生命出发	4
二、殖民统治下的忧患童年	10
三、游学东京的热血男儿	22
四、时代前沿的革命伴侣	29
五、登台亮相的文坛健将	39
六、首阳农园的抗争“隐士”	47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64
一、战后重建的文化先锋	64
二、动荡时局中的和平使者	75
三、绿岛铁窗的无罪囚徒	92
四、东海花园的大地园丁	104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123
一、杨逵与赖和：亦父亦兄亦文友	123
二、杨逵与人田春彦：生命相托知己情	129
三、杨逵与大陆文坛：“鲁迅情结”“胡风缘”	137
四、杨逵与徐复观：真人真话真文章	147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154
一、1935：《台湾新文学》的独立品格	154
二、1945：《一阳周报》与三民主义理想	166
三、1946：《和平日报》副刊及其编辑出版活动	174

四、1947:《文化交流》与“中国文艺丛书”	184
五、1948:《台湾文学丛刊》与《台湾力行报》副刊	188
第五章 文艺批评:杨逵的理论战场	199
一、文学理念:写实的、大众的、草根的文学	200
二、文学评论:从文学标准到批评实践	213
三、文学论争之一:关于“粪便现实主义”	216
四、文学论争之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重建	227
第六章 小说世界:以文学见证历史	234
一、主题形态:殖民地创伤与抗争精神	235
二、形象塑造:殖民地台湾的人物画廊	249
三、风格呈现:写实主义的叙事方式	263
第七章 戏剧天地:以舞台演绎人生	270
一、戏剧生涯:与戏结缘的另一种人生	271
二、戏剧理想:打人民间与提升新剧	275
三、戏剧风貌:多音交响的舞台世界	281
第八章 绿岛言说:以生命倾诉心语	295
一、绿岛家书:黑暗中发出的爱与热	295
二、绿岛诗文:囹圄里放飞的情与思	311
结 语	323
附录:杨逵文学活动年表	325
参考书目	371
后 记	378

引 言

时光的流逝,会带走许多人、事和岁月。然而有一些人,时代或许可以忘却他一时,却永远带不走他,因为他与历史同在,他的生命沉淀在历史深层。或者说,他本身就构成和见证了某段历史。

而杨逵,他所经历的风雨人生、世事沧桑,特别是那种时代弄潮儿的生命履历,这一切所映现的,正是台湾由日据时期——光复初期——戒严年代的一幕幕社会历史影像。

——走进杨逵的世界,你就走进了一部 20 世纪台湾的历史。

社会的变迁,世事的无常,特别是在风雨如磐的专制政治年代,会带来不少人的命运沉浮和理想变异,制造出种种退却的、妥协的、扭曲的、追随的人生形象。然而有一种人,始终是铁肩担道义的战斗,为了追求美好的理想,一直走着荆棘丛生的小路,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作战。选择这样一种社会角色,以这种方式来守望人生信仰,往往需要毕生的奋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成就社会的良心,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足为奇。

而杨逵,为争取殖民地台湾的民族自决和返归祖国,为追求战后台湾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乐园,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日据时期因抗日数度入狱,光复后由于呼吁和平而坐牢多年,一生颠沛流

离,两度沦为花农,杨逵曾被历史长期封存。但遮蔽不了的事实是:在冰山底下活过八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无论命运如何起伏跌落,杨逵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精神,成为正义社会的代言人。

——读懂了杨逵,你就读懂了台湾社会的良心。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了时代大苦难的斗士,他在投身社会运动、为民族解放奔波奋战的同时,拿起了手中的笔;他以殖民地人民血泪经验的凝结,以对美好、光明前景的追求,化作笔下一篇篇社会写真、生命素描和大众心声,创作了一种呐喊的文学。对文学事业的虔诚与执著,让杨逵一生无怨无悔,备受磨难而不改其志。他对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抗争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他为台湾文坛提供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学创作实践,他在人生的困境、逆境甚至绝境中永不屈服的文学意志,使他始终以“压不扁的玫瑰花”形象,绽开在冰山底下,傲然于社会之上,从而成为时代风雨中的不朽老兵。

纵观整部台湾新文学运动史,迄今为止,单以影响力及掀起波浪之大来说,杨逵应是首屈第一指的。^①

——王诗琅先生如是说。

杨逵承担了日据下台湾人共同的苦难命运,并继承了赖和尖锐的抗议精神,以诚实的风格、朴实的结构、平实的笔触,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魂。他的小说意识充满希望和远景,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既不是杨华

^① 王诗琅语,转引自林衡哲:《台湾现代史上不朽的老兵》,原载《台湾文化》第5期,1986年4月;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4页。

的悲厌绝望,也不是龙璚宗的自怜忧伤,可说是个理想的民族主义者与写实主义者。他的道德勇气与文学实践,形成了一块不可毁灭的里程碑,是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①

——张恒豪先生如是说。

坚定不移的抵抗立场,使杨逵漫长的一生在无可言宣的贫困、潦倒、压迫和挫折中度过。但事过境迁,他的孤独的抵抗志节,却发散出璨耀的道德的光芒,使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台湾勤劳人民的良心、尊严和道德力量的表证,使杨逵先生那样一个精瘦、年老、素朴的老人,成为伟岸、强壮、挺拔的巨人。^②

——陈映真先生如是说。

冰山下覆盖的民族魂,文坛上“压不扁的玫瑰花”——这就是杨逵,以他的文学理想和心血生命为我们树立起来的一座历史碑石。

① 张恒豪:《不屈的死魂灵——杨逵集·序》,见张恒豪主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3页。

② 陈映真:《杨逵的一生》,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4页。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在 20 世纪的台湾文坛上,杨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他以文学言说的历史,他所塑造的人生形象,他所走过的文学道路,成为那个风雨坎坷时代的象征,指引台湾新文学进程的灯塔。

在 20 世纪的台湾社会中,杨逵是一个无法征服的形象。从社会运动的前线斗士,到绿岛铁窗的无罪囚犯;从漫漫世纪的文坛健将,到乡土台湾的种花园丁,无论杨逵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蹇厄,他所信仰的人生理想,他所坚持的人格操守,始终没有在历史的顿挫与时代的磨难中扭曲变形。

杨逵的一生,跨越了两个时代。四十岁以前,他在异族殖民统治的日据时期度过,生命岁月里刻满苦难的记忆和抗争的年轮;四十岁以后,遭逢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时期,他更多感受到台湾的社会变迁和人民的创伤性经验。杨逵八十年来所经历的曲折坎坷,他与世纪台湾进行的漫漫长跑,正是一部近代台湾人民历史的真实写照。

一、远离祖国的生命出发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历经反复

的外交谈判,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南一纸割让给日本,台湾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十年之后,杨逵于1905年10月8日出生在台湾省旧台南州的大目降街,也就是今天的新化镇。

杨逵出生的时候,台湾社会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初期。1905年,日本继打败亚洲的古老帝国——中国,又战胜了横跨欧亚的俄国,9月签订日俄媾和的《朴茨茅斯条约》,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野心与气焰正如日中天。

这一年,日本殖民者在结束了武力征服台湾的过程后,已经开始全面的政治统治。日本当初占据台湾的主要目的,一是要通过经济资源的掠夺,把台湾变成本国生产的原料市场与消费市场,以图工商权利的垄断;二是将台湾作为日本进一步南侵的前哨据点。日本政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关于台湾岛域镇抚策》一文中说:“我们占领台湾之要旨,不外乎在于二端,即:一则以本岛作为将来展弘我版图于对岸之中国大陆及南洋群岛之根据地;二则在开拓本岛之富源,移植我工业制造,垄断工商权利。”^①日人据台之后,最感头痛的,就是台湾岛上人心思汉,对祖国念念不能忘怀。为了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标,殖民当局强力推行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血缘联系的高压统治,企图让台湾人民变成没有祖国的、对异族侵略俯首帖耳的臣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的著者矢内原忠雄也曾指出,日本的台湾支配政策要害是在“把台湾从中国隔离起来,跟日本结合在一起”。始于日本占领台湾的资本主义移植,在台湾人民武装抗日运动的顽强抵抗下,前后历时七至十年始得以推行。1905年正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

^① 转引自刘振鲁:《对日据时期天种政策的剖析》,见《台湾文献》33卷1期。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统治,自 1895 年 6 月设立台湾总督府以后,从此“总督府的独裁权力,特殊的警察统治和保甲制度,构成了日本殖民统治的三大支柱”^①。而创建及维持这一统治体制的法律基础,不外是赋予总督府广泛立法权限的“六三法”。

“六三法”正名为《关于在台湾实施法令之法律》,以《第六十三号法律》名义于 1896 年 4 月 1 日发布,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后来虽经四次修改和变动,但基本精神延续了整个日据时期。日据时期派往台湾的十九任总督中,自第一任至第七任,凡二十四年,皆由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形成武官总督时代。总督有权公布命令或律令,有权统帅军队,有权处理关税、铁道、通信、专卖、监狱及财政等特殊行政事务,在台拥有一切独裁的权力。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是日据时期任职最久的总督。在 1898 年至 1906 年的八年期间,儿玉源太郎与担任民政局长的后藤新平联手,导致了所谓民政统治的登台和“生物政治论”殖民政策的推行。比之急欲改变新殖地地上的异民族的本性,他们认为应以确立制度辅以积极建设为施政大纲。故改军部中心为民政部中心,对台湾的土地、人口、货币等资源实施调查。另一方面,他们先是根据“六三法”发布了《匪徒刑法令》,竭尽手段镇压台湾的抗日游击战;又于 1902 年春夏实行“土匪招降策”,威胁利诱抗日民众投降,遂设计诱骗杀戮大量义民。同时又特别强化了殖民地台湾特有的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以“糖饴与鞭”的手段树立了日本统治台湾的根基。

儿玉源太郎时期对台湾的重大影响,首推警察制度的强化。日据时期的台湾警察,实为“警察官吏”。除担负固有的警察事务外,同时行使辅助官吏的职责。其结果是警察直接充当人民命运的主宰,予以生杀予夺大权。按照当时台湾的编制,从州、厅、市、郡到街庄,

^①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第 201 页。

全岛共有警察机构一千五百多处,警员一万八千余人,平均每一百六十名居民配备一名警察。这些日本警察以统治者自居,集军、警、政、教大权于一身,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压迫,被称为“草地皇帝”。儿玉源太郎还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移植到台湾,并加以强化。1898年8月颁布的保甲条例《律令第二十一条》,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础之一。保甲制度是根据街庄区域,以十家为一牌,牌设牌头;十牌为一甲,甲设甲长;又以十甲为一保,保设保正。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警察检查来往人员,监视居民行动和缉捕罪犯,保甲内居民如有“违法”行为,历行连坐法。而保长、甲长、牌头皆不给薪俸。这实际上是强迫台湾人民自出经费,互相监视,来达到其“以台制台”的恶毒目的。

台湾经济的殖民地化过程,是从1905年以后正式开始的。日本殖民者为进一步榨取台湾而实施的实业“建设”,在儿玉源太郎时期开始有了整体的规划。为了推进日本资本主义入侵台湾的“基础工程”,日本殖民者早在1898年就公布了《台湾地籍令》和《土地调查规则》。1905年又公布了《土地登记规则》,把清代历代移民辛勤开垦而所有权证明不完全的耕地,以及原住民部落公有的猎场和森林地没收为公有。在他们的巧取豪夺下,归殖民统治当局和日本财阀及私人占有者的土地,占台湾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五。与此同时,殖民当局还大力推行以台湾银行为中心的货币及金融制度,把台湾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格局之中。

在经济生产方面,台湾作为物产富饶的宝岛,一向有着生产糖、米、茶、矿等物产的良好基础,日本殖民者意欲通过对它的掠夺性开发建设,从而把台湾作为自己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地,并为日本工业生产产品开辟消费市场。诸如,日本政府一向将糖视为台湾最珍贵的资源,1900年成立“台湾制糖株式会社”,1901年设总督府垦丘局出張所于台南,并在大目降,也就是杨逵的家乡一带设置糖业试验场;1902年公布临时台湾糖务局官制及有关糖业奖励规则,大力发展糖

业帝国主义的殖民经济形态。“仅仅四五十年之间,完全在台湾养大的这个庞大的日本糖业资本,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地位只次于纺织资本的。”^①然而,日本制糖会社的发展,却是建立在对台湾蔗农的残酷剥夺上。正如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所说:“台湾蔗农之穷困,产生台湾制糖会社之隆盛。”^②

为了从精神上奴役台湾人民,日本殖民者还大力推行差别教育制度。儿玉源太郎就曾说道:

教育一日亦不可付之忽诸。然而亦不可漫然导入文明潮流,养成趋向权利义务论之风气,应使新附之民不致陷于前例之弊害。^③

上述教育思想,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奴化教育”。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的初等学校分为小学校、公学校和教育所,实施差别化的三元教育体系。小学校师资力量与条件设备最好,专收日本学童;公学校师资和设备都很差,专收台湾学童;教育所则由警察担任教学,根本谈不上什么设备,专收“蕃族”儿童,实施“管制”教育。日人子弟就读的小学校课程与日本本土相同,台湾子弟就读的公学校课程则是殖民当局所刻意改编,并在内容精神上搞奴化教育。所有初等学校的教学全部使用日语(称为“国语”),禁读汉文,并且通过修身、历史等课程对台湾学生灌输日本国体观念。日本人担任教师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校长在学校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台湾的中高等教育,主要是为居台日人子弟的升学而设立。虽然于1920年开始实施日

① 王诗琅:《日本殖民地体制下的台湾》,(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0年12月版,第47页。

② 矢内原忠雄语,转引自王诗琅:《日本殖民地体制下的台湾》,(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0年12月版,第47页。

③ 同①,第54页。

台共学制，一律改称公立中学，但新生的录取率，日生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以上，台生仅为百分之十八·七。台生的升学命运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动辄得咎，到处是无理的限制。1923年，某师范学校有彰化台生五十四名应考，被录取的只有十七名。谁知到了“人物试验”，竟然全部名落孙山。据说是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对日人统治心怀不满，具有“危险思想”倾向。在高等教育中，读书的机会多被日本人垄断，台生所占比例微小，而且大部分只能学医、学农，“毕业即失业”。1928年4月，日人于台北设立台北帝国大学，首届入学新生六十人，其中台籍学生只有六人，余均为日籍学生。这种大学教育的歧视政策，一直持续到日据末期。1943年，台北帝国大学的学生中，日籍子弟高达百分之八十四·八，台籍子弟仅占百分之十五·二。日据时期的教育不平等事实，对台湾人民的权利、精神和心理，具有漫长的杀伤力。

事实上，从残暴苛责的政治统治，到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再至奴化政策支配下的差别教育制度和强迫同化政策，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的侵略达到了系统而彻底的程度。在被异族统治的日子里，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回归祖国怀抱始终是他们的最高奋斗目标。以1915年为界限，这之前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是以武力反抗斗争为主，之后逐渐转向以政治文化斗争为特点的非武力抗日运动。

在日据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异族统治造成的殖民地创伤，以及被压迫者英勇悲壮的反抗斗争，不能不深刻影响着每一个台湾人的生命过程。对于杨逵而言，从1905年他来到人世间，到1915年他所经历的童年成长，这一充满腥风血雨的时期，记载的正是异族殖民压迫愈重、人民反抗愈烈的历史。受到祖国大陆革命运动的影响，台湾岛上先后爆发了十二次大规模的武装抗日起义。虽然义军最终全部遭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但反抗殖民统治的精神却在岛上广泛传播。

当回溯的目光再度锁定杨逵的出生年代,在1905年这道历史的刻痕背后,被迫远离祖国的台湾,正经历着日本殖民者的高压统治。作为殖民地台湾苦难岁月的产儿,杨逵的生命出发,一开始就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这也注定了他的生命成长,与身历的时代,与脚下的土地,有着无法分割的社会联系。

二、殖民统治下的忧患童年

旧时台南州的大目降,位于台南市通往噍吧哖(今玉井乡)的途中,距离府城台南并不遥远。杨逵的故乡就在这里。

大目降早期是平埔族群聚集的地方,其名称就来自于平埔族。这里有一个台江内海未淤积之前最早的港口——洋仔港,可见它自古以来就是商旅往来频繁的交通枢纽之地。大目降地处丘陵和平原之间,它绿树环抱,物产丰富,丘陵地带适合于种植竹笋、凤梨和各种水果,平原沃土则盛产水稻、甘蔗。作为一个典型的乡下街镇,大目降的民情纯朴而丰富。从本土的朝天宫、太子庙,到洋仔的保生大帝庙,以及古色古香的街役场,这一切都深得民间宗教氛围的濡染。自1921年始,大目降改名为新化镇。

大目降有着南台湾独特的地貌与风情。因为靠近府城台南的缘故,它又颇受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浸润。府城台南作为台湾最古老的一个城市,位于台湾岛西南海岸,嘉义平原南端。在台北市成为首府之前,这里一直是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荷兰人据台时期,曾在此地设立总督府。清朝政府统一台湾后,也长期以台南市为首府所在地。这里不仅有赤嵌楼、安平古堡、忆载金城、延平郡王祠、台南孔庙等多处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还有众多或规模宏大或隐现在住宅郡内的大小庙宇。经荷兰、明郑及清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变迁,这七十多处名胜古迹所蕴含的沧桑世事和厚重文化,这两百多座庙宇、教堂所氤氲的缭绕香火和宗教氛围,加上民间广为流传的歌仔

戏、布袋戏、采茶歌、驶犁歌等艺术形式，自然构建出台南深厚的人文风貌。据说，“台湾”这个名字，就是由府城台南安平港一带居住的“台窝湾”人的族称演变而来的。由于这样一种人文地理背景的倚仗，位于府城台南附近的大目降，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台湾近百年来的文化与教化的影响，所以眼界并不封闭，也不乏文化风尚。这种生存环境对杨逵的人生成长，自然也发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杨逵出生在台南州附近的大目降街观音庙二百四十七号，父母皆为文盲，杨逵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父亲名杨鼻，母亲叫苏足。也许因为父母一生都在贫寒的平民生涯中挣扎，希望儿子未来的命运能有一种改观，所以给杨逵取名为杨贵。现在新化一带有人讲，杨逵的父母一个“鼻”，一个“足”，难怪他们的儿子会顶天立地。

杨逵的祖父吴知文，早年从闽南一带只身来到台湾，由于生活困难入赘台南市杨家，祖母杨让是个传统妇女。后来因谋生不易，举家搬到大目降定居下来。祖父母去世很早，后世子孙所知道的，只有台南海边一个叫做“喜树”的地方，那里的墓碑上刻着有关祖父母的一些文字。

杨逵的父亲杨鼻，是个瘦小而健康、安静又温和的锡匠，以制作锡器、水桶、酒盏、烛台等家庭日用品为生，被当地人亲热地称为鼻师，是这一带行业中很有名的师傅。他有着平常百姓的亲感和，与街镇上的乡亲邻里相处融洽。工余之时常常和小孩子们一起玩耍，有时也带着孩子们到乡下朋友家里吃拜拜。杨鼻虽然不识字，却喜欢议论时事，他与邻近的知识分子，比如区长钟天德、书房老师王字、街役场（镇公所）的林书记之类的人物，时有来往，经常三五成群一起谈天说地，这给家中带来不少热闹，孩子们也可以听到一些时事新闻。

母亲苏足是个知足安分的农家女子，自幼生长在大目降街附近的棒口，一生勤勉、操劳，有着传统妇女的美德。她在色彩和美术方面有些专长，常为邻人画些头巾、肚兜以及其他刺绣品的图案，赚些

零星家用。杨逵从母亲身上所体会到的，是恨霸如仇的性格和善解人意的温情。母亲从没叫孩子们用功做“人上人”，却时常叮嘱孩子们要和别人和睦相处，平等待人。

日据时期缺医少药的贫困生活，使杨鼻和苏足共同生育的七个孩子，不幸夭折了四个，只养活大三个男孩子。杨逵兄弟三人感情深厚，又多受父母的潜在教化。大哥杨大松本来在日人的糖业公司工作，因为听了一次抗日演说而遭免职，转而从事木刻业以维持生活，母亲身上的民间美术细胞仿佛更多地传承与他。二哥杨趁虽然选择了医学，但却热衷于音乐，能拉一手漂亮的小提琴。从他手中流淌出来的袅袅琴音，曾带给杨逵美妙的遐想和深刻的印象。后来家境一度十分恶劣，二哥虽然考取了台湾总督府医学专门学校，因为无力筹措学费，接受父执辈劝说，不得已入赘大营陈家，终因生命压抑和婚姻生活破碎而自杀。杨逵后来远赴东京求学时，两位哥哥都曾竭尽全力帮助他，支持他去奔自己追求的文学之路。在杨家三兄弟各自喜爱的木刻、音乐与文学之间，仿佛有着某种共通的艺术本质。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台湾乡镇家庭，夫妻俩靠着一间面向街道的小小店铺谋生，后面的一间房子则住着大小全家人。在大目降的观音庙附近，所有的店铺几乎都是这种同一格局的传统建筑。火花迸溅的铁匠行，手艺古老的锡匠铺，让人恐惧又神秘的棺材店，永远散发着刨花气味的木匠铺，五花八门的杂货店，还有类似茶室、常有特殊女人出入的妓院，都沿着长长的街道排列开来，再加上街口香火缭绕的妈祖宫，人来人往虔诚朝拜的观音庙，给乡间街镇带来世俗生活的方便和喧闹，也给小孩子们留下许多好奇的、色彩斑斓的民间印象。杨家的锡匠铺每天一早就打开店门，开始播播打打地做活，邻居的铁匠行、木匠铺也忙碌起来，叮叮当地响声一片。生活虽然单调，却也很有乐趣。杨逵，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渐渐成长，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童年记忆。

小时候的杨逵，是一个体弱多病、内心孤独而又喜欢幻想的孩

子。他一生反对暴力,就与这种童年时代的性格和经验有关系。作为一个沉默寡言、性情温和的孩子,杨逵的童年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反抗或叛逆的举动,惟一的一次,是因为不满于观音庙的庙祝封闭庙前广场不让小孩子玩耍,杨逵便和小伙伴儿一同把癞蛤蟆放在了庙祝的床底下。有时也参加台湾孩童与日本孩童之间的纷争,童稚的心灵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殖民地孩子与异国孩子之间的不平等。童年杨逵尽管缺少强烈的反叛性,但经常跟随做锡匠的父亲到不同生活水准的家庭里揽活做工的经历,使他在广为接触生活层面的同时,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尝试着独立的思考。在杨逵的性格里,多少有几分承继了父亲喜好议论时事的性格,这为后来塑造他坚强的批判精神和思考社会的独立个性,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童年杨逵最深刻的记忆,一是日本警察的霸道,以及由此引起的反抗意识;二是日据时期缺医少药引发的可怕后果。当年日本入侵台湾时,大家都“走番仔”躲起来。这种“走番”,曾闹过许多有趣的笑话。以当地的生活风俗,台人离家之前,要把家中打扫一遍,就连便桶,也要洗刷得一干二净。其时,日本军官北白川官曾一度率部驻扎大目降,地点就在杨逵家对面的庙旁,区长钟天德的住宅。那年,杨逵的父母新婚不久,按风俗将便桶漆成红色,洗刷干净。日本军人不知其作何用处,就拿它当作饭桶。多年过去,每每茶余饭后,这件事常常成为家中笑谈。它使台人因受日本殖民者欺压的悲惨心情,多少有了一种宣泄的快慰。杨逵小的时候,还听到母亲骂日本军人的警察为“臭狗”。凡是从日据时期过来的人,都会知道“臭狗”、“四脚仔”这类称呼,正是日本殖民者的代名词。杨逵念书时,家乡一带,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花はせんだん,田舎は警察官”,即“最野香的花是苦楝,最野蛮的人是乡下的警察官”。上述种种,在杨逵幼小的心灵里,渐渐滋生出一种朦朦胧胧的民族意识。

当时困扰一般民众的,除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压迫以外,应当算是疾病了。极端低劣的卫生水准,使岛上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

民都患过疟疾。杨逵的父母前后生育过七个孩子，每当疟疾来袭的时候，贫穷的他们只能像普通家庭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的生命被病魔夺走。有的孩子患了肺病，无力就医，也只能简单地用一些土方，最终还是不幸夭折。因为疾病的缘故，杨逵的姐姐、弟弟和两个妹妹先后死亡。弟妹相继去世时，杨逵只有四五岁，还不懂事，只记得那天从外面玩耍回来，看到家中停放着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着小团仔的尸体，这给杨逵留下了非常恐惧的印象。不仅如此，杨逵自己也深受其害。他从小经常生病，身体非常瘦弱，在同龄的孩子里，就成了突出的弱小者，以至于十岁才入大目降街的公学校读一年级，还被同学们戏称为“鸦片仙”。孩提时代的杨逵，也喜欢到庙口与童伴们玩“闯军”、“拔河”之类的游戏，可孱弱的身体常使他力气不逮，玩得没趣了就自己走开。遇到那种擂台式的比武游戏，杨逵只能做一个旁观者。每每这个时候，他就有了一种孤独的寂寞感。

为了排除生活中的孤寂感，杨逵常常沉浸在那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他开始关注周围的生活，从中受到民间文化的濡染。当然，穷家寒舍里成长的孩子，常常体会到的是一种贫穷的经验。杨逵小时候家境贫穷，家里靠制作锡器维持生活。他们把旧的煤油桶收集回家，通过火烧来熔解衔接筒子的锡料，再利用这些锡料来做烛台、香炉、酒瓶等容器。小时候的杨逵，有一次没有经过父亲同意，就去烧那些煤油桶，结果轰的一声，油桶炸了开来，在他手上留下一块伤疤。杨逵自己觉得，这种好奇心，还有想去体验工作的过程，反映出了他的性格，也使他日后对工人的生活有了一种特别的关心。但更多的时候，杨逵的好奇心，是被那些周围的生活所吸引。父亲制作锡器后丢弃的锡片屑，在杨逵眼里往往有着生动的意义，他把这些亮闪闪的锡片剪成各种形状的小物品，借以消遣自己寂寞的童年。

家境虽然贫穷，小孩子们却总能从中找到几许孩提时代的快乐。大目降街上有一棵大榕树，巨大的树冠像一把绿伞，可为几十个人遮住骄阳。在炎热的夏天，它是大目降的孩子们嬉闹玩耍的天地，也是

附近田里的农人们和过路人顶好的休息场所。孩子们常常在树上捕蝉捉鸟，在树下荡秋千，翻筋斗，玩捉迷藏。子孙满堂的鹤年伯伯，整天坐在树下拉胡琴；开竹器行的竹头叔，则一早就把他的竹器在树下摊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哼小调。他们都藏有满肚子的故事，经常津津有味地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则组织了小小“马戏团”，也表演节目给大人们看。杨逵在这种场合，倒也算得上一个相当活跃的角色。

当然，更令杨逵陶醉的，是到镇上妈祖宫去听一位老先生“讲古”。听《三国志》、《水浒传》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杨逵如痴如醉，无形中引发了他的文学乐趣。那些梁山好汉、造反英雄的形象，也对他的斗争精神发生了潜在的影响。还有布袋戏、歌仔戏，带着乡土台湾的民间趣味与戏剧精神，经常让杨逵沉浸其中，流连忘返。透过《济公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类戏，剧中那些英雄、神仙将他带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幻想世界里。农闲时节，乡下常有车鼓锣、采茶歌、驶犁歌等民间游艺；偶尔有马戏团到来，更是童年杨逵兴奋不已的“节日”。

杨逵的双亲虽是文盲，未能直接给孩子传授知识；但是他们开通明理，在贫穷的境遇中苦苦支撑，坚持让三个儿子都上学，这在当时的大目降街是很少见的。好学的杨逵藉由民间渠道所获得的知识启蒙和传统文化教育，不仅将他的幻想气质与最初的文学兴趣结合在一起，也使他的童年时代与府城台南一带的文化底蕴和民间风情，有了密切的联系。

真正让杨逵为之钟情的，还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光。1915年，杨逵进入大目降公学校读书。体弱多病的杨逵，虽然每天要忍受朝会时诵读日本天皇诏书的难堪，耳边经常回响着教师斥责台湾子弟“小清国奴”的骂声，而且亲眼目睹了台湾公学校与日本小学校之间的巨大差别，他还是非常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杨逵一直到小学毕业，都基本上保持了班级第一的成绩，在家乡一带被称为少年才子。杨逵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林允是大目降本地人，他对好学的桑梓子弟喜爱

有加,常常给予杨逵更多的指导和鼓励。杨逵真正对文学发生兴趣,是在小学六年级。当时的级任老师沼川定雄,是杨逵生命史上第一个可纪念的日本人。年轻的沼川定雄刚刚从学校毕业,怀抱一腔热情来台湾从事教育,对杨逵这个瘦小勤奋的学生十分疼惜。他主动邀请杨逵到家里,免费讲授将来上中学时要读的英语、代数、几何,还提供了许多文学名著,这令爱读书的杨逵流连忘返,眼界大开,由此进入了文学的启蒙期。

然而,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的孩子,是不可能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去幻想和描画人生理想的。现实风雨的严厉抽打,让小小年纪的他们和家乡父老一起体味到殖民地人民的痛苦。杨逵十岁那年,在家乡台南一带发生的噍吧哖事件,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创伤。

1915年5月,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背景下,台南人余清芳秘密结社,以“斋教”作掩护,发动了噍吧哖起义,后人也成为称西来庵起义。这是台湾武装抗日运动中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一次起义,它遭到了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当时,义军祭旗兴师,袭击日警派出所,焚烧敌人的军火粮食仓库,缴获多数枪械物资,一路声势浩大,附近农民志愿参加革命军者达到三千多人。是年8月6日,义军攻占通往台南的交通要冲噍吧哖庄(今玉井乡),遂修筑阵地于噍吧哖附近的虎头山。台湾总督急调重兵镇压,枪炮齐发。义军寡不敌众,死伤惨重,退居山中。日军乘胜追击,与警察合围搜山。义军或遭枪杀,或自杀,或被捕。日军又放火烧毁民房,百姓纷纷走避。8月22日,余清芳余部八个人在中央山脉被捕;1916年4月16日,躲入深山的义军首领江定,中了日本人的诱降之计,率部二百七十人归顺,却不料于5月18日被殖民当局全部抓捕。从台南监狱到临时法庭出庭时,余清芳等人皆以篓子罩头,宣判后即遭处决。

在日军的大屠杀中,被捕的义军将士有一千九百五十七人,而一次被判为死刑的竟多达八百六十六人!另外还有四百五十三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时间,血流成河,哀鸿遍野。杨逵的家乡人苏有志,一位很有名望的大目降人,因为资助了义军而被一同处死,留下了有志竟未能成功的惨痛记忆。至今台湾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云:“王爷公无保底,害死苏有志。”噍吧哞大屠杀是世界史上一件最残酷的案件,由于死刑人数创下世界审判史上的纪录,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界的责难,连台湾总督府法院的检察官上内恒三郎也不得不承认:“处死刑者超过千人,为世界裁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①

更有甚者,那些在噍吧哞之战中伤亡惨重的日本军警,事情过后,大泄怨毒,竟对噍吧哞一带的三千二百多名平民百姓施以集体屠杀。据目击者追述,这些居民“经临时检查局简单讯问后,以台人一百为一次被屠杀集团,依次屠杀,除妇女外,男子不分少壮老幼,皆就缚俯卧。……由特选精壮之日兵约三十人手持锋锐长刀,肆情挥舞,竞相斩杀。”^②遇害百姓身首异处,血肉模糊,头颅则盛以十七牛车运往台南,沿途滚落,惨不忍睹。浩劫后的噍吧哞庄人口大减,户籍一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勉强凑足当时遭屠杀之人数。

噍吧哞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因为大目降街是台南市通往噍吧哞庄(今玉井乡)的必经之路,整个街镇上的每一家都关门闭户,气氛非常紧张。杨逵家是老房子,门缝很宽,当日本炮车和武装部队浩浩荡荡经过时,杨逵紧握双拳,从门缝里目睹了这一切。他后来回忆说:

我十岁时,噍吧哞抗日事件发生,我亲眼从我家的门缝里窥看了日军从台南开往噍吧哞的炮车轰隆而过,其后,又

^① 上内恒三郎:《台湾刑事司法政策论》,第29页,转引自汉人《台湾革命史》,第83页。

^② 汤子炳:《台湾史纲》,第183页,转引自陈碧莹《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24页。

亲耳听到过我大哥(当年十七岁)被日军抓去当军伕,替他们搬运军需时的所见所闻。其后,又从父老们听到过日军在噍吧哖、南化、南庄一带所施的惨杀。每谈到“搜索”两个字都叫我生起了鸡皮疙瘩。所谓“搜索”就是戒严吧。站岗的日军每看到人影就开枪,一小队一小队地到每家每户,到山上树林里的草寮、岩窟去搜查,每看到人不是现场杀死,便是用铁丝捆起来:承认参加的则送到牢狱,不承认的便送到大坑边一个个斩首踢下去。^①

经由目击大屠杀者的叙述,不满十岁的我对日人杀害台人的残酷手段,在心灵上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痕。往后几年也陆续得到更多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叙述,在我当时的心灵中,除了引起仇恨的反应外,还有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象。它在我后来的一生当中,起了相当大的影响。^②

后来,杨逵到台南读中学时,仍念念不忘小时候目睹以及听到的噍吧哖事件。在噍吧哖曾被夷为平地的村庄里,在空旷而萧索的田野上,跃入杨逵眼帘的是一片苍凉的景象:当年残存的老弱妇孺踽踽独行,成年男子则一扫而空,从而印证了传说中的大屠杀确有此事。

还有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合理的事,也给杨逵深深的挫伤和震动,不断加深他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十四岁那年,就在大目降街上,一直受父亲照顾的单身走贩杨傅,一个非常本分的小生意人,因

①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8页。

② 杨逵:《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2页。

为莫须有的罪名，竟被日警活活殴打致死。目睹了这幕惨状的杨逵，感觉十分凄惨，耳边总是回响着杨傅的哀号声，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童年杨逵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仇恨，也越来越强烈。

事实上，在日据时期长大的孩子，他们永远无法掠过被异族压迫的惨痛历史，幼小的心灵曾经遭遇的惊恐、创伤和震撼，将影响他们的一生。正因如此，“噍吧啤事件对杨逵以后的政治路线、文学内容有着根源性的影响”^①。

1921年，十六岁的杨逵从大目降公学校毕业，依照沼川定雄老师的建议，只身北上，到台北投考高等学校的初级部。由于当时教育制度的不平等，公学校的入学考试题目皆以小学校的教材为主，旨在录取日人子弟，排斥台人子弟。公学校毕业的杨逵，虽然一直成绩名列前茅，在此却只有望题兴叹了。考学失利后，杨逵遂到大哥服务的新化糖业试验所做了一年工友，负责搬东西、扫地、泡茶、抄写资料之类的杂务，工钱每天三角八分，仅够糊口而已。某日，因为被试验所里一个名叫高桥的日本人戏称为“杨贵妃”，杨逵非常生气。在他看来，杨贵妃不过是皇帝的花瓶罢了，他从小看不起这类人。于是，杨逵和高桥狠狠吵了一架，第一次对自己的本名有了不满。这期间，杨逵一边当工友，一边准备考试，常常靠着一盏煤油灯，蜷缩在自家的小阁楼里读书，一读就是三更半夜。

1922年，杨逵前往州立台南二中，投考这所新开设的开始实施日台共学制的中学。前往应试的家乡同学很多，最终却只有杨逵一人考中，成为该校的第一届新生，并担任了副班长。中学三年，杨逵对正常的课业没有太大的兴趣，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看课外读物。他常常泡图书馆、逛旧书店，见到好书，总要一口气连夜读完，白天上课免不了打盹。有一次，杨逵竟然在校长的“修身”课上肆无忌惮地睡觉，从走廊走过的代数老师，笑着说他是“豪杰”，因为上代数课时睡

^① 林梵：《杨逵画像》，（台北）笔架山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56页。

觉的人很多,但是敢在校长课上睡觉的人,一定要有过人的胆量。杨逵后来说,这与胆量无关,只是挑灯夜战留下的后遗症。那时主要为了兴趣与好奇而读书,对于说教的书籍特别反感。白天上课打瞌睡,晚上过着猛烈的乱读生活,这使杨逵在台南二中颇有些知名度。所幸的是,他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作文课,题目自拟。当时杨逵刚看完一本新渡户稻造的《修养论》,对这位日本大博士拘泥于古代教条的诸多论点颇有异议,于是就大发议论,在文章中批评了新渡户稻造。作文老师是刚从日本来的,不像在台湾久住的日本人那样具有盲目的优越感,对杨逵的越轨文章不仅没有批评,反而在课堂上当着同学的面朗诵,嘉许了杨逵的批评精神。这使杨逵颇受鼓舞,对政治、社会、思想的问题也更加关心。

读书寂寞的时候,杨逵也曾独自穿行于台南府城的大街小巷,游览赤嵌楼,出入安平古堡,瞻仰郑成功庙,诸多的名胜古迹印在了他的心上。祖先胼手胝足的开拓精神,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的英勇气概,都令杨逵充满了敬意。再回到现实的世界里,面对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经历的噶吧哖风暴,杨逵不由得对台湾人的命运生出几多感慨。

对生活的体验和实践,逐渐培养了杨逵喜爱思索和行动的性格特质。杨逵读中学的时候,每遇放假回家,他都高兴和朋友们一同到乡下去玩。有一夜,他们要经过一条小路,那里阴森森的,据说不断有鬼出没,小孩子们晚上从这里路过,因为路窄心慌,常常挤作一团,碰得头破血流,于是这里便有了“鬼峒”的名字。杨逵不信这个邪,他和一个胆大的朋友,决心把“鬼峒”的事情闹个明白。于是,他俩一前一后,夜闯“鬼峒”,来回走了两个来回,并未发生什么“恐怖事件”。但在走第三趟的时候,忽然迎面过来一个无头的高高的黑影,让杨逵和朋友顿时紧张起来。凭着年轻人的冒险精神和求知心理,他们还是站立脚跟,屏住呼吸,等待事态发展。终于对面有人说话了:“你们

不是要走过来吗？快一点走吧！”这一来，狂跳的心渐渐安定下来，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挑柴的人。这次要弄清“无头鬼”真面目的经历，虽然让杨逵和朋友吓得捏了两把汗，但更让杨逵明白了：“勇敢的冒险与仔细的观察，在探求真理、在求真知的途径上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困难的事情。”^①

杨逵的中学时代，正值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之际，社会革命的呼声尤为高涨。热衷于文学阅读与思想探索的杨逵，沉浸于各家学说之中，眼界为之一开。文学作品以帝俄时代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作品最为喜爱，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人的小说，特别是雨果的《悲惨世界》，都是令他感动的作品。每每深感社会黑暗渴望寻找出路时，这些小说就带给他抗争的启示和力量。

思想类的作品中，杨逵又对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著述印象深刻。1923年9月，也就是关东大地震的那一年，大杉荣因为思想主张问题遭受迫害，举家的老弱妇孺被日本宪兵甘粕大尉推入井中。此事在报纸上披露后，杨逵大受刺激，他一向认为思想应该是自由的，没想到日本政府竟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对付思想家。

另一件令杨逵思路轰毁的事情，是他在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了日本人所著的《台湾匪志》。^② 杨逵无法忘记他当时心中的巨大震惊：

到我稍大，在古书店买到一本《台湾匪志》，它记载了十多次的所谓“匪乱”，当然噍吧嘽事件也记载在里头，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史”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也看出了

^① 杨逵：《半罐水叮咚响》，原载1955年11月绿岛《新生活》壁报“国父纪念周刊”；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8页。

^② 日本人秋泽乌川所著，（台北）杉田书店1923年4月5日出版。

暴政与义民的对照。

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至于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形态抗议,自然就成为我所最关心的主题。^①

至此,一个接受了文学启蒙的杨逵,一个走向独立思考的杨逵,一个唤起了民族自觉反抗意识的杨逵,正在悄然形成。

三、游学东京的热血男儿

1924年夏天,为了寻求人生理想和思想出路,十九岁的杨逵不顾一切地东渡日本,奔向他生命的另一岁月。

20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台湾青年》、《台湾民报》的创刊,加之台湾留学生在东京的崛起,台湾的抗日民族运动方兴未艾。杨逵的赴日留学,是在当时的文化启蒙氛围影响下,思想与生活受到双重波荡的结果。杨逵读中学的那段时光,每年暑假都有留日学生组织的文化演讲团返回台湾推展文化启蒙活动,杨逵时常参加,也结交了几位朋友。

有一次,留日学生到杨逵的宿舍来,正听见杨逵和同学们在念一首用英语、台语、日语连成的打油诗:

Country King Policeman(草地皇帝是警察)

^①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8—389页。

腰佩油抽 汪汪汪！

其中一位留学生便说：“你们都很天真，骂这些混混几句有什么用？你们把他们腰佩的剑说‘油抽’好玩，但它是可以杀人的啊！你们把他们说成狗，但那不是空吠，也会咬人的。我们要民族自决，要解放我们的土地，就应该有学问，有信心，有觉悟，有组织……才成。光戏谑几声是没用的。”他还说：“在东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国自由思想家、改革者的著作，也可以看到世界名作家的书，又可以半工半读。”^①此时的杨逵，泡在台南的中学里，每天要听日本天皇的敕语，看那些统治者的横行霸道，心中早就有些不耐；加上他深感台南二中的天地狭小，三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对学校的课业兴味索然，因课外读物引起的求知欲，却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也感觉课外读物已渐渐无法满足需要，最后促成了我远赴日本求学的决心。”^②所以，那位留学生朋友的话，自然让杨逵心有所动，而远赴日本求学的决心，无疑是他生命历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并影响了他整个人生。

另一方面，急于摆脱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也是促使杨逵留学日本的原因和动力之一。杨逵小时候因为体弱多病，父母一直担心他的成长。按照台湾民间的迷信说法，若将小女孩的衣服罩在身上，到庙里焚香朝拜，这样小孩子就比较好看。于是，在杨逵十二岁那年，父执之女梁盒的衣服就被送了过来。当时台湾的童养媳风俗非常流行，梁家与杨家平时相处甚好，家长们干脆协议让梁盒过门做童养媳。梁盒是一个有着红红脸颊和浓密黑发的女孩子，十二岁被带到

① 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页。

② 杨逵：《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8页。

杨家做“媳妇仔”。杨逵的父母因为自己的几个女儿都在小小年纪夭折,对梁盒更是疼爱有加。当然,替杨逵娶童养媳,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父母因为大哥的婚事,向人借了几百元,一辈子都要扛着这笔沉重的债务。他们为了培养二哥学医,甚至让他当了上门女婿。父母想帮助杨逵考虑婚姻问题,便早早地替他说下童养媳。但不知为什么,杨逵就是无法喜欢梁盒。家里的这种安排,使杨逵在公学校即成为同学取笑的对象,中学时代则更甚。性格内向的杨逵对这件事很排斥,他无法忍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未来婚姻格局,成年累月不曾和梁盒讲过一句话,可父母还要他中学一毕业就马上“送做堆”^①,这更令杨逵心焦。

面对如此窘境,赴日求学在客观上就成为解脱这种婚姻束缚的途径。于是,杨逵中学未毕业就退学赴日;到日本后给家里的第一封信,即表明他要解除婚约、切断与童养媳一切关系的决心。但双方父母却回信说,女孩子会永远等着杨逵衣锦还乡,如果杨逵来日另有意中人,可娶梁盒做妾。这让杨逵伤透了脑筋,他不想耽误女孩子的终身,也不愿委屈自己的心意。他知道,以自己的性格来看,如果被金钱、道义和姻亲等等捆绑得动弹不得的话,他是绝对无法脱身的。自我个性与现实的冲突,难免会让他走上绝路。杨逵再度写信,情绪十分激烈,声言若此事未获解决,他必定不再回来。几个月后,事情总算解决了。梁盒后来嫁给杨逵大目降公学校时代的一位同学,听说婚姻幸福美满。从此,杨逵和梁盒一直没再见过面。

对于杨逵这样的贫家子弟来说,赴日留学的费用是一种极大的负担。父亲开的锡店,仅够糊口生活,而杨逵自己又没有经济来源。所幸兄弟之间一向手足情深,大哥给了他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二十元钱,还把自己新婚的棉被与西装给了他,总算让他出门有了一身行头;二哥卖掉他心爱的小提琴,凑了二十元给杨逵做旅费,梁盒的父

^① 此系台语,指圆房完婚。

亲亦送他二十元钱。就这样，带着东拼西凑的六十元钱，怀着一种踌躇满志又前程未卜的复杂心情，杨逵和故乡两位毕业于台北工业学校的青年，搭上一艘四千多吨的小商船，远离熟悉亲切的故土家园，前往举目无亲的日本。

从1924年8月抵达日本，到1927年9月返回台湾，杨逵在东京度过了三年最为艰苦的漂泊生活。初到人地生疏的日本，正值世界经济大恐慌日渐严重的时代，日本的失业人口在1924年已高达七十万左右。一年前遭遇大地震的东京，大街小巷到处是用木板临时搭建的小屋和行色匆匆的路人，灾难的痕迹随处可见。杨逵在这里的求学，不同于当时大部分读书的留学生，他必须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甚至是“九工一读”的方式，自己负担生活和学习，而他所面临的日本社会现实，又使这种个人奋斗显得异常困苦。由于杨逵在台湾时中学尚未毕业，没有直接报考大学的资格，他只能先行进入补习学校。

这段时间，杨逵白天到处找工作，靠打零工勉强度日。从泥水匠，木工，玩具厂小工，电杆工人，到邮局分发信件，当送报伙，他什么工作都干。日本帝国议会会议事堂重新建造的时候，为了每天一元的日薪，杨逵也曾肌肠辘辘地挑着沉重的混凝土，一步一颤地爬上高高的鹰架，把混凝土灌进钢筋和钢筋之间。大风刮来，残留的水泥吹进杨逵眼睛，刺痛得他无法睁开双眼。剧烈晃动的鹰架木板桥，让杨逵像水蛭一样整个人贴在那块木板上，才幸免被风刮下来摔死的厄运。做送报伙，辛苦奔波了几天，他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被报馆老板骗去了五元钱的保证金。最为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杨逵连房租都付不起，陷入了早上喝开水，中午吃番薯凑合一顿，晚上又空肚子苦熬的困境。好不容易从一位同学那里借到五角钱，竟然靠它度过了一个星期。

杨逵来到日本，为生活所迫，首先投身的是社会，而社会亦是学校。苦难的人生磨砺，使杨逵对社会人生的真实层面有了更为广泛

的了解,原来不只在台湾,日本人剥削台湾人,即使在日本,也存在着阶级剥削的悲惨事实和“人吃人”的可怕现象。这种深刻的生活经验,愈来愈唤醒了杨逵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这也是他后来的创作能够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与民族意识,站在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立场上,去拥有广泛的社会关怀面的重要原因。

去东京求学,杨逵的父亲原来希望儿子学习医学,但杨逵却为解决许多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而选择了文科,并陷入了“九工一读”的苦境。后来,杨逵的兄长曾来信劝说,如果杨逵放弃文学改学医学,他可以通过借贷供弟弟读书,这样才能改善经济状况。而对于杨逵来说,他之所以“到日本志愿读文学,就是想用写小说的方式把被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①。当医生本不是杨逵的志趣所在,何况他一直钟情于文学,所以矢志不移。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杨逵不断地挨饿,不断地打工,仍然坚持了工余时间的功课补习。

1925年冬天,杨逵先是通过颇有难度的专检考试;又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报考了私立日本大学夜间部的文学艺术专科。日本大学位于东京市区,这是一所学风相当自由的学校,选课空间大,又没有硬性的考试制约,学生生活很是惬意。由于时局动荡,没有人愿意躲在象牙塔里,学生多半参加各种聚会。杨逵入校后,对文学艺术科主要讲授的现代文学、电影、戏剧等项,反而降低了研究的兴趣。

他不愿坐在教室里听那些刻板的课程,更热衷于博览群书和参加社会活动。他经常呆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阅读那些充满社会性、思想性的著作,希望为人生打开更大的天地。每每夜晚从图书馆出来,走在满天星光下,无论多么疲劳,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激励着他:

^① 杨逵:《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经验》,原载《中华杂志》252期,1984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8页。

多多充实自己,及早回台湾加入民族运动的行列,台湾会用得着我的。

1925年前后,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思潮激荡下,中国大陆、朝鲜、日本以及台湾都卷进了激烈的思想论争之中。杨逵在那时开始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了解两种世界大事:一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二是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这期间,日本的社会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著大量流行;在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安部矶雄、山川均等人的领导下,劳工运动依次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1923年7月,日本共产党非法结社;1925年12月,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成立了农民劳动党,虽在两个小时之后即被日本政府取缔,但不久又出现了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关西民众党、社会民众党等众多团体。那时的日本大学有很多思想研究的组织,受其影响,杨逵一方面致力于组织文化研究会,而读书过程中所讨论的,不只是文化问题,更重视思想研究。他逐期阅读发行于东京的《台湾民报》,从中了解台湾的社会运动。读书方面,杨逵先读了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几本著作,接着读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著述,思想上颇受震动。不久,马克思主义逐渐盛行,杨逵又开始接触了《资本论》,从中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杨逵的思想发生急速变化后,即把参加社会运动当作思想的实践。当时,日本大学有很多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组织,这些组织除了研究社会科学之外,还很注重社会问题的考察。正如杨逵所谈到的那样:

入学不久,我即参加了由学生所组成的工人考察团,到浅草地区的一间寺庙考察“工人集中区”,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贫民区。那里有一大堆的工人挤在寺庙的地下室,天寒地冻只有草包可以御寒,冻死了不少人。这使我对于社会

的黑暗面,有了刻骨铭心的印象。^①

正是在深入社会底层和参加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杨逵深刻地认识到实践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体会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力量,这促使他走向一生的行动家。1927年的五一劳动节,在日本皇宫的“二重桥”前,杨逵参加了“打倒田中反动内阁”的示威游行,揭开他一生社会运动的序幕。后来杨逵又投入声援朝鲜人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演讲会,在高喊示威口号的时候被日本警察抓走。这是杨逵生命史上的第一次被捕。留学日本的三年,杨逵正是在思想和行动的結合中接受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并形成他一生信守不渝的世界观。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杨逵没有忘记他最初立下的文学志愿。1925年10月,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运动开始蓬勃起步,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一时成为文坛主流。杨逵得风气之先,很快融入这样的文学运动。他不仅大量阅读了日本进步作家的作品,接触了普罗文学家所创办的《文艺战线》、《战旗》等杂志;还结识了秋田雨雀、岛木健作、叶山嘉树、洼川稻子、前田广一郎、德永直、贵司山治、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武田麟太郎等日本著名作家。与日本文坛的往来,丰富了杨逵的文学经验,也使他和日本进步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杨逵最困难的时候,宫本百合子曾送给他十元生活费,这令他深为感动。他还直接参加了日本新剧领导人、普罗文学作家佐佐木孝丸主持的“演剧研究会”,以戏剧为武器,直接影响于社会。

1927年9月,杨逵的处女作《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样办才不会饿死呢?》,以“杨贵”本名发表于东京记者联盟机关志《号外》(月刊)上。杨逵拿到了七元五角钱的稿酬,这是他最初的文学试

^① 杨逵:《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0页。

笔,也是他第一次领取稿酬。但这篇处女作给杨逵带来的,不是甜美的回忆,而是一种余悸犹存的感觉。那时,为生活所迫的杨逵,每天在日本帝国议会议事堂的修建工程中当建筑小工,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让他差点丢了命;他的处女作就是在这种惊恐之中写出来的,作品内容也正是反映自己这一时期的打工生涯。杨逵于30年代发表的成名作《送报伙》,呈现的仍旧是这段日本生活的经验。事实上,杨逵后来所拥有的“普罗文学健将”之称,究其源头,还是得力于当年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和奠基。

1927年,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达到顶峰,农民团体、工人团体、文化团体纷纷成立,斗士的需要也就显得非常迫切。杨逵在东京,经常接到各种团体负责人的来信或电报,催促他返回台湾参加社会运动。那时,他虽然学业尚未完成,但也觉得情势迫切;于是,带着飘泊东京的人生历练,怀着新的思想主张与实践经验,响应台湾农民组合召唤的杨逵,于1927年9月踏上了返回台湾的道路,准备迎接一场更为艰辛的战斗。在归程中,杨逵脑海里所浮现的是这样一幕:

我满怀信心,从巨轮蓬莱号的甲板凝视着台湾的春天——这宝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表面虽然装得富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这恶臭逼人的血脓的逆流!^①

四、时代前沿的革命伴侣

1927年,在台湾民族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头。

1927年,在杨逵个人的生命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新的

^① 杨逵:《送报伙》,《鹅妈妈出嫁》,(台北)香草山出版社1976年5月版,第135页。

起点。

从社会形势来看,一方面,台湾的工农运动在台湾文化协会的大力鼓动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北门、新营、大化、二林、桃园等地的农民组合支部纷纷成立,全岛性的多行业工人罢工浪潮也此起彼伏。台湾农民组合在当时颇具力量,拥有两万多会员、十多个支部的阵势,本部设在台中,农民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抗日本人。

另一方面,随着多种世界性政治文化思潮在台湾文化协会内部的逐渐滋长,原本以民族自决主义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1927年1月3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公会堂举行临时总会,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分裂成两派。其右翼以民族主义派林献堂、蔡培火、蒋渭水为代表,他们认为台湾应以民族运动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借以与资本家相抗衡,因而主张采用合法手段,在不触犯日本宪法的前提下,改良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一派宣布退出文艺协会,另组台湾民众党。其左翼以社会主义派连温卿、王敏川为代表,成立了“新文协”,并主持日后工作。他们认为台湾资本主义不可能独立发展,主张将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强调以阶级运动作为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政府斗争的主线,并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惟一目的,推行阶级运动,争取台湾的民族解放,以达成阶级解放的目标。台湾文化协会在内部的矛盾斗争和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下,从1927年的分裂到1931年底濒临瓦解,这使台湾抗日民族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开始面临着从高潮走向低落的变化,革命队伍也经历着分化重组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的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转捩点上,杨逵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家园,开始了一个文化斗士为理想而奔走呼号的革命生涯。几乎是一踏上台湾的土地,杨逵就马不停蹄地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浪潮中去。在台北的文化协会认识了连温卿,随即参加“文协”举办的民众演讲会,巡回各地进行抗日民族思想的宣传工作。

不久,杨逵在台中与农民组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赵港相会,由于志同道合遂组织研究会。之后,杨逵屡接简吉电报,造访简吉于凤山

农民组合,在此认识叶陶,开始了他生命与感情的另一纪元。

1927年10月,杨逵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同年12月5日,起草台湾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大会宣言,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十八名中央委员会中的五位中常委之一。全力以赴投入农民组合运动的杨逵,在拥有两万五千会员的台湾农民组合中,后来成为其政治、组织、教育三个部门的部长。他以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出入于社会运动斗争的前线。

1928年2月3日,台湾农民组合组织了特别活动队,杨逵负责政治、组织、教育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并担任竹林争议事件负责人。同年,他又受聘于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台湾大众时报》,后因竹林争议事件,与农民组合委员长简吉意见相左。由于工作意见的分歧,再加之个人的成见和恩怨,简吉先是污蔑杨逵懒于工作,忙着和叶陶谈恋爱;然后又造谣言,说杨逵与实际上关系并不密切的连温卿组织“反干部派”,遂两次动员投票,勉强得胜,剥夺了杨逵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了杨逵作为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的位置。

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渗入了台湾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杨逵对此心里有数,但并未与他们密切接触。杨逵对文学仍然怀抱一种使命感,因而不能转入“地下”。而另一方面,台湾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看到杨逵在农民运动中东奔西走,四处演讲,随时有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的风险,也无意于向杨逵表白什么,以免牵连地下党的安全。这之后,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农民运动的弹压政策越来越紧张,抗日民族阵线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更加复杂,在农民组合与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中受到双重排斥的杨逵,逐渐由社会运动的峰巅状态趋于沉寂,转向另外一种角色和方式的斗争。

尽管参加社会运动的道路充满艰难曲折乃至个人的挫伤,杨逵仍然抱定了始终不渝的信念和热切峻急的姿态,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台湾的抗日民族事业中。那时的杨逵,始终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曾用大写的一首诗贴在案前墙上——“扬帆出大海,风浪日常事。

顺风虽爽快,逆风也不惧。”这无疑成为杨逵从事社会运动的形象写照。更具体的实践与行动,可从杨逵的回忆中略见一斑:

民国十五六年前后,政治社会运动在台湾正炽烈进行着,文化团体、农工组合等像雨后春笋般抬起头来,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台湾青年会”,办“台湾青年”,暑期间回来带动巡回演讲队,深入穷乡僻壤,举行文化活动,做政治宣传。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十六年九月中,我自东京回到台湾,当天晚上就参加文化协会的演讲活动,随后跟着农民组合的演讲团,几乎跑遍三分之一南台湾的乡村。往往,山区几十里路才有两三处人家,必须费好大力气才能纠集起来办演讲;有时,天色黑了,正在半途中,前不着村,后不接店,就随便找个茅棚,寻些稻秆铺在泥地上过夜。^①

在日据时期从事农民运动,不仅仅要面对无数的艰难困苦,更要承担生命危险。为了逃避日本警察,杨逵要随时寻找树林或甘蔗园隐藏起来。炎热的夏天,躲在密不透风的地方,身上常常被蚊虫叮咬得红肿一片。有时情势紧急,眼看日本警察追捕过来,来不及隐藏的杨逵,便叫农民把他装入麻袋内,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以此躲过劫难。颠沛流离中有过多少次的生命危险,早已融进那段苦难的历史,仅在日据时期,杨逵被日本人逮捕就多达十次,进出监狱成了家常便饭。

在如此艰苦的社会运动时期,杨逵有幸认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与他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人生伴侣叶陶。与叶陶的相遇、相知、相惜,到结为牵手相伴一生,是杨逵能够度过坎坷命运的情

^① 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 (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27页。

感支撑,也是他生命中的华彩乐章。他们两个共同书写的,是日据时期台湾革命者的一部爱情传奇。

作为从传统生活中走出来的新女性,叶陶为台湾的农民组织、文化启蒙、政治运动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奇女子,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叶陶,1904年5月25日生于高雄市旗后。父亲叶赐曾念过私塾,靠勤奋谋生,后来经营古物、杂货、米店等行业,终于白手起家。他曾被推为保正(今里长),在街坊邻里颇有影响力。母亲黄美邻,人称“赐婶”,平日为人豪爽,不愿受传统生活环境束缚,常于台湾岛内乃至祖国大陆旅游。父母开通明理,家业和睦兴旺;叶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很早就显示出性格中不平凡的一面。

叶陶年幼时,身边有婢女菊花伺奉,是一个中等家庭衣食无忧的大小姐。但她个性要强,从小不甘于人后。叶陶小的时候,按照当时风俗,父母曾为她缠足。成长的过程中,叶陶不断反抗,后来索性把裹脚布扔到旗津海里看它随波而去。九岁那年,得天足进入平和公学校读书。日据时期的台湾,由于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和当时的歧视教育政策,女孩子入校就读者数量甚微。叶陶得益于家庭的开明风气,一方面于公学校接受日本教育,另一方面亦读汉塾,从三字经、千字文一直读到《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经文。叶陶从公学校毕业时,由于成绩出色,被送至附设于台南师范的教员养成所受训。教员养成所是日本人为培养本岛人的师资而特别设置的,学员来自台南各地,本期为二十人。叶陶性格乐观,颇有男子气;平时不甘寂寞,好强争胜,凡事常常带头,与同学相处融洽,为人仗义,颇得人缘。一年的受训结束后,年仅十五岁的叶陶于1919年被派往高雄公学校盐埕分教场任教。后因盐埕一带地皮昂贵择址在三块厝建校,成为第三公学校。时任教师的叶陶,喜欢唱歌弹琴,性格爽朗活泼,讲起课来声音洪亮,督促学生严厉认真,学生们对她又怕又爱,私下里称她“乌鸡母”,颇能传其个性神韵。

叶陶后来走上社会运动的道路,有其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民主与民族自决风潮愈演愈烈,叶陶受其影响,对封建的“三从四德”发生怀疑,开始关心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命运。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以强劲的文化启蒙运动唤起民众,性格一向豪爽、追求个性解放的叶陶,得风气之先,有了一种生命的觉醒。特别是她几经转调,到高雄第三公学校服务后,与简吉成为同事,开启了她投身社会运动的楔子,也种下了与杨逵相识相伴的机缘。简吉作为那个时代的农民运动领袖,他一向勤于吸收新知,喜爱研究孙文学说,热衷于中国大陆的革命事业,对日据时期的台湾现状与社会前途甚为关心。叶陶在其影响下,开始接受新思潮,一个新的社会革命天地展现在她眼前。日本殖民主义的压迫,底层农民的困境,台湾社会的命运,使叶陶深感日据时期知识分子为社会、为乡土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当简吉放弃了教职,与黄石顺四处奔走组织凤山农民组合的时候,叶陶也毅然于1927年辞掉教职,前往凤山参加农民运动。从此,在社会运动的街头,在农民聚集的场所,开始活跃着叶陶勇敢的身影。

杨逵与叶陶的初次相识,是在1927年秋天凤山农民组合的一次欢迎宴会上。叶陶比杨逵早一步投身于农民运动,而杨逵是带着各种新知识和新信息刚从东京返回台湾,受简吉邀请新近加入凤山农民组合的活动。当晚的聚会上,大家都喝了酒,气氛非常热烈。叶陶拿出一把扇子,请杨逵题字。想起日本殖民政府专门对付反抗运动者的《匪徒刑罚令》,有感于叶陶女中豪杰的气概,杨逵大笔一挥,开玩笑地在扇子上题了“土匪婆”三个字,众人哄堂大笑,杨逵也在叶陶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踵而来的,是杨逵与叶陶在南部台湾农村为期三个月的巡回演讲。他们根据农民运动的需要四处奔波,风餐露宿,穿山越岭,在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斗争中加深了解,彼此亲密起来,由知心好友而结成终身伴侣。

共同的革命志趣和台湾的社会运动,把杨逵和叶陶的命运连接

在一起,尽管他们之间的性格并不相同。杨逵内向、安静,更适于伏案沉思,挥笔成文;叶陶则是外向的性格,挽着一个简单的发髻,身着一袭素朴衫裙,踏着一双放大的天足,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演讲时英气勃勃。他们不计较得失,不分内外,不分你我,而是积极地走同一条路,从事共同的事业,这使两个人反差鲜明的性格,反而有了一种互补,彼此非常合得来。朋友们常以“叶陶兄”和“杨逵嫂”的戏称,来调侃他们之间的性格差异与人生弥合。正是这种精神与灵魂的默契,支撑了杨逵与叶陶多灾多难却又忠贞无限的漫漫人生。

作为日据时期走在社会运动前沿的革命伴侣,杨逵和叶陶的前卫意义还在于他们对封建道德观念和婚姻制度的大胆反叛。当时,这对恋人的感情遭到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杨逵的父亲说,儿子找了叶陶这么一个四处乱跑的“鲈鳗查某”,无法过日子;叶陶的父亲也说杨逵是个“罗汉脚仔”,既没职业,也无家产,不能托付女儿的终身。特别是到了1928年,杨逵与叶陶在彰化组织读书会时的租房同居,更让双方家长感到大逆不道。而在他们自己看来,“我们只问是否相爱,是不是好伙伴,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法。”“我们对制度和形式并不重视。人的结婚,最要紧就是双方谈话会投机,兴趣相同,志同道合。这样结婚仪式就不重要了。”^①

1929年2月11日,杨逵与叶陶共同列席台南总工会会员大会,并发表演讲。预定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返回新化镇举行结婚典礼,不料是日凌晨,住在文化协会台南支部的杨逵与叶陶双双被捕。他们被脚镣手铐紧铐在一起,从警察署押送台南监狱,再转至台中监狱。一路上,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还以为他们是因为私奔而被抓的。在这场全岛性的大检举中,农民组合总部与各地支部遭到日

^① 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7—168页。

本警察的大规模袭击,三百多所住宅被搜查,二百多名领导干部包括十三名中央委员锒铛入狱,全省被捕者共有四百多人,农民组合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杨逵与叶陶这对原本要进入洞房的新婚夫妇,却被双双关押牢房十七天之久。出狱一个月后,杨逵与叶陶在家乡新化镇结婚。起初暂住新化杨家,遂转往高雄定居。每每杨逵回首这段经历,会幽默地称之为度过了一场“官费的蜜月旅行”。这也是杨逵的第九次被捕坐牢。

在充满腥风血雨的日据时期,杨逵与叶陶双双出入于农民运动的身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召唤。担任农民组合政治、组织、教育部长的杨逵,与担任妇女部长的叶陶并肩战斗,以巡回演讲和发表文章来唤起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当时,日本的大资本家或大商社,如三井物产会社、三菱财阀等,往往倚仗财势向台湾总督府申请土地,以强制手段把农民辛辛苦苦开垦的土地霸占;或以微不足道的金额收购稻谷、甘蔗、香蕉、凤梨等农产品,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强势的经济剥夺,不断引起争议案件,杨逵与叶陶常常潜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为争取应得的权益与日本殖民者展开斗争。当时影响较大的争议案件,诸如因日本拓殖会社所有的三千甲土地引起的佃农争议,南投农民反对山本农场承领九百四十五甲林场的斗争;嘉义农民阻止日商赤司在番路庄承领地强种五百八十八甲凤梨园的斗争;以及其他由大日本制糖、新高制糖、盐水港制糖所引发的纠纷和斗争,杨逵与叶陶都参加进来,搞演讲,造舆论,策动农民奋起,反对日本的殖民掠夺行径。

在社会运动的舞台上,沉静内敛的杨逵也会大声热辩,激情澎湃;明朗、果断的叶陶,更是雄辩过人,豪气冲天。叶陶演讲的时候,每次总有日本刑士守着,但他们听不懂台语,只好找人翻译。而叶陶故意说一些无法翻译的台语,让日本人干瞪眼。叶陶讲,“日本人说,日本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变好,变富足了。不错,你看,我们现在吃

的是‘珍珠糜’、‘凤眼饭’(饭里掺地瓜),住的是去一与去义厝^①,穿的是打结仔裤……”。^② 叶陶说到这里的时候,周围的农民群众热烈鼓掌,连声叫好。杨逵与叶陶为农民运动的奔波与演讲,自然也触怒了日本殖民统治者。

1928年竹林事件发生后,杨逵到各地组织农民运动,先后于竹山、小梅(梅山)、朴子、麻豆、新竹、中坜等地,连续六次被日本警察逮捕。因为出双入对,叶陶也与杨逵一同被捕。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是在梅山召开的农民大会。大会通过一件抗议文,由杨逵执笔并把它寄给日本总理大臣和台湾总督府,杨逵因此被捕。经过三审在台南高等法院开庭,周围有许多民众聚集观看。当法官起立念起诉书时,竟把抗议文中的一句话“日本政府是土匪”也念了出来,当即引起满堂的掌声,令日本法官尴尬不已。这次被捕,杨逵被判决坐牢七天。但坐满刑期出狱时,监狱的看守却向狱中犯人大谈杨逵敢做敢为的风采,还说杨逵是替台湾农民牺牲的义士,要犯人们向杨逵学习,不要再做盗鸡换狗的小偷。抗日宣传活动竟然在狱卒中也发生了影响,这对杨逵来说,无异于一次坐牢“坐得非常愉快”的经验。日据时期的漫漫长夜里,杨逵因为从事社会运动而被捕,竟然达到十次之多,这在台湾文坛乃至台湾历史上,也算得上“坐牢之最”!每每遭遇生死威胁的时候,叶陶都与杨逵坚决地站在一起,或双双入狱,或独自挑起家庭重担,矢志不移地等待杨逵归来。

多年以后,曾经有人问及杨逵,他和叶陶的感情生活与今天人们鼓吹的新女性主义有何相关之处,杨逵这样答道:

^① 此系台语,意为“叮咚屋”,指漏雨的屋,屋子漏雨时响起滴滴答答的水声。

^② 杨素娟:《心襟上的白花》,原载《联合文学》第1卷第8期,1985年6月版,第28页。

新女性主义者也曾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我们以前的种种比现在的新女性主义更前进一步，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谈好条件，划分好权利义务，而是积极走同一条路，不计较得失，不分内外。而她比较健谈，在办杂志时，常常是她去跑路接洽事情。而我要写稿，办编务等，在家的时候多，所以有时煮饭、洗衣、看顾小孩的事由我来做，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所以有朋友开玩笑，叫我们“叶陶兄”、“杨贵嫂”。在这种困难的生活中，实在需要这种合作，共同承担一切。重要的是，我们的基本思想相同，所做的事业相同。她的女权主张和我的活动相配合，目标是一致的。这种女权运动是针对整个社会，并不仅是在家庭里向丈夫争平等、争利益而已。^①

为共同理想而缔结的爱情创造了怎样的人生奇迹，杨逵与叶陶并肩走过的道路，令世人感佩、唏嘘。杨逵从一介书生到社会斗士，从书斋作家到大地园丁；叶陶从家境优裕的大小姐，到台湾妇女运动的急先锋；从首阳农园的“卖花婆”，再到社会尊敬的“模范母亲”，这对“革命鸳鸯”经历着苦难的人生，却始终满怀希望，乐观向上，甘之如饴。何以使然，惟爱而已。在这个世界上，叶陶简直可以说是为杨逵而存在，她视杨逵为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她把一生都奉献给杨逵以及广大受压迫妇女，虽然她同杨逵并肩战斗，在社会与家中皆为地位平等的革命伴侣，但对于叶陶而言，人生在她不是享受而是更大的负荷，爱和奉献始终是这位台湾妇女运动先驱者的真实写照。杨逵也把叶陶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和她是亲密无间的夫妻，相濡以沫

^① 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8页。

的牵手,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相知相爱的两颗心分开。1970年8月1日,身患心脏病、肾脏病并发尿毒症的叶陶,在以六十六岁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抚着杨逵的手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而这之后,一直沉浸在痛苦与思念中的杨逵,则徘徊于东海花园的叶陶坟墓前,每天在这里做早操给叶陶看,继续充当爱情的“守护神”。

“昔日脚镣手铐度蜜月,老来胼手胝足相扶持。”正是杨逵与叶陶一生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真实写照。在他们那里,革命生涯催开的青春玫瑰,志同道合坚守的社会理想,爱情力量支撑的坎坷人生,成为人间感天动地的生命乐章。

五、登台亮相的文坛健将

作家杨逵的真正出发,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走向低谷的时候。童年记忆的延续,现实斗争的激励,将杨逵塑造成为一个充满抗争精神的行动者;而知识分子实施反抗的最有效途径,便是诉诸文字、语言,用文学创作唤起民众。自从杨逵决定了以文学为武器,投身到台湾的社会革命运动中,他就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奋争之路。在漫长的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愈演愈烈的白色恐怖,台湾社会运动不断的起起落落,新文学阵地所遭遇的风风雨雨,世事时局的每一次动荡,都会带来台湾进步知识文化界的命运变迁。而杨逵,是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家庭乃至生命全部融入台湾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无条件地奉献给自己的乡土。他在那些动荡岁月中所经历的颠沛流离,他在艰难蹇厄中开始的文学出发,更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负荷。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不定,个人命运怎样起伏跌宕,惟一不变的生命原点和精神支撑,就是杨逵对于祖国和乡土的孺慕情怀。而文学创作,则是杨逵这种心声的代言方式。

20世纪30年代的杨逵,不仅负载着家国仇、民族恨的时代仇

患,还经历着贫穷、疾病、厄运的重重缠绕。在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并恶化的情形下,杨逵不断地调整与更换自己的人生角色,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出发。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台湾的社会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时期,整个社会再度陷入全岛性的白色恐怖之中。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一是日本殖民者对“雾社起义”的残酷镇压,二是对台湾革命力量连续不断的全岛性大检举。就前者而言,1930年10月27日,台湾发生了震惊全岛的“雾社起义”。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海拔一千二百三十公尺的山地上,地势险要,风景秀丽,是当时日本统治“蕃地”的中心之一。居住在台中州能高郡雾社庄的高山族人民,构成了由十一个社组合的雾社部落,他们一向具有光荣的抗日革命传统。在日寇的野蛮压迫和疯狂榨取下,郁积了太多新仇旧恨的雾社人民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让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惊恐万状的日本殖民者立即出动武力血腥镇压,甚至违犯国际公约施放毒气弹和燃烧弹,把大批义民毒死在山谷里。当时参加起义的六个社庄,原有人口一千二百多人,在经历敌人的大屠杀之后,只剩下二百九十八名老弱妇孺,还被强制迁移到埔里北面的眉原(川中岛)去。“雾社起义”发生在日本统治这块所谓“模范殖民地”三十五年之后,它宣告了日寇对台湾原住民的“讨伐”、“绥抚”和所谓“理蕃政策”、“同化政策”的破产,给日本殖民统治体系以沉重的打击。“雾社起义”失败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台湾的全面控制,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全岛。

就后者而言,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为了消灭台湾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频频制造政治高压事件。1929年2月12日,日本殖民者突然出动全部警察特务进行全岛性的大检举,各地“文协”、工会、农民组合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千多人,全部遭到搜查和逮捕,由此造成震惊一时的二一二事件。随着荻洲担任台湾军参谋长之后,殖民当局的军部权势骤增,对台湾人民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1931年2月,日本总督府宣布取缔“台湾民众党”;3月至6月,又举行全岛性的大检

举,逮捕被疑为与台湾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士一百零七人;9月至11月,再度举行大检查,逮捕革命者和积极分子三百一十人。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联盟以及台湾共产党或遭取缔,或自行解体,左翼力量遭受重创,公开的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转入地下斗争。面对这种政治时局的风云突变,借重合法的文学运动开展文化政治斗争,就成了当时的惟一出路。

1931年前后是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由高潮走向低谷的阶段,也是杨逵一生中最为失意的时候。但在杨逵看来,“生活上最潦倒的时候,却是我写作热情的盛季,生活环境的困难并不表示精神的潦倒,《送报伙》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写出来的”^①。当时,台湾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将他们的主要力量转移汇聚到文学活动与创作上来,新文学运动得以迅速发展与提升。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社会斗士的杨逵的一度沉默,作家杨逵开始登场亮相。事实上,文学活动也是杨逵实践思想理想的一种方式,是他透过小说世界启示来带动台湾民众的觉醒和参与。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上,能够始终靠脚踏实地的劳动来生存,并从大地和乡土直接汲取生命能源和文学经验的,惟有作家杨逵。

杨逵从小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但苦于一直没有实际写作的机会和经验。在日本半工半读求学的那几年,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寻找思想出路上;返回台湾后,又全身心投入社会运动的潮流中,一直在风口浪尖上搏击人生,难得有时间坐下来安心构思。所以,在二十七岁以前,创作对于他仍旧是一个梦想。

1929年在彰化,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山人赖和先生的相识,成为杨逵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在赖和的影响和指导下,杨逵大

^① 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遗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2页。

量阅读现代文学与本土作家的作品,更加坚定了他以文学为武器,唤起台湾民众精神的创作宗旨。在此之后,杨逵的文学出发,常常与坎坷的人生命运相伴随,创作更成为社会低潮与生命逆境中的一种坚持。这一年,台湾文化协会及农民组合被日本殖民当局破坏,杨逵与叶陶也被抓进监牢。出狱之后即结婚的杨逵与叶陶,迁徙高雄谋生。先寄寓旗后叶陶的娘家,后迁居于苓雅寮。因为杨逵夫妻皆名列于警察的黑名单,经常受到管区警察的盘问,邻居大都避之惟恐不及,几乎没有人敢和他们交往。为了生存,杨逵做过清道夫、修路工人、砖厂工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于困境中苦苦挣扎。

这时,叶陶靠了缝制成衣来补贴家用。她曾发明一种儿童穿的方便开裆裤,立时合并,蹲下去时裤裆自动敞开,小孩子撒尿不会脏了裤子。叶陶马上申请了专利,后来又请人来帮助制作,再交给中盘商。想不到,那中盘商因为债务而逃跑,导致了杨逵与叶陶服装加工生意的失败。1930年黯淡的生活现实中,又增添了长女秀俄出生的啼哭声。紧接着,家乡传来噩耗,在台南县新市开业行医的二哥杨趁,入赘陈家后,因不堪精神虐待和婚姻破碎而自杀身亡。杨逵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心灵遭到巨大创伤。忍受着时代忧患和个人苦难的双重磨折,杨逵选择了归农与写作的人生方式。

1931年,杨逵在高雄内惟的寿山脚下,以一年八元的租金,租了一所据说常会闹鬼而无人敢住的房子,蜚居下来。这所房子紧挨着山壁,周围经常有猴子出没,耳畔不时响起猴子的叫声,有时它们还顺着延伸过来的龙眼树枝跑到房顶上。白天,杨逵为生活不停地奔波,他出没于树林草丛,攀爬于山坡断崖,劳碌几天砍够一车木柴,便向朋友借来一台拖车运到高雄市去出卖。每次卖的钱只够买半斗米、一条咸鱼,有时还可买到一本杂志。生活是如此艰难,杨逵却未曾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打算。因为是从狱中释放出来的人,杨逵砍柴为生的时候,仍有日本警察尾随监视,想不到这却在无形中“保护”了杨逵,让他能够公然出于保安林中,暂为樵夫。

白天的忙碌使夜晚的静寂更加鲜明,窗外只有山风阵阵,不时传来几声虫鸣。每每这时候,杨逵心中的创作欲望跃动不已,难以自抑。常常是在家人进入梦乡之后,杨逵跪坐窗户下的矮桌前涂涂写写,不知不觉之中已是夜半三更。最初的写作并不顺利,心中虽然满溢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情感,但从笔端流淌出来的,却是时断时续、零零落落的文字;夜半时分,孩子睡梦中惊醒的哭声,也会打断他的思路。创作的过程中,杨逵的脑海里不断地回响着:我如何代替台湾同胞说话?什么时候可以写出像果戈理一般的伟大作品,展示积极、愤怒的抗议姿态?

在坚持不懈的摸索和努力中,杨逵于1932年夏天完成了他的小说代表作《送报伙》。经由赖和介绍,8月间发表于《台湾新民报》。但小说刊出前半部以后,下半部的稿子寄去半年之久,却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后来杨逵才得知这篇作品已经被日本殖民当局查禁。《送报伙》被查禁之际,也是杨逵的长子即将出生之时。小说难产,婴儿也难产,这让杨逵充满生命的悲凉。当时,杨逵穷困到全身上下只剩下四分钱,连助产士都请不起,只好找邻居老太婆帮忙,因为没有处理好脐带,小孩到了十多岁肚脐还经常流血。再加上营养不良,小孩出生不久就患了夜盲症。多亏后来在台中经杨肇嘉先生嘱咐,每天从“醉月楼”送来鸡肝服用,再加上赖和先生的悉心治疗,才得以痊愈。

即使遭遇如此困境,杨逵仍然坚持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信念,为这个孩子起名为“资崩”。杨资崩在《我的父亲——杨逵》一文中也曾谈到这个事实:“爸在全部财产只有四分钱的时候,让妈生下了我,取名资崩,意为资本主义崩溃。”^①

^① 杨资崩:《我的父亲——杨逵》,原载《联合报》1986年8月7日。

叶陶也曾以自己的这段生命经验为底稿写成《爱的结晶》^①，来表现生下了盲眼儿子的革命女性的生命悲哀，并揭示出黑暗的时代幕布。作品一方面借小说人物之口发出悲叹：“‘爱的结晶’，由于钱的原因而盲目了。理想，由于钱的原因被吞噬了。这样的时代真糟糕啊！”另一方面，又通过其他女性为女主人公祝福：“让你下一胎爱的结晶是个千里眼”！由此带来了一个峰回路转、充满希望的暗示，而这也正是杨逵夫妇对于未来的生命期许。事实上，杨逵的几个孩子的命名都别具深意。长女取名为“秀娥”，而非女孩子多用的“娥”；至于长子的名字“资崩”，用心更是明显；次子取名“建”，则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崩溃之后，建立新的社会的人生理想。^②

1934年，台中酝酿成立台湾文艺联盟。身为筹备委员之一的何集璧，从赖和那里得知杨逵的地址，并受赖和的委托，亲自跑到高雄内惟看望杨逵，又把他介绍给张深切。杨逵由此参与了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文艺》的编辑工作，月薪十五元。就在此时，杨逵第一次从何集璧那里看到了东京创办的《文学评论》杂志。于是，他把《送报伙》寄到东京的编辑部后，想不到很快就在当年10月份的杂志上全文刊出。《送报伙》击败了其他的日本作家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了《文学评论》第二奖（第一奖从缺）。这是台湾作家首次进军日本文坛，《文学评论》的当月号在台湾却被禁售。作品发表后即得到日本著名作家德永直、龟井胜一郎、洼川稻子、中条百合子、武田麟太郎等人的好评；台湾文联的朋友们，尤其是何集璧和张深切格外高兴。而当年作为《送报伙》“助产士”的赖和，更是激动异常，几乎比杨逵本人还要兴奋。

① 叶陶：《爱的结晶》，日文原著发表于1936年2月刊行的《台湾新文学》附属刊物《台湾新文学月报》。

② 钟天启（钟逸人）：《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297页。

1936年,《送报伕》经由胡风翻译成中文,收录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它共收入朝鲜族张赫宙的《山灵》、《上坟去的男子》,李北鸣的《初阵》,郑遇尚的《声》,以及台湾杨逵的《送报伕》,吕赫若的《牛车》,杨华的《薄命》等七篇小说。这是台湾小说第一次被介绍到祖国大陆,大陆人民从中看到了台湾同胞在乙未割台之后的悲惨命运。后来,《送报伕》又被收入《弱小民族小说选》,也曾经被翻译成拉丁化新文字,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一年,对于杨逵具有特别的意义。进入而立之年的杨逵,以《送报伕》的全文发表,确立了他在台湾新文学文坛上的作家地位;而5月6日,全岛性文学团体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则标志了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由分散走向统一,作家队伍开始了新的聚合;同年11月5日,该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创刊,这是一份提倡深入大众、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的富有创造意识的刊物,也是日据时期寿命最长、涉及作家最多、对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本文艺杂志,一共出版十五期。杨逵担任了《台湾文艺》的编辑委员,负责日文版编辑,并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编辑生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台湾文艺》的编辑工作却碰到了钉子。因为与台湾文艺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张星建在选稿的作风、方针上大异其趣,自觉无法发挥作用的杨逵便退出了《台湾文艺》。1935年,杨逵担任了杨肇嘉的秘书,为其撰写回忆录,月薪二十元。叶陶在雾峰乡担任家庭教师,教二十个小孩,每月挣得二十元。省吃俭用的夫妻俩勉强凑足出一百元,于1935年12月28日独资创办中日文并行的《台湾新文学》。创刊号出版了三千本,杨逵夫妇拿着刊物去全省推销订户,征求会员及读者,订阅一年为二元,支持者是五元。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前辈诗人林幼春的慷慨解囊,他一次就赞助三百元,足够《台湾新文学》出版三期。后来加盟这个刊物的作家,有赖和、杨守愚、郭水潭等人,其中多数为台湾文艺联盟的重要成员。

比起《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更富有写实精神和社会主义倾向，更注重中文作品，选稿原则也比较开明。杨逵与叶陶用心血生命来培植这块文学园地，他们分工协作，配合得十分默契。以叶陶爽朗、健谈的性格，她更多的主“外”，跑出去接洽杂志的印刷、发行等事务；而杨逵则常在家中写稿、编辑，同时兼顾煮饭、洗衣、照顾孩子等家务。这种夫妻角色的“互换”，又被朋友们戏称为“叶陶兄”、“杨贵嫂”。

从创刊号到1937年6月15日，《台湾新文学》一共发行十五期（其中第一卷第十号被查禁），另出版附属刊物《台湾新文学月报》两期。从第一卷第八号（1936年9月发行）至第二卷第四号（1937年5月发行）这七期，由于杨逵夫妇操劳过度、双双病倒，编辑工作改由王诗琅临时负责。《台湾新文学》发行到第十期时，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已告停刊。这时的文坛上，只剩下《台湾新文学》独自担负起推动台湾新文学工作的使命。

1936年9月2日，日本政府派出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取代台湾文官总督，恢复了军人兼任总督的体制。1937年6月4日，近卫文磨内阁上台，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为了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除所有的中文杂志报刊。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台湾新文学》等报刊，或被迫废除汉文版，或被迫停刊。

创办《台湾新文学》之际，也是杨逵文学创作及文艺评论写得最多的时候。从小说《水牛》、《模范村》、《顽童伐鬼记》、《蕃仔鸡》……到多处发表的随笔、评论、杂文，杨逵的创作生命力蓬勃而出。作家杨逵的登坛，与赖和等人一同开创了台湾30年代的新文学运动；杨逵编辑生涯的展开，为台湾新文学园地培植了创作的有生力量；而《台湾新文学》的被迫停刊，不仅是杨逵与叶陶遭遇的沉重打击，也象征了30年代台湾文学黄金时代的结束。

六、首阳农园的抗争“隐士”

杨逵的一生中,从事过五花八门的职业。从送报伙、清道伙、挑土工、小贩、苦力、工人,到园丁、编辑、作家,其中以园艺为时最久,可以说大半生都在做园丁。而每一种职业的变迁背后,都有着杨逵生命历程的足迹和时代风雨的投影。1937年至1945年期间,杨逵在贫病交加和殖民统治高压的环境中,是以他对首阳农园的艰难开拓和创建,完成了一个园丁/“隐士”曲折抗争的时代形象。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把台湾当作南进的基地和跳板。为了达到他们称霸亚洲、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野心,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纳入了“战时体制”,拼命掠夺台湾的物质资源,以支撑其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则更加厉行暴政,疯狂地推行“皇民化运动”。

“所谓皇民化,就是以八纮一宇的团体精神,对新附领土台湾的土地居民,从物与心两方面,彻底去除从前的思想信仰与物质等状态,而成为完完全全的皇国土地与居民。”^①如果说,这之前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推行的“同化政策是意指成为日本人。则‘皇民化’的意思是‘成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统治者所企望之的‘皇民化’的实态,不是台湾人做为日本人活,而是做为日本人死。因此,‘做为忠良的日本人’的意思是指发现‘做为日本人死’的道理,并为它奋进”^②。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进

① 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2页。

② 尾崎秀树:《战时的台湾文学》,见王晓波编《台湾殖民地的伤痕》,(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8月版,第212页。

行。第一阶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主要通过各种思想宣传与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大力灌输日本臣民思想。为了推行所谓皇民化“国语”运动，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正式下令废止在台发行报纸的汉文栏，所有杂志禁止使用中文，台语广播停止，台湾民众被剥夺了使用母语的权利。而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国语”讲习所，则从1937年的四千三百六十七所，跃升到1939年的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六所。接踵而来的，是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烧毁祖先牌位、废弃中国寺庙，并大力建造日本神社，禁止中国年节风俗，禁演台湾戏剧等等，范围相当广泛。第二阶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其主旨在于彻底落实日本皇民思想，强调挺身实践，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1941年4月，台湾总督府下令成立“皇民奉公会”以后，还于全台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外围组织，诸如“奉公壮年团”、“皇民挺身队”、“商业奉公团”、“报国挺身队”、“奉公挺身队”等等；并通过志愿兵制度、义勇报国队等形式，把台湾人驱赶到战场上去充当炮灰。

在“皇民化运动”的狂潮中，不仅2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台湾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遭到禁绝的命运，30年代前半期刚刚走向高潮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陷入困境，进步知识文化界的命运被压制或封杀。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对汉文栏目的废弃，直接剥夺了台湾作家的文艺生存园地和母语言说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迫作家成立“文学奉公团”、“挺身演剧队”等各种组织，企图把作家纳入御用写作的道路上来。遭遇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作家们失去了创作的空间，文学活动也急速减少。老作家王诗琅在战后回忆此时的台湾文学界，曾这样说道：

中日事变爆发，随着日人侵华战争的扩大，台湾也跟着实施战时体制，思想统制日见加强。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在

这种情况之下,以过去的文学理念已无法再事写作,况且很多的文艺工作者相继到中国大陆去,就是留在台湾的,也都把笔暂时搁起,静观时局的演变。^①

对于作家杨逵而言,战时环境氛围的高压和个人遭遇的艰难,使他重新陷入了困境。七七事变前夜,为了拯救濒临危机的《台湾新文学》命运,杨逵于1937年6月再渡东瀛,以谋求日本进步文学界的支持。他四处奔波努力,会见了《日本学艺新闻》、《星座》、《文艺首都》等杂志的负责人,建议设置台湾新文学专栏,为《台湾新文学》提供合刊发行的合作前景,以便在台湾报刊中文专栏被废弃的危机形势下,保存一份台湾文学的种子。这种建议获得日本进步文学刊物界的同意和支持,杨逵又看到了希望的前景。

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杨逵所谋求到的希望前景终归破灭。杨逵到日本不足一个月,日本军国主义就发动了侵华战争,并加强了对国内文化界的压迫和控制,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一次,因为日本天皇的出行,沿途地区皆被日本警察加以突袭检查。此时住在本乡小旅社的杨逵,由于是黑名单上的人物,遂被拘捕押往警察局。多亏原来与杨逵相识的《大势新闻》主笔的极力保释,方得脱险。恢复自由后的杨逵隐居于鹤见温泉,以摆脱日本警察的追踪。这期间,他将自己原来的《田园小景——摘自素描簿》这篇小说扩充为《模范村》,经《文艺首都》主编保高德藏之推荐,送往改造社的《文艺》编辑部发表。

9月返台,杨逵一路被日本特务跟踪回来;10月20日得悉报载,日本开明知识分子被捕百余人,杨逵与日本进步刊物合作的计划完

^① 王诗琅:《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文艺》1卷3期,1944年6月;收入《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问题》(王诗琅选集第五卷),(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34页。

全落空,《模范村》也因文化界大检举被退稿。在“皇民化运动”的封杀下,《台湾新文学》被迫停刊,杨逵夫妇的心血与投资化为泡影;从东京返台就患了肺病的杨逵,债台高筑,贫病交加,遭遇了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

即使面临如此困境,一生特立独行的杨逵也不屑于同日本殖民当局妥协,去充当御用作家。杨逵说:

七七事变后,整个台湾的文化运动几乎被“皇民化”运动淹没了,于是我只有放弃一切,全力垦殖首阳农场(取自首阳山典故,自勉宁饿死也不为敌伪说话),一直坚持了八年。^①

首阳农园的创建,颇为周折。当时,因为不忍心让三个孩子挨饿,杨逵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向米店赊欠,以至于欠债二十元。在日本警察的唆使下,米店老板竟将多年主顾的杨逵告上了法庭。这时,朋友健次因建议杨逵种花,并在火葬场后面,为他代租了一块两百坪的土地。这片土地在今天台中市五权路附近的旧时火葬场旁边。当时人们都称这火葬场为“烧死番仔”,因为它是专为日本人用的。然而,要开辟这块土地,租金就需要三十元。一贫如洗的杨逵,四处奔波借贷,却连连碰壁。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平素喜爱文学、早有结识杨逵愿望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在友人的陪伴下前来拜访。目睹杨逵家徒四壁的困境,入田春彦当即拿出一百元救助。杨逵盛情难却,心中百感交集。平日里总被日本警察跟踪、骚扰,今日竟然有如此奇遇!杨逵与入田

^① 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页。

春彦，也由此成为肝胆相照的生死至交。

靠了这笔钱，杨逵还清了米店、杂货店的债务，用剩下的钱付了土地租金，最后连一把一块多钱的锄头也买不起，只好向人家借用。这时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晚间敲门，原来是东京时的老同学林怀古。林君当晚邀请杨逵上酒家喝酒，杨逵因为心情郁闷，喝得酩酊大醉。隔天早晨，林君再度造访，说要观赏杨逵的花园，但看到的却是杨逵用借来锄头开垦了一半的荒园。林君感慨万分，便捐了二十元来相助。杨逵用这笔钱买来水壶、锄头和种子，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播下花种，心中充满了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以首阳山的故事而命名，杨逵由此开创了“首阳农园”。

遭逢乱世，面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强权，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人跟随日本去做驯服的“皇民”，也有个别作家充当了“皇民文学”的御用工具；但更多的人则以自己的方式选择了疏离或反抗的态度。

杨逵于乱世中当了花农，走上隐居的归途，这本身就是对日本殖民当局强令台湾人民“归顺”和“趋同”的一种无言的反抗。而将新开垦的农场命名为“首阳农园”，无疑是表明心志，彰显精神，它充分体现了杨逵不与日本殖民者妥协的民族气节，从中也可看到中国人文传统和爱国精神在台湾岛上的血脉流传。古人有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宁愿饿死首阳山的壮举，今人则见杨逵开荒园以种花、避乱世则明志的人格风范。

在“皇民化运动”的喧嚣中，一些缺乏民族志气的人，也不时劝说杨逵何不立定志向，为“国家”效力？每逢此时，杨逵便苦笑答道：

我哪里此种才能？我自己认为该做的是，向蔬菜与花朵浇水、施肥，让它的嫩芽长高。如果蔬菜与花朵遭到虫害，就将害虫一只一只地捏死，若长出杂草就要除掉，这就是适合我的志向。当然，这些工作只能在我稍微能自由

活动的首阳农园里做。^①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杨逵常常意味深长地引吟东方朔的《嗟伯夷》,并以此作为支撑自己的精神动力:

穷隐处兮 窟穴自藏
与其随佞而得志
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杨逵虽然归隐,但他并非遗世而独立,而是在冷眼看乱世的同时,保持了一种内在的人生进取精神。杨逵执着守望的是伯夷叔齐的精神,并不是要仿效他们心甘情愿地饿死;他认为,“虽然同是首阳山,但是有觉悟、肯奋斗、求生存的人未必就会饿死,我想起了被我们祖先赶进山里头的同胞们,他们就是仍然生存着,并且保持了比平地人更为健壮的身体”^②。虽然避乱世于首阳农园,杨逵却始终在等待机会传达自己的人生奋争;他一心一意建设的首阳农园,并非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而是标志着他对健康大地的拥抱,对活生生世界的创造。

从文化斗士到归农园丁,在这种非文化生活方式的转换面前,一方面,杨逵是以清醒而达观的眼光,将其视作春夏秋冬的周期性循环交替,以现实的态度坦然面对现实。另一方面,杨逵所眼见的文坛悲剧,令他哀伤震惊。这一时期,在政治高压和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相继自杀或病逝的台湾作家,就有一打以上,而且多在二三十岁的青春年

^① 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7年3月30日至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86页。

^② 同^①,第497页。

华。著名诗人杨华，因为“治安维持法违犯被疑事件”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身患肺病，穷困潦倒。在杨华最困顿的日子里，杨逵曾于1936年5月4日的《台湾新文学》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出紧急呼吁：“优秀白话诗人杨华，因过度的诗作和为生活苦斗，约于两月前病倒在床，曾依靠私塾教师收入为生，今已断绝，陷入苦境，期待诸君捐款救援，以助其元气，病倒于屏东市一七六贫民窟。”这个紧急呼吁发出不到一个月，杨华最终于1936年5月30日悬梁自尽，年仅三十岁。文友们的英年早逝，让身患肺病的杨逵百感交集，痛心扼腕，也更坚定了他拥抱健康大地，以生命的坚持来抗争黑暗现实的决心。当他一面吐血一面拿着锄头垦荒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杨逵说：“不管怎样：我还不死，总想多活几天，使我的身体变成耐得住西北风。耐得住大台风吹打般的强壮。这是目前惟一的希望。”^①

杨逵于乱世中选择了归农，每天早出晚归，栉风沐雨，一寸一寸地新翻泥土，一颗一颗地撒下生命的种子。当时杨逵也看了许多种花的书，多是日文的。但台岛的风土毕竟与日本不同，靠书本经验去种植，始终长不出好花来。因为缺乏实际种植经验，不熟悉风土、气候、季节的耕作规律，第一年几无收成。于是杨逵带着叶陶四处走动，参观别人的花园，借鉴花农的经验，也订购一些相关的园艺书籍，期待来年的花园丰收。叶陶由此向别的花园取花来卖，开始了卖花婆的生涯。她从前从事抗日活动，四处演讲，知名度高，认识的人也多。靠了朋友们的帮助和照顾，卖花的生意得以维持。更没想到的是，终日与泥土为伍，田野里空气新鲜，又兼体力劳动，杨逵的体重竟然增加了二三斤，面目黧黑，苍白尽失，肺病渐渐不治而愈。杨逵常跟人开玩笑，说他是以一根锄头治好了肺病。

^① 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8年3月30日至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96页。

不仅如此,在首阳农园的劳作中,杨逵还有了新的生活发现和诗心颖悟。从被野草淹没的花苗,杨逵发现,农学家们用心研究的,往往是耐寒耐热、不怕风不怕雨的优良品种。由此想到,既然植物可以改良品种,人何以不能改善他的品质?而不认输、不认命,正是人们抵抗社会风雨的优良品质。从自己一柄被偷走的锄头,杨逵想到了这个世界的悲哀:人好比蝼蚁,为了活命须要锄头和面包,不偷盗就无法生存,这才是问题。透过首阳花园的建设,杨逵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活生生世界的生命诗意:

说起来,在这个将成未成的花园里,在这小小的世界,仍有着丰富的诗情,在这间草房的旁边有几间猪舍,虽然阵风频频送来异味,花园的出口也还有火葬场,每日都焚烧了一些人,南风一吹,心旌的异味就传过来,来访的朋友经常觉得很不自在,但浇花施肥时和老农闲谈起来仍有诗情,可惜我终究不是诗人,无法形诸笔墨,但在这一小小世界里所感觉到的诗意却比每天报上出现的诗更浓厚。有能力为赋作诗的诸君,希望大家能发现更多的诗情,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写出一首首有生命的诗。^①

这期间,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强化,台湾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被疯狂掠夺,作家也遭遇了强硬的文化统制,台湾的社会环境愈加恶化。1938年1月,小林跻造总督发起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驱赶台湾青年充当战争炮灰;4月,公布“中日事变特别税令”,对台湾实行横征暴敛;11月,日本政府发表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狂妄声

^① 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8年3月30日至4月2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97页。

明。1939年5月,小林跻造宣称“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即南侵以台为据地政策)”的对台三策,开始实施;10月,实行米配给统制;12月,在台中开始“米谷供献报国运动”,强制征粮以遂其侵略战争。1940年2月,规定台籍民改日本姓名法,后来又宣布“台籍民改日本姓名促进纲要”,斥不改姓名者为“非国民”。一些御用绅士积极迎合改姓名运动,已经挂起了“国语家庭”的招牌。与此同时,自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全面禁止报刊使用汉文以来,文艺界形势日益紧张。1940年1月,日本在台湾的殖民主义文学总代理西川满又发起创立“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文艺台湾》,大力倡导“皇民文学”。一些御用文人随之跟进,周金波的《水癌》、《志愿兵》等“皇民文学”作品先后出笼。

杨逵视这一切为耳旁风,他仍然在首阳农园的土地上,用锄头“写诗”。时局的高压氛围,剥夺了台湾作家言说的权利,杨逵虽不能够“放胆文章”,偶然有朋友来访,邀三五知己,野菜为肴,对酒当歌,也不失为一种快乐。从种花的第四年起,随着种植经验的丰富和杨逵健康的恢复,首阳农园的经营也上了轨道。所以迁移到梅枝町十九番的空地,开辟了约一千坪的土地,扩大了经营范围。

然而,首阳农园的隐居并非世外桃源,外界的风风雨雨也不时袭来。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0年,杨逵经历了病魔缠身、被捕入狱以及亲人朋友相继去世等一系列打击。1938年5月5日,慷慨救助杨逵创办首阳农园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因为思想左倾以及与杨逵接近,受到日本当局驱逐出台湾的处分,遂愤而自杀,以死抗议。痛彻肺腑的杨逵拿起笔来,特地为这位可敬的日本友人写了一篇充满深情的悼文《入田君二三事》,发表于5月18日的《台湾新闻》。

1939年,杨逵的母亲苏足在多年的操劳中,肺病加剧,永别了她牵肠挂肚的孩子们;翌年,父亲杨鼻身染重病,溘然长逝。转眼之间,父母先后去世,令不断返回家乡料理亲人后事的杨逵承受了巨大的悲痛。母亲的一生知足常乐,与人为善;她无师自通,喜欢刺绣、绘

画、图案。她从不喋喋不休，她的心事都隐藏在灵魂深处，偶尔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针见血的。她担心疼爱经常坐牢的儿子，但她更深明大义，恨霸如仇，理解和支持为台湾这片土地的奔波奋斗的儿子。父亲虽为民间锡匠，底层百姓，没有念过书，但他一生关心时事，颇富正义感，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自七七事变以来，杨逵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经常谈起战争时局，父亲对此非常关心。杨逵每每安慰父亲，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不会长久。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父亲就与世长辞了。杨逵从父母那里接受到最朴素、最亲切的人生教育和性格濡染，这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帮助他在任何艰难险阻中，坚持初衷不改，为理想而奋斗。

1940年，就在父亲病歿的这一年，杨逵还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因为当时有一位日本亲王要来台湾，而过去台中附近曾经发生过一次朝鲜志士赵志明暗杀日本亲王久迩宫未遂的事件，所以日本警察异常紧张，将附近一些所谓思想倾向有问题的人强行拘捕，杨逵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进监狱十余天。这次被关在一起的，有十八人之多，他们自称“十八罗汉”，大有相见恨晚、同气相求的感慨，出狱后大家还时有来往，这是杨逵在日据时期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控制进入了“决战时期”的全面高压。是年4月19日，“皇民奉公会”成立，并创办《新建设》杂志作为言论机关，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渐次被收编成一元化的组织，成为动员“国民精神”的宣传机构。所有的剧团都被编入“台湾演剧协会”，并组织“演剧挺身队”、“音乐挺身队”，到处公演“皇民化戏剧”。1942年和1943年，日本殖民者在战争时期召开了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派代表到全岛各地举行所谓“大东亚文艺演讲会。”1943年4月，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统治，西川满创立的台湾文艺家协会自动解散，原班人马随即成立了隶属于“皇民奉公会”的“台湾文学奉公会”，

并以“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为宗旨，在台北公会堂召开所谓“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一时间，“皇民化运动”的气焰甚嚣尘上。

战争期的台湾天空虽然阴云密布，但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作家而言，他们或拒绝写作，或凭良知抵抗，或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以各种方式维系了台湾新文学的气脉。1941年5月，曾经参加西川满《文艺台湾》的台湾作家张文环和黄得时，因为反感于西川满的独裁作风和《文艺台湾》的勤皇派色彩，毅然退出台湾文艺家协会，成立了启文社，并创办日文季刊《台湾文学》。这个以台湾文化运动之传承者自命，冒着被打成“敌性杂志”危险而创办的刊物，重新聚集了杨逵、吴新荣、吴天赏、吕赫若、巫永福、龙瑛宗、杨云萍等台湾文艺界人士，它使杨逵在战争期的文学再出发有了新的平台。

杨逵在后来写的《光复话当年》一文中，也曾谈到这时期的文坛景况：

抗战中，台湾文学界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以日人西川满为中心的勤皇派，鼓吹着勤皇主义，为日本军阀的征服与版图的拓展而扬眉吐气；另一派是我们台湾同志的民族文学派，却不仅仅是台湾本地人，也有许多日本人支持着我们。“民族台湾”里占了好几个台大教授、新闻人、也有官吏。^①

4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内部的分裂，日益凸显，有的主战，有的主和。在台湾的日本人当中，日本军部与警方迷信武力，仍旧采取弹

^① 杨逵：《光复话当年》，手稿注明：“四十二年光复节，改登于新生活壁报国父纪念周刊”；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9页。

压政策；但一般比较开明的日本人士，态度已有些转变了。在当时的官吏、记者、编辑及大学教授当中，出现了一些厌恶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人士，如台大教授金关、中村，《台湾民俗》杂志的同仁们，又如台湾总督府杂志《台湾时报》月刊的编辑植田、浅田，以及“奉公会”《台湾文艺》杂志的编辑池田，《台湾公论》的编辑，《新高新报》的记者，以及身为小学教员的日本女作家坂口樱子夫妇等等。他们开始频繁地接触台湾作家，想走大家合作的路线。他们也常常到首阳农园访问、邀稿，期待杨逵拿起笔来。植田就曾几次找杨逵交谈，希望杨逵能够给《台湾时报》写稿。杨逵也与植田讨论这个问题，并坦白地告诉对方：“如果要我们作家合作，必须让我们报导实在的情形，在文学方面，也是描写实情。如要我们歌功颂德，那是不可能的事。”^①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隐居首阳农园四年之后的杨逵，决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方式，透过“合法”的文学斗争，来对抗“皇民文学”，想方设法传递台湾新文学的薪火。从1942年起，杨逵再次出现于台湾文化界，并以他一向的积极态度介入敏感、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在刊物的邀约下，杨逵把一篇极富嘲讽意义的小说《泥娃娃》，投给了《台湾时报》的编辑植田。这篇作品一方面是表现武力不可仗恃，另一方面在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强化的战争观念对儿童心灵的荼毒。由于刊物内部的矛盾，开明思想派一时获胜，《泥娃娃》得以全文登出，并发生强烈的影响，同时也引发殖民政府内部的摩擦。

这篇作品刊登后，植田又来邀稿，杨逵便创作了小说《鹅妈妈出嫁》，作品谴责了“大东亚共荣圈”虚构的“共存共荣”，在小说结尾处更是画龙点睛地写道：“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这

^① 杨逵：《光复前后》，原载《联合报·副刊》1980年10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1页。

才真正是共存共荣……”。作品在《台湾时报》发表后，立刻受到日本警方的干扰。因为这本杂志是日本总督府的刊物，所以未能禁刊；而当杨逵后来将《鹅妈妈出嫁》连同其他几篇作品合并要出单行本时，却被查禁了。1942年，杨逵创作出现新气象，一年之内，他就发表了《无医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萌芽》、《绅士轶话》、《父与子》、《民众与娱乐》、《作家与热情》等十三篇文章，包括小说、散文、剧本、文艺时评等等。

1943年，杨逵于首阳农园种花之余默默翻译的长篇小说《三国志物语》四卷本，由台北盛兴书店出版。杨逵从小喜欢听卖艺人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他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无法直抒胸臆的时代里，为了自娱娱人，更为了以大众化文学的方式传递出民族文化与文学的传统，杨逵将《三国演义》的故事，翻译成日文的《三国志物语》，并请画家林玉山画了插图。在此书的序言中，杨逵这样写道：

小说最重要的是必须有故事的趣味性。

虽然三国志或许能满足这种趣味性，但是只有这样就够了吗？

俗话说：“要用活眼读活书！”

我想用这句话来要求读者诸君。

读书最重要的就是要读出书中的精神。

我们万不能忽略了书中三杰的忠烈义勇精神。

而刘备、张飞、关羽三人性格迥异，却能为了完成大业而团结到底，千万不可轻忽。^①

在杨逵看来，台湾阅读阶层中喜爱《水浒传》和《三国志》的人们

^① 杨逵：《三国志物语·序》，《杨逵全集》第6卷（小说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9年6月版，第156页。

占有相当比例。如果能通过通俗小说的新创和提升,抓住这类阅读阶层,就能更好地发挥一个文学工作者存在的价值。因此,正是本着为台湾民众的文化需要着眼,本着延续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宗旨出发,杨逵创作出版了《三国志物语》,并使通俗小说的写作在“皇民化运动”的推行时期,仍有民族意识的彰显。

从1941年到1945年台湾光复,在创作小说、剧本等作品的同时,杨逵还发表了二十九篇文艺评论,构成其创作的又一高峰。1943年5月,“皇民文学”的总代理西川满在“台湾奉公会”成立之际,于《文艺台湾》发表一篇《文艺时评》,攻击辱骂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粪便现实主义”,又用个别变节分子所写的“皇民文学”来打压台湾新文学作家。西川满蛮横无理的殖民主义态度,引起了台湾作家的强烈愤怒,世外民(邱永汉)、吴新荣、台南云岭、吕赫若等人皆以自己的方式同西川满展开论辩斗争。杨逵此时则化名“伊东亮”,发表了《拥护粪便现实主义》一文,深刻揭露了西川满压制践踏台湾文学的真面目,从根本上维护了台湾新文学的品格。同年11月13日,在所谓“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上,面对西川满之流“献上文艺杂志”、“服从战时配置”的废刊建议,黄得时、杨逵等台湾作家正面反弹,全力抗争,全场氛围一时间显得紧张肃杀。虽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台湾文学》最终不得已被强令废刊,但台湾作家的抗争精神令人感佩。

到了日本侵华战争后期,败相已露的日本统治者更加紧了对台湾的弹压,台湾作家连“不说话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根据杨逵的挚友,战争末期与其交往甚密的钟逸人后来回忆,在“皇民化”甚嚣尘上的时候,当时很困扰杨逵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当局以及‘皇民奉公会’有时会要他写些迎合当时的文章,这违反他的个性,当时有些台人作家,为生活所逼,而成为御用文人的也不是没有”。杨逵“生活固然艰困,又有肺病,但一直拒绝这种充当御用文人的要求,真的无法

拒绝,也顶多是虚应故事应付一番”。^①

1944年6月,台湾总督府情报课(文化局)邀请台湾作家分赴台中州谢庆农场、台南州斗六国民道场、高雄海兵团、石底炭坑、金瓜石矿山等地,实地参观战时体制,以撰写“报告文学”,呼应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杨逵被派往石底炭坑,观察煤矿工人的起居作息、生存状况,并据此写了《增产的背后——老丑角的故事》。这篇作品保持了一贯的写实风格,因是应邀之作,也不乏反面寄意。杨逵生前曾与人言这是一篇敷衍之作,也就是“虚应故事应付一番”的文章。

“皇民奉公会”成立后,台湾的电影、演剧、文学、艺术等文化活动,都被迅速纳入殖民当局的一元化统制之下。1941年4月,“皇民奉公会”成立;翌年1月,“皇民奉公会”又组织“演剧挺身队”,动员各地文学界替他们工作。杨逵此时则巧妙地利用日本殖民者推广“皇民化戏剧”的机会,来反讽日本当局,启蒙民众觉悟。1943年1月,参加“二水奉公会”的朋友陈憨婴、杨招鉴来找杨逵,希望能为他们写一出剧本。杨逵创作了《扑灭天狗热》,投给《台湾公论》月刊,想出版后借“演剧报国队”的名义来演出。这出戏剧外表上写扑灭流行于农村的天狗病,实际上是在嘲讽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放高利贷欺压农民的李天狗。但剧本一登出,《台湾公论》就被查禁了,演出自然也化为泡影。雾峰有另一朋友庄万生,也参加了“皇民奉公会”,杨逵本想把小说《模范村》改成剧本,供他们演出,可《扑灭天狗热》一被禁,其他剧本的改编演出也成为不可能的事。

到1944年年底,《台湾新闻》副刊主编田中,与同盟通讯社松本特派员相偕来访。他们带来俄国诗人与剧作家特洛查可夫写的一个剧本《怒吼吧!中国》,要杨逵将其改写成适合当时演出的剧本。他们表示,这个剧本的演出已获得台中州特高课课长田岛的同意。田

^① 钟天启:《瓦窑寨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0页。

岛比较开明,杨逵的《鹅妈妈出嫁》被查禁时,他曾为此打抱不平。

《怒吼吧!中国》是一出描写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剧。剧本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英国,这符合当时的日本国策,故得以可行。杨逵采用迂回策略,将这出戏作了修改。台上表演的是英国人欺负中国人,台下的观众却是心知肚明:那盛气凌人的英国人哪,其实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把在台中山公园殴打林献堂的日本浪人卖间的名字,安在剧中英军舰长的头上,更是鲜明地影射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杨逵与巫永福、张星建、颜春福等朋友成立了“台中艺能奉公会”,利用这个组织排练《怒吼吧!中国》,并在台中的台中座、台北荣座及彰化三个城市用日语演出,获得满堂喝彩。一些前来观赏的台湾大学及高等院校里的教授们心潮难平,其中一位特意来到后台,他紧紧握住杨逵的手说:“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怒吼吧!中国》的演出成功,让杨逵信心倍增,他向田岛提出了用台语演出的建议,并得到了对方赞同。后来,在首阳农园的草寮里,每到周六下午和晚上,就有三四十位年轻人,前来参加翻译和排练。沿引祖国焦土抗战之意,他们成立了焦土会,宗旨是:宁愿变为焦土,也不愿“皇民化”!杨逵和这些年轻的朋友,一起采野菜举行“野菜宴”,一起排练《怒吼吧!中国》的台语话剧,共同研究时事、文学和三民主义。杨逵以手头仅有的一本三民主义原版书,向年轻朋友宣传讲解三民主义。这本书是原台湾大学教授中井淳先生从广东带回来送给杨逵的。此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在盟军飞机持续不断的轰炸中,走向穷途末路的日本侵略者正在作困兽挣扎。

1945年8月15日,杨逵与前来首阳农园排演戏剧的青年朋友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他们一生中最为震撼的消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首阳农园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欢喜若狂,禁不住热泪滚滚,百感交集!

整整五十一年了,在日本殖民统治铁蹄下度过的这半个多世纪,

是多么不堪回首的一段屈辱惨痛的历史！有祖国而不能呼唤祖国的悲哀，世世代代居住台湾却不能拥有宝岛的痛苦！

终于，噩梦一样的昨天结束了。怀着重见天日的心情，杨逵立刻“就把‘首阳农园’改成‘一阳农园’，又得到年轻人的支援，发行‘一阳周报’介绍国父思想与三民主义，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光复以后，在大家兴奋的心情之下，向民族、民权、民生努力建设，台湾一定可以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①。

^① 杨逵：《光复前后》，原载《联合报·副刊》1980年10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14页。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一、战后重建的文化先锋

1945年8月至1949年12月,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过渡阶段,人们一般称之为“光复时期”。短短四年中,台湾结束了一个充满屈辱与血泪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也遭逢了光复后风云诡譎、时局多变的现实境遇。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多重矛盾扭结,使台湾人民在光明与黑暗并存、进步与落后交织、希望与挫败共生的时代转换中,经历了社会风云急剧变幻的巨大震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诏告臣民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经历了五十一年被割让、被殖民的惨痛历史,六百五十万台湾同胞终于结束了“亚细亚的孤儿”命运,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10月5日,台湾行政官署的先行人员葛敬恩中将率领幕僚八十余人飞抵台北。

10月10日,是台湾开辟以来第一次庆祝双十节。这一天,全省各地都举行了庆祝典礼。早晨8时,无数的民众簇拥到台北公会堂

(现在的中山堂),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各地代表发表演说时,民众情绪高涨,许多人被感动得唏嘘流泪,压抑了五十一年情感喷涌而出。10月16日,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开始登陆。当时的情形是:

十月十六日,传闻国军抵达基隆,民众争先恐后,均以先睹祖国军容为快,因而基隆码头人山人海。可是这一天装载国军的船舰终未入港,民众等得望眼欲穿,有的甚至露宿码头以待。第二天,首批国军乘坐美国运输舰,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浩浩荡荡,开入基隆港,这是陈军长孔达所部的陆军七十军,当军队开始登陆,民众喜极泪下,举手高呼,其声震动天地。是日下午,这批将士分乘火车抵达台北火车站时,一样地也是人潮汹涌,当这千百貔貅离开台北火车站,开始前进,三十万市民夹道欢呼,处处都是感人的场面……^①

10月25日,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市公会堂举行,中国在台湾省的受降主官会后发表广播谈话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②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庆祖国收复失土。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焚香祭祖,舞龙舞狮的锣鼓声早已响彻街头巷尾,光复的狂喜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作家张文环在《关于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这样描写了光复时的动人场面:

^① 参见《台湾史话》,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转引自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版,第443—444页。

^② 周伦、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55页。

今天新生报台中分社主任吴天赏,光复当时,在众人面前指挥练唱国歌时,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了自由,而且大家都还活着,真想一起跪在青天白日旗的面前痛哭一场……^①

一时间,欢呼光复的狂喜浪潮涌动,“台湾祖国化”的口号风行各地,“中国化”的趋向构成当时台湾最强劲的社会潮流,台湾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转折的时代。

沉浸在光复氛围中的一阳农园,适逢新的时代氛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来。杨逵踌躇满志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开始了他人生的再出发。这一年,杨逵正好四十岁。以不惑之年的社会体验和人生彻悟,杨逵光复时期的所有活动,都在围绕两个目标展开:一是宣扬三民主义新中国,创造自由、民主新生活;二是投身台湾新文学的重建活动,期盼文学薪火的传承。无论是为台湾文坛的复兴奔走呼吁,还是投身于多种社会活动,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一个劫后余生的文坛老兵对台湾重建的热望,杨逵作为思想者、行动者和文学家的形象得以充分彰显。

光复之初,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日,到10月5日台湾行政官署的先行人员葛敬恩中将率领幕僚八十余人飞抵台北之间,整整五十天的时间,台湾处于政治权力“真空”的过渡期。从异族统治下挣脱出来的台湾人民,自动地组织起来,出现了一个无人领导的、自发的、全岛性的、令人感慨的“自治运动”。他们或筹备欢迎祖国政府之工作,或想方设法营救身陷海外之同胞,或走上街头维持社会治安,或自编教材辅导学生学习汉语,或筹划企业、谋求经济发展,为稳定战后台湾局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期间,台湾岛上几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没有发生一桩小偷小摸、抢劫民财的案件;市场

^① 张文环:《关于台湾文学》,原载《和平日报》1946年5月31日。

虽然由战时统制恢复为自由经济,但市场上的所有商品价格持平,没有发生更大波动;全岛秩序井然,也无重大交通事故。对祖国大陆的心向往之,让台湾人民以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主人公姿态和自律精神,自觉地配合了祖国接受台湾的历史性胜利。

当时台湾社会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是各种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家都想为台湾光复尽职尽责。当然,因为社会正处于大的转折动荡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形势,也带来这些民间团体的复杂色彩。1945年9月10日,由台中文化名人陈炳发起,台中成立了“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叶荣钟出任总干事,常任委员多是社会政治文化界名流。这个民间团体虽然没有权利,但由于它是由过去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领导人组成的集团,在台湾光复的特殊时期,还是以其政治号召力和民众的信任度,构成了政治上的稳定力。这一时期,其他像“台湾省海外侨胞救援会”、“人民协会”、“农民协会”、“人民自由保障会”、“学生联盟”、“大公企业”等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各尽其责。

当时,整个社会都在盛言三民主义,台湾很快成为三民主义的天下,人们也以各种方式来理解和接受三民主义。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一般的民众也还理解;但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对三民主义的误读,也时有发生。例如角板山的医生就对村里人说,所谓三民主义,就是日本人、台湾人、高山族三个民族融洽行事。^① 在众多的民间团体中,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公认的团体,许多台湾人蜂拥而至,或积极参与,或打探情势,知识分子和作家主动参与或被应邀进入组织的,也不乏其人,如叶荣钟、张星建、巫永福、吴新荣、吕赫若等人。

^① 《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载于《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2页。

杨逵回忆他在这个时期活动的时候,曾这样谈道:“我也常在台中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露面,但根本无意参加。我想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建立自己的组织,采取自己的方针。”^①事实上,杨逵确实在着手组织团体。台湾刚刚光复,杨逵就和各地赶来看望他的昔日农民组合与文化协会的朋友们有过讨论。杨逵说:“他们和我都很希望早日重建工人农民等人民的自主团体。”^②早在日本投降刚刚八天的8月23日,杨逵就同李乔松带着“解放委员会”的传单拜见林献堂。林献堂曾劝导两人不要轻举妄动,最好静观时局:“所谓解放者,对任何人而言也,旧政府已将放弃,新政府尚未来,而解放云云对谁而言也,此时惟有静观,切不可受人嗾使以扰乱社会秩序也。”^③此后,杨逵并未接受林献堂的建议。池田敏雄1945年9月4日的日记里,就有“杨逵(作家)取得台中当局的谅解,正在组织‘台湾解放委员会’”的记载^④。多年过去,杨逵在1982年访美返程过境日本之际,曾接受戴国焯教授与内村刚介的访问,他这样忆及往事:

台湾总督府向国民政府正式投降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五日,在这一天以前,我组织了解放委员会,意思是要总督府的统治权停止,我们的要求,特高课长(译注:指的是台中厅警察内的特别高等刑事课课长)是以默认的方式接受了,当

① 转引自《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载于《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 (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2页。

② 同①,第281页。

③ 此事参见《灌园先生日记》1945年8月23日之记载(尚未刊行),并首度披露于许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献堂》,见《20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第六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1004页。

④ 池田敏雄:《战败后日记》,廖祖尧摘译,《台湾文艺》第85期,1983年11月,第180页。

他向上面呈报时，上面却回说不行，因此才想从文化方面做点事，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出版了《阿Q正传》。^①

尽管杨逵出于戒严体制下的政治禁忌，在有无“解放委员会”的名称问题上，有过前后不一致的说法，但他当时针对日本当局的残余统治，着手组织代表工农民众“解放”意愿的团体，应该成为不争的事实。

日本投降之际，日本警察或台人警察，都不再出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战争结束带来的民众自由交易，又让遍地丛生的摊贩堵塞了交通，任意弃置的垃圾也堆积如山。面对旧政解纽、新政未孚的青黄不接之秋，“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响应蒋介石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于1945年9月发布文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就地组织青年服务队，协助维持桑梓的治安。

这时，杨逵主动站出来，组织台中市民成立了“新生活促进队”，负责清理台中市的垃圾。这个队伍当初是由关心社会的心地单纯的男女青年组成，护士、学生、司机、文化人……皆在其中，可谓战线广泛。最初，约有一百来人，后来开始清扫街道时，不断加入新的成员，以至于人数多达成成立时的三倍以上。“新生活促进队”的成员自备工具，携带扫帚簸箕，列队走上台中市的街头，开始大规模的环境清洁运动，为光复之初的台湾重建工作增添了令人鼓舞的社会景观。

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叶陶，更是发挥了一个演讲家的才华，将群众鼓动得热血沸腾。只见她一袭黑色长裙，站在十字路口的椅子上，目光环视出入市场的人群，第一句话，先自报家门，并说明自己的卖花婆身份，然后反问群众：日本人已经战败了，我们也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我们是否能在没有日人的统治下，过得更好？过得更有意义？

^① 转引自陈中原译：《杨逵的七十七年岁月——一九八二年杨逵先生访问日本的谈话记录》，《文季》第1卷第4期，第28页。

没有日本人的刺刀在背后,我们是否能更为自动、自爱、自发、自觉?叶陶的演讲激起群众的阵阵掌声,许多人自动参加到清扫工作中来,市民们还热心供应了茶水、香烟和点心。

“新生活促进队”的行动,虽然只是清扫垃圾,整肃环境,但杨逵事先为此拟好的两项立场与原则,却是颇具深意的。这两项原则是:

一、“新生活促进队”要清扫的,不只是路上垃圾,而是想更进一步扫除台人的奴隶劣根性,要台湾人醒觉,不要因为统治者日本人的压制,而无法自觉无法自理,以致公德败坏,社会日益混乱。

二、“新生活促进队”的队员,决不可收分文报酬,才不致使这个有意义的“新生活促进队”沦为一般“清洁队”。^①

从中可知,杨逵所致力,不仅仅是战后台湾良性生活秩序的重建,更是民众素质的重新塑造。

1946年4月21日,“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会”正式成立,刘启光任主任委员,简吉为总干事,杨逵担任副总干事,另有委员五十九人。根据该会公布的标准,“台湾革命先烈”,特指那些为解放台湾从事反日运动而成绩卓著或壮烈牺牲者。该会决议将桃园神社改建为忠烈祠,定于6月17日台湾沦陷纪念日举行奉安大典,并筹备一系列纪念活动。该会还印就捐款名单,为救济先烈遗族募捐基金。杨逵所执笔的《六月十七日前后——纪念忠烈祠典礼》,自6月17日起,连续两天刊登于《台湾新生报》。文章在回顾和颂扬台湾革命先烈反日抗争事迹的同时,特别揭露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侵略面目,以及清朝官员卖国求荣、台湾汉奸追随日军的卑劣行径,并强烈呼吁公开

^① 转引自钟天启:《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4页。

那些被屠杀者的斗争事迹,将异族统治者编造的台湾历史纠正过来,将人民被扭曲的认知匡正过来。事实上,杨逵的主张所承继和发扬的,也是他投身文学运动最初的创作宗旨和文学信念。

光复初期,许多机构处于重组之中,不断有一些政治团体邀请杨逵出来任职,但都被杨逵婉言谢绝。如谢雪红领导的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人民协会”,原农民组合成员的张士德(本名张克敏)所供职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原农民组合骨干的侯朝宗(后改名为刘启光)所加入的军统局等等。据钟逸人回忆,返台后的刘启光曾登门拜访杨逵,想说服他出任新竹县的社会科长或民政局长。对于这些,杨逵一概没有应允。^① 他当时只同意担任《和平日报》的编辑,而不愿介入政治团体,他更愿意做实际事情,而不想上台吆喝。

鉴于台湾战后重建的现实,杨逵更加意识到培养社会干部和时代先进、启蒙民众的迫切性。他甚至计划在一阳农园创办政治学校。在杨逵的设想里,利用有关新中国蓝图的三民主义论著作为教材,由全省各地每一个村庄,去挑选一至三名基层青年,集中到一阳农园,施以六十天的劳动兼政治培训,然后遣返乡下,以教育和影响当地民众。通过分批轮训干部,来为台湾社会提供战后重建的骨干人才。这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计划,终因政治局势骤变二二八事件发生而成为泡影。^②

台湾光复后,怎样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文化遗害,成为当时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殖民当局长期推行的同化政策,特别是1937年之后的“皇民化运动”,给台湾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皇民炼成”造成的精神荒废和心灵创伤,还在梦魇般地缠绕着台湾社会。先行的台湾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在

^① 钟天启:《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7页。

^② 同^①,第308页。

1945年9月28日,就有署名“林萍心”的文章谈论道:

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受尽了日本奴隶教育,他们中间大部分已成了“机械”的愚民,而小部分已成为了极危险的“准日本人”,我们要用怎样的手段和方法,在最短时间中去唤醒去感化这两批的同胞,使他们认识祖国,使他们改掉“大和魂”的思想,成为个个健全的国民,使他们能够走上建设新台湾,建设新中国的大路去。^①

在这一历史转折期,海峡两岸作家携起手来,共同担负起台湾文化重建的时代使命。为了帮助台湾人民早日摆脱日本奴化教育的遗毒,从30年代就已经驰名文坛的文化界人士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李霁野、李何林、黄荣灿、袁珂、雷石榆、钱歌川,到40年代成长于大陆的文艺青年何欣、歌雷、思翔、孙达人、萧荻等人,再到寓居大陆多年的台湾作家张我军、洪炎秋、王诗琅、钟理和等作家,他们于1946年前后纷纷赴台,同坚守台湾新文学阵地的杨逵、吴浊流、杨云萍等人一道,创建台湾省编译馆,推广国语运动,更新报刊文化阵地,为开创台湾战后文化新局面不遗余力,鞠躬尽瘁。

杨逵因为力作《送报伙》曾被胡风翻译到大陆文坛的缘故,前来支援台湾文化重建的大陆文化人士对其早有所闻,所以经常有人到一阳农园走动,与杨逵共商文化活动的事宜。杨逵那座用茅草、芦秆和泥巴混合搭建的小房子,逐渐成为台中地区一个小小的文化中心。

光复以后,日据时期一向用日文写作的杨逵,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毅然抛弃了他所熟悉的日文,宁愿忍受暂时搁笔的痛苦,开始了艰难的文字转换。他自学中文,努力用中文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

^① 林萍心:《我们新的任务开始了——给台湾智识阶级》,见《前锋》第1期(“光复”纪念号),1945年10月25日。

感情,正在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杨素绢成了他的“小先生”。杨逵后来所写的《阿 Q 画圆圈》、《我的小先生》等篇什,都记载了这种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五味杂陈的人生感受。

此时的杨逵依然贫穷,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以文化斗士的形象出入于台湾文化重建的第一线。当年的台湾文化界朋友都还记得,杨逵常常和妻子叶陶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参加台中的社会活动,与那些所谓“社会名流”的雍容华贵形成鲜明对照。“因为我贫穷,所以我骄傲”,杨逵常用这句话来自诩他的行为。从香港来台湾的文艺界人士黄永玉,曾这样描摹了一次文艺聚会中的“杨逵印象记”:

在座最令我注意的是杨逵,他的朴实,他的矮小精壮,一头粗短头发,一双农民型的粗大的手,破旧的衬衣裤和在座的各个比较起来特别突出……杨逵的外貌既不动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自然也少,但也极留心倾听别人发言,用铅笔沾着口水记在他那个小本本上。他是根据这些问题写成了文章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报纸上发表出来的。^①

大陆作家范泉也在《记杨逵》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杨逵的许多朋友里,都称颂杨逵的为人和个性。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的中年人。在朋友们开会讨论的时候,他会默默地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开座谈会的时候,一等到他发言,郑重而有力的语调,常常会令人听了肃然起敬,鸦雀无声。然而杨逵决不是一个冷面的“假道学”,决不是一个目空一切的无聊绅士。只要在一个熟朋友的面前,

^① 黄永玉:《记杨逵》,收入司马文森编《作家印象记》,(香港)智源书局1950年版,第83页。

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话,热情得像一个孩子。他虽然已是久经沧桑的中年人,然而他却是每一个年青人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热爱着祖国的文化斗士。^①

就是这样一个贫穷而骄傲、朴实而机智、沉默而热情的杨逵,一路走过去,身后留下了台湾文化重建的弥足珍贵的足迹。

战后初期杨逵的文学活动时间,总共只有三年七个月零二十天(1945年8月15日至1949年4月6日),其中还要扣除因二二八事件入狱的三个半月。但杨逵在这一时期为文坛所做出的贡献,却有着惊人的纪录。他不仅热情参与战后台湾的社会重建工作,支持“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指导“银铃会”青年作家的创作,并不断在报纸刊物发表新作,还把大量的心血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园地的培植方面,其编辑工作的密度之大,文化活动的频率之高,足以令世人感佩与赞叹!这期间,经杨逵之手,或直接创办、或担任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报纸副刊、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就达到八种之多,且不少报纸刊物是顶着官方压力,在查禁与创刊之间,屡仆屡起,一路坚持过来。战后初期最重要的报刊编辑阵地里,大多活跃着杨逵战斗的身影。且看杨逵这份文学活动记录:

1945年9月22日,创办《一阳周报》,为宣传三民主义理想奔走呼吁;

1946年5月5日,担任《和平日报》“新文艺”副刊主编,力促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传播;

1946年7月1日,进入《台湾评论》杂志社,坚持战后台湾的左翼文学论述;

1946年,创办民众出版社,预计出版“小说故事篇”四册、“歌谣

^① 范泉:《记杨逵》,见范泉《遥念台湾》,(台北)人间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2页。

俚语篇”三册、“常识论说篇”三册；

1947年1月15日，担任《文化交流》主编，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

1947年1月之后，出版发行“中国文艺丛书”六册，热衷于国语运动推行和两岸文学沟通；

1948年8月2日，出任《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主编，为台湾新文学的薪传倾心竭力。

1948年8月10日，出版《台湾文学丛刊》三辑；

1945年8月至1949年4月，杨逵不仅在自己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上发表诸多作品，还为《新知识》、《潮流》、《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等报刊杂志撰写文章，多方面推展文化重建活动。

杨逵活跃于战后初期文坛的时候，正值四十多岁的人生壮年。1946年3月，他的第一本作品选集《鹅妈妈出嫁》出版后，他也曾计划着多写几篇小说，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记录台湾历史上诸多可歌可泣的场面和人物。作为一个作家，他毕竟还没有涉足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漫长而辛酸的日据时期，不断剥夺他们那一代作家的生存权利和写作空间。如今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渴望着新的文学出发。

然而，随着1949年台湾全省的时局动荡，杨逵不幸被捕入狱，他的文学生涯亦戛然而断。

二、动荡时局中的和平使者

在台湾新文学的历史上，坐牢次数最多的作家恐怕非杨逵莫属。从事农民组合运动的岁月里，为了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杨逵曾数十次出入于日本人的监狱；到了光复时期，因为争取民主、自由与和平，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杨逵又两次身陷囹圄，最后一次竟被国民党当局监禁十二年，由此构成他漫长而辛酸的绿岛生涯。

光复的历史转折,使台湾突然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转变为半封建中国的一省,台湾人民也进入了欢天喜地的昂扬状态。“然而,在欢天喜地的现象之下,台湾社会却潜存在着两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日本殖民统治后的遗害问题,另一是国民党政府的半封建半殖民性格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对光复后的台湾历史的发展产生基本的、结构性的重大影响。”^①异族殖民统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各种遗祸和封建中国在政治上的昏庸无能,成为当时社会存在的巨大矛盾。

欢天喜地后的台湾民众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矛盾所显现的现实是如此严峻。光复初期的台湾政治,出现了贪官污吏投机横行,歧视压迫台湾人民的局面;经济上则陷入生产停顿、物价飞涨,失业恐慌的危机,到了二二八事件前夕,台湾的米价整整上涨了二百五十倍,号称米仓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米荒,抢米风潮时有发生。当时台湾的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已经增加到一百万,无米可炊而全家自杀的事件不断出现。而思想文化上的不民主,也让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文化团体受控于包办主义,文化摩擦日趋严重,省内外的隔阂不断加深了那条“澎湖沟”。

上述情形很快引起台湾知识分子忧虑和警觉。大陆来台作家王思翔将国民党政权为代表所进行的接收和重建,形象地称之为“恶性的中国化”。这种情形,与许寿裳所主持的台湾省编译馆以及半官半民的“台湾文化协进会”所共同推行的“良性中国化”路线,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光复一周年之际,杨逵和他同时代台湾作家所表达的,已经是一种对台湾光复的痛哭、叹息之感情了。在1946年8月15日出版的《新知识》上,杨逵发表《为此一年哭》,痛陈光复初期的台湾社会现

^① 曾健民:《建设人民的现实主义的台湾新文学》,见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4页。

实：

说几句老实话，写几个正经字却要受种种的威胁，打碎了旧枷锁，又有了新铁链。结局时间是白过了，但是回顾这一年间的无为坐食，总要觉着惭愧，不觉的哭起来，哭民国不民主，哭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宝贵的一年白费了。^①

作家赖明弘发表于同刊的《光复杂感》，也不无痛心地看到了民众人心的失落：

现在对“光复”不仅不感到兴奋，反而个个都有点近于“讨厌”的情绪……由狂欢而失望了，而痛哭了，甚至而“排斥”了。^②

作家杨云萍在稍后台湾开展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则在众多颂扬鲁迅的文章中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台湾的光复，我们相信地下的鲁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只是假使他知道昨今的本省的现况，不知要作如何感想？我们恐怕他的“欣慰”，将变为哀痛，将变为悲愤了。^③

① 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9页。

② 赖明弘：《光复杂感》，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

③ 杨云萍：《纪念鲁迅》，原载《台湾文化》1卷2期（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1946年11月1日。

与当时的台湾民众一样,杨逵对台湾光复的期盼愈切,他后来面对恶性现实的痛苦,也就愈深。光复以来,针对台湾社会与文坛的现状,杨逵一再痛心地诉说道:

目前整体文化呈现停顿的状态,而文学的停顿更叫人痛心。^①

光复九个月以来,我们的期待完全落空。我们虽然想尽办法,寻找我们活动的小空间,苦斗不懈,然而如今一切全面停顿的同时,我们在此还为了不得不讨论的文学的停顿而洒泪告白,情况太惨了。^②

礼仪廉耻之邦,在这一年来给我们看到的,已经欠少了一个信字……虽有几个礼仪廉耻欠信之士得在此大动乱之下再发其大财,平民凡夫在饥寒交迫之下总会不喜欢他们的。^③

台湾光复以后,民众百姓经历了从欢天喜地的狂喜,到呼天抢地的痛苦的情绪跌落,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的表现令民众普遍失望,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想开始化为泡影。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以

① 杨逵:《文学重建的前提》,原载《和平日报·新文学》第2期,1946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15页。

② 杨逵:《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原载《和平日报·新文学》第3期,1946年5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3页。

③ 杨逵:《阿Q画圆圈》,原载《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页。

及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不断激化了执政当局与台湾民众之间的矛盾，官逼民反，最终酿成席卷全岛、震惊一时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上，台湾省专卖局官员傅学通、叶根德和警察以查缉私烟为名，在台北街头造成殴伤女烟贩林江迈、并射杀围观青年陈文溪的不幸事件。愤怒的群众奋起抗议，包围了藏有凶手的警察局。次日早晨，整个台北市沸腾起来，民众自发地聚集起来，到行政长官公署示威抗议，不料遭到卫兵机关枪扫射，当场就有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被激怒的群众在中山公园集合并占领广播电台，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反抗暴政。于是台北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岛性的反抗运动旋即引爆，史称二二八事件。当天下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宣布全省戒严。蒋介石遂紧急抽调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福州的一个宪兵团开赴台湾，进行报复性的镇压。

二二八事件在台北发生后，消息传到台中，杨逵非常激愤，同时又感到事态严重，不知本市的民意如何？于是，便与庄垂胜、叶荣钟、何集璧等人商量，决定利用政治建设协会台中分会拟在3月2日举办的“宪法推行大演讲会”，扩大召开市民大会，共商对策。3月1日上午，杨逵等人在中央书局二楼设“舆论调查所”，制作名信片大小的传单，内容除了告知二二八事件之外，还通知次日在台中戏院召开民众大会。当时也没有与“台中人民大会”交涉，杨逵就将它的名字印上去，并在大街小巷四处散发。

3月2日清晨，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到台中戏院开会，并纷纷上台演讲，群情激愤，人们很快就把台中的宪兵和军队武装解除，分几路接收市政府、警察局、消防队、飞机场。当天的人民大会由台湾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谢雪红担任主席，她以警察的武器编组学生起义军，并宣布“人民政府”成立。是日下午，台中县市、彰化市参议员及士绅代表聚集台中市参议会，成立了“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并编组青年学生为“治安军”。当晚，杨逵赶写了一篇题为《大捷之后》的文

章，勉励规劝民众不可得意忘形，必须理智、团结地应对时局。原拟在某家报纸发表，后因编辑拒绝，遂以油印方式四处发送。

事实上，从3月1日起，二二八事件的斗争就开始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条战线是以地方士绅为主、部分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处理委员会”，它多表现出成分的复杂性和斗争的某种妥协性；另一条战线是准备武装斗争的群众，台湾共产党地下领导谢雪红、张志忠等人皆参加了武装起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就台中地区而言，当时局有变，风闻陈仪从台北率兵南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处理委员会”的士绅纷纷走避；谢雪红等人则将台中的群众武装组织重新编整，于1947年3月4日下午4时成立了“二七部队”，以纪念辑烟血案发生的2月27日。台中民兵对官方机构的控制，一直延续到3月8日。

那段时间里，杨逵在《和平日报》主编“新文学”副刊。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中市的“处理委员会”曾派杨逵负责组织部，随时印发传单。杨逵常常自己跑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印号外，报导有关时局变化的各种消息。因为形势动荡，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乱打外省人的偏激行为，杨逵就出面劝说，并把外省人安排到一家旅馆里保护起来。他还以“台湾民主联盟”的名义，与当时中共台湾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共同执笔了《告台湾同胞书之一》、《告台湾同盟书之二》，并由杨逵的长子杨资崩拿去刻钢板，油印后四处散发，影响甚广。

这两篇文章充分反映了台湾民众在忍无可忍的现实压迫下奋起反抗、要求民主和自由的迫切愿望，并以“不分本省外省全体人民携手为政治民主奋斗到底”的胸怀，呼吁制止那种排斥、殴打外省人的偏激行为，并对二二八事件以后的局势做出正确的引导和号召：

我们要求政治上彻底的改革，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是我们决争的目标。我们是汉民族，应该和全国被独裁一党专政所压迫的同胞携起手来，我们切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

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逐他。……大家要理解以后要和国内同胞精诚团结，打倒恶劣腐败政治……共同争取民主政治。^①

“处理委员会”控制台中期间，台湾共产党负责人蔡孝乾曾经找到杨逵，要他负责创办《人民日报》。杨逵与其意见不合，但仍然保留了两人的私下联系。在杨逵看来，台中的局势难以维持长久，一旦国民党大军开来，乌合之众随即会散去；倒是创办流动性的周刊或半月刊更符合实际。另外，与其大家都集中于台中闹市，还不如到乡下去发动农民，保存革命力量。当时负责台中起义群众组织工作的杨逵，遂撰写了《从速编成下乡工作队》一文。由于记者缺乏实际斗争经验，这篇文章以“杨逵”署名发表于3月9日的《自由日报》，同时也印成单页传单散发，以作为指导性的文件。杨逵对于动荡时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在文中呼吁建立和扩大除贪官污吏奸狡恶霸之反对派以外的民主统一战线，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组织下乡工作队，到乡镇去从事宣传、组织和训练工作，以便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因为争取民主与自由，这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分项叙述工作原则时，杨逵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和工作对策：

第一，在市民控制下的都市，随时要从事统一工作。

我们有点弊病，就是你一党我一派，各人的思想虽不得轻易改变，但，在此争取民主与自由，在此争取以自由无限制普选而产生自治政权这阶段，除贪官污吏奸狡恶霸之反

^① 杨逵：《告台湾同胞书之一》，见吴克泰《杨逵先生与“二二八”》之附录；金坚范主编《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52页。

对派以外,是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在此阶段,我们需要包容各界(学、工、农、商、妇女、文化各界),而且也要包容无党派,扩大民主统一战线。

第二,下乡工作队可以三人——五人为一组,分发各区,在地联合当地知识分子,进步而有热血的青年,开始宣传、组织、训练工作。进而与乡镇公所与警察合作,推行自由无限制的选举,产生乡镇区自治。

第三,在此工作第一的对象,就是乡镇中坚青年,以十人为一小队,五小队为一中队,二中队以上为一大队,这可以叫做乡民或镇民保卫队,而保卫队须要准备随时可以赶到他乡镇以至都市去应援。

第四,第二的对象就是以邻里或是村乡镇为基础地域的自卫团,这自卫团,原则上不移动,只要自卫自己的邻里,或是村镇。这邻里或村镇须要附属合作工作或是相互工作,以增加生产与防卫。

第五,第三就是妇女、工人、学生、教员等各界的组织,进而取得各界可以联合起来,互相帮助,互相看顾。^①

作为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理想的行动派,杨逵又一次将精神理念付诸社会实践。他和叶陶身体力行,扮作农夫农妇,到邻近乡镇游走,四处传播消息,鼓动农村青年投身斗争行列,并将他们组织编队,三三五五一组地送到台中的“二七部队”,为群众武装组织开发兵源。后来从农村前来台中报到的队伍中,有一大部分可以说都是杨逵夫妇鼓动而来的。事实上,杨逵因为噍吧哞事件带来的童年记忆和自

^① 杨逵:《从速编成下乡工作队》,原载《自由日报》1947年3月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9—240页。

幼柔弱的身心性格,使他始终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杨逵并不看好发动起义、组织游击队之类的武装斗争,对武装反抗终归失败的结局也早有预料,但他仍尽力为“二七部队”开拓兵源,无非是想藉此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善政治,促进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而并不是以武力长久对峙。

1947年3月8日,南京政府的援军抵达基隆,开始了报复性的大屠杀。风声骤紧,许多参加武装起义的台中人士纷纷躲藏,“二七部队”也于3月12日退守南投埔里一带,3月16日宣布解散。见大势已去,杨逵夫妇离家走避,踏上了逃亡之路。起初杨逵不想离开台湾,想和大家一起做些事。逃亡时,身上还带着油印机和纸张。他们先在山里隐匿了十几天,随后往二水、林内一带山区逃难,住草棚,藏牛栏,一路惊见同样出逃的友人。不久,风声更紧,杨逵夫妇沿着山线逃向海岸,希望能在鹿港一带找到船只,偷渡出海。但这时海岸线已被死死封锁,无路可逃。失望又疲惫的杨逵夫妇,在逃难四十多天后,只好折回台中。由于杨逵与叶陶一共被官方悬赏十万元,邻人立即通报警方,杨逵夫妇返家当夜即遭逮捕,被关押在干城营区的马棚里。此后,杨逵与叶陶所经历的恐怖经验和人生传奇,令他们命运起伏,五味杂陈。

当时关进干城营区马棚里的人很多,其中有不少是参加学生队的年轻学生。警方原来内定枪毙十七人,杨逵与叶陶都在名单之中。生性乐观的叶陶,自嘲死期来临,索性天天放开怀来唱台湾民谣《丢丢铜仔》,还不断向几位青年学生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杨逵则沉默不语,久坐于地。

临刑前一天,事情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魏道明作为当日新上任的台湾省主席,开始改变之前的官方处置政策,采用安抚手段,所有非军人被捕者改以司法审判,结果是救了十六条命,只有一人被枪毙。杨逵和叶陶侥幸逃过一次死亡的劫难。

杨逵夫妇被专车送往台北警务处侦讯,当时由一个法官主审。

那张刊登有杨逵署名的《从速编成下乡工作队》的《自由日报》赫然摆在桌上，旁边便是电击的刑具。法官催促杨逵，坦白讲来。杨逵心想，既然有报纸文章为证，注定是没命了，勿需再讲。所以不管法官怎么问，杨逵都保持沉默。最后法官说，你想想看，不然就要用电击，随即离去。这位法官后来到杨逵家中，把赖和未发表的稿子和才出一期的《文化交流》杂志拿走，从此就失踪了。之后，杨逵虽然被转至台北多家单位审讯，但都没有人问起《自由日报》这件事，估计证据已被神秘销毁，那位法官可能逃往大陆。

1947年8月，杨逵与叶陶在监牢度过一百零五天之后，终于被释放出狱。

死里逃生的杨逵并没有被这次挫折击败，反而更加活跃于台湾文化界。他四处奔波，先是倾力编辑印制鲁迅、沈从文、老舍等人的中日文对照本，发行了“中国文艺丛书”；1948年又担任《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主编，参加了《台湾新生报》“桥”副刊有关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这期间，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杨逵事迹，那就是他与台湾大学的麦浪歌咏队结下的不解之缘。

麦浪歌咏队的前身成立于1946年，是以演唱《黄河大合唱》而著称的黄河合唱团。二二八事件之后，它于1948年发展为以省内外进步学生为主体的大型文艺社团。

麦浪歌咏队队员平常保持三四十人，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人。他们多来自北方，看过随风浮动的麦浪，又喜爱诗歌中的“麦浪”意象，故取名为麦浪歌咏队。

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麦浪歌咏队曾举办过十余场大中型演出活动。1948年12月底，麦浪为了给台大全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筹募福利基金，曾连续三天在台北中山堂演出。从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祖国大合唱》，到当年大陆学生运动中风行一时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青春战斗曲》、《跌倒算什么》、《光明赞》；从《康定情歌》、《马车夫之歌》、《青春舞曲》、《插秧谣》、《在那遥远的

地方》、《王大娘补缸》、《朱大嫂送鸡蛋》等地方民歌，到《农村曲》、《农村曲本事》等歌剧，这些唱出了祖国风光、传达了大陆人民心声的歌曲，这些表现了人民真正的生活的舞蹈，在充斥着日本歌曲与西方音乐的当时台湾社会里，引起强烈反响。为了让“麦浪”歌声传遍全岛，在台大校学生会的倡议下，从1949年2月4日起，麦浪歌咏队利用寒假举行了环岛演出。每到一地，麦浪歌咏队都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场场爆满，盛况空前。许多台胞是含着热泪观看演出的，还有一位台湾老人在观后感中写道：“‘麦浪’的感人之处在于，它唱出了广大台胞对伟大祖国的真挚感情，唱出了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对光明前途的憧憬。”^①

麦浪歌咏队环岛演出的成功，是与杨逵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演出的第一站是台中，由于麦浪歌咏队的行动已经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演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杨逵四处奔波，联合当地文化界进步人士，想方设法找到一家戏院，帮助歌咏队解决了演出场地和住宿问题。他还在麦浪歌咏队与台中文艺界、报社媒体之间搭桥牵线，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和介绍其演出活动。杨逵很认真地观看了演出节目，建议增加台湾民歌民谣，并推荐长子杨资崩和另一位台湾小朋友许肇峰，表演了台湾战后民歌《收酒罈》和《补破网》，让各地民谣有了一种新的融合。《收酒罈》为张邱冬松1946年创作，讲述一位台湾少年靠收购破铜烂铁废纸维持生活的悲苦故事，因为它反映了民众重建台湾理想幻灭的心情，而传唱于大街小巷；《补破网》则由李临秋创作于1948年，旨在表现男主人公与闹翻的女友弥补破碎的爱的希望。因为歌词“渔网”与“希望”的台湾发音相近，它又被视为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民众期盼修补残破的社会之象征。这两首台湾歌曲的演唱，使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更具有现实感和群众性。

^① 《青春三年在台湾的证言》，见蓝博洲《麦浪歌咏队》，（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4月版，第155页。

2月10日上午,杨逵还另外安排麦浪歌咏队员和银铃会成员朱实、林亨泰、萧翔文等人,在台中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文艺为谁服务”的座谈会。大家就“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人”与“人民”的分野等问题展开激烈论争,最终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杨逵也结合自身的文艺实践经历,深刻地阐释了“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反映人民的心声”的理念。最后,他还即兴朗诵诗歌一首,送给“麦浪”。现在,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最后两句:“麦浪、麦浪、麦成浪;救苦、救难、救饥荒。”

台中演出结束后,为了安排麦浪歌咏队在台南的巡回演出,杨逵先期去了台南,多方疏通关系,从演出场所到住宿地点,一一落实下来。整个旅行演出的过程中,他都在不辞劳苦地奔走联络,义务担当麦浪歌咏队的“先行军”。2月15日,杨逵在《中华日报》“海风”栏目发表《介绍“麦浪歌咏队”》一文,向台南文化界推荐即日起开始在当地展开的麦浪歌咏表演。文章开门见山,首先推崇麦浪歌咏队“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道路,不但是正确的路,也是新文艺应该遵循的路。接着,他深刻发掘了这种演出的时代意义:

“麦浪歌咏队”这一次的表演是把全国各地(如西藏,新疆,东北,山西,河南等地)的民歌民舞介绍给我们的,当然不是创作,可是这正如播种的人们一样,为开拓台湾人民文化是很有意义的,由这个鼓励很久很久被大家忘记了真正的人民思想与感情的纯真,朴素与活泼的表现,形已使大家重新关心起来了……

这是人民文化的开拓,只有坚忍耐劳耕耘,播种,光明才能来临。^①

^① 杨逵:《介绍“麦浪歌咏队”》,原载《中华日报》“海风”栏目第39期,1949年2月15日。

从这篇文章发表之日起,麦浪歌咏队一连三天在台南的南部大戏院演出四场,引发民众热烈反响,台南市文化界也为之举行了欢迎会。杨逵通过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活动,不仅更加坚定了提倡文艺大众化、重建台湾文学的理念,而且对民间文学的力量有了深刻认知,这让他 在麦浪歌咏队巡回演出之前即已开始进行的母语歌谣收集和写作的尝试,拥有了一种新的前景。

然而,麦浪歌咏队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精神和文艺大众化路线,很快被国民党政权所扼杀。1949年3月20日晚上,台湾大学法学院和台湾师范大学两名学生,同骑一辆自行车路过台北大安桥附近时,被中山路派出所警察以“违犯交通规则”理由抓去修理,学生们很快聚集在派出所进行交涉抗议。3月21日,台大与台师大的学生们高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到警察局示威;3月29日,学生们在台大法学院操场举行了庆祝青年节的营火晚会,麦浪歌咏队的演出,让全场群情振奋,争取自由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4月6日清晨,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台大及台师大,拘捕了二百多名学生,后有百余名被释放,十九名接受审判,其中包括麦浪歌咏队队员陈钱潮、王耀华、王惠民、蓝世豪等人。这就是震惊台湾的“四六事件”。当天,平时与学生们有过往来、常去台湾师范大学参加座谈演讲的杨逵,以及由他担任副刊编辑的《台湾力行报》的社长、工友,还有《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主编歌雷,台中办事处主任钟平山等人,均遭逮捕。

事实上,杨逵被捕的更直接原因,还在于他起草了《和平宣言》。40年代后期,《台湾力行报》、《台湾新生报》、《和平日报》的副刊编辑等文化人经常往来,举办文学座谈会时,常常推举杨逵担任主席。杨逵曾这样谈及《和平宣言》的由来:

民国三十八年,我同一些外省籍文化人士常常讨论:二

二八事变所造成的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鸿沟，应该填平起来。我于是写了一篇《和平宣言》，主张先从台湾文化界做起，把当时台湾的文化界，不论省籍，用“台湾文化联谊会”的组织，开始彼此的理解，沟通与交谊，先由文化界展开民族团结，一步步弥补二二八事变所造成的民族创伤。^①

在文化界朋友的提议下，杨逵起草了《和平宣言》，当时油印二十份，寄给关心的朋友，他们多是外省人。这时，前来台湾《台湾新生报》访问的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在《台湾新生报》副刊主编歌雷那里看到《和平宣言》的草稿后，颇感兴趣，即以《台湾人关心大局 盼不受战乱波及 台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宣言》为题，在1949年1月2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这篇新闻报道。

这期间，共产党已进入北平，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条件再启国共和谈。《和平宣言》发表当日，国共和谈重新开始。但是国民党派去和谈的代表张治中、邵力子一去不复返，内战形势发生急剧逆转。此时，陈诚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台湾省主席，赴任途中经过上海时，曾有记者向他问起《和平宣言》的问题。待陈诚抵达台湾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被触怒的陈诚已经扬言台中有共产党第五纵队，并宣称要把这种人送去填海。闻此消息，杨逵心中已有警觉；但是，以一篇《和平宣言》成为“叛乱罪”的惟一罪证，这是杨逵始料不及的。1949年4月6日的大规模逮捕活动，实际上是当局借机控制言论自由、清除左翼人士的一种阴谋。

杨逵的《和平宣言》，是在内战形势全面逆转的形势下而提出来的。文章开宗明义：

^①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8页。

陈诚主席在就任当日的记者招待会宣布,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这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什么呢?需要从人心坎找出的,不能凭主观决定。据吾人所悉,现在国内战乱已经临到和平的重要关头,台湾虽然比较任何省份安定,没有战,①没有乱,但谁都在关心着这局面的发展。究其原因,就是深恐战乱蔓延到这块干净土,使其不被卷入战乱,好好的保持元气,从事复兴。我们相信台湾可能成为一个和平建设的示范区,可是和平建设不是轻易可以获致的,须要大家协力推进。②

这里所说的人民的意志,即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内民众对于这种民族前途,皆心向往之。1949年1月8日,台湾省参议会曾通过临时动议,分别致电蒋介石与毛泽东,呼吁停止内战,争取和平。③

围绕怎样让台湾实现“和平建设的示范区”的目标,杨逵提出建言。针对当时外国势力插手两岸事务的国际性阴谋,以及1949年元旦之前,美国与台独联盟廖文毅等有关台湾独立或联合国托管的主张;也基于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现实教训,杨逵明确提出:

第一,请社会各方面一致协力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避免类似“二二八”事件的重演。第二,请政府

① 原文此处为空字。

② 杨逵:《和平宣言》,原载《大公报》1949年1月2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5页。

③ 参见薛元化主编:《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I(1945—1965)》;李永炽监修,(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72页。

从速准备还政于民,确切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第三,请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的捕人,保证各党派循政党政治的常规公开活动,共谋和平建设,不要逼他们走上梁山。第四,增加生产,合理分配,打破经济上不平的畸形现象。第五,遵照国父遗教,由下而上实施地方自治。^①

由此看来,这篇不满七百八十字的《和平宣言》,大约有三个要点:一是希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尤其不可把内战蔓延到台湾岛上;二是希望台湾实行民主建设,释放政治犯,以避免二二八事件的重演;三是消灭所谓台湾独立及托管的一切企图,维护祖国统一。

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杨逵仍然高瞻远瞩、情真意切地呼吁“以台湾文化界的理性的结合、人民的爱国热情”,“泯灭省内省外无谓的隔阂”,呼吁民主自由、和平建设的台湾示范区的理想,这一切足以见其社会主义理念之赤诚。

然而,谁也无法想象的是,杨逵竟因为一篇《和平宣言》而被捕,并在长达两年的监狱关押中等待判刑。就在杨逵这次被捕的三四个月以后,基隆中学发生“光明报事件”。^②作家钟理和的同父异母哥哥钟浩东因印刷《光明报》被捕,同时也抓了林正亨。林正亨在严刑拷打中乱供叶陶是《光明报》台中负责人,于是叶陶再度被捕,与杨逵一同关在军法处监狱。由于缺乏证据,叶陶终于被释放。杨逵夫妇双双坐牢时,长子资崩只有十七岁。资崩既要独立照料下面四个弟妹,又要想方设法跑到监狱去看望父母,小小年纪,吃尽了苦头。

^① 杨逵:《和平宣言》,原载《大公报》1949年1月2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5页。

^② 《光明报》是中共在台湾的地下报纸,手写油印本,二二八事件以后由吕赫若躲藏在台北编印。

杨逵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家中屡屡被搜查和抄家。据杨逵次子杨建回忆，二二八事件之前，大陆来的左翼文人扬风曾经找过杨逵，并把一只装满书籍的大皮箱存放杨家，以后就没有了音讯。杨逵被捕后，警备司令总部每隔几个月就来搜查一次。1950年那一次，一共来了三个人搜查，一下子就拿走了九百多本书，都是扬风带来的书，其中多是鲁迅、郁达夫等大陆作家的著作。

在岁月的煎熬中，从阳明山警务招待所持续五六天之久的轮番疲劳审问，到转送军法处长达数月的囚禁，在经历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侦讯、诱供和审问之后，按照军法审判，杨逵最终以“叛乱罪”被判处十二年徒刑，而此时杨逵辗转监狱已经两年。当时法官对杨逵的判决作了如下的结论：“不满现实就是左倾，你会反抗日本统治，就会反抗我们的政府！”如此以来，杨逵为填平二二八事件造成的省籍鸿沟而铺路搭桥的《和平宣言》，就成为“叛乱罪”的所谓证据。法官宣读判决书后，还特地问杨逵：你本人有什么意见吗？可当杨逵刚要开口时，对方一声怒喝，取消了他的申诉权。

1950年5月10日的《中央日报》，其中一则新闻标题为《三个叛乱罪犯判决，杨逵处徒刑十二年，钟平山陈军各十年》。新闻内容如下：

杨逵，四十五岁，台中市人，业著作家；钟平山，四十一岁，山东益都人，《新生报》台中办事处主任；陈军，又名陈峰，二十三岁，福建福清人，系台中农学院学生。三人均因叛乱罪，于昨日经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判决，爰杨逵在日本大学读书时，曾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自称为共产主义理想者，三十八年元月初旬，共匪在北平鼓吹局部和平时，以台湾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名义，撰拟《和平宣言》，谓“希望不要再重武装来刺激台湾民心，造成戒惧局面，把此比较安定的干净土以战乱而毁灭”等语响应之，并先将原稿转交于台中《新

生报》分社主任即被告钟平山阅览,经同意后,寄发台北市各文化人士,转寄上海《大公报》发表。被告陈军,系台湾省立台中农学院先修班学生,先后于三十七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二次以“中国共产党华南区队部”名义,撰写诋毁政府宣扬共产主义之反动文告《告全国知识青年书》,张贴于台中农学院,均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案经前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察觉,电飭台中市警察局将该被告等一并扣押,解案审辨,经讯杨逵等三人,供证明确,乃各依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科刑,除杨逵处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外,钟平山、陈军各处徒刑十年,各褫夺公权五年,并呈奉国防部核准发监执行。^①

透过这则新闻可知,杨逵的被捕入狱,的确是跟《和平宣言》直接相关。白色恐怖年代里,那种“宁可错杀一百,决不放过一人”的政治高压气息,从字里行间,满溢而出。

因为一篇七百多字的《和平宣言》,竟然换来十二年的监狱生涯,杨逵事后曾自嘲他领过全世界最高的稿酬,平均一个字换得五天的牢饭钱。由于呼吁和平而招来牢狱之灾,这对当时独裁、专制的社会政治现实,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它所言说的,不仅是一位台湾作家不幸的人生命运,也是那个时代沉重的悲哀。

三、绿岛铁窗的无罪囚徒

1951年5月17日,在辗转审讯中已经度过了两年牢狱生活的杨逵,在这一天被押送绿岛监狱,开始了另外十年的囚徒生涯。这

^① 转引自王晓波:《被颠倒的台湾历史》,(台北)帕米尔书店1986年11月版,第2—3页。

时,杨逵已经四十六岁。

绿岛,在走过戒严岁月的大多数台湾人的记忆里,这个名字是同禁忌与恐惧、惩罚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构成了许多政治犯惨痛的生命历史,也成为现代台湾政治、社会乃至文学的一种特殊议题和历史见证。

绿岛,又称鸡心岛,位于台东县东南方的太平洋中,是全省第四大离岛,面积约十七平方公里。它距台东十九海里,与兰屿相隔四十海里,从台湾岛到这里,以今天的航海时速,要乘坐两个多小时的轮船。绿岛四周为裙状珊瑚礁群围绕,再加上临海高峭的台地崖,经海水侵蚀,岩石嵯峨雄伟。过去这个岛上,住着稀稀落落的十几家渔户,常年靠打鱼为生,他们与外界惟一的联系方式就是渔船。绿岛旧称“火烧岛”,一种说法是讲渔民出海捕鱼,必在山顶燃火为号,来为船只返航引导,因而得名火烧岛。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在这个遥远又荒凉、炎热又冰冷的小岛上,每逢冬春季节,西北风呼啸而来,卷起海面上的层层巨浪,变成无数雨点,猛烈吹打着一草一木,让备受盐分侵袭的岛屿绿色迅速枯黄,远远望去,像是野火烧过,寸草不留,人们又称之为“火烧岛”。日据时期,这里曾是政治犯和重大流氓犯的流放地,素以荒凉萧索而著称。

台湾光复后,火烧岛草木渐生,逐渐恢复漫山遍野的绿色,从1949年7月15日起,台湾当局将其更名为“绿岛”。1951年,当局开始扩大绿岛监狱规模,设立新生训导处,其主要工作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故称之为“新生”。新生训导处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管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两个分队,此外还有一支女生分队。在冤案丛生的戒严时代,绿岛监狱中经常听到的话,就是“宁可冤枉一百个,决不放过一个”。五六十年代的高峰时期,绿岛曾经关押过一万多名政治犯。从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到进入中年的持不同政见者,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

与世隔绝的绿岛,构成了成分颇为复杂的政治犯集中营。这里

有国民党部队在步登岛俘虏的百余名解放军官兵，新生训导处设立之前他们就被关押在绿岛；有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诸如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捕的老政治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死亡，被抛进了大海；有 50 年代“清肃运动”中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他们几乎要把牢底坐穿，诸如 1950 年 5 月被捕的思想犯林书扬、李金木等人，他们系狱绿岛竟然长达三十四年！尽管 1975 年蒋介石去世时，当局曾发布“刑事犯罪分子减刑二分之一。政治犯罪分子减刑三分之一。无期徒刑减为二十五年”的“大赦令”，但直到社会民主人士为长期监禁的无期徒刑政治犯公开呼吁假释权利的 80 年代中期，他们才被当局不无阻挠地艰难释放；也有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的人物，包括国民党的一些忠贞之士。

1951 年与杨逵同行的那批犯人，是 50 年代第一批被押送绿岛的政治犯，他们多被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然而刑满释放时，因为惧怕政治犯株连而无人担保，致使政治犯超期服刑的现象并不鲜见。漫漫长夜中，有的人初衷不改，咬着牙挺过了铁窗生涯；有的人愤起抗争，倒在了血泊里。在遥遥无期的身心折磨中，那些死于疾病的，精神失常的，发生人性扭曲与变异的，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悲剧。许多人永远未能归乡，成了绿岛公墓里的孤魂野鬼。

这些政治犯正值盛年，却不得不终日与海天为伴，只能在荒岛度生，并忍受种种惩罚性的监狱管制。因为政治犯多属于思想和信仰问题，管训者与被管训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情绪态度始终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驯化与反驯化的抗衡成为与时间拔河的一种角力。这种漫长的绿岛对峙于双方而言，都变成了一种复杂难言的特殊人生经历。

多年以后，杨逵仍然清楚地记得被押送绿岛的那个傍晚。孤独的岛屿上，一片荒山的怀抱里，修筑着与世隔绝的绿岛集中营。高墙，铁门，碉堡，铁丝网，戒备森严的狱警，而监狱正门上赫然在目的却是“新生之家”四个大字。海风扑面，残阳如血，在绿岛的一片废墟

广场上,新生教导处第一任的姚处长,威风凛凛地站立于一块大石头上,面对千余名在疲累与饥饿中席地而坐的绿岛新生们,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地说:

我代表一座十字架,跟着我走的是生,背向我的
是死!①

眼前这残酷的现实,在杨逵内心世界中所引起的,是尖锐对立和强烈冲撞的情绪:

在火烧岛,囚舍背后的山腹,写着“信义和平”四个大字。每天,我看见“和平”两个斗大的字,我就想:我竟是为了中国人中间的和平与团结来这儿的!我曾经为了使台湾从日帝支配下解放,奔波半生,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事,但总也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人的相爱、相互间的和平,却有艰难的遭遇,这成为我心中无从解开的疑结。②

早期绿岛政治犯的生活,主要围绕思想训导与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展开。政治教育,也就是对政治犯的“洗脑”,它是绿岛监狱一项重大的例行公事,主要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方式来推行。从早晨起床后的训话,到所谓“匪党理论批判”之类的政治课;从每天需要填写的“自省自勉录”,到名目繁多的“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感训心得写作”,新生训导处对政治犯严密苛刻的思想控制,达到了无以

① 转引自胡子丹:《杨逵绿岛十二年》,原载《传记文学》第5期,第73页。

②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8—19页。

复加的地步。但事实上,当局对政治犯的这种“教育”并不相信,更无诚意。因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因为狱中教育考核成绩优秀而获得减刑,一批批的政治犯都是不折不扣地坐满了他们七年、十年、十二年乃至更多年头的监牢,而且有不少人因为被认定不知悔改分子而多加几年徒刑,却从来没有人因为“懊悔有据”而提早释放。

绿岛岁月中,最让政治犯们难以忍受的,就是在这种没完没了充斥一切的政治训导中,被迫违心说话,被剥夺掉思想与信仰的自由。如同杨逵自述:“最讨厌这唱军歌,政治课上的小组讨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①

每天必开的小组讨论会,在李镇洲的《火烧岛第一期新生》的记录中,是这样一幅情景:

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小组以班为组,设组长一人,讨论时主席一人,由新生轮流担当,每一题换一次主席,记录一人,也和主席一样轮流,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②

而唱歌,也是囚犯每天必做的“功课”。秦汉光的《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一书中写道:

唱歌,除了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唱《新生之歌》,集

^① 《关于杨逵回忆录笔记》,原载《文学界》第14集,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4页。

^② 李镇洲:《火烧岛第一期新生》,转引自秦凤《岁月台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3—64页。

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加上唱的就是那几首，真是要命。我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①

梦魇似的“新生”生涯，就在这种无孔不入的政治训导中拉开序幕，绿岛集中营立刻显示出它残忍、冷酷、荒谬的本相。特别是在最初的岁月里，管训人员与新生的关系，更是横眉冷对，剑拔弩张。新生们稍有反抗，不是被关禁闭，就是受到种种惩罚，“我枪毙了你”，是管训人员动辄挂在口头上的话。管训人员监视政治犯工作的时候，一律佩枪持械，完全一幅押解的架势，训导的口吻也清一色是在对敌喊话。

担任新生训导处第一任的姚处长，是一位浑身都是政治细胞的少壮派军人，他为了让政治犯安心改造，俯首听命，最初的几年内，每每从台北返回绿岛，就编造许多谎言，好让大家为之心动。诸如“某某条文一旦通过，新生们便可以结训了”。天长日久，谎言太多，说的人累，听的人更累。后来新生们从这种谎言中解放出来，重新面对漫长的绿岛梦魇。姚处长原来满心希望站在他十字架前的新生们，全是真正的顽固不化的敌人，由他来感化，由他来教诲，通过这种“化敌为友”的训导工作，为他的前程获取人生筹码。没想到，事情全然不是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训导”并未把政治犯们驯服，政治犯们也决不可能靠这种改造获得减刑，提前出狱。姚处长的希望落空，后来也被调离绿岛。

50年代初期被押送绿岛的政治犯，等待他们的，不是一座设备完整的监狱，而是那种原始、野蛮的苦役，是刺刀逼迫下的“白手起家”。当时最能体现这种“新生生活”的典型内容，就是修建绿岛的三

^① 秦汉光：《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转引自秦凤《岁月台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4页。

大工程,即盖克难房、砌监狱围墙,开辟运动场。政治犯们被强迫着为自己造监狱,把自己关进去,还美其名曰“克难房”,并且要在自己动手建起的牢房外面挂上“新生训练总队”的牌子,以表示他们的集体“新生”。这种情形,对于政治犯们来说,它不仅是消磨体力一场苦役,更是摧残灵魂精神的一种心理战役。修围墙、筑铁丝网,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它要建造沿海岸线半围绕集中营的围墙,地势险要,距离漫长,政治犯们形象地管它叫“万里长城”。

上述各项工程以及开辟运动场,都与石头有关。建房砌墙是以石头为主要材料,开辟运动场是要把山边的石块打掉,以提供搞建筑所需的石头。这样以来,打石头和抬石头就成了新生们必做的日常功课。不仅在山边打石头,还要到山上打石头,下海里去打石头,随着打石头的范围的扩展,犯人们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打石头的任务,是挑选年轻力壮、原本做工务农的新生们来干;而抬石头,则是全体犯人必须参加。每天天刚蒙蒙亮,犯人们就被吆喝起来,跑操、训话,然后去海边抬石头,来来回回抬够五趟以后,才能吃早饭。到了暮色沉沉的时候,犯人们晚饭后还要再抬五趟石头。至于白天的劳役时间内,更是被石头所充斥。晨曦中,黄昏里,烈日下,风雨中,政治犯们在叮叮当地敲石头,砌石头,步履沉重地抬石头,由此构成20世纪50年代最可怕的苦役场景象。

在长夜漫漫的梦魇人生中,杨逵最初被编在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后来因台风肆虐,吹垮了第五中队的房子,杨逵又被改编到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对于年近半百又体弱多病的杨逵来说,他在两个队的“职业”与任务是管理菜圃。这应该是绿岛三百六十行中最远离权力中心的一项任务,杨逵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夹缝中适度喘息生存的机会。

对于杨逵这样一位曾经十二次出入于监狱的“坐牢仔”来说,他已有足够的意志、毅力、智慧和经验来面对绿岛的梦魇生涯。他虽寂寞,却清醒,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残酷的现实,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持着自我,收获人生。在狱友们的记忆里,杨逵是一个矮矮瘦瘦的老

头子,有时会穿着一大一小样式不同的旧木履,头戴一顶破斗笠,手提肩褡,不是在通往菜圃的小路上踽踽独行,就是在山洼中的菜圃里默默劳作。而他随身的佩带中,总少不了一本破旧的国语字典。管理菜圃,比起那些被狱警淫威管制下的劳动惩罚,已经属于“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劳作”;但它繁重的劳动强度,对于体弱多病的杨逵来说,也绝非易事。在荒草丛中开荒种菜,每天要挑几十担水来浇灌菜苗,还要兼顾苗圃的种植。每逢台风与季节风来临的时候,风雨交加,遍地泥泞,来不及赶回克难房的杨逵,常常浑身透湿,感冒频频。每每看到杨逵从菜圃中疲惫归来的身影,如果不是知情人悄悄指点,谁也无法想象,这就是日据时期大名鼎鼎的作家杨逵!

管理菜圃的劳动是艰苦的,而在杨逵看来,绿岛监狱中最苦的差事是上“爱国政治课”和参加“新生训导会议”。每逢开会,在这种没有不发言自由的场所,杨逵总是以一种苦涩涩的表情和语调,照本宣科地读那些千篇一律的发言稿。从1951年5月17日到1961年4月8日,这样的会议,杨逵参加的何止千百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又岂是心甘情愿,又岂能乐从中来!

按照绿岛监狱的规定,管理菜圃是被列为特种专业,特准不出“晚公差”的。但年逾五十的杨逵却常常被命令晚上出差,从帮厨打杂、磨豆腐,到担任挑石头的零时工,经常被呼来唤去,更不要说白天动辄被命令上山砍柴、挑石头了。对于这一切,杨逵是以“顺民”姿态作一种沉默的抗议,他不屑于向狱方申诉理由。在一个只有统治者独裁权力的监狱里,犯人言说的自由,以及当权者认错的时候,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沉沉的暮色中,杨逵在长长的抬石头行列中,是极其普通的一个犯人。一块块石头,一步步路程,一把把汗珠,年老体弱的杨逵在走着人间最沉重的路。但在另外一些场所,杨逵终究是杨逵,他倔强的生命意志与文学理想,如同“压不扁的玫瑰花”,开放在最黑暗的梦魇世界里。

绿岛监狱为了标榜当权者训导政治犯的功绩,用来应对外来人士的某种“参观”,也让新生们参加一些文体活动,诸如演出歌仔戏、话剧,举办运动会,以及编辑《新生活》壁报等等,以便把绿岛监狱装扮成“模范监狱”。

在1957年12月5日至7日举办的一次监狱运动会中,谁也没想到,五千公尺马拉松的长跑名单中,竟然出现了杨逵自告奋勇的名字。对于当年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绿岛政治犯来说,奔跑在运动场上的,多是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以杨逵已超过知天命年龄的“老新生”身份,以杨逵瘦伶伶的身体,这样来舍命陪少年,它让狱友们在敬佩的同时,也着实捏着一把汗。当播音器里响起“杨逵”两个字时,全场爆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席地而坐的新生们,全都站了起来。五千公尺的马拉松比赛,时间一分分过去,第一名冲刺了,后来者紧追不舍,最后一名也到达了终点,除却中途退场的,始终不见杨逵的身影。直到这一项目就要颁奖了,被落下很远的杨逵才一拐一拐地跑进场地,抵达终点。这一刻,掌声再次响起,人们为杨逵的长跑精神,为杨逵在绿岛中的生命存在,而致以深深的敬意。

殊不知,在杨逵种植的山间菜圃旁,有山泉流经处形成的一个“游泳池”,而弯弯的山路,又成为自然的“跑道”。为了锻炼自己的生命意志,增强自己的生活信念,杨逵把游泳和跑步当作每天不变的课程。他对自己从不会游泳到学会游泳,从体弱老迈到坚持跑完五千公尺比赛,感到非常自豪。他在写给儿子资崩的信中说,他奉行的是马拉松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乌龟的精神,也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①他还做诗一首,用以自励:“天天跑五千,骨硬皮肉坚,不怕寒流冻,不怕烈日煎。”

绿岛监狱为了配合新生改造,创办有《新生活》壁报和《新生月

^① 杨逵:“绿岛时期家书”(1957年12月的信),收入《杨逵全集》第12集(书信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页。

刊》内部刊物，杨逵奉命担任刊物的编辑。这种用钢笔写成的文字，要经过狱方的层层审查，才可在壁报上张贴出来。政治犯们每写一篇文章，要以曲笔而为，旁敲侧击，不能直抒胸臆。在这个没有自由的荒岛，所有的文字写作都有严格规定，包括家信，如果一次写信超过三百字，就要受到惩罚，更不用说文字内容可以出格了。尽管如此，杨逵不肯放过这个园地，在险恶政治环境中坚持笔耕。当年宜兰县罗东镇的女青年萧素梅，因为参加读书会、关心社会政治，而以所谓“颠覆政府”罪入狱，关押绿岛五年零九个月，在50年代前半期，曾为杨逵的新生“同学”，出狱后与杨逵的长子杨资崩结为连理。萧素梅当年担心被狱方利用，不敢在《新生活》壁报上写文章。后来，她曾问及杨逵：“爸爸，您为什么要在《新生活》壁报发表文章呢？这不是上了为他们宣传的当吗？”杨逵则回答说：“不，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你都要把刺角伸出去，试探一下你的文章能发表到什么程度。”^①

杨逵性格温和，内心世界却很积极，充满了行动者的果决，从不放弃任何可以争取的机会，想方设法创造自己的生活。《新生活》壁报的园地上，经常出现杨逵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杨逵仅在《新生活》壁报发表的小说就有《春光关不住》等三篇，诗歌《八月十五那一天》等七首，评论杂文《光复活当年》等十九篇，书信《给在彷徨途上的孩子们》等六篇，共计三十五篇（首）。除此之外，杨逵在绿岛监狱创作的作品，另有戏剧《牛犁分家》等十三种，其中在绿岛监狱晚会或绿岛街头演出的为七部；未定稿的诗歌有《十月好风光》等七首，评论、杂文有《上山砍茅草》等十九篇；与此同时，杨逵还以书信方式，写给亲人一百一十一封《绿岛家书》。如此众多的文章，竟然是在绿岛监狱中完成，杨逵对人生的进取态度和对文学的坚持精神，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绿岛时期的杨逵，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际遇中，经历了特殊

^① 萧素梅女士谈杨逵，见于笔者对萧淑梅女士的访谈录，2004年2月7日，广西南宁，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杨逵作品研讨会”上。

的考验。1957年2月,廖文毅等人在东京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展开“台独”分裂活动。而国民党当局亦多方布局,从事颠覆该组织的反制行动。1957年底,执政者将杨逵借提到台北,软禁于新生北路,开始了两个多月之久的谈判。谈判内容是要杨逵“答应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利用他在日本文化界的声望与关系,只身到日本从事地下秘密活动,隐身潜入所谓在日‘叛乱’集团内做卧底反间工作,并搜集有关共产党与台独分子在日本的活动内幕,以及参与人员的详细资料,必要时将派员协助等等,‘将功补罪’,以弥补未完的刑期为诱饵,软硬兼施逼杨逵就范。”^①

那段时间,杨逵白天必须接受主义熏陶、思想改造、理念沟通、任务解说,以及包括条件交换的说服与谈判,每天都有两三个特务采用疲劳轰炸的手段,轮流前来约谈,甚至恩威要挟,或以高官厚禄诱惑,或以惩罚恫吓威逼。杨逵自始至终坚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妻子叶陶和五个儿女必须同往,当局则不能接受这个条件,双方都不肯相让。斗争经验与智慧颇为丰富的杨逵,早已看穿当局的政治把戏,他判定当局不会同意自己的要求,故始终坚持己见。万一当局真的答应了妻儿同行的条件,他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条件提出来。在杨逵看来,九年的狱中生活都已经挺了过来,熬到刑满释放,能让他自由实现未完成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不会为了一时的荣华富贵,而违逆他一生中所最执著、最热衷追求的人道社会主义理想的奋斗。“所以一心一意想回绿岛坐完刑期的他,一直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婉言相拒地与当局周旋了两个多月,终于谈判破裂”,^②于1958年2月又被遣返绿岛,继续羁押未完的刑期。

漫长的绿岛生涯,梦魇一样黑暗的日子,它能囚禁杨逵的身体,却无法磨损那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作为一个“逆风何所

^① 杨建:《拒绝出卖儿女的杨逵》,原载《自由时报》1997年8月29日。

^② 同^①。

惧”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仅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自己，也用这种精神鼓励家人，期盼大家携手扶助，共同走过这段悲惨岁月。在他的影响下，杨逵家人也以坚强乐观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绿岛营区公墓北边的一座山脚下，凹进了一个大山洞，底部砌成几个台阶，俨然是一个大舞台，而台前的一片空旷斜坡，就成为天然的观众席，绿岛监狱的露天晚会、戏剧演出都在这里进行。杨逵绿岛时期创作的话剧，多在这里登台亮相，诸如独幕喜剧《丰年》、《真是好办法》、《睁眼的瞎子》，四幕歌舞剧《牛犁分家》等。上述剧目还与《驶犁歌》、《国姓爷》、《渔家乐》等街头剧一起，在绿岛街头巡回演出。

同样是在绿岛的这个露天舞台，让狱友们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次监狱晚会，是杨逵一家人的同台演唱。1956年春天，叶陶带着两个孩子，千辛万苦地来到绿岛探望杨逵，家人有了一次难得的团聚。监狱的晚会上，杨逵与家人登台演唱的一曲《甜蜜的家庭》，在监狱人生的特殊氛围中，以乐天的精神，唱出了绿岛囚犯对家的共同向往：

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好又安康。姊妹兄弟很和气，
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扬；虽然没有
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呀！我不能离开你，
你的恩惠比天长。……

深情依依的歌声，在绿岛监狱里响起，也把政治犯们带回久违的家庭亲情的思念中。许多狱友含着热泪在听，节目顿时获得了台下的满堂彩。

绿岛的铁窗岁月，再次证明了杨逵生命意志的坚忍，人生理想的执著，内在“能源”力量的强大：

这一生我的努力，都在追求民主、自由与和平。我没有
绝望过，也不曾被击倒过，主要由于我心中有一股能源，它使

我在纠纷的人世中学会沉思，在挫折来时更加振作，在苦难面前展露微笑，即使到处碰壁，也不致被冻僵。^①

四、东海花园的大地园丁

1961年4月8日，杨逵从绿岛监狱释放。梦魇般的岁月，蹉跎了杨逵生命壮年的大好时光。劫后归家，杨逵时年五十六岁。

从1949年4月6日被捕入狱，到1961年4月8日绿岛归来，经历了十二年分离的家庭，终于又团圆了。尽管杨逵心里早有准备，可当他看到苦苦支撑了这个家的老妻叶陶，看到已经长大成亲的儿女们，看到从未谋面的媳妇、女婿、孙子、孙女，还是禁不住心潮难平，老泪纵横。

十二年来，这个家因为杨逵锒铛入狱而深陷困境。一阳农园的光景无法维持，家人只好不停地搬家，终于在台中渔市场的淡沟一带住下来。债务和利息像雪球一样滚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亲友走避，人情冷漠，一个政治犯的家庭，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重负。叶陶依旧沿街卖花，苦苦拉扯着五个儿女。孩子们有的被迫辍学，帮助家计。跟着在日本学过化工的姊夫，资崩和弟弟杨建小小年纪就开始学做肥皂、面霜、酱油，再到街上叫卖。在杨逵往日朋友的帮助下，家里也曾开过豆腐店。叶陶和两个男孩子半夜两点就起床，手工磨完豆浆后，由叶陶把它制成豆腐，两个孩子轮流睡觉，天明以后再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有时孩子们也四处招揽零工，补贴生活，甚至于上山盗取“国有官柴”，偷偷卖钱换米。有的孩子是通过帮人洗床单，做家教，靠半工半读完成师范学校或大学教育的。最困顿的时候，家人离散，四处流浪谋生，七口人竟被分隔在六个地方。尽管如此，人

^① 杨逵：《人生金言》，1983年接受方梓访问；转引自向阳：《阳光一样的热——读杨逵先生〈绿岛家书〉》，《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2页。

人都在困境中挣扎、打拼，终于走出了一条条人生之路。

特别是叶陶，一生跟着杨逵出生入死，从日据时期到光复以后，屡屡出入监狱，又陷入与丈夫生离十二年的孤苦境遇。她为拉扯五个孩子，支撑这个家，默默承受了一切的煎熬和牺牲。以她从事社会运动的名望和古道热肠的性格，后来也曾担任台中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北区妇女会理事长的职位，而这一切，只是让她于繁忙的生计打拼之外，不断为人排解纠纷，更忙而已。这年5月的母亲节，台中市选举叶陶为模范母亲。望着家中悬挂的“母亲楷模”的横扁，杨逵与叶陶感触无限，欢乐中又带有难言的苦涩。

杨逵虽然告别了绿岛，然而，面对并不接纳释放政治犯的社会现实，面对走向老迈的五十六岁的生命现实，杨逵又该怎样开始他的人生出发呢？

杨逵认定，最能表现自己志愿的职业，“应该说是园丁。晴耕雨读，灵感来时写写文章”。每每政治理想受挫、不能自由写作之际，杨逵就选择了归农，以自我开拓的天地，来与不公平的现实社会抗衡；以自我创造的桃源乡，来期待可以自娱娱人的美好境界。他心中浮现出一幅未来新乐园的蓝图，并立刻付诸行动。

听朋友说起高雄乌松一带，有人因还债欲卖掉一片果园。杨逵急匆匆地赶过去，才知道卖的只是果树，土地则因为是三七五放领地^①，钱尚未缴清，不能出售。杨逵想做自由自在的果农，最终颇费

^① “三七五减租”与“公地放领”皆为台湾当局第一次“土改”中实行的政策。1949年4月19日，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强制实施“三七五减租”，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限定耕地租额最高不得超过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37.5%。租率根据佃农总收成保留1/4，余下的3/4由地主与佃农对分计算。1951年6月，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及“省有”耕地所有权有偿转移为农民所有。其方法是：地价按照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2.5倍，公地租率为全年收获总量的25%，受领农民只要连续缴纳10年地租，即取得耕地所有权。

周折成交。但心有不甘的卖主总在设置障碍,不让杨逵自由放手地管理果树,家人与卖主之间时常发生摩擦,这使得杨逵大伤脑筋。终于决定放弃乌松果园的时候,算算将近一年来的收支,反而亏损了许多钱,这对于家无恒产的杨逵夫妇,压力和拖累都显得过于庞大。

这时,家住清水的台湾省总统府资政杨肇嘉准备写回忆录,急需秘书帮忙。杨逵 1935 年 5 月曾在《台湾新民报》发表过一篇《杨肇嘉论》,故得友人李君晰推荐,担任杨肇嘉的私人秘书。杨逵除了每天代为处理信件,撰写回忆录,还在杨肇嘉丰富的藏书中,潜心阅读,重温了台湾近代史的命运。后来因回忆录的部分内容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而杨肇嘉又固执己见,杨逵遂辞掉秘书工作,返回家中。

这段时间里,杨逵因为往来于台中与清水之间,不断经过大度山一带的东海大学。这里的环境清静幽美,终日书声朗朗,杨逵很为这种自然环境所吸引,也向往着能与青年学生往来的前景,遂“梦想在这地方依照自己的设计开设农园,种些花木水果,过着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①

1962 年 7 月,经由杨逵当年参加农民组合运动时的朋友侯朝宗出面(侯朝宗在 1929 年台湾殖民当局逮捕农民运动人士的白色恐怖中,曾一度逃亡中国大陆。光复后返回台湾,改名为刘启光,时任台湾华南银行董事长),以私人情谊做担保,同意杨逵以信用贷款方式,向华南银行借款五万元。杨逵计划以四万五千元购买土地,留下五千元,用来搭建房屋。

靠了这笔贷款,杨逵终于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大度山上,买下一片约有三千坪的荒坡地。这是一片地地道道的不毛之地,荒芜的红土地上,稀稀落落地点缀着相思林,层层叠叠的鹅卵石,漫布在原始的

^① 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 年 3 月 12 日;收入《杨逵全集》第 10 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 2001 年 12 月版,第 374 页。

山坡上,谁都无法相信这里能种植出花草植物。孩子们各有所好,对这片荒地没有信心,一时还不能充分合作;亲戚们埋怨杨逵是“败家子”,一再让家庭受到连累;朋友们一片责骂声,都说杨逵疯了;连附近的农民也直摇头,笑杨逵是个大傻瓜。没有经济力量雇工帮忙,开垦花园需要投资,买地借钱的利息每月要付,对于一个长期生存拮据的家庭来说,这次开荒种植,注定要把他们推向更艰苦的境地。杨逵不怕吃苦,他一生吃惯了苦,但若为了借钱而向人低头,为了交利息四处奔波,却不是他所愿。

这样的時候,幸亏有叶陶站出来全力支持杨逵。杨逵是一个行动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持举家迁移大度山,想望在满是石头的贫瘠红土中开拓出美丽的花园。这一年,孙女杨翠出生,杨逵乐不可支地将他的理想赋予孙女的名字,唤之为“翠”,祈愿来年便能看到满园青翠,遍地鲜花。杨逵一心一意地开荒种花,叶陶却要為现实生活问题日添愁苦,为借钱还息而求告低头,为卖花养家而四处奔波。叶陶不愿意让坐牢十二年的杨逵再度遭遇理想破灭的痛苦,她一个人承载着这些心事以至终老。叶陶对儿女们说:“你们阿爸无事被关了十二年,与现实生活脱节很久,难免不通世事,现在他好不容易回来了,兴冲冲想要辟建一座花园,这是他自早以来的心愿,我们就别扫他的兴,一起帮赞他来完成。”^①叶陶处处身体力行,想方设法来支持杨逵。

1964年,华南银行以信用贷款超期为由,催还贷款。杨逵和叶陶四处奔波,到处筹措,先还借款一万元;同年10月14日,改以东海花园的土地、房屋等为抵押品,签具“抵押权设定契约书”,抵押借款四万元,以每百元按日息四分三厘计算,按月付息。

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杨逵没有退缩。“我们努力干下去!开垦将是给予孩子们生活最好的教育。”杨逵则对叶陶如是说。

^① 杨翠:《阅读叶陶的风华》,原载《中国时报》1992年10月。

杨逵与叶陶日日早起,进山劳作。在这里,杨逵挂起一个小小招牌:“东海花园”。四个月,好不容易凑齐五千元,请来一个泥水匠搭盖茅屋,孩子们也跟着忙里忙外。荒芜的东海花园里,终于有了一座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大家都很兴奋,泥墙还未干透,就急忙搬进去了。

杨逵颇为感慨,他勉励孩子们说:

当然,任何一件事,开始的时候无可避免会遭到相当多的困难;不过天下事也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我决心要把石头山变成花园,虽说困难重重,但比起当年美国开发西部的拓荒者的苦心,又算得了什么。至少没有暴风雪和热风的侵袭,也不必和红蕃争斗。我没有本钱,但是我有的气力、双手;只要我一铲一锄努力的挖下去,总有成功的一天。^①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杨逵动员祖孙三代合力开荒,用生命和汗水书写出现代版的愚公移山故事。靠着锄头、铁锹、畚箕、扁担这些最原始的工具,杨逵和家人一坪一坪地将荒地开垦,再一坪一坪地种下花木蔬菜。

浇水要到很远的水圳去挑,停水时没水浇地,闹水荒时,水利会员又不让挑水。每天天未亮,杨逵就上山挑水浇花。在黎明的晨曦中,一个瘦弱老人,挑着沉重的水桶,无数次地往来于水圳与苗圃之间,直到太阳高升,才稍事休息得以喘息。白天,要继续开荒种植,料理花事,还得陪着笑脸打发那些频频上门的催债人。这种差事让杨逵不堪其苦,常常感到比开荒、挑水、种花都来得吃力。每每这种时

^① 杨素娟:《开拓者》,收入杨逵《羊头集》,(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14页。

候,多由叶陶出面应对。下午四五点钟以后,炽热的岛屿阳光开始减弱下来,挑水的工作又得重新开始一遍,直到暮色沉沉,才回家吃晚饭。而群星闪烁时分的劳动内容,则是“晚上捡石头,一担担挑开都要做到深夜。照明工具是最原始的‘壁虎’煤油灯,小小的风都会给吹熄,便在黑暗中摸索。”①

杨逵曾这样描述自己在东海花园的生活情景:

四年有余,天天挖石头,搬石头,浇水、施肥、喷农药……默默地把这一块荒芜的石头山已变成了花园。为的是想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过得安静舒适的天地,也就是说要创造一块不受到干扰,而且不为生活而低头屈膝的天地,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而把农耕与笔耕并行的小天地。②

像母亲哺育婴儿一样,杨逵每天都在低着头照料他那每一棵花木。每每看到他撒下的种子发芽、成长、开花,杨逵就会感到一股生命力量涌上心来。靠着这样一种艰苦的劳作和执著的追求,凤凰木、龙柏树、扁柏树、铁树、万年青、桂花、茶花渐次扎根,太阳花、福寿菊、大理花、孤挺花、剑兰、一串红、紫罗兰、金鱼草、兔子花、大邓伯花竞相开放,长春藤、茑萝也四处攀爬,东海花园开始出现新气象。

然而,一场台风袭来,花园即刻遍地狼藉。杨逵的文章曾真实地再现了这种情景:

① 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年3月1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5页。

② 杨逵:《默默的园丁》,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28页。

台风过后,花园一片凄凉。

龙柏被吹倒了,菊花被刮乱了,比大腿还要粗的凤凰木从半腰折断,遍地都是折枝落叶,叫人不知道从何做起。

我们老园丁小园丁四个,刚把倒地的龙柏茶花扶起,正在清理菊花花圃的折枝落叶的时候,第二次台风又来了。

瓦飞墙倒,被刮破的塑胶板吱吱华华的响,鬼叫一样,整夜不能成眠。

扶起的龙柏,茶花又倒下去了,折枝乱叶东一堆西一堆,走路都不好走。

就这样,一直忙了好多天,累得要命。^①

东海花园就是这样,在开垦荒山野岭的艰苦劳作中,在与自然灾害的顽强搏斗中,在不断的借债还贷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1968年,银行又在催讨抵押借贷的那四万元。无奈之中,杨逵向同情和支持他的出版商叶先生借贷十万元,没有任何抵押物或利息,只以借据为担保。条件是日息六分,一个月下来利息为一千八百元。依靠这笔钱,杨逵终于在1968年9月13日还清了四万元的银行抵押借款。所剩的余款,则用来扩建东海花园,以改善生产条件。到了1969年年底,因为叶先生周转不灵,经济出了问题,杨逵向台中的老朋友郭顶顺借款十万元,以日息六分,折合月息一千八百元。后来因还不起利息,遂于1970年3月,又以同一条件向叶荣钟先生借了十万元,部分还清所欠利息,余款仍然用在花园建设上。1970年底,经由钟逸人先生介绍,杨逵以同样条件向商界朋友蔡伯勋借了第三个十万元。朋友们轮番借钱给杨逵,以此作为支持东海花园建成台中文化城的

^① 杨逵:《羊头集》,原载《文艺》第1卷第7期,1970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8页。

经费所用,也好让杨逵的债务偿还与花园经营能有一番周转。

在不断的借钱还债之后,杨逵把所剩资金都用来发展花园建设。渐渐的,东海花园的小路铺出来了,大型蓄水池和灌溉管线也一一建成了。终于申请了用电,花园里有了电力设备。园中开始修建起简便的灌溉设备,只要一按插头,水珠就朝四面八方汇成一片人造雨,毋须再靠双肩挑水。种植的鲜花品种越来越多,一朵朵、一蓬蓬地竞相开放,五颜六色,姹紫嫣红,点缀了满山满谷。一部分鲜花由叶陶挽着花篮,走街串巷叫卖;一部分鲜花则由台中附近的商店订购,成为批发生意。经过十多年的血汗经营,生活渐渐好转,杨逵终于梦幻成真,把荒芜的石头山变成了美好的花园。

回眸父辈在东海花园的创业轨迹,女儿杨素绢字字真情,感慨万分:

从荒山到花园,从煤油灯到电灯,从步步得用人力浇水到轻易的自动灌溉,这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爸爸妈妈总算走过来了,虽然,还未到尽头,但确实踏上了坦途。从徒步到自用汽车代步,电话通话,这其间多少的艰辛,多少辛酸和血泪,绝非外人所能深刻领会的。这里面包含的爸的坚忍、决心毅力和理想。所有的光荣和成就,一半也得归诸于妈辛勤的持家和帮助;没有妈的任劳任怨,坚定衷心的支持,爸的花园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父亲的一生,扮演的就是开拓者的角色,他始终不懈,孜孜矻矻的开拓两个园地,一个是笔耕的心园,一个是锄耕的田园。^①

^① 杨素绢:《开拓者》,收入杨逵《羊头集》,(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17—218页。

“锄耕的田园”，以它竞相怒放的花朵，回报了杨逵艰苦奋斗的理想；而“笔耕的心园”，这些年来来的荒疏，却让杨逵心生遗憾，颇有几分人生落寞。

他默默地在他园子里除杂草，驱害虫，但也无法把人生社会上那些莠草害虫视而无睹。每看到听到感人故事的时候，他就会想他那枝放着生锈的笔来。

他有自由写他高兴写的东西。

可是，一想起明天要付的，超过他一家生活费用多倍的利息，后天要清还的那一笔债，他的灵感就纷乱起来，不能自主了。^①

这段话来自杨逵 1961 年 4 月 8 日刑满释放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大约写于 1965 年，当时并无发表的机会。它所描绘的情境，那种在园丁的谋生和作家的写作之间的苦苦挣扎，正是杨逵此后二十三年东海生涯的写照，是杨逵晚年困境的生命独白。作为一个青年时期就开始投身社会运动，终生为理想而奔波的作家，杨逵仍然关心社会，向往着“笔耕的心园”。然而戒严时期的社会氛围，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又让他在无奈之中，不得不辍笔。虽说早已从绿岛归来，但作家杨逵仍然被社会所封杀，尝试动笔的作品“十篇九禁”，寄出即被退回；周围不时有特务监控，平时言谈还需小心谨慎。杨逵也不愿与孩子们多谈往事，担心万一走漏了风声，再次坐牢，自己一生毁灭不说，更连累了家人。偶尔有朋友上山谈话，每当涉及政治问题，常常欲言又止。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人生的是是非非，杨逵心中不能不涌动着无限的情感，可他当时让世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沉默寡

^① 杨逵：《默默的园丁》，收入《杨逵全集》第 13 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 2001 年 12 月版，第 730 页。

言、近乎木讷的老园丁形象。当年,东海大学的学生们常常看到这个老园丁在花圃忙里忙外,但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日据时期大名鼎鼎的作家杨逵!

出狱已经五年有余,但作家杨逵仅在1962年2月的《联合报》和《台湾新生报》上,发表《园丁日记》等三篇狱中旧作。直到1969年3月,杨逵才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了出狱后写下的第二篇文章《垦园记》。其中表达的,还是这样的心境:

最近有一位编辑来游,问我近来有没有写诗。我笑着说:“在写,天天在写。不过,现用的不是笔纸,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你现在所看到的,难道不美吗?”

他承认了我的说法之后。说:“是的,这是一片美好的诗篇,是你不凡的创作。尤其你这六年多来的奋斗,更是一部感人的故事。不过,能够到这里来参观而听你讲这故事的,终究有限。用笔写的东西,传播力更大、更广、更久远的,这事实你能否认吗?”^①

文章在这样的提问下结束,杨逵无语。作家杨逵不甘于此,他不能听任“笔耕的心园”继续荒芜,重拾写作是他挥之不去的文学情结。所以在日后出版的文集中,他会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加上两句回应的话作为结语:

“是的,我不否认。”

就这样,我把这枝秃笔找出来了。

^① 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年3月1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6页。

就在杨逵准备重拾写作的时候,与杨逵风雨同舟并肩作战、胼手胝足打拼生活的叶陶,由于长期操劳而透支生命,终因心脏病并发肾脏尿毒症,于1970年8月1日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六岁。回想起患难夫妻的艰辛人生,一向坚强的杨逵禁不住老泪纵横。叶陶最终长眠于东海花园,杨逵执意让满园的鲜花陪伴她,让自己残存的生命守护她。

丧偶之后的1971年,心力交瘁的杨逵已无力偿还每月五千四百元的利息。他深感来日不多,担心东海花园创建文化城的志向未成而身先死,子孙又无力继续偿还沉重的债务,遂于1972年年底变更东海花园的土地所有权,并与蔡伯勋、叶荣钟、郭顶顺三人达成一项协议:

以割地还债方式割让三分之二的东海花园土地产权,由他们共同持分,自己则留下仅三分之一(约一千坪),同时并承诺(口头)若此地将来成为文学园地的文化村,则同意无条件归还云云。^①

此时的杨逵,心情沉重到极点。绿岛归来已经十年,虽说“锄耕的农园”开始绽露满园青翠,而“笔耕的心园”仍然在尘封之中,且自己的晚年又被脑神经痛的毛病所折磨,更何况构成杨逵苦难人生精神支撑的叶陶已经随风而逝,这种被现实忘却的历史的寂寞,这种独自面对生命残局的精神寂寞,让杨逵内心充满痛苦。每每空对四壁,心情怅然的时候,杨逵就来到叶陶的墓园前。昔日的恩爱夫妻,一生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如今却生死相隔两茫茫,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枯坐无语,让纷乱的思绪在唇边香烟的烟雾中久久缭绕。

^① 杨逵变更东海花园的土地所有权的协议,转引自杨逵次子杨建先生给笔者的信件,2005年12月28日。

70年代以后,作家杨逵的生命际遇开始有所转机。1971年8月8日,战前就活跃于台湾文坛的坂口樱子带领日本女作家女记者观光团访问台湾,专程到台中看望文坛旧识杨逵夫妇,而叶陶已经在一年以前告别人世。感慨万分的坂口樱子返回日本后,满怀深情地写出《杨逵与叶陶》一文,发表于1971年11月的《亚洲》月刊。杨逵的近况引起日本文坛和学界相当大的反响,台湾留日学者戴国焯,以及日本学者尾崎秀树等人都有意将杨逵回归文学和历史。

1973年,日本研究生河原功,数度前往台湾,以杨逵及其作品作为研究题目。河原功与杨逵来往密切,手中掌握资料相当丰富。他于1973年5月编写《杨贵氏著作目录》,1973年7月至9月编成《杨贵氏略年谱》,给予后来的研究者极大方便。

1973年到1974年,是杨逵晚年生涯中关键性的两年。在岛内外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杨逵再度“出土”,台湾文化界开始重新认识杨逵,并通过杨逵重新认识历史,发掘历史。前往东海花园拜访的人士,从政界、文艺界到学生,逐渐多了起来。1972年,当时就读于东海大学的林载爵,第一次从老园丁杨逵那里读到《送报伙》的时候,整晚的心情都在为之震动:原来台湾还有这样的作品!再往后,约有四个月的时光里,他每天来帮助杨逵浇花,逐渐走进老园丁的文学世界,并于1973年12月在《中外文学》杂志发表《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这篇文章与颜元叔于1973年七八月间首先发表的《台湾小说里的日本经验》一文,都标志了70年代台湾杨逵研究的最早成果。1975年,从绿岛监狱归来的陈映真,第一次在东海花园拜访了杨逵,听他讲起日本学者从殖民地文学研究的立场,对杨逵作品解读的情形。之后,陈映真的文章里,开始不断出现杨逵的名字及其历史功绩。到1978年,林梵的《杨逵画像》由台北笔架山出版社出版,成为有关杨逵的第一本作家评传。

随着学术界研究的升温,杨逵的文学面貌开始被台湾社会所认识,大中学校的刊物也热烈讨论起杨逵的作品。

1972年1月,《春光关不住》刊于《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5月,《新闻配达伏》(即《送报伏》)重刊于日本杂志《中国》第一百零二期。

1973年11月,《模范村》发表于《文季》第二期。

1974年1月,《鹅妈妈出嫁》发表于《中外文学》二卷八期;4月,《冰山底下》发表于《台湾文艺》第四十三期;9月,《送报伏》发表于《幼狮文艺》第二百四十九期。

1975年,也就是杨逵七十岁的那一年,张良泽编辑的《鹅妈妈出嫁》一书,并由台南大行出版社发行,这是杨逵作品第一次以中文结集出版。

1976年1月,《春光关不住》改题为《压不扁的玫瑰花》,收入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第六册,杨逵为日据时代成名的作家之作品收录于教科书的第一人;5月,香草山出版社再版《鹅妈妈出嫁》;10月,台北的辉煌出版社出版《羊头集》,这是杨逵的第二本中文结集。

1976年10月,杨逵之女杨素绢主编的《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由台北的辉煌出版社出版,这成为女儿献给父亲七十一岁生日的珍贵礼物。

1976年8月,《夏潮》杂志社为纪念杨逵的七十一岁生日,开始策划了一辑杨逵特辑。在10月号的《夏潮》(一卷七期)上,刊出了杨逵访问记《我要再出发》、散文《首阳园杂记》、小说《泥娃娃》,以及何思萍的《除非种子死了——探讨杨逵小说的精神》,于飞的《从〈无医村〉看日据时代的台湾医学》两篇评论。这是杨逵形象在70年代台湾文坛的一次系统性的呈现。杨逵在长篇访问记中,明确认同“人生七十才开始”,他说:“我想对我在过去的年代中所做的各种事情做一次检讨和整理,同时准备再出发。”^①9月,杨逵在学者尉天骢、吴宏一

^① 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0页。

的推荐下,以《鹅妈妈出嫁》一书,参加“第二届台湾文艺奖”选拔,12月25日结果揭晓,杨逵落选。杨逵继续努力,整理过去屡遭退稿的散文投寄各报副刊,《谚语与时代》、《谚语四则》、《我有一块砖》、《自强不息》、《我的小先生》等十九篇作品,皆在这一年发表于《台湾新生报》、《中央日报》、《台湾日报》等报纸副刊。

杨逵晚年一直想写自传,期望还原日据以来台湾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但由于身体欠佳、境遇困窘,更因为戒严时期的社会氛围,绿岛生涯对笔造成的“永恒的恐惧感”,使杨逵只好用铁锹把诗文写在大地上,而非写在文学史上。虽然杨逵在70年代开始得以“出土”,但戒严时代的禁忌还远远没有解除。

1974年10月,杨逵六十九岁生日前夕,因身体不适,未能应邀参加台北文学界同仁为他举办的生日座谈会,杨逵专门投寄了《“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大概是因为文章第二部分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三部分公开了当年的《和平宣言》以及因其坐牢的真相,文章的刊登还是有诸多忌讳,《大学杂志》第七期于1974年11月发表的时候,只刊登了稿子的第一部分。直到杨逵已经去世后的1985年6月,这篇冰冻了十一年之久的文章,才以《台湾文学对抗日运动的影响——十一年前一项文艺座谈会上的书面意见》为题,由《文季》第二卷第五期全文刊登。尽管如此,杨逵始终没有放弃“压不扁的玫瑰花”精神,仍然在创造夕阳岁月中的生命奇迹。他的晚年,可以说是为“历史”而活着,为“台湾的30年代文学”而活着,因为台湾新文学历史的复活,首先是从杨逵的“出土”开始的。

80年代以后,杨逵虽然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但他仍然保持了一份对社会的人文关怀。1982年8月22日,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邀请,杨逵由长媳萧素梅陪同赴美。在《自立晚报》的专栏访问中,在美国洛杉矶出席“台湾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杨逵都一再表明,他最大的愿望还是想写小说。当时美国有一些

变成了“台美族”的台湾留学生，说话相当张狂，常常将“要把那些不认同台湾的人，赶到海里去”的话挂在嘴上。他们当中曾有人质疑杨逵：“我们那么费尽力量请你来美国，你不替台独说话？”杨逵则不理睬他们那一套，他渴望祖国统一，无论在哪里，他都强调说：“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们是从中国过来的。”

当杨逵与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爱荷华大学“中国周末”活动中相遇的时候，心心相连的两岸作家们在美国度过了“同参加文学讨论、同吃、同参观游览”的美好时光。在聂华苓与安格尔夫妇为两岸作家代表团举行的家宴上，杨逵和冯牧共同打开一瓶香槟酒，欢乐的笑声令人陶醉；在约翰·迪尔农业机械公司参观，冯牧与杨逵并排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融洽；在密西西比河上泛舟，两岸作家自由自在地谈天说笑，合唱民歌，杨逵与萧素梅翁媳合唱的台湾民谣《补破网》和《卖肉粽》，情真意切，委婉动人，特别是杨逵唱歌时流露出那种童心未泯的神情，让人很难想象他已经是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七十七岁的杨逵仍然没有放弃，他与台湾继续进行着一场顽强的世纪长跑。1982年5月7日，在应邀到台湾辅仁大学草原文学社演讲时，杨逵仍然深情地期盼着“老幼扶持，一路跑下去，奔向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乐园。”^①

事实上，晚年杨逵最大的心愿，也是他坚持一生的理想，就是创建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乐园，建设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东海花园正是他实现政治理想和文学理想力所能及的最后场域。

据杨逵的次子杨建回忆，因为看过国民党的腐败，又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了十二年，杨逵在开辟东海花园的前些年，曾寄希望大陆会解

^① 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0页。

放台湾。如果大陆解放台湾,他向往着东海大学能够被接收为农工大学。

杨逵的老友,在二二八事件中曾任“二七部队”部队长的钟逸人先生,在接受学者柳书琴访问的时候,也曾说道:

他(杨逵)希望以东海花园为据点,见到红旗飘扬,台湾被解放,若此他们就要接收东海大学,在那里发扬他的理想。这是他一贯的想法,始终没变,这事他只告诉我,不敢告诉别人。^①

然而,大陆发生的“文革”运动,使社会现实处于一片乱象之中。从报纸不断得到相关信息,杨逵对动乱现实逐渐失望。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引发杨逵感情的复杂变化,遂对东海花园的心愿与前景有了新的安排。他决定将东海花园捐出来,在这里建起一座文化活动中心。在《我有一块砖》、《老园丁的话》、《怀念东海花园》等文章中,杨逵多次表明了自己的这种理想。他说:

为使这一片土地免于被都市的罪恶污染而保持我原始自——可以自娱娱人的桃源乡,如果有人想在这里盖个艺术馆、图书馆、民艺馆之类的文化传播机构,我很高兴捐出这一块土地。^②

东海花园已经有十五年的历史;若从创建首阳农园开

^① 钟逸人语,转引自柳书琴:《荆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以〈福尔摩沙〉系统作家为中心》,附录,第23页。

^② 杨逵:《我有一块砖》,原载《中央日报》1976年10月2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01页。

始学种花算,至今已经四十年了。这些年,我都用锄头代笔,在大地上写诗,写故事;施用了臭的大小便与粪土,培养过不少的既美又香的花卉,因而我老早就有一个幻想:如在这百花齐开的园子里,盖了几栋小山房,让大家有空时到这里来一面学种花,一面学写作、绘画、雕塑、唱歌、演戏等,把这一块从前是不毛之地的花圃,变成新乐园,那该多好。^①

1981年3月9日凌晨,杨逵因感冒药物引起的痰阻塞症送往医院急救。住院四天后,在子女的簇拥下迁居外埔次子杨建家休养,次年元旦假期移居大溪长子杨资崩家居住。

一场重病之后的杨逵,自知返回东海花园已成梦幻,他以怀恋、惋惜、焦灼、无奈相交织的复杂心情,于1983年11月写下《怀念东海花园》一文。这其中,让杨逵念念不忘的,是那段把诗写在大地上的日子,是和叶陶风雨同舟的岁月:

许多沉静的夜晚,我依然生活在东海花园的花影里,屋前的大邓伯花,垂满紫色的花串,花棚下两把藤椅,文友们常来陪我喝茶小坐,一壶茶、几支烟,消磨掉一个闲闲的日午。有时我们离开花棚,在园里拔草或在花径间漫步,黄昏来的时候就去浇花,水花一片片在夕阳下闪亮,得到滋润的花木,更为鲜绿盎然了,那时,站在鲜花围绕的花圃里,我总是禁不住喜悦的浮起笑容。荒草石砾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经过十多年的血汗经营,这三千坪土地井然有序地织出繁华似锦的美丽图案。那时我相信,我是会和东海花园永远

^① 杨逵:《老园丁的话》,原载《新文艺》第261期,1977年12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7页。

在一起的。许多晚霞斑斓的黄昏，坐在叶陶的墓前怀念她生前抱着满怀鲜花去兜售的情景，我拍拍她的墓碑，更坚定这个永不离开的意念。^①

然而更让杨逵耿耿于怀的，是夙愿难以实现。那个不能再用铁锹在大地上写诗的老园丁，已经无力把东海花园建成“不但能赏花，也能在文学、艺术、音乐的熏陶中欣赏心灵之美”^②的文化活动中心了。而这一切，又是杨逵晚年为之奋斗为之憧憬的新乐园和桃源乡！

历史，在走过了许多曲折坎坷的道路之后，终究会把它的公正还给世人。事实证明，杨逵对于整个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对于 20 世纪的台湾社会历程，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1983 年，杨逵荣获第六届吴三连文学奖及第一届台美基金社会人文科学奖；1984 年 8 月 9 日，盐分地带文艺营颁给杨逵“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

而这些迟到的文学荣誉，对于历经沧桑、即将走近生命尽头的杨逵来说，又蕴含了多少历史的血泪和难言的人生况味！杨逵不会忘记他曾经被遗忘的许多年。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最成熟的阶段，更是他最艰苦最孤独的岁月。当人们重读杨逵的时候，他已临近夕阳西下。属于他的时代，却并没有开始。即便这样，杨逵从不言放弃。他在人生的最后一个季节，乃至最后一天，始终坚持了美好理想的追求和期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5 年 3 月 12 日凌晨 5 时 40 分，杨逵在么女杨碧家中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3 月 29 日，遵照杨逵生前心愿，子女们将他葬于东海花园的叶陶墓园旁边。鲜花翠柏簇拥着静静的墓园，杨逵与叶陶

^① 杨逵：《怀念东海花园》，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3 年 11 月 8 日；收入《杨逵全集》第 10 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遗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 2001 年 12 月版，第 422—423 页。

^② 同^①，第 423 页。

也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永远留在了这片洒着他们血汗的土地上。

有挽词为证：

鹅妈妈出嫁，先走一程。

送报仗安息，长留回忆。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作为一个终生与文坛相伴而行的老作家，杨逵对文心风骨的坚持，与文学同好的率真相处，让他的文人生涯颇具人格魅力，一向有着“放胆文章拼命酒”的文坛美誉。从日据时期到战后台湾，杨逵与他同时代文人们的往来交游，以及文学同好者之间的互为影响，不仅成为杨逵人格精神与文学理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原因与时代参照，也带着特定岁月的历史烟尘，再现了台湾新文学风雨历程的某种时代剪影。

一、杨逵与赖和：亦父亦兄亦文友

赖和与杨逵，因文学结缘，更因创作理念与关怀层面的共识而成为心灵契合的伙伴。

在日据时期,赖和^①是为台湾新文学“打下第一锄,撒下第一粒种子”^②的开拓者,他第一个把白话文的价值提到民众面前,并以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和倡导,成为“五四运动精神之子”,“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在担任《台湾民报》文艺栏主编、《台湾新民报》学艺栏主编以及《南音》杂志编委的时候,还为台湾文坛培养了一批年轻作家,他的抗议精神和讽刺笔法,特别影响了杨守愚、陈虚谷、蔡秋桐、朱点人、杨逵、王诗琅、吕赫若、吴浊流以及稍后的钟理和、钟肇政等人,赖和因此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奶母”。赖和毕生悬壶济世解救穷苦百姓的高尚医德,又使他成为民众百姓心中的“彰化妈祖”、“台湾医圣”,以至于他1943年由于遭受日本殖民当局迫害而去世的时候,百姓们盈街痛哭,“路祭”的人群络绎不绝,沿途都在供奉青果,焚香祭拜。更让人们敬重的是,有感于疗救国民精神、启蒙民众的责任,赖和始终以鲁迅为楷模,一生都在为台湾的抗日文化运动奔走呼号,“凡台湾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先生无不公开参与或是秘密援助”,^③始终以一个反殖民反封建的文化斗士形象活跃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线。

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历史中的奠基作用,使他获得了台湾文坛最

^① 赖和(1894—1943),本名赖河,字懒云,笔名有懒云、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台湾省彰化县人。幼年习汉文,并接受日文教育,但一生坚持中文写作。1909年入台北医学院,毕业后在彰化建立赖和医院。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1923年因治警事件入狱,1941年又因思想问题再度入狱,病重后出狱,1943年1月因心脏病逝世。其文学作品后来结集为《赖和先生全集》、《赖和集》等。

^② 守愚:《报颜闲话十年前》,原载《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1954年8月;收入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46页。

^③ 杨逵:《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原载《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3页。

高的敬仰和评价。黄得时将赖和比喻为“台湾的鲁迅”，吴新荣认为“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①陈虚谷也不无崇敬地断言：“赖和生于唐朝中国则可留名唐诗选；生于现代中国则可媲美鲁迅。”^②

杨逵的成长过程与文人行谊，受赖和的影响最为深刻。杨逵的作品中多次提及赖和，仅以赖和为主题的文章就多达6篇，计有《赖和先生的木屐》、《忆赖和先生》、《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幼春不死！赖和犹在！》、《希望有更多的平反》、《我的心声》等。杨逵一生，对赖和感念至深，他谈道：“我是受赖和先生栽培的后进中的一员。赖和先生生于一八九五年，我则是一九零五年生的，他比我大十岁，不过我们在一起就像父子一样，又像是兄弟，无所不谈。”^③

对于杨逵来说，20年代末期与赖和在彰化的相识，成为他文学生命的关键性转折。“在认识赖和之前，他只读过世界文学与日本名著，透过赖和的介绍，他才开始大量阅读台湾本土作家的作品；在认识赖和之前，他以为全力投身社会政治运动，是追求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惟一道路，但是接触了赖和之后，他才逐渐领悟到文学运动，也是促进民族解放的一个很好的途径。”^④

1928年下半年，因为竹林争议事件而遭受简吉打击的杨逵，在他从事的农民运动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与叶陶一同来到彰化、鹿港

① 史民(吴新荣)：《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原载杨逵编《台湾文学丛刊》第2辑，1948年9月15日，第12页。

② 参见陈逸雄：《我对父亲的回忆——陈虚谷的为人与行谊》，收入《陈虚谷选集》，(台北)鸿蒙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96页。

③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4页。

④ 林衡哲：《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老兵——杨逵》，原载《台湾文化》第5期，1986年4月；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7页。

一带,联络当地的知识分子,以组织读书会的方式继续坚持社会运动和文化启蒙。当时,赖和在彰化本地一边行医,一边担任《台湾新民报》学艺栏主编,团结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也使彰化俨然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中枢。在赖和的帮助下,杨逵在彰化赖和医院附近租到一间小屋和叶陶同居,他们与一群文艺青年也有了经常同赖和接触的机会。

赖和平时行医繁忙,他每天要看一百多位病患,收入却比看五十人还少。对于贫苦百姓,赖和经常分文不收;而行医的收入,赖和又多拿来支持台湾的社会运动,他的身后竟然留下万余元的债务。在家坐诊的时候,赖和常常面对一屋子病人,不停地用听诊器或用手敲打诊断;而出门行医的时候,赖和总是风尘仆仆,四处奔波。尽管他如此忙碌,仍旧吸引许多年轻人前来,赖和那里自然地变成了一个文化中心。

遇到文艺青年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赖和就会仔细地替他们诊病,开处方,抓药,叮嘱再三。杨逵那时身体很弱,受到赖和的照顾也就更多一些。杨逵印象中的赖和,像个乡下学者,平易近人,和藹可亲。赖和家的客厅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总是堆放着几种报纸,彰化的文艺青年无论是独自前来,还是几个人吵吵嚷嚷簇拥而来,都可以随意进入赖和家的客厅,“不管先生在不在,我们都是自己进去,自己看报,自行讨论,自行离去。”^①赖和在家的時候,有时也会加入青年人的客厅讨论,大家七嘴八舌说个不停,就像自家人一样。

1929年,经历了坐牢、新婚的杨逵和叶陶,流落到高雄的内惟,租了一间因为闹“鬼”而没有人敢住的房子,白天以砍柴为生,晚上埋头写作,并从写好的小说中挑出几篇,寄给赖和主编的《台湾新民报》

^① 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

学艺栏。其中一篇是杨逵第一次用白话文写作，内容涉及一个不向逆境低头的贫农形象，杨逵用了诸多破破烂烂之类的形容词去描写主人公的生活窘境。几天后，那篇小说被退了回来，上面有赖和许多亲切的修改和评语，那段描写贫农衣衫破烂的描写，全都画上了红线，只写了一句“破了又补”。杨逵一下子感到，“破了又补”这句话为自己小说的主题增加了千斤重的分量。

1932年5月，杨逵在不断的尝试之中完成了他的成名作《送报伙》。因为一向不喜欢父母给自己取的名字“杨贵”，加上后来被人以“杨贵妃”绰号来取笑，杨逵更加讨厌自己的本名。《送报伙》完稿时杨逵也没多想，就草草写下“杨达”这样一个笔名。经赖和之手，《送报伙》在1932年5月19日至27日的《台湾新民报》上刊载出来。在署名的问题上，赖和建议使用“杨逵”笔名，一来与其本名谐音，二来取自《水浒传》中打抱不平的梁山好汉“李逵”之名，故用红笔圈去“达”字，改为“逵”字。从此，台湾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赖和也成了杨逵的“命名之父”。首度以“杨逵”为笔名的《送报伙》在《台湾新民报》上只登了一半，就被日本殖民当局查禁了。作为《送报伙》的“助产士”，赖和甚为伤心和遗憾，那种期盼文学作品顺利诞生的心情，仿佛比杨逵本人还要迫切。此时的杨逵，适逢长子资崩出生，婴儿难产，小说也难产，杨逵在台湾发表的只有这半部《送报伙》。两年以后，在日本《文学评论》杂志的征文中，《送报伙》终于在参选的八十余篇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获得第二名（第一名从缺）。当赖和看到中文版的《送报伙》后来收入《山灵——朝鲜台湾小说集》、《弱小民族小说选》的时候，他高兴得掉下眼泪，并对杨逵说：“你这本本书的译文，胜过我过去所有作品的总和了。”^①杨逵非常感动，更坚

^①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5页。

定了跟赖和先生一起前进的信念。

在杨逵流浪高雄、砍柴为生的日子里，每每遭遇困难，赖和总会伸出援手。从鼓励杨逵创作和发表文学作品，到帮助杨逵的长子资崩治疗夜盲症；从促成杨逵参加台湾文艺联盟活动，并担任《台湾文艺》编辑，到帮助杨逵独立创办《台湾新文学》，为其负责中文栏目的编辑，赖和在人格建树和文学活动方面给予杨逵决定性的影响。1976年8月，在接受《夏潮》杂志访问时，杨逵曾明确表示，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中，他与赖和最为亲近，文风也最相似。从强烈的抗日民族意识，到反映底层贫苦百姓生活的关怀精神，再至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杨逵与赖和有着高度认同的文学路线。

赖和不仅是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也是日据时期的抗日仁医和民族英雄。1951年4月14日，赖和以抗日民族英雄入祀忠烈祠，受到社会的推崇敬仰。孰知到了1958年，却因为涉及所谓“思想问题”无人敢于申辩，赖和竟然又被逐出了忠烈祠。早在1943年就已逝世的赖和，台湾光复后蒙冤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直到1984年1月19日才得到平反。同样因为坚持真理而蒙冤监狱十二年的杨逵，对赖和的遭遇有着强烈而深刻的感触，他不仅参加了1984年2月12日由《中华杂志》、《夏潮论坛》、《台湾文艺》、《文学界》、《文季》五个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庆贺赖和先生平反演讲会”，还致词《我的心声》，并发表《希望有更多的平反》的演说。这其中，杨逵深情缅怀他与赖和亦父亦兄的友情，表达自己“今年七十九，还不想离开人世，我就是要接下赖先生的这枝棒子”^①的信念。同时，杨逵大力呼吁民主，“希望执政党继此次赖和先生平反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放弃蹂躏民主的手段，将过去的冤案像此次一般，重新深入调查，

^①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5页。

再有五次、十次、一百次、乃至无数次的平反”^①。

杨逵认为,自己的一生从赖和以及林幼春那里获得的精神滋养最为直接和深刻,对于这两位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杨逵永远怀有这样一种敬仰的心情:

……像我这样的“又瘦又乏”的角色,在此暴风雨的二十年间未曾饿死或是投降,这气力与耐性,可说大半都是由于他们来的。

八年的抗战中,在日本特务的猫目爪牙下,我藏于首阳园种花以免饿死或是投降,全是由于先生们的感化来。他们教示我们后辈,未曾用过一条的训令或是一场的说教,他们总是这样的,以他们全人格诱导着我们。^②

二、杨逵与入田春彦：生命相托知己情

杨逵的一生中,曾有位对他的生命履历和文学生涯发生关键性作用的日本友人,年轻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就是其中的一位。杨逵在《入田君二三事》、《首阳园杂记》、《光复前后》、《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不朽的老兵》等文章中,多次提及这位身份特殊的左翼文学青年。入田春彦与杨逵的真诚交往和生命相托,不仅构成了杨逵在日据时期的一段生命传奇,也对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发生

^① 杨逵:《我的心声》,本文为杨逵参加“纪念赖和先生平反会”的致词。发表于《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7页。

^② 杨逵:《幼春不死! 赖和犹在!》,原载《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7页。

了深远的影响。

入田春彦对于台湾学界,过去一直是个谜。杨逵生前与入田春彦交往颇多,但也不知道入田春彦的真正来历,因为他从不讲起这些事情。

近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主要研究杨逵与日本文坛关系的张季琳博士,在日本报界的帮助下,经由多方寻访入田春彦遗族和深入的资料发掘,并分析杨逵遗物中尚未公开过的《台湾新闻》剪报,以及入田春彦的作品样本,终于解开了入田春彦的身世背景之谜。

入田春彦,1909年3月5日生于日本宫崎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9月开始接受六个月的警官训练,1932年3月28日结业,即被派往台中州任职巡查,之后调往南投郡与新高郡,1937年11月起担任台中警察署巡查,原本负有尾随监视杨逵的任务。同年12月18日,入田春彦辞职获准。

入田春彦虽为日本警官,但平日喜爱文学,他“无法忍受沉闷死板的山中警察生活”^①,心仪社会主义思潮,是一个带有左翼色彩的文学青年。当时担任《台湾警察时报》编辑的日本作家中山侑^②,后来曾谈到他与入田春彦始于一封长信的文学交往,以及他对入田春彦的“文学青年”印象:

您那封信曾经在《台湾新闻》报的文艺版发表,是一篇

① 入田春彦语,见中山侑《入田春彦君》,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5月18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7页。

② 中山侑(1909—1959),日本作家,笔名有鹿子马龙、志马陆平。出生于台湾台北,台北高校毕业。创作涉及诗、戏剧、影评、文艺评论、小说等方面,1930年组办《かまきり座》(螳螂剧团),开始从事剧团活动。1934年前往台湾总督府警务局任职,编辑《台湾警察时报》。曾担任《文艺台湾》编辑委员,后因与西川满不合而选择协助张文环创刊《台湾文学》。

以充满才气的笔致,勇敢述想说的事情的文章。一想到像您这样在蕃界山区的人,一方面担任警察工作,一方面又勤于文学创作。我仍记得当时我惊讶得瞠目结舌。^①

有关入田春彦的文学活动,曾发表其作品的《台湾新闻》,在1937年12月17日的“学艺消息”栏,做过这样的介绍:

入田春彦氏,笔名乡亲良、乡はるこ、高英、大伴英彦、洪春乡。辞去六年的警察生活,目前滞居彰化温泉旅馆静养,近日将返回乡里。

从杨逵遗留的剪报资料可知,入田春彦生前发表的作品大致如下:

(1)入田春彦译:《国际警察とは何か——リテラリィ・ダイツユストより》(《何谓国际警察——从文学角度看》),《台湾警察时报》二百五十三号,1936(昭和十一年)12月。

(2)乡はる子:《マドリットにおける文化拥护国际作家会议》(《马德里第二届文化拥护国际作家会议有感》),《台湾时报》,1937(昭和十二年)11月26日。

(3)入田春彦:《日录抄》,《台湾新闻》,1937(昭和十二年)12月17日。

(4)入田春彦:《新约异解》,《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

^① 中山侑:《入田春彦君》,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5月18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7页。

(5)高英:《断片录》,《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①

入田春彦生前与日本在台作家田中保男、中山侑、藤野雄士多有接触,文学理念上受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影响较深,既倾向于芥川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揭露,也有着芥川式找不到社会出路的虚无与绝望。他还珍藏有创造社刊行的《大鲁迅全集》七册,每月订购美国的《新民众》与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接触中国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作品,对殖民地台湾的左翼文学有着特别的关注。早在1936年3月2日,入田春彦以“乡亲良”的笔名,投书《新文学月报》第二号的“明信片”栏,对杨逵夫妇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当他阅读了杨逵的《送报伙》、《模范村》等作品后,颇感慨于杨逵对弱势族群的关怀与文学表现,心中充满钦佩之情。他曾在《台湾新闻》发表《入田春彦》一文,结尾特别提到希望结识杨逵的心愿。

入田春彦初识杨逵,正值杨逵山穷水尽之际。1937年6月,为挽救《台湾新文学》被强制废刊的命运,杨逵远赴日本,奔波游说于东京进步文化界。七七事变爆发后,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杨逵不得已于9月返台。这年秋天,杨逵积劳成疾,咯血数月,因欠米店二十元,在日本警察的唆使下,被米店老板告上法庭。当时有朋友为他代租一块两百坪的土地,杨逵却拿不出三十元的租金。就在这穷愁潦倒的时候,《台湾新闻》的编辑田中保男带着入田春彦前来拜访。杨逵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变卖几本书,换得一纸口袋米,烧稀饭果腹。入田春彦和田中保男见状,急忙买菜沽酒来,大家边吃边谈,十分投缘。入田春彦当即慷慨解囊,惠赠一百元巨款。而当时,入田春彦基本月薪不过四十元,每月还要从中扣出一部分寄回日本故乡,可见一

^① 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9页。

百元对他并不是笔小数目。靠了这笔钱,杨逵绝境逢生,开创了首阳农园,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高压年代里得以安身立命和坚守自己的理想。

不久,入田春彦辞去六年的警察生涯,经常出入于首阳农园,并待杨逵的孩子亲如己出。他总是撑着高大的身躯,踏着他那独特的步伐,“咔哒咔哒”地拖着木屐来找资崩玩。当时六岁的资崩也经常去入田春彦的宿舍玩耍,入田春彦赠他糖果点心,为他朗诵故事书,也教他唱《胜利归来》之类的日本军歌。每逢入田春彦来首阳农园的时候,叶陶便忙着挖野菜,炒花生,做些朴素的菜肴好让杨逵与入田春彦下酒。两人敞开胸怀,谈文学,议时局,说心事,也交流思想,大有人逢知己相见恨晚的感慨。他们之间的位置,也从原本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对立关系,转化为跨越国度种族的文学心灵的交融对话。两人相识不久,入田春彦就在杨逵的带领下,拜访了吴新荣、郭水潭、陈培初、黄炭、黄朝东等多位台湾文友。

入田春彦因为写了不少触及日本警察黑暗内幕的文章,并屡次批评日本政府的侵略战争,又与杨逵这样的“危险分子”过从甚密,遂被殖民当局以思想偏激、执行任务失败为由,将其拘禁数日。决定释放入田春彦的同时,台湾总督府也下达了限期离台回国的命令。几天之后,入田春彦托人捎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杨逵次日晨七点到他住处去找他。1938年5月5日,也就是入田春彦原定被限期离台的头一天,依约前往的杨逵到达入田春彦门前时,屋内传来断断续续的胡琴声,房门却是紧锁着,无人应答。杨逵赶忙跑到管理公寓的阿婆那里拿来钥匙,开门一看,躺在榻榻米上的入田春彦已经不省人事,怀抱一把瘦瘦的胡琴,在痛苦的喘息声中,还不时地叫着杨逵长子资崩的名字。原来,入田春彦在得到自己要被遣返日本之后,就决定了以死抗争。于是,他吃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并给杨逵和叶陶分别留下遗书,以二十九岁的英年,坚定地自杀了。入田春彦还表示愿将他的骨灰当作肥料,遍撒在首阳农园的土地上。很少流泪的杨逵,见

到此情此景，精神遭遇强烈震撼，眼泪潜然而下，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平复的创痛。

入田春彦自杀后，当时台湾最大的日文报纸《台湾日日新报》曾于1938年5月7日，以《原巡查因对前途悲观，于公寓服毒自杀》为题，进行报导。同日，台南市日文报纸《台湾日报》也以《文学青年因孤独感和生活不安，留下异常遗书自杀》为题，披露了这一事件。

入田春彦留给杨逵和叶陶的遗书，表明了他对中国人的感情以及对日本殖民统治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厌恶。这两封遗书分别写道：

叶陶女士

我想，你是最能迅速、利落处理我的后事的人。

因此，我就不客气地拜托了。

我想，在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战斗也是好的。

能够了解怀抱炸弹，欣然勇赴死地的一个士卒的心情的人，

大概也能理解我的心情。

让资崩小弟弟为我唱“胜利归来”的歌吧。

资崩以后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时，

这世界不知道将变成什么样子。

杨逵先生

我想你一切都了解的，所以我就没必要再写什么。

这是战斗。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卑怯的行为。

我的内心也存在著各种东西。

但是，芥川式的虚无，还算是有三分吧。

多估计的话，大概也有四分左右。

到了这样的時候，我多少宠坏了芥川式的虚无，也是个事实。

但是，我给予了它令战斗更加激烈的任务。

我不希望被过重地评估芥川式的虚无。^①

事实上，早在入田春彦自杀前一个月所发表的《断片录》中，已经可以看到他以勇敢赴死来抗争的某些端倪。下述章节的文字表现，与入田春彦写给叶陶遗书“怀抱着炸弹，欣然勇赴死地的一个士卒”的话，是相当吻合的：

我已下定决心，准备不顾死活，用身体，直接冲撞前去。

但是，总觉得奇怪，这是无法击发的子弹吗？

我的脸，像死人般发青。

而不知什么时候，那把枪已被施以安全装置了。^②

入田春彦的突然自杀，使杨逵深受刺激，一度陷入心力交瘁、意志沉迷的状态。1938年5月11日，也就是入田春彦告别人世六天之后，杨逵写下《入田君二三事》，在生死情谊的追怀中，道出了他无限的痛苦与感叹：

肉体上、精神上都已经筋疲力尽的现在，我虽然负债累累，却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写。

那个高大的男人，现在整个人都收在这个不到一尺立方的木箱里。说决斗、谈打仗的这个热情的人，现在化成一堆骨灰塞在这个木箱里。

① 入田春彦的遗书，张季琳译；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与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5页。

② 入田春彦：《断片录》，张季琳译，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年4月1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与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5页。

在给叶陶的遗书里,他自负是个怀抱炸弹、慷慨赴义的士兵,结果却和炸弹一起坠入海里。炸弹最后没有爆炸,和他自己一起被大海,被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吞噬了。

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想想他这一生的种种。我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债务之一。^①

杨逵与叶陶将入田春彦的遗体火化后,含着热泪整理了他的遗物,这使杨逵第一次接触到七卷本的《大鲁迅文集》,也由此影响到他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之后,杨逵曾向台湾总督府查询其日本家属,得到的却是“查无资料”的回答。不忍看故友的骨灰流落在外,杨逵将入田春彦的骨灰安置在自己家中供奉,存放长达十二年之久。1949年4月,杨逵因起草《和平宣言》被捕入狱后,经常有特务、警察到他的住宅搜查,全家人的命运动荡不定,入田春彦的骨灰存放也不安全。杨逵的长子资崩,便请求宝觉寺住持林锦东协助,以杨贵(杨逵本名)夫妇的名义,于1950年3月30日,将入田春彦的骨灰免费安放于宝觉寺。

1961年,杨逵从绿岛监狱归来,心中依然牵挂着入田春彦的骨灰安置,一刻也没有放弃寻找故友遗族的努力。一直到1982年,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邀请赴美访问的杨逵,虽然已经是七十七岁的高龄,在归途中重访东京,还念念不忘恳请日本媒体帮助寻找入田春彦的家人,但却未见任何信息反应。入田春彦的骨灰不能安返故里,让三年后辞世于台中的杨逵带走了永远的遗憾。

杨家后代深知父亲的心愿,他们继续以各种方式寻找入田春彦的家属。但从1985年到1997年,十二年的寻觅都杳无音讯。后来

^① 杨逵:《入田君二三事》,原载《台湾新闻》1938年5月18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88—589页。

经由台湾在东京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张季琳的努力,她在《官崎日日新闻》上刊登的寻人启事终于有了回应。1999年12月18日,入田春彦的外甥女藤江绫子与夫婿一同来台湾,接舅舅的骨灰返回故里。对杨逵家族保存入田春彦骨灰十二年,并寄存宝觉寺长达四十八年的义举,入田家族感念至深。经历了六十年的世事沧桑,杨逵与入田春彦真情相见、生命相托的感人故事,终于有了新的延续;他们所共同见证的那段社会悲剧,也已然成为历史。

三、杨逵与大陆文坛：“鲁迅情结”“胡风缘”

杨逵终其一生,并未见过鲁迅与胡风。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旗手鲁迅的精神仰慕,形成了心中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结”,并直接影响到战后初期的文学再出发;他与胡风之间的文学因缘,传递着左翼作家对底层被压迫者的关怀精神,更见证了两岸文学割舍不断的历史联系。

杨逵首度接触鲁迅的作品的时间,大概在1928年左右。当时在彰化居住的杨逵,经常与一群文友出入赖和家里读书看报,讨论文学。杨逵清楚地记得,“先生的客厅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上总是摆着好几种报纸。”^①晚年杨逵接受林瑞明访问时,也肯定地回答桌上还有中文杂志。赖和当时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而鲁迅又是1925年至1930年间在《台湾民报》出现频率最高的作者。《鸭的喜剧》、《故乡》、《牺牲谟》、《狂人日记》、《鱼的悲哀》、《狭的笼》、《阿Q正传》、《杂感》、《高老夫子》等作品都转载于这一时期,由此形成了鲁迅思想在台湾传播的第一次高潮。赖和平生最崇拜鲁迅,他同样是

^① 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

以文学来疗救社会弊病,改造国民精神,一生保持了尖锐抗争的形象,因而被人们誉为“台湾的鲁迅”。而杨逵,作为深受赖和人格濡染和文学影响的作家,他内心认定的赖和,就是鲁迅的形象。1943年1月赖和去世后,杨逵即发表《忆赖和先生》一文,其中谈道:“一想起先生往日的容颜——当然是透过照片——就会浮出现鲁迅给我的印象。”^①由此看来,20年代后期的杨逵,经由赖和而间接地接触到鲁迅作品,并从中获得精神的认同与启迪,其背景也是真实可信的。

1935年12月起,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从第二卷第一号起,分五期连载由戴顽鍊翻译、增田涉著的《鲁迅传》,引发文坛普遍关注。杨逵当时也在《台湾文艺》发表文章,透过《鲁迅传》得以进一步了解鲁迅的精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去世。杨逵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迅即于次日刊登了由他主动提议王诗琅所写的《悼鲁迅》,以及黄得时的《大文豪鲁迅逝世——回顾其生涯与作品》。《悼鲁迅》以卷头言形式出现,其中写道:

不久以前我们丧失了马琪西姆·高尔基而悲哀尚未消逝,又接到鲁迅在十月十九日因痼疾心脏性喘息病去世的讯息。从事文学的我们,在短短三个月中失去了两位敬爱的作家,是何等的不幸……现今在遥远的那边,在那黄浦江边犹如追悼他一样,愁云覆盖了天地……^②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正是杨逵和他那一代台湾新文学作家的共

^① 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

^② 王诗琅:《悼鲁迅》,原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

同情感。

1938年5月,由于入田春彦自杀的意外促成,杨逵遂开始全面系统地接触鲁迅作品。1937年七七事变至日本战败前,日本当局全面禁止中文刊物发行,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新文学作品转载完全停止。当时,无论是在台湾,甚至是在东京,《鲁迅全集》都被视为禁书,而入田春彦能够拥有一套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①,更证明了他的左翼文学青年身份。杨逵曾说:

这位入田先生的遗物中有改造社刊行的《鲁迅全集》
(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由于我被授权
处理他的书籍,就有机会正式读鲁迅。^②

正式阅读《大鲁迅全集》,为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出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资源。台湾光复后,许寿裳受陈仪邀请,从大陆赴台担任了台湾省编译馆馆长,旋即成为鲁迅思想最重要的传播者。许寿裳对于台湾文化重建的构想,是期望“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期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③而实现这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就是把鲁迅思想的传播与台湾的文化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建设一个具有新生命的台湾。

^① 《大鲁迅全集》,佐藤春夫、增田涉、山上正义、井上红梅等人合译,(东京)改造社,1937年出版。

^② 杨逵语,见《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原载《文艺》第22卷第1号,1983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遗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0页。

^③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台湾新生报》1947年5月4日。

战后的初期的台湾社会,形成了“中国化”的时代潮流,如《民报》在社论中表示:“光复了的台湾必须中国化,这个题目是明明白白没有讨论的余地。”^①随之而来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新文学被大量介绍,而鲁迅作品在台湾文坛的出版、转载无疑最多,这使鲁迅思想成为战后初期两岸文化人沟通的语境。

许寿裳于1946年6月25日抵达台北,同年即发表《鲁迅和青年》、《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精神》三篇文章,一年后出版《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1946年5月至1948年1月,从台湾的《中华日报》、《和平日报》、《台湾新生报》三大报刊,到《台湾文化》、《文化交流》等刊物,据中岛利郎的统计,直接以鲁迅为题的评论和创作文章多达十八篇,这一时期文坛出版的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著述为五种^②。战后初期台湾文坛的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说带来了台湾传播鲁迅精神的第二次高潮。

得益于入田春彦遗留的《大鲁迅文集》,杨逵在系统的研读中,对鲁迅的精神的理解与传播,更致力于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与战后文化重建实践的转化。

1946年10月19日,杨逵分别在《中华日报》日文版以及《和平日报》副刊上发表中日文诗歌《纪念鲁迅》:

《纪念鲁迅》

呐喊又呐喊/真理的叫唤/针对恶势力/前进的呼喊//
敢骂又敢打/青年的壮志/敢哭又敢笑/青年的热肠//一声
呐喊/万声响应/如雷又如电/闪光,烁烁//鲁迅未死/我还

^① 《民报》社论:《中国化的真精神》,1946年9月11日。

^② 此统计见方美芬编,吴兴文、秦贤次补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关系略年表》,收入中岛利郎编《鲁迅与台湾新文学》,(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35—237页。

听着他的声音/鲁迅不死——/我永远看到他的至诚与热情

(为十周年纪念作)

——《和平日报》(1946年10月19日)

《纪念鲁迅》

“我有寸铁”/鲁迅从不退缩/立于贫困与龌龊的环境/
提刀反抗枪剑的追击/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面对恶
势力与反动/呐喊又呐喊/鲁迅如猛狮般锐不可当/敢骂、敢
打、敢哭、敢笑/鲁迅是永远的青年/如今到处听见鲁迅的声
音/继承者的心中/看见鲁迅的至诚与热情/鲁迅是人类精
神的清道夫/革命永生的标杆

——《中华日报》(1946年10月19日)

1947年1月,在《幼春不死!赖和犹在!》一文中,杨逵再次强调“鲁迅不死”,并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声疾呼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两位先驱同样不朽:“幼春不死!赖和犹在!”

1947年1月,杨逵编著的《阿Q正传》中日文对照本,列为“中国文艺丛书”之一种,由东华书局出版。杨逵所写的题为《鲁迅先生》的卷头语,集中表达了他对鲁迅精神内核的理解:

鲁迅先生本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年幼时,家有水田四五十亩,生计相当优裕。但在十三岁时,祖父因某事件入狱后,家运就急速中落,寄寓亲戚家时,曾被唤为乞丐。先生在最初的小说集《呐喊》的序文中记载,曾因父亲罹病长达四年,他几乎每天进出当铺和药房。有人说钢铁因锻炼而更坚固,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就是在在此期间锻炼而成的吗?之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时二十五分,先生以五十六年生涯告终前,先生经

常因作为被迫害者与被压迫阶级之友，而一再重复血淋淋的战斗生活，平日固然忙于用手笔耕，有时更得忙于用脚逃命。说是逃命，或有卑怯之感。但笔与铁炮之战斗，作家与军警之战斗，最终，大部分仍不得不采取逃命的游击战法。如此，经由先生这般不屈不挠的战斗生涯，使被迫害者的战斗意志更为强韧，组织也益形坚固。……在此所译《阿Q正传》是先生代表作，这是向应受到诅咒之恶势力与保守主义宣告死刑。恳请细腻吟读。只要不扬弃此等恶势力与保守主义，我们一步也无法前进。^①

1947年1月，杨逵还在《文化交流》发表《阿Q画圆圈》，经由纪念鲁迅的文章，对大陆来台的一部分贪官污吏，即“礼义廉耻欠信之士”在光复后大发其财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从杨逵的上述诗文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认同，更多地定位于“人类精神的清道夫”、“呐喊前进的青年”、“被压迫阶级之友”、“战斗的文化战士”等层面上。这其中，一方面融入了杨逵作为战斗型作家的生命经验和行动路线，让他“从鲁迅身上找到作为自我延伸的理想图像”。^②另一方面，这种认知与时代的脉动以及台湾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经由新的转化和发展，不断赋予鲁迅精神新的时代意义，并对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化重建现实发生积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事实上，杨逵对鲁迅精神的执著和追寻，可谓贯穿他的一生。直到1982年，杨逵在美国爱荷华城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明确回答，对于鲁迅的抗议文学和反叛文学，“我比较接近，如果对社会的不合理毫

^① 杨逵：《鲁迅先生》，杨逵编译《阿Q正传》，（台北）东华书局，1947年1月版；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

^② 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

不关心的,我就没兴趣。”^①这种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结”,与杨逵作为一个战斗的、关怀大众的、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自然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

胡风作为鲁迅的得意门生,也是鲁迅晚年最接近在身边的一位。胡风翻译《送报伙》以后,又将其收录在《弱小民族小说选》中,其背景仍然有鲁迅的影响。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与胡风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之间,应该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胡风在鲁迅精神影响下从事的文学活动,使他和杨逵之间发生了一段跨越海峡两岸的文学因缘,有了一种普罗文学精神的沟通。

1932年,杨逵投稿《台湾民报》的小说《送报伙》只登出一半,就被台湾总督府强行查禁。心有不甘的杨逵没有放弃,仍然在寻找发表全文的机会。1934年,得知日本东京的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正在征文,杨逵便将《送报伙》投稿过去,结果发表在当年10月刊出的第一卷第八号上,并获第二奖(第一奖从缺)。这是台湾作家首次进军日本文坛,日本进步作家给予《送报伙》相当高的评价,而《文学评论》当月号在台湾却被禁止销售。

在同期的《文学评论》上,日本进步作家对《送报伙》如是说:

我认为“送报伙”很好。没有虚假的造作,而显露着不得不写的真情直逼人心。我看过的十四篇中,它是顶好的。

(龟井胜一郎)

作为一篇小说,它难说是完整的,但作者的真情硬逼着读者的心。送报的生活与乡里的故事吸引着我的心。最后

^① 《访台湾老作家杨逵》,原载《七十年代》总第154期,1982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页。

一段感情似有几分低调。

(洼川稻子)

总而言之,主观是幼稚的,但正因如此,真朴实的脸貌更显得突出。它没有其他应募作品能看到的叫人反感的造作,是可喜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大。

(武田麟太郎)

就在此时,胡风有机会接触到了杨逵的这篇成名作。胡风在1985年悼念杨逵逝世的文章中回忆道:

三十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普罗文学》上读到了杨逵先生的中篇小说《送报伙》。在日本侵略者的长期迫害之下,台湾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甚至家破人亡,终于觉悟到了非组织集体力量进行斗争不可。这篇作品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即译了出来,发表在当时销数很大的《世界知识》上。后来,新文字研究会还把它译成了拉丁化新文字本,介绍给中国的工友们阅读。从这篇小说,大大增进了祖国同胞对台湾同胞的了解和同情,它的影响是很大的。^①

如果说,赖和是《送报伙》的助产士,胡风就是《送报伙》传播者。1935年6月,由胡风译为中文的《送报伙》,发表于当时广为影响的《世界知识》(上海)第二卷第六号。1936年4月,胡风编译的小说集《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作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刊》之一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杨逵的《送报伙》、吕赫若的《牛车》和杨

^① 胡风:《悼杨逵先生》,收入《杨逵先生纪念专辑》,台声杂志社1985年4月,第12页。

华的《薄命》三篇小说入选其中，这是台湾小说首次被集中地介绍到祖国大陆来。1936年5月，胡风编译《弱小民族小说选》，由上海生活书店以“世界知识丛书”发行，同样收入了上述三篇台湾新文学作品。

胡风是在什么样的语境里译介《送报伙》呢？他在《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的“序”里说：

去年《世界知识》杂志分期译载弱小民族的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东方的朝鲜台湾，想到他们底文学作品现在正应该介绍给读者，因而把《送报伙》译好投去。想不到它却得到了读者底热烈的感动和友人们底欢喜，于是又译了一篇《山灵》，同时也就起了收集材料，编印成书的意思。

.....

我还记得，这些翻译差不多都是偷空在深夜中进行的。四周静寂，市声远去了，只偶尔听到卖零吃的小贩底微弱的叫声。渐渐地我走进了作品里的人物中间，被压在他们忍受着的那个庞大的魔掌下面，同他们一起痛苦，挣扎，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整个世界正在从我底周围陷落下去一样。在这样的時候看到了像《初阵》、《送报伙》等篇里的主人公底觉醒，奋起，和不屈的前进，我所尝到的感激的心情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

好像日本底什么地方有一个这样意思的谚语：如果说 是邻人底事情，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把那说成了外国底故事。我现在的处境恰恰相反。几年以来，我们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前面，现在且已到了彻底地实行“保障东洋和平”的时期。在这样的時候我把“外国”底故事读成了自己的事情，这原由我想读者诸君一定体会得到。^①

^① 胡风：《山灵·序》，胡风译《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收入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4月版。

胡风当时为《送报伙》写过一则“译者序”，该序《世界知识》版置于文前，《弱小民族小说选》版置于文后，至《山灵》版则被删除。从该序可以看出胡风对《送报伙》的评价：

台湾自一八九五年割让以后，千百万的土人和中国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然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隶生活究竟到什么程度？却没有人有深刻的描写过。这一篇是去年日本《文学评论》征文当选的作品，是台湾底中国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四十年以后第一次用文艺作品底形式将自己的生活报告给世界的呼声。^①

大陆同胞对杨逵的了解，首先是从胡风翻译和编选《送报伙》开始的。台湾光复后，许多前来支援台湾文化建设的大陆作家、文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一到台湾就慕名而来拜访杨逵，千方百计与他取得联系，都是由于拜读过《送报伙》，文学精神与心灵世界已经有所沟通的缘故。一位从大陆回来的台湾籍青年曾对杨逵说，他们学校的校刊就转载过这篇小说。被抓去当日军翻译的台湾文学界人士李献璋也说，他在广州“各界抗日联合会”出版的小报上，曾看到《送报伙》。又有林朝培从新加坡来信说，他在那里看到《送报伙》与其评论文章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也有人说，他还看过翻译成世界语的《送报伙》。《送报伙》在抗日战争中传播范围之广，对民众参加抗日决心影响之大，令事后知晓的杨逵倍感欣慰，对翻译、传播这篇小说的胡风也始终感念在心。

胡风晚年回忆说：“我虽然在三十年代就介绍了杨逵先生的作

^① 转引自黎湘萍：《“杨逵问题”：殖民地意识及其起源》，金坚范主编《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01页。

品,但与他却从未见过面,连他的情况也不了解。直到近几年来,我才听到了有关杨逵先生的点滴情况。”^①杨逵与胡风素昧生平,但他的《送报伙》却被胡风热心翻译,不断推荐,乃至广为传播,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于精神相通的力量,文学传播的奇迹!这段文学因缘所共同见证的,是一个风雨坎坷的文学时代,也是两岸作家影响互动的一段文坛佳话。

四、杨逵与徐复观：真人真话真文章

杨逵在东海花园,与当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时有往来,互相欣赏并引为知己。杨逵晚年深受徐复观人文精神之影响,他们之间也演绎出一段心心相印的文人佳话。

1903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的徐复观,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新儒学代表人物。他曾在湖北省第一师范、湖北省武昌国学馆读书,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投身军旅,抗战期间进入政治中枢,当过蒋介石的随从秘书。四十一岁时,在重庆勉仁书院拜见国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接受其“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之理念,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抗战胜利后以陆军少将主动退役。1947年在南京创办学术刊物《学原》,1949年又在香港创办政治学术理论刊物《民主评论》,这成为20世纪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

1949年,四十七岁的徐复观来到台湾,定居台中,历任省立农学院、私立东海大学教授。潜心于国学研究的徐复观,“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重在阐扬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并为自由与民主呐喊,在学界具有“创新传统主义者”、“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等

^① 胡风:《悼杨逵先生》,收入《杨逵先生纪念专辑》,台声杂志社1985年4月,第12页。

美誉。1956年,时逢蒋介石七十岁生日,徐复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祝寿专栏”发表《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批评了蒋氏的政治性格,使这刊物连续印刷十一版之多。

1958年,徐复观与牟宗三、张君勱、唐君毅一起,发表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由此成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一生有《中国学术思想》、《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经济学史基础》、《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两汉思想史》等多种著述,涵盖中国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后来因政治原因,徐复观被迫退休,1969年赴香港新亚学院继任教席,临别发表《无惭尺布裹头归》一文以明志。1982年4月因胃癌去世于香港九龙,终年八十岁。徐复观在生前致泮水故乡友人的信中,希望自己骨灰能够埋于桑梓之地,并在墓碑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徐复观”这三十个字。

杨逵与徐复观的相识,却并非由于徐复观新儒学大师的背景与地位,而是缘起于东海花园的邂逅相遇。1961年4月,在绿岛监狱坐牢十年的杨逵回到台中,以贷款方式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大度山下买了一块荒坡地,开始了他晚年在东海花园的农耕生涯。而1955年至1969年,正值徐复观在东海大学任教十四年的时段。杨逵谈道:“我和徐复观先生的交谊,开始在他即将离开东海,在东海的最后几年他常常和徐太太,散步来到我的花园。很自然地,我们成了朋友。”^①

60年代的后几年,徐复观先生与太太常常在晚饭前后到大度山上散步,最初多半是在山上绕一个几里路的大圈子,再返回东海大学宿舍。有一天,他们绕道公墓右下角,越过一个小山沟时,突然发现

^①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页。

水沟上面的坡地上，竟然种植了一片姹紫嫣红的花草，旁边还有一间简陋的木屋。徐先生心生惊奇，连忙走了过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小而神定气闲的老者正在花畦里浇水，与其攀谈，心里寻思：难道书上记载的高人逸士，今日真尚有其人吗？这就是徐复观与杨逵相识的开端。“后来向朋友们打听，才进一步了解他是日治下非常热爱祖国的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但他所热爱的祖国到了他的乡土时，却又和他万分生疏，只好在一个孤岛上和人世间隔绝了十年的岁月。等他再回到人间世时，已成为一身以外更无长物之人；只得向已经发了财的老友，借点钱来垦这一块荒地。”^①

从此，徐复观经常到东海花园，与杨逵不拘小节地闲话家常。杨逵的记忆里，徐复观先生来了，“看见我在劳动，就随手搬个石头，在我身边坐下来，天南地北地谈论。气氛一直是坦诚、友爱，互相关怀的。话题，是无所不包，包括一些问题，套现今的话说，包括了一些‘敏感问题’。”^②杨逵因为一纸《和平宣言》在绿岛坐牢的时候，每当看到囚舍背后山腹上所写的“信义和平”四个大字时，心里就无法平静：自己竟是为了中国人中间的和平与团结来这儿的！有时听杨逵在东海花园谈起心中这些无从解开的疑结，徐复观只是摇头，苦笑，叹息，却不曾说话，但杨逵知道，在徐复观忧苦的笑声和叹息中，他对于自己的坚持中国人之间应当和平的想法，是同情和支持的。

杨逵与徐复观在东海花园聊天的日子里，互以老友相称，从中颇多受益。杨逵因为日据时期受的是日文教育、国语说得太不好，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受到限制。现在从徐复观那里，杨逵知道了更多、更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对历史、社会与人生有了更为深广的认

^① 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起的一番怀念》，原载《大学杂志》第81期，1975年；收入杨素娟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35页。

^② 同^①，第17页。

知。有一次，心存感念的杨逵实在情不自禁，叫了一声“徐老师”。没想到，徐复观大为惊恐，坚决表示不敢接受杨逵对他的敬意。杨逵费了许多口舌，谈及人各有所长，若是徐先生要学薜花的技艺，也可以称自己是“杨老师”，徐先生才不那么用力反对。

徐复观对杨逵的命运遭遇，充满同情和关心，两个人之间，相交颇深。知道杨逵素有“放胆文章拼命酒”的性格，徐复观曾送杨逵好酒，杨逵也回赠过几次鲜花。徐复观几次想邀杨逵到东海大学寓所来喝酒，也几次自动地抑制了，因为担心会给彼此带来“麻烦”。徐复观虽然经常与杨逵聊天，但在周围某些人的窥伺下，说到一些“敏感”问题时，还需特别小心谨慎。看到杨逵手头拮据，徐复观曾热心地要招一个互助会，后来被杨逵婉言谢绝了。毕竟，这是戒严体制下的台湾，以杨逵坐牢十二年的政治犯历史和被埋没的现状，以徐复观敢于直言、不时触犯政权权力的性格，他们的频频交往在当时是犯忌的，所以也不时地被人窥伺。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徐复观先生的身影不再出现于东海花园，后来在台中街上相见，杨逵才知道，原来有人打了徐复观的“小报告”。徐复观先生后来为什么离开东海大学，杨逵始终不明白。他想过，会不会是因为徐先生常来东海花园聊天，触犯了政治禁忌，他才被逼走？徐复观后来也谈道：“我被东海大学撵出来的时候，很快便来到台北，没有机会向杨先生辞行。而杨先生住的地方，既没有街道，当然更没有门牌，想通信也没有办法。但这是我不能忘记的一位朋友，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作家。”^①

徐复观先生被迫离开东海大学后，他与杨逵虽难晤面，但颇多惦记与思念。1975年，《大学杂志》召开“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座谈会，杨逵因为有事不能到会，便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发表于《大学杂

^① 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起的一番怀念》，原载《大学杂志》第81期，1975年；收入杨素娟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36页。

志》第七十九期。当时已经迁居香港的徐复观，读到杨逵的文章，感念至深，马上写了《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发的一番怀念》，发表在《大学杂志》第八十一期上。在这篇怀念老友的文章中，徐复观畅述他与杨逵的山野相识，东海叙谈，并给予杨逵高度评价。徐复观的这篇文章，也让杨逵感慨无限，日后经常重读，更“感受到他对朋友的仁慈、厚爱，也看出他对世间的和平、人类的苦难，永远是怀抱着那么大的同情和鼓励。”^①

1976年，杨逵的《鹅妈妈出嫁》中译本出版，在序文中，杨逵提到了孙女杨翠以《这是卧薪尝胆的时候，不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为题，参加学校演讲的事情。杨逵把这本书寄到香港，徐复观很快写信给杨翠，称赞她的演讲词写得好，对于演讲题目所阐释的时代背景，更是欣赏有加。以徐复观崇高的学界地位，却不惜在百忙中回复给中学生的杨翠，并对其热情鼓励，先生真诚待人的情怀，和对杨逵一家的友谊，从中可见一斑。

1980年9月中旬，得知身患胃癌的徐复观回台大医院手术，想念老友至深的杨逵，在《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帮助下，很快来到医院探望。一看见多年不见的徐复观，杨逵“心里有如见了一辈子未见的至亲，他也是，一见面就掉眼泪，我想我的这个老友，不是一个会为动胃癌手术掉眼泪的人，他是一个为了理想，不惜远离荣华权势的人，我想在必要时，他也是一个可以为理想来牺牲他的生命的人。”^②当时，徐复观身体非常虚弱，但仍殷殷垂询杨逵家人的近况，对自己的文章志业也侃侃而谈。他对杨逵说：“我还有两三本书要写”，“如

^① 杨逵：《沧海悲桑田》，原载《中国时报》1982年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19页。

^② 杨逵：《当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原载《民众日报》1980年10月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13页。

果老天还能给我两三年时间,那就太好了。”

1982年2月17日傍晚,徐复观再度住进台大医院,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消息传来,惊愕中的杨逵,满心伤感,遂于次日下午去台北探视。在病床前,徐复观紧紧拉住杨逵的手,泪水溢满眼眶。他对杨逵说:“还能活着和你见面,真是太幸福了。”得知杨逵此时在大溪协助长子资崩经营花园,他又说:“希望我还有机会到你那儿去看看花,哎,只怕是没有机会了!”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成了徐复观和杨逵的永诀!1982年4月1日这一天,老友永远地走了,杨逵也把自己对徐复观的怀念和敬仰,写在了《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沧海悲桑田》、《当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等一系列文章中。

杨逵与徐复观,一个是被当时社会埋没的作家,绿岛归来的政治犯;一个是潜心国学研究的大学教授,远离荣华权势的“边缘人”,他们成长的环境背景与身份角色虽不相同,但却在不期而遇中,成为晚年老友,心灵知己,这正是他们精神世界相通的必然结果。在杨逵眼里,徐复观是一个不肯在委屈中使自己变形,一生为民主、自由和理想而呐喊的“真人”。而“真人”的内涵,如同徐复观在《从“哈哈亭”真人的呼唤》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争言论自由的过程,即是争说真话的过程;争说真话的过程,必然要迫进到庄子所要求的做一个‘真人’的立场……。”^①所以,杨逵“最尊崇徐复观先生所说过的一句话:要做真人,要说真话,要写真事。”^②在徐复观心中,杨逵则是“这样的天真、纯朴、勤苦、恬淡,真所谓‘人欲尽去,天理流行’的这样一个人,可

^①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0页。

^② 徐复观语,转自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页。

以说是‘圣人’之徒’。”^①杨逵晚年对民主与自由坚持不懈的呐喊，他因赖和先生的平反昭雪而发出“希望有更多的平反”的呼吁，他对自己“在冰山底下活过七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②的理想坚持，他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还原与彰显，都是本着“真人真话真文章”的人格准则，对那些被历史遮蔽的、被现实政治压制的、被“假人假话假文章”扭曲的生活真相，进行一一的澄清与还原。正是基于共同的关爱社会的共识，追求真理的信仰，以及呼唤民主与自由的精神，杨逵与徐复观心灵相通，互相引为知己。这一切，正像杨逵所说的那样：

我是用小说表达对人类、对时代、对人生看法的人，复观先生则以他的学术研究和论述，对政治、文化、人类处境不断提出质疑和抗辩。我们采用的表达形式不同，但追求真理与理想的心意是相同的。^③

① 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发的一番怀念》，原载《大学杂志》第81期，1975年；收入杨素娟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35页。

② 杨逵：《冰山底下》，原载《台湾文艺》第43期，1974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6页。

③ 杨逵：《沧海悲桑田》，原载《中国时报》1982年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20—421页。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园丁是杨逵为之钟情的职业，他的一生兼具了双重园丁的形象。作为大地的园丁，杨逵旨在通过“锄耕的农园”，为人间增添一片春色，也寻找一个能让自己不屈服的灵魂寄情放歌的自由场域；担任文坛的园丁，杨逵则执著于“笔耕的心园”，办刊物，编文章，辑丛书，培植文学力量，为台湾新文学作品的发表与传承提供了文学园地。两种园丁，劳动方式不同，但其内在精神不乏相通之处，那就是开拓者的生命特质。考察杨逵文坛园丁的编辑生涯，其中不仅蕴含着杨逵对自己文学理念的实践活动，也见证了台湾新文学的成长之路。

一、1935：《台湾新文学》的独立品格

杨逵一生创办过许多刊物，《台湾新文学》是他用心血生命培植的第一个文学刊物，也是他编辑生涯中历时最久、影响力最为深远的杂志。

《台湾新文学》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台湾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创刊的具体原因，与台湾文艺联盟机关杂志《台湾文艺》编辑部的内部分歧有着直接关系。台湾文艺联盟于 1934 年 5 月 6 日成立

之后,经过六个月的筹备,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从1934年11月5日开始刊行。它一开始就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不偏不党”、“无为而有为”的文艺主张,故能将全省艺术主张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作家熔于一炉。当时飘泊在高雄内惟的杨逵,应赖和、何集璧的邀请,从第二卷第七号(1935年7月发行)的《台湾文艺》开始,担任其日文版编辑,聘期约为一年。杨逵乃举家北上,从此扩大了文艺圈交游,并激发出新的创作欲望。

参加《台湾文艺》的编辑工作不久,杨逵便与《台湾文艺》第二号人物张星建专擅独裁的选稿作风发生了冲突。《台湾文艺》先前的两期稿子,都是由张星建选好之后才交给杨逵处理,而杨逵发现,那些废弃不用的稿子里,有些作品比发表出来的稿子还要精彩。杨逵认为既然让他担任日文栏编辑委员,就该让他全权负责。然而张星建一再拖延阻挠,双方因此分歧严重。另外,《台湾文艺》的编辑方针不断调整,最初以中文为主,后来东京支部的日文作品接踵而来,水准又高于中文作品,“台文的编辑方针,在实力对比之下,不得不自动转变由民族性转向于政治性,再由政治性转向于纯文艺性,初创的主旨逐渐无法维持下去了。”^①对于这种由于中文稿件不济而再三变更编辑方针的做法,杨逵也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1935年六七月间,围绕着“文联的宗派化”问题,《台湾新闻》编辑田中保男(恶龙之助)对台湾文艺联盟存在的“血的不同、经营的派系化和自以为是的编辑”^②发动了猛烈进攻,杨逵、赖明弘、赖庆、廖毓文、李献璋、吴新荣等人相继呼应,张深切、张星建、刘捷则坚决反对,其中又以杨逵与张星建之间的论争最为激烈。张星建在《台湾新

^① 张深切:《里程碑(四)》,(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年12月版,第490页。

^② 参见《编辑后记》,《台湾文艺》第2卷第8、9合并号,1935年8月。

闻》发表《文联的“公贼”》^①一文，指责杨逵与赖明弘中伤台湾文艺联盟；杨逵则发表了《杨逵、张深切，谁在说谎》、《不必打灯笼——文联团体的组织问题》、《关于 SP》、《团体与个人——几点具体的提案》等一系列文章^②，阐释文艺观点，也为自己辩解。张深切后来写自传中回溯这一段历史时，还在指责杨逵为争取编辑权，利用一部分民族主义作家对张星建编辑作风的不满情绪，对张星建进行攻击，进而标榜主义问题向张深切及其编辑委员会挑战。^③

至于真正使事件白热化的导火索，则是围绕是否刊登蓝红绿^④的小说《迈向绅士之道》^⑤，杨逵与张星建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后来杨逵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这篇小说，并获得读者反响。吴浊流认为它是“《台湾文艺》的遗珠，难以割舍的作

① 张星建：《文联的“公贼”》，完稿于1935年6月24日，刊登于《台湾新闻》，发表时间不详，可能在1935年6月底到7月初之间。

② 《杨逵、张深切，谁在说谎》，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6月12日；《不必打灯笼——文联团体的组织问题》，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6月19日；《关于 SP》，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6月22日；《团体与个人——几点具体的提案》，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6月26日。上述文章皆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266页。

③ 张深切：《里程碑（四）》，（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年12月版，第490—491页。

④ 蓝红绿，本名陈春麟，1911年生，南投埔里人，1926年曾赴东京读书。1933年为埔里青年会文化戏编剧兼导演，同年以小说《坚强地活下去》进入文坛。1936年于《台湾新文学》发表小说《迈向绅士之道》和剧本《慈善家》。战后曾任职于台湾电影戏剧公司与台湾合会埔里分公司，1973年退休。出版有《前辈作家蓝红绿作品集》。

⑤ 《迈向绅士之道》，主要描写一个不满现实的大学毕业生，其未来幻想与日常生活不能调和，夫妻之间屡屡发生冲突。小说透过对家庭琐事的描述，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

品”^①；茉莉则称赞它是“台湾有始以来最好的讽刺文学作品”。^②

因为一篇作品的刊登所引发的风波，“由于杨逵与张星建的对立，联盟内部问题反而发展成严重的问题，本部虽然极力呼吁，仍连续引起论争。这不光是文艺联盟运作上的问题，也关系到文艺大众化路线与新台湾文学运动的存在问题。”^③究其深层原因，杨逵与张深切、张星建等人因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不同，导致了文学理念的迥异，从而引起有关文联派别分化等论战的产生，但这种论争并非因为派系问题。杨逵信奉社会主义，强调从阶级立场来看文学，推举以劳动者的世界观书写的普罗文学，来实现文艺大众化；张深切等人是台湾民族主义者，反对阶级文学，他们所主张的文艺大众化，是将文艺推广到一般民众的生活。杨逵与张星建等人的这场笔战，还因为有了《台湾新闻》编辑田中保男的参与，也被当时一些文人质疑。时任该报记者的巫永福就曾发出“台湾人不可以分裂，要集中力量，对抗日本人才对”的呼吁^④。张深切后来甚至严厉批判杨逵“不顾大局，为固执己见，不恤文联分裂，俨然替日本当局效忠，打击文联，这一过错实在难以轻恕。”^⑤事实上，具有国际主义胸怀的社会主义者杨逵，愿意结盟站在同一阶级立场的日本作家，同心协力发展台湾文学，没想到竟因此长期蒙受“分裂文联”的不白之冤，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① 吴浊流：《〈绅士への道〉と〈田园小景〉》，《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6号，1936年7月第60页。

② 茉莉：《台湾新文学六月号の作品七つい乙》，《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6号，1936年7月，第63页。

③ 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台北）全球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第201页。

④ 巫永福：《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和杨逵》，收入王晓波编《被颠倒的台湾历史》，（台北）帕米尔书店1986年11月版，第347页。

⑤ 《张深切全集》卷2《里程碑》（下），（台北）文经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月版，第624页。

面对台湾文艺联盟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杨逵虽然被严重误读并遭受指责,但他还是寄希望于文联的改革和团结,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克服文联派系化,使文联成为大众的文联。为了消除文联的分裂局面,在1935年8月11日“第二回台湾全岛文艺大会”召开之前,杨逵以大局为重,于7月29日专程拜访张深切,并提出了化解矛盾的恳切建议。7月31日,杨逵在《个人想法的修正与两三个愿望》这篇文章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一向被批评为公贼、破坏者,此时不得不针对文联改革问题再度提笔。虽然因学派问题以及改革案,我被贴上了令人难堪的标签,但是,我现在却感到非常愉快。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管我过去如何被践踏,此次论战中,文联的改革唤起了全岛作家的关心,十一日召开的总会将会面临不得不改革的事实;而我的谬见在遭到多方指责后,可在此文中获得修正的机会。^①

在这篇文章中,杨逵一再声明,“只要是正确的意见,我即使遭受任何打击都不会感到痛苦”。如今面临团结合作的关键时刻,杨逵不计前嫌,主动撤销了已经寄出的驳斥张星建不实之词的文章,并透过刘捷今天努力工作的态度,原谅了他以往给台湾新文艺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张深切,杨逵谈到此次拜访取得了非常满意的结果:

诚如大家所知,他以往在台湾新闻发表文章,对我大加批伐。但是这次,他亲口告诉我那些文章流于意气用事,并

^① 杨逵:《个人想法的修正与两三个愿望》,写于1935年7月3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56页。

声明赞同正确的改革。他过去认为我们所有的论调都是空谈，并攻击我们在新闻报纸上公开表示不同的意见。相对而言，如今他希望我把一些汇整过的意见写出来。因此，即便过去有过任何不愉快，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改革文联，所以我要在此声明，我对他的这些意见非常满意。只要他以后继续维持如此真诚的态度，就算过去他把我的意见及态度批评得一无是处，我还是愿意冷静地与他讨论。如是针对我的谬见，他愿意彻底说服我的话，我也很乐意低头认错。^①

杨逵致力于文联改革和团结的胸怀与诚意，从中可见一斑。他在自身生活拮据的情况下，仍然惦记着如何为文联排忧解难。他真诚地提出，如果文联缺少明信片邮资的话，他愿意负担其中的五分之一。

对于杨逵与张星建之间因选稿问题衍生的风波，台湾文艺联盟本着息事宁人的立场，也曾发过一则公告：

张星建君和杨逵君都是文联的重要份子，但却不是指导者，指导部是常委会，两君均不是常委，也不是执委，两者的冲突是个人的冲突，深望诸同志谅解。

两君的冲突均为极爱文联而发生，所以本部对此事件，于上月廿六日的常委会已决定解决方针了。^②

^① 杨逵：《个人想法的修正与两三个愿望》，写于1935年7月3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57—558页。

^② 《公告》，《台湾文艺》第2卷第7号，1935年7月，第196页。

然而,过于庞大的组织以及指导部门工作的迟缓,加上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的分歧,台湾文艺联盟的分裂终究难以避免。有感于《台湾文艺》编辑经历的是是非非,有感于文艺工作者热情消退、台湾又没有足以鼓起读书欲的刊物,加上眼见文联组织松散,难有作为,杨逵自觉留在《台湾文艺》已无法发挥作用,遂决意创办一份《台湾新文学》杂志:

我经过了千思万虑,而所获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著适应台湾的现实底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们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励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记。^①

《台湾新文学》于1935年12月28日在台中创刊,由杨逵与叶陶独资创办。创刊号在“启事”栏表明:“本杂志不属于任何流派,任何团体的机关,本杂志是全台湾文艺同好者的共同舞台。”

为了避免重蹈《台湾文艺》由少数人把持的局面,《台湾新文学》中文栏目委托赖和负责,诗稿由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等“盐分地带”的诗人编辑^②,日文栏目则以杨逵本人及其他编辑委员会分担负

^① 杨逵语,原载《台湾新文学》创刊词(日文),1935年12月27日;引自王诗琅:《台湾新文学杂志始末》,《台湾文学重建的问题》(王诗琅选集第5卷),(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82页。

^② 盐分地带文学是以台湾省台南县佳里镇这一地域的地理特点而得名的,是人们对这一地区作家文学活动的概括,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台南县佳里镇,地处台湾海峡之滨,此地土质含盐量较大,被称为“盐分地带”。这一地区多出文学人才,从30年代开始,涌现出吴新荣、郭水潭、徐清吉、王登山、林精纯等一批作家,被称为盐分地带文学“五大将。”

责。列名《台湾新文学》编辑部的还有高桥正雄、田中保男、藤原泉三郎、藤野雄士、黑末驱子等日本作家。《台湾新文学》的选稿原则十分开明,只要是支持民族自决,追求民主、自由,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写的稿件都加以采用。当时在《台湾新文学》杂志上投稿并发表作品的作家,从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之初五位常务委员中的赖和、赖庆、赖明弘,到杨守愚、黄病夫、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李祯祥、叶荣钟、王诗琅、张文环、吕赫若、吴浊流、翁闹、陈华培、陈瑞荣、徐琼二、张庆堂、林越峰、蓝红绿、周定山、庄松林、杨松茂、黄得时、蔡秋桐、赵枋马、朱点人等等,除了张深切、张星建、刘捷未向《台湾新文学》投稿以外,几乎包括了当时台湾文坛台籍与日籍重要的左翼作家,地域涵盖台北、台中、彰化和台南等日据时期北、中、南三大文学阵营。

《台湾新文学》的创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出刊后不到两星期就销售一空;同仁人数已经超过原来预定的五十人,杂志读友也超过预定数量的二十人。这足以证明民众对文学的关心与响应,也让杨逵为之振奋。

《台湾新文学》在《台湾文艺》之后创办,两者皆活跃于30年代中后期,而且执笔的作家也雷同,但《台湾新文学》还是以它的鲜明风格而独树一帜。

首先,《台湾新文学》始终以“为人生而艺术”作为办刊宗旨,以反映台湾穷苦大众的生活现实为依据,主张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强调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比起《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所提倡的明确文艺主张,以及它更富有写实精神、更关注台湾社会现实生活的编辑路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台湾新文学》不仅刊登了大量具有社会写实精神的重要作品,诸如在30年代台湾文坛颇具影响的《田园小景》(杨逵)、《豚的生产》(张文环)、《逃逸的男人》(吕赫若)、《一个同志的批信》(赖和)、《水月》(吴浊流)、《罗汉脚》(翁闹)、《迈向绅士之道》(蓝红绿)、《婚事》(徐琼二)、《王万之妻》(陈华培)、《年关》(张庆堂)、《乳母》(周定山)、

《鸭母王》(庄松林)、《橄榄》(黄得时)、《王猪爷》(蔡秋桐)等等,它还在创刊伊始,就设置了“乡土素描”和“街头写真”栏目,全力推举直面台湾现实社会的报导文学。

1937年2月至6月间,杨逵连续发表《谈报导文学》、《何谓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问答》三篇文章,并于《台湾新文学》第二卷第四号上刊登《募集报导文学》的启事。杨逵对报导文学的理论界定,是“笔者以报导的方式,就其周边、其村镇,或当地所发生的事情所写下来的文学。”^①报导文学与普通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极为重视读者;第二,以事实的报导为基础,不容许凭空虚构;第三,笔者对应该报导的事实,必须热心以主观的见解向人传达;仅罗列事实而缺乏作者感情,不算是文学艺术。^②1937年开始确立报导文学理论基础的杨逵,在此前后发表的《台湾震灾地慰问踏查记》、《逐渐被遗忘的灾区——台湾地震灾区劫后情况》、《我的书斋》、《摊贩》、《输血》等作品,可以视作作者本人对报导文学理论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

杨逵虽然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但他非常重视中文创作,渴望继承民族传统。《台湾新文学》作为中日文创作并刊的杂志,尽管它与《台湾文学》后来也同样面临着中文作品短缺的命运,但《台湾新文学》在坚持中文栏目、提升中文作品的品质方面,比《台湾文艺》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直面现实态度。

有感于“汉文凋落之久,隔了很久,执笔者诸氏以崭新的意气与诚挚,打破沉默,卷土重来以显示其力量”,^③杨逵与编辑部同仁积极策划、多方动员,于第一卷第十期第十二月号的《台湾新文学》,专门编辑了《汉文创作特辑》,刊登有赖贤颖的《稻热病》、尚未央的《老鸡

^① 杨逵:《何谓报导文学》,原载《台湾新民报》1937年4月2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03页。

^② 同^①。

^③ 《编辑后记》,见《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

母》、马木历的《西北雨》、朱点人的《脱颖》、洋的《鸳鸯》、废人的《三更半暝》、王锦江的《十字路》、一吼的《旋风》等八篇小说，执笔作家皆为一时之选。然而，这一动员了当时最活跃的作家所写的具有相当水准的作品集，却在刚刚付印提出审查时，由于其鲜明的反殖民精神，以及文字使用上对日本“同化政策”的挑战性，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厉查禁，理由是“内容不妥当，全体空气不好”。这种结局，不仅仅是佳作尚未面世，竟告胎死；也是充满现实精神的中文小说在当时文学杂志中的最后一次编辑。所有报刊的中文栏目，在1937年春天以后接踵而来的废止汉文栏的行动中，都遭遇了被迫停办之命运。

其次，杨逵身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的阶级意识，使《台湾新文学》具有浓郁的左翼色彩，并以开阔的胸怀，与日本普罗文学界保持了密切联系。《台湾新文学》创刊号在《台湾新文学的期望》一栏中，刊登了德永直、叶山嘉树、前田河广一郎、贵司山治、细田民树、桥本英吉、藤森成吉、平林泰子等十七位日本左翼作家的感言。《台湾新文学》杂志中，不仅可以读到日本进步文艺界主办的《文学评论》、《社会评论》、《高尔基文集书简集》、《文学案内》、《诗人》中的文章，读到德永直、平田小六、叶山嘉树、渡边顺三、林房雄、洼川稻子等作家的作品，还能看到《时局新闻》周刊、《土曜日》、《公民常识》、《太鼓》、《劳动杂志》、《实录文学》的广告或销售服务。^①《台湾新文学》倾力介绍大陆、日本、苏俄的现实主义作家，它所刊登的《高尔基特辑》、《悼鲁迅》、《大文豪鲁迅去世》等文章，都表明了该刊所拥有的广阔视野和左翼色彩。

再次，《台湾新文学》在培植文坛新人方面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充

^① 参见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台北）全球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第206—207页；尹子亚：《杨逵〈台湾新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附录《〈台湾新文学〉杂志广告一览表》，《第一届全国台湾文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3—184页，第189—191页。

实台湾的文学环境。杨逵“相信台湾文坛的未来与其只有两三个有名的作家,不如让众多无名作家担负”,^①故将拔擢本地无名作家当作刊物的重要任务。《台湾新文学》多次筹措经费,举办“台湾新文学赏”及“全岛作家竞作号”征文活动,并限定只有新人才能参加“悬赏原稿募集”,给予新秀登临文坛的重要机会。著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即是由此崛起。其处女作《水月》发表于《台湾新文学》第二期(1936年3月),另有《泥沼里的金鲤鱼》入选“台湾新文学赏”佳作,并刊登于《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五号(1936年6月)。

1937年以后,在“皇民化运动”日趋喧嚣的局势下,台湾总督府图谋于4月1日为期限,一举废止全岛新闻的“汉文栏”。在《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栏目后,惟有《台湾新民报》一家延至6月始废。

面对台湾总督府的高压政治,杨逵自知停办汉文栏势在必行。他对此保持了清醒的无奈:

日本统治当局为了消灭台胞的民族意识,于是勒令废止报纸和所有杂志的中文版,“台湾新文学”出版最后一期时,即收到取消“汉文栏”的命令,没有了“汉文栏”,“台湾新文学”的存在意义也等于丧失,加以当时整个台湾的文化活动几乎为“皇民化运动”所淹没,于是便停办了“台湾新文学”。^②

1937年6月15日,发行至第二卷第五号的《台湾新文学》,在

^① 见《编辑后记》,《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5号,1936年6月。

^②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中心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页。

“编辑后记”中说：

汉文栏以此号为止不得不废止。对于只用汉字写作的人和只读汉文的人毋宁是悲哀，但我们也十分感慨。然而汉文作家诸君也不必因而退缩。跟以前一样投稿的话，我们会找到适当的译者予以翻译之后发表，希望更加专心写作吧！

此时的杨逵，不仅承受巨大的政治高压，经济上也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双重的厄运使《台湾新文学》在这一期之后不得已停刊。为了杂志的再生，杨逵于1937年6月底专程赴日，以期寻求日本左翼文学界的支持。终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突变，杨逵所有计划落空，自己也遭警察跟踪拘捕。杨逵与叶陶用心血生命浇灌的《台湾新文学》园地惨遭挫败，永远失去了再生的机会。

《台湾新文学》从1935年12月28日创办，到1937年6月被迫废刊，除查禁号之外，一共发行了十四期，另有《台湾新文学月报》两期，历时一年半。关于《台湾新文学》以及《台湾文艺》对台湾文坛的贡献，日据时期的著名作家黄得时有着高度评价：

《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的寿命不过三年而已，可是在这短短的三年之中，所获得的效果，比过去十几年的效果都来得大。堪称在台湾文学史上划下一段光辉灿烂的时期。^①

① 黄得时：《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原载《台北文物》3卷2期、3期、4卷2期；收入李南衡主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台北）明津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23页。

对此,杨逵也有着完全的认同:

“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那三年,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有了十分丰硕的收获,而且更赢得广大读者的关心与支持,形成一股新的社会运动力量,普及到整个社会。^①

二、1945:《一阳周报》与三民主义理想

杨逵光复后的文学出发,首先是从文学刊物的创办与编辑起步的。

受到台湾光复的巨大鼓舞,台湾各地纷纷出版报刊,创办国语讲习班,举行文化座谈会,开展演讲、美展、演剧等文化活动,其中又以期刊杂志最为活跃。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于1945年11月23日公告,要求已发行的报纸二十日内办理登记手续,“到1946年1月底为止,光台北市一地的报纸加上杂志的申请登记者就有三十九家;到5月底为止,登记的报纸与通讯社共计二十一家。”^②“民间与政府各机关单位竞相出版刊物的情况,持续到1946年上半年,也是杂志发行最为蓬勃之时期”^③。据旅美台湾学者叶芸芸女士统计,1946年

^①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6—37页。

^② 参见吴纯嘉:《人民导报研究(1946—1947)——兼论其反映出的战后初期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之第一章《日治时期到战后初期(1945—1947)台湾报业情形》,(台北)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9年7月,第55页。

^③ 何义麟:《战后初期台湾出版事业发展之传承与移植(1945—1950)》,《台湾史料研究》第10号,1997年12月,第5页。

夏天,台湾以各种方式存在的报纸杂志,多达八十种左右;1945年至1949年间,台湾出版的期刊杂志有四十三种。^①这期间,台湾“知识分子的昂扬自信与文化界之生气勃勃,是战后初期台湾予人深刻印象的景观,也是台湾历史上,文化界难得一现的黄金时代。”^②

身为台湾文学园地的园丁,杨逵对文学刊物的创办一向情有独钟。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在短短的三年半时间里,从创办《一阳周报》开始,杨逵光复以后自己创办、参与创刊和担任编辑的报纸期刊乃至出版社多达七种,其对战后台湾的文坛重建与社会改革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庆祝“一阳光复”,杨逵马上把自己在日据时期经营的“首阳农园”改名为“一阳农园”。意识到教育民众、唤起民众的迫切需要,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节衣缩食的杨逵于1945年9月购买了手转轮印机,准备创办新刊物。

1945年9月22日,杨逵在台中市创办了《一阳周报》,这是战后台湾最早出现的中日文合刊的刊物之一。它是一本三十二开的薄薄的小册子,用白报纸印行,每期二十四页,逢周六出刊,同年11月17日出版第九期后停刊。《一阳周报》在林幼春之子林培英和李崇礼之子李君晰的资助下,以刻钢板、油印的方式得以出版。当昔日农民组合及文化协会的朋友们来看望杨逵的时候,杨逵用誊写版出了第一期的《一阳周报》,并把它分送给朋友们,向他们提供讨论的素材。

杨逵创办《一阳周报》,旨在“介绍国父的思想和三民主义,把台湾建设成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模范省。”^③以介绍祖国的革命理想和文学作品为宗旨,传达了杨逵对于战后台湾的社会命运与道

① 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台湾知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3—68页。

② 同①,第63页。

③ 杨逵:《我的三十年》,原载《联合文学》第1卷第8期,1985年6月1日。

路抉择的强烈关注。

台湾光复以后,长期处在被奴役、受歧视的殖民地子民的地位,一旦得以挣脱,台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使命感空前高涨,他们的济世情怀很快被三民主义的前景所吸引。“当时之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三民主义》,满怀抱负与热情,努力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比之日据时期,知识分子更形活跃。”^①在言必称三民主义的光复初期,随手翻阅当时的台湾报纸,“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口号就会跃入眼帘。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前,各地知识分子热烈响应并参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也足以证明孙文的三民主义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号召力。1946年6月16日,由游弥坚、许乃昌、陈绍馨、林呈禄、黄启瑞、林献堂、林茂生、罗万、杨云萍、陈逸松、苏新、李万居等日据时期政治界、文化界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台湾文化协进会”,并创办促进两岸交流和台湾重建的刊物《台湾文化》。该会在成立大会宣言的结尾呼吁道:“建设民主的台湾文化、建设科学的新台湾、肃清日寇时代的文化遗毒、三民主义万岁。”^②

杨逵更是首当其冲。他是战后省籍作家中最活跃的左翼文化人士,也是最早意识到台湾回归祖国后与中国政治接轨的先行者。《一阳周报》自然成为最早宣传三民主义理想的有力阵地。

由于《一阳周报》大多已经散佚,人们多从仅存的《一阳周报》第九号《纪念孙总理诞辰特辑》(1945年11月17日发行),来透视其刊物之宗旨、内容与走向,以及杨逵本时期思想之脉络。这一期刊物,前后共二十四页,封面印有孙中山的照片,并刊载了本期的文章目录,其内容为:

① 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的台湾知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3页。

② 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8页。

纪念 孙总理诞辰	杨逵……2
纪念 总理诞辰	萧佛成……3
如何纪念 总理诞辰	郭泽如……4
纪念 总理诞辰的感想	陆幼刚……5
纪念 总理诞辰的两个意义	胡汉民……7
孙文先生传略(下)	……10
中国工人解放途径(二)	孙文……11
农民大联合(二)	孙文……13
中国革命史纲要(三)	孙文……15
三民主义大要	孙文……18
犬猿邻组(下)	杨逵……20
创造(二)	茅盾……23

我们还注意到,1945年至1946年,《一阳周报》出版批发售卖的书籍有八种,而对孙文思想的介绍,成为其重镇,且看这份出版书目:

- | | | |
|-----------------------|------------|-------------|
| (1)《三民主义演讲》 | 孙文著 | 1946年 |
| (2)《三民主义》 | 杨逵编著 | 1945年11月28日 |
| (3)《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美) | 包尔·林百克著 | 1946年 |
| (4)《日文小说选》 | 杨逵著 | |
| (5)《民族主义解说》 | 金曾澄著 | 1946年 |
| (6)《伦敦遭难记》 | 孙文著 | 1946年 |
| (7)《孙中山传》 | (美)包尔·林百克著 | 1946年 |
| (8)《新生活运动纲要》 | 蒋介石著 | 1946年 |

从上述情形可知,光复初期的杨逵是那么热切地宣扬三民主义新中国,渴望把三民主义介绍给台湾的民众,以便更好地继承先生开创的伟大事业,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杨逵发表于第九期《一阳周报》上的《纪念总理诞辰》一文,还特别冠以《纪念民族救星·民权斗将·民生总理·孙总理诞辰》的大字标题,从中体现的,正是杨逵以及同时代知识分子对孙中山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思想的崇尚。

事实上,杨逵对三民主义的接触与响应,早在东京留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是经由日文翻译来阅读,并由此打开了视野,了解到中国的国民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日据末期,杨逵在首阳农场组织焦土会,排演《怒吼吧!中国》的话剧时,据其长子杨资崩回忆,杨逵曾以三民主义教育青年:

年轻的有志一同的朋友成立了焦土会,每周一次集会。宗旨是:宁愿变为焦土也不愿皇民化!共同研究时事、文学、三民主义。爸爸以手头仅有的一本三民主义原版书向年轻朋友们宣传并讲解三民主义。这本书是原台大教授中井淳先生从广东带回来送给爸爸的。^①

根据钟逸人的说法,《一阳周报》中刊行的有关三民主义的学术论著,是那时在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任教的法律哲学教授中井淳、金关丈夫二位教授,因为要离台,无法把他们所拥有的中文书籍带走,遂表示愿意把书送给杨逵。杨逵将此事告诉钟逸人并恳请帮忙,钟逸人便透过日本军部的关系,借了两部卡车,到台北土城载

^① 杨资崩:《我的父亲杨逵》,原载《联合报》1986年8月7日,第8版。

回了一卡车半的书,其中不乏宝贵的珍本。^① 这本《三民主义》的原版书,还是日本教授当年从中国大陆华南各地的学校图书馆得到的。池田敏雄在1949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也曾记载当日他带着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到杨逵家里拜访,并将这些书交给叶陶,叶陶非常高兴;隔日,池田敏雄与杨逵又就三民主义相关书籍与小说的出版事宜进行了讨论。^②

由此可知,杨逵战后在《一阳周报》上宣传介绍有关三民主义的书刊,确曾仰赖于日本友人提供的资料。

《一阳周报》对三民主义理想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与光复后人必言三民主义的时代氛围有关系,也与杨逵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分不开。对于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及关注民生、民权、民治的政治路线,杨逵是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姿态来接受的,其改造台湾社会的理想与孙文的思想内涵发生共鸣,这使他当时对三民主义充满信心:

今日台湾要建设“民有民治民享而均富”的三民主义模范省,就要切实记住孔子在“大同篇”所表现的福利社会的构想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也要切实记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教示。

孙中山先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却是继承孔子的大同思想,以达到均富,福利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惜又可恨的是,孔子的“大同篇”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

^① 钟天启(钟逸人):《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15日版,第307页。

^② 池田敏雄:《战败后日记》,《台湾文艺》第85期,第186页。

念却被历朝帝王当做装饰品,有的悬在墙上,有的写在书本里,至今四千多年未见其实现。以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为目标的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已经廿九年了,不可以再彷徨,应立即整备体制急赶直追。^①

基于此,一心一意要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杨逵,马上行动起来:

战后我开设“一阳农场”,并发行《一阳周报》,我想宣传三民主义,印《三民主义》,但发生事件,没人要看《三民主义》,五千本都成废纸;朋友出了三万元,都成废纸。当时我对三民主义有“信心”。是因为国民党的第一天代表大会强调“扶助农工”,我在《一阳周报》予以介绍。^②

从《一阳周报》第九号(1945年11月17日)同时刊登孙文的《中国工人解放途径》和《农民大联合》两篇文章,也可看到杨逵对农工问题的高度关切。

透过《一阳周报》的编辑方向,也可以看到杨逵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对中国政情的理解程度。据杨逵次子杨建回忆,光复后杨逵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期望,二二八事件之前他跟叶陶都曾加入国民党。光复一年多后,官员贪污等事件不断暴露出来,后来又发生二二八事件,他就对国民党灰心了!没有再交党费,就自然退

^①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90页。

^② 杨逵语,见《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访谈录》,原载《美丽岛》第3期,1982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2页。

党了。事实上,杨逵对国民党当局逆三民主义路线而动的现象,早有警醒和担心。《一阳周报》第九期刊载的两篇文章,都触及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反民主的现象。例如邓泽如的《如何纪念 总理诞辰》和陆幼刚的《纪念 总理诞辰的感想》,在赞扬孙文的革命功业、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的同时,皆严厉地斥责了担负党国之责者,不但不能继承国父的伟大业绩,反而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陷党国于分崩残破之局,实在是愧对孙文与同胞。文章还呼吁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制裁独裁军阀,消灭革命障碍的残余,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

光复一个月,当台湾还沉浸在“未战而得胜”的欢庆氛围的时候,杨逵已难能可贵地意识到中国的“惨胜”及其将来社会重建面临的困难情势。他没有盲目地拥抱三民主义,而是期待“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期待人们彻底解决民权、民生问题,努力新建设,“才能达到美满的社会”。

在这一期刊物上,杨逵以编者身份所加的按语,也表明了他对战后台湾的时局所怀有的忧患意识和清醒态度:

未战而得胜的台湾光复,虽是可庆可祝、总是因此若抱着中国革命为如桌顶拿柑^①之安易感,那就惨了。光复了后的新建设目前多难、民权民生的彻底解决尚有多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全挂在我们肩上。夙夜少刻都不可撒谎、不可偷懒、不可楷(按:“楷”之误)油、始终一贯以总理的思想、斗志及为人当做罗针自检自规奋斗,才得到达美满的社会。^②

^① 台湾话文,意谓“易如反掌”。

^② 杨逵:《编者按》,原载《一阳周刊》第9号,1945年11月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11—212页。

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三民主义的热潮迅速消退,民众已开始用“三眠主义”来称呼“三民主义”。杨逵由朋友资助三万元印刷的五千本《三民主义》皆成废纸,创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想受到沉重打击,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情绪可想而知。

总之,《一阳周报》对于三民主义的推崇与宣传,寄予了杨逵的社会理想,渴望台湾的战后重建,期盼着一种和平、自由、民主的社会新前景,杨逵以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

三、1946:《和平日报》副刊及其编辑出版活动

1946年5月5日,《和平日报》在台中市创刊。

杨逵这一年的编辑生涯,主要围绕《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而展开,期间也贯穿了《台湾评论》的编辑工作与民众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和平日报》原为国民党军方报纸,由《扫荡报》扩充而成,总部设于南京。台湾版的《和平日报》由台中驻军《扫荡简报》改组而成,1946年5月创刊,但在系统上不受南京总社的指挥,而是直接隶属于“国防部宣传处”。该报社长李上根^①,以及后来来到台湾参与领导《和平日报》的陈正坤(改名陈洗)、张熙本等人,有意利用来台进步青年加盟,大胆揭露抨击陈仪当局施政,这除了以哗众取宠拉拢当地的文化人扩大实力之外,更隐藏了军方及国民党“黄埔系”同陈仪所凭倚的“政学系”之间的派系倾轧,企图利用民众对陈仪当局的不满情绪来制造舆论,以便取而代之。

^① 李上根,浙江东阳人,抗日初期中央军校三分校十六期毕业,曾任军事记者及台中《扫荡简报》负责人。参见王思翔:《台湾一年》,收入周梦江、王思翔著《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2页。

李上根遂聘任大陆来的进步青年楼宪^①为经理,又邀请大陆来台湾的进步青年王思翔^②以及表兄弟周梦江^③,分别担任主笔和编辑主任。这三位文化人士于1946年一同赴台,均有左翼思想倾向。据周梦江在《台湾一年》中回忆:“当时我们名义上虽为国民党员,但楼宪早年参加‘左联’,追随过鲁迅先生。王思翔和我则是在家乡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而逃到台湾来的。因此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深为厌恶,对共产党较有好感。”^④

《和平日报》发行量约一万二千份,经费上也未能得到南京总社的支持,必须走“以报养报”的道路。为了争取社会读者与地方名流的支持,楼宪、王思翔、周梦江上任后,专程拜访了台中政治文化界的一些名人,诸如已息影家园的老一代社会运动家林献堂,市议会会长黄朝清,市图书馆馆长庄垂胜和研究员叶荣钟,三民主义青年团台中负责人张信义,作家杨逵和张文环,实业家张焕珪等等。

《和平日报》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虽然是国民党军方的机关报,却能与具有台共身份的谢雪红合作,谢雪红借此机会安排身边的杨克煌、林西陆、蔡铁城等进入报社工作,以扩充其影响力。周梦江曾谈及这种情况:我们欢迎谢雪红的支持,报社绝大多数人员都是谢氏介绍的。如谢氏的助手以后出任台盟秘书的杨克煌,来到报社任日文编辑科长;一位曾在农民协会工作的林西陆出任副总经理。此外编辑、记者以至一般职工几乎全是谢氏介绍的,报社还聘请她为顾

① 楼宪,1908年生,笔名尹庚,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台中二中校长。

② 王思翔,笔名张禹,浙江平阳人,1922年生。1945年秋,因在杭州《东南日报》揭发平阳县县长贪污罪行,被指为共产党头目而逃亡。1946年春天来台,是中国民主同盟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地下活动时期的成员。出版通讯《台湾二月革命记》、通俗读物《我们的台湾》、杂文集《台湾旧事》、《从心随笔》等。

③ 周梦江,1922年生,原名周大川,浙江平阳人,与王思翔为表兄弟。

④ 周梦江:《缅怀谢雪红》,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19页。

问。

就在此时,王思翔他们邀请了杨逵担任《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杨逵加盟“新文学”副刊,是与他在大陆文艺界的文学声誉分不开的。其代表作《送报伙》于1936年4月被胡风收录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并在大陆文化界有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外省知识分子来台后,仰慕其名其文,纷纷拜访杨逵,杨逵也与他们之间展开文化交流。王思翔在《忆杨逵》一文中就曾提到,1946年春天他刚到台湾,便设法托人邀见杨逵。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王思翔等人来自大陆的左翼文化色彩,以及他们的办报动机和编辑理念,颇能引起杨逵的共鸣与认同。

《和平日报》创刊伊始,即开设综合性文艺副刊“新世纪”、青年专刊“新青年”、妇女专刊“新妇女”、纯文学专刊“新文学”、趣味性的“周末版”等副刊栏目。之后又陆续增加了“每周画刊”、“新时代”等等。《和平日报》的核心编辑们有意仿效上海《大公报》的“大捧小骂”策略,在社论和国内新闻处理上,尽量配合军方的反共立场,新闻电讯全部取自官方的“中央通讯社”,以保证不出大的“问题”;而在省内的社会新闻版和副刊栏目上,则以抨击时弊、揭露陈仪政府的专断腐败的指向,鼓吹和平、民主、繁荣的理想,力争成为民众喉舌为特色,这使得原本为军方报纸的《和平日报》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向,一跃而成为除《台湾新生报》之外的台湾第二大报。^①今天看起来:

王思翔等人的真正动机则是鼓吹“民主思潮”,他们在副刊“新青年”、“新妇女”、“新世纪”与“新文学”从事这样的文化工作,并刊登大陆的文艺作品,将三十年代以及抗战时期充分发展的“现实主义”文艺美学带进台湾,作为台湾现

^① 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62页。

实批判的利器。^①

杨逵加盟《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编辑工作的时候,堪称家徒四壁,叶陶以沿街叫卖小百货维持生计,夫妻两人经常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出入于社会活动场所。杨逵与周梦江交谈时,因为杨逵只懂得闽南话和日本话,每次都要经稍谙北京话的叶陶来翻译。在周梦江的极力劝说下,杨逵先任中文编辑,因语言障碍,自觉无法胜任而请辞的杨逵,后来又担任日本版编辑。

《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自1946年5月创刊至同年8月9日停刊,共出刊十四期,历时约三个月,为中、日文并刊。该副刊的编辑方针,特别体现了杨逵及其同仁们的文学理想,那就是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孺慕之情,渴望两岸的文化交流;以国际主义文学情怀,关注着世界文学特别是普罗文学的发展态势,以强烈的当下关怀精神,不断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现状与发展提出建言。

《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致力于中国文学及文化传统的介绍,让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祖国大陆的整体形象。与此同时,该栏目特别注重通过弘扬五四运动所揭橥的民主、科学精神,试图建立战后台湾的新文化论述。郑振铎的《覆书》、丰子恺的《艺术与革命》、艾青的《诗人》、《关于诗》,老舍的《储蓄思想》、何其芳的《工作者的引见》、《叫喊》,臧克家的《假诗》、陈残云的《走人民的道路》、刘白羽的《饥馑》、郭沫若的《慈悲》、靳以的《给赛珍珠女士》、许杰的《献身文学的精神》、王思翔的《纪念屈原》等篇章,从诗歌、散文、小说、书信到评论,不仅文体形式多样,多为大陆著名作家执笔,且内容多带有左翼色彩。其他像《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宣言》、《慰问上海文艺界书》、《山城文坛漫

^① 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04页。

步》等文章,及时地将内地文坛信息传递给台湾,特别是引进了一种思想上受民主主义指导、提倡走进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美学,构成了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在台湾的传播现象。

二是热衷于世界文艺的传播,给台湾文坛打开新的视野。从英国诗人雪莱、霍斯曼,到保加利亚的伊凡·威佐夫;从法国作家纪德,到俄国的托尔斯泰、拉甫涅列夫、葛洛斯基;特别是德国女版画家珂勒维支、俄国的高尔基,对于那些倾向于批判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新文学”副刊都给予热情的介绍和评价。这其中,仅与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相关的就有《高尔基之家》、《苏热烈举行“高尔基纪念周”》(塔斯社讯)、《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茅盾)、《高尔基的小说》(艾芜)、《关于写作》(高尔基语录)等五篇,足以见得杨逵对于普罗文学的信奉与崇尚。

三是立足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反思、现实关怀与前景展望,突出了台湾新文学的重建意识。楼宪、张禹的《一个开始·一个结束》、竹林的《应该来个文学运动》,特别是杨逵的《文学重建的前提》、《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两篇文章,直面光复一年后台湾的社会症结与文坛现实,诸如台湾新文学停顿的主要原因在于包办主义、语言问题、文艺园地缺失、文化交流受阻、文艺工作者团结不力等五个问题,并呼吁文艺工作者自发组织起来,以形成自主、民主的团体,并与全国文联合作,以便重建台湾文坛,以左翼的现实主义推动战后台湾新一波的文学运动。

1946年8月9日,《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刊出了最后一期。

1946年10月13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为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特地向全国各地发出文告。台湾也同步参加了这次活动,各类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共达三十多篇。其中,由台湾的左翼进步人士杨逵、谢雪红、杨克煌等人,与大陆来台湾的进步文化人士王思翔、周梦红、楼宪等人共同合作的《和平日报》的几种副刊,表现

得最为热烈。它连续几天推出纪念鲁迅专辑,从木刻、版画,到纪念文章,诸如许寿裳的《鲁迅和青年》、胡风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杨逵的诗《纪念鲁迅》、颖瑾的《鲁迅先生传略》、黄荣灿的《中国木刻的保姆——鲁迅》、秋叶《我所信仰的鲁迅》,以及黄荣灿的《鲁迅先生遗像》、耳氏《母女》、陈烟桥《高尔基与鲁迅》等版画作品,计有十六篇(幅)之多。

由于《和平日报》的进步倾向,该报后来被迫改组。报社副社长张煦本也曾谈道: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台湾和平日报因被当时的台湾行政官公署认为不能作充分的配合,颇有难以为继之势,我受台湾社长的邀请,受聘为和平日报复社长兼总编辑……(中略)我,到了台湾以后曾在编辑方针上做过相当的修正,以消解行政长官公署方面的误会。^①

《和平日报》改组后,楼宪、周梦江离开了报社,王思翔苦苦坚持到1947年3月,并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于3月2日主编了《和平日报》“新世纪”副刊最后一期(一百二十三期),并登载有纪弦新诗《虚无主义》、《故乡》与《窒息》等三首。3月8日,一度停顿的《和平日报》重新出刊,针对“二二八事件”刊登《省处理会告全国台胞书》,并冠之以醒目的标题:“这件事动机单纯/完全出诸爱国热情/要求肃清贪官污吏刷新本省政治/不仅不排外并且欢迎外省同胞合作”。3月12日避居台北的原报社社长李上根与发行人韦佩弦重返台中,接掌报社,正式发行《和平日报》的“台北临时版”,王思翔遂告假还乡。没有了左翼编辑力量支撑的报纸很快失却了原有的进步风格。《和

^① 张煦本:《工作在浙西及台湾》,《扫荡二十年——扫荡报的历史记录》,(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78年11月,第30页。

平日报》的“台北临时版”发行不久，也遭遇了停刊命运。

《和平日报》创办期间，与其有着“兄弟刊物”关系的《新知识》月刊也于1946年8月15日创刊，发行人张星建，主编为王思翔、周梦江、楼宪，由中央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实际出资人是张焕珪。这份刊物，实际上是“一份由台湾文化人士出资，而由文化人出面组稿的综合性刊物。”^①

《新知识》创办的缘起，是因为王思翔、周梦江等人在《和平日报》报社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来自大陆的报刊，其中有不少与官方持不同观点但很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是一般台湾人所无法接触的，因此“萌发了办一份刊物的念头，想把这种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文章和资料选载或摘录成辑，公开发行。”^②这一想法得到了谢雪红、杨克煌等人的支持，有说谢雪红还变卖了一副首饰资助出版。

《新知识》三分之一为新发表的文章，其余为选录转载的文章，其内容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和社会真相披露。据王思翔回忆，《新知识》“以介绍祖国大陆各报刊有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重大问题的言论为主，试图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钳制封锁，可是因政治色彩太浓，一印成就被查禁了，只由印刷工人偷出几百本散发给熟悉的读者。”^③

杨逵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编辑工作，但他与这种刊物的核心编辑王思翔、周梦江、楼宪关系密切，有着《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历史渊源和同道志向，因而持续与该报编辑群合作。杨逵在“二二八事件”之前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标志了他战后初期理想信仰受挫、思想认知转折的文章《为此一年哭》，就发表于《新知识》创刊

① 秦贤次：《〈新知识〉导言》，原载《新知识》第1期，1946年8月15日。

② 王思翔：《台湾一年》，收入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28页。

③ 张禹（王思翔）：《一幅半个世纪前的插图》，原载《江淮日报》1994年9月16日；收入《从心随笔》，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20—121页。

号。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漫漫长夜,杨逵是那么急切地盼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首阳农园的“隐士”气节,“焦土会”的抗争志向,收听日皇投降广播时的欢喜若狂,让杨逵一次次经受了时代情感的巨大洗礼。台湾光复后,为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杨逵办刊物、写文章,四处奔走,多方努力,致力于台湾新文学的重建。但光复一年的社会现实又是如何呢?

《为此一年哭》写得情真意切,声泪俱下:

很多的青年在叫失业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猪母乳”炒菜补,死不死生无路,贪官污吏拉不尽,奸商倚势欺良民,是非都颠倒,恶毒在横行,这成一个什么世界呢?

说几句老实话,写几个正经字却要受种种的威胁,打碎了旧枷锁,又有了新铁链。结局时间是白过了,但是回顾这一年间的无为坐食,总要觉着惭愧,不觉的哭起来,哭民国不民主,哭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宝贵的一年白费了。^①

这种如此大胆地揭示了现实真相,针砭社会时弊的作品,杨逵将它投稿给《新知识》,《新知识》也在显著位置发表,可见杨逵对这个刊物的高度认同,以及同办刊人编辑方针之间达到的精神默契。杨逵在表达了自己失望、痛苦的情绪之后,誓言坚决追求民主自由:

“自今天起天天是争取民主日,年年是争取民主年。”我

^① 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9页。

坚决的想,不要再哭了。^①

在《新知识》仅出一期即被查禁之后,同年年底台中一家新的报社成立,《新知识》主编之一周梦江曾推荐杨逵应征编辑工作,却因为过去从事社会运动的历史,而不被当局录用。杨逵没有气馁,他很快开始了他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又一程出发。

杨逵在从事《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参与了《台湾评论》杂志社的工作。1946年7月1日,《台湾评论》月刊在台北市创刊,它由刘启光集资,林忠、丘念台、李纯青和周天启等人共同创办,一共出刊四期。

《台湾评论》的主编由李纯青^②担任,编辑为王白渊、苏新。是年,杨逵进入《台湾评论》杂志社。这是一份中日文合刊的综合月刊,稿源主要由李纯青在上海负责采集大陆民主刊物的文章来提供,苏新、王白渊实际负责台湾的编务工作。

上述创办人多为大陆返台人士,刘启光是日据时期农民组合的干部,在大陆时又与军统过从甚密。周天启曾是20年代活跃的左翼分子,担任过台湾文化协会的干部,后来曾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主

^① 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9页。

^② 李纯青(1908—1990),祖籍台湾,生于福建省安溪县,以后来往于海峡两岸。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组织部长,同年进东京大学社会系。翌年9月回中国参加抗战,先后在上海、重庆、香港任《大公报》主笔,负责撰写社评及专栏文章,为当时著名评论家。发动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为台湾光复预作准备。抗战胜利后返台参加受降典礼,并率记者团巡回全岛访问。1945年李万居创办《台湾新生报》之初,曾邀请李纯青担任主笔之一。主编《台湾评论》,1946年在台北出版评论集《献曝》。二二八事件之后,在上海报刊撰文声援,支持台湾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

编李纯青,是当时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光复后以《大公报》名义返回台湾,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从创办人的背景来看,《台湾评论》作为日据时期的左翼分子战后重新聚集而创办的刊物,在主编李纯青的思想主导下,明显的带有左翼批判精神。杨逵对这个刊物的认同和参与,与其参加过30年代农民运动以及左翼倾向不无关系,他针砭陈仪政府的文章《倾听人民的声音》即在该杂志刊出。从丘念台的《对台湾省政治的期望》、林忠的《台湾政治怎么才能明朗化》、刘启光的《反省、觉悟》等发表于1946年7月创刊号上的文章来看,“他们的诉求,主要还是基于三民主义实行地方自治,民生主义经济下允许的产业自治,同时不忘呼吁弥平省、内外的隔阂,而这些主张其实是延续了他们在重庆‘台湾革命同盟会’时期的建言。”^①

在《台湾评论》的创刊号上,李纯青因发表《中国政治与台湾》一文,公开赞扬共产党的新四军,很快遭到国民党党部的禁售处分,CC派省党部组委李翼中马上批评《台湾评论》“创刊号出,异党作品,赫然刺目,反动言论连篇累牍,余不胜骇然”。此事造成了一时轰动,原定价十五元的刊物,市价一下子涨到四十元。1946年10月10日,《台湾评论》苦苦支撑到第四期后,终于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勒令停刊。

杨逵没有因此停下自己的步伐,他时刻在寻找新的出击方向。

1946年间,杨逵在台中市大同路新北里存义巷十二号的住处,创立了民众出版社,发行人注明叶陶。预计出版“小说故事篇”四册,内容有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周定山的《愁光义·王仔英》、林荆南的《鸭血王》,以及杨逵的《送报伙》;“歌谣俚言篇”三册,内容包括《谢赖登歌集》、《陈君玉歌集》、《蔡德音歌集》;“常识论说篇”三册,主要由《宪政问答》、《民主问答》、《自治问答》组成。这种出版路向,不仅

^① 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 (台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40页。

体现了杨逵对台湾当下时局与社会发展前途的热切关注,而且凸显出杨逵对台湾新文学传统的薪传以及对民间文学宝库的发掘。

1947年1月,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由民众出版社出版,在封底广告上,列出了上述预计出版发行书目。但接踵而来的“二二八事件”,让台湾陷入动荡的时局,民众出版社原定的出版计划,也因杨逵同年4月的被捕入狱而夭折。

四、1947:《文化交流》与“中国文艺丛书”

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如何让遭受日本异族统治五十一年之久的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祖国大陆,推展良好的中国化路线,就成为外省籍与本省籍的作家、文人共同关心的议题。对于杨逵而言,文化交流,两岸互动,共同推进台湾战后的文化重建工作,更是他在编辑生涯中身体力行的奋斗目标。

1947年1月15日,在台中市图书馆长庄垂胜的大力支持下,由台中的中央书局董事长、实业家张焕珪出资,蓝更与^①为发行人,王思翔和杨逵出任主编,正式创办了《文化交流》。这是一本不定期辑刊,由于出资人和编辑没有大的变化,《文化交流》又被看作《新知识》的再生。鉴于《新知识》的失败,王思翔提议尽量少谈政治,涂上一抹温和的色彩,故定名为《文化交流》。刊物同仁包容了外省和本省的作家、文化人,大家团结一致,合作愉快,蓝更与不仅包揽了一切事务性的工作,还积极为刊物提供工作环境,杨逵与王思翔也成为两岸作家合作办刊的友好见证。

《文化交流》创刊时在《本社缘起》中写道:“在今日的台湾,一方面是旧的文化束缚已经解除,一方面是新的文化尚未能建立。”而要

^① 蓝更与,本名蓝运登,1912年生,台中人。台中师范学校毕业后赴日学画,曾任《台南新闻》文教新闻记者,战后一度从事制药业,晚年重拾画笔。

吸收新文化来实现战后台湾的重建，“这种工作不是少数人所能达成的，而赖于文化人与文化人间的交流合作，这交流合作不仅是本省文化人之间所必需，亦为省内外文化界之间所必需。”该刊同时刊登署名“冷汉”的文章《吵闹要不得——视文化交流发刊》，正是针对两岸文化有所隔阂的现象而发的。《文化交流》的发刊宗旨，如同第一期卷头语所说：“出版这个小册子的作用正如她的命名，是想在此时此地的文化尽一点交流的作用；因为文化是社会的产物，人与人之间，地与地之间，时代和时代之间，所有的文化都应该交流，才有发展，而交流须有媒触……”^①《文化交流》的封面由画家耳氏^②所描绘，画面是一个背上写着“台湾”的小孩子扑向胸前写着“祖国”字样的母亲怀抱的情景，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文化交流》所肩负的，是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重任，它意为为隔绝五十一年之久的海峡两岸搭建桥梁。这本刊物大半篇幅用来介绍祖国的历史、文物和文化活动，由王思翔组稿；小半篇幅用来介绍台湾文化，由杨逵负责。第一期刊物的文章内容相当丰富，重在两岸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王思翔托台北的朋友向台湾省编译馆馆长、鲁迅先生的好友许寿裳要来一篇回忆孙中山和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交往情况的文章，并组织了凤炎（周梦江）所撰《台湾史话》、江灿琳的《台湾民谣史》等文章；杨逵除了翻译鲁迅的作品，也特别重刊了赖和的《查大人过年》与林幼春的《狱中十律》等遗稿。他还赶写了《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幼春不死！赖和犹在！》、《阿Q画圆圈》等文章，发表在第一辑上，并集中刊登了虚谷、少奇、南都、衡

^① 《卷头语》，原载《文化交流》第1期，1947年1月15日出版。转引自叶石涛《接续祖国脐带之后》，收入《走向台湾文学》，（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6—17页。

^② 耳氏，本名陈廷诗（1916—2002），生于福建长乐官宦世家，八岁因病而失聪。战后随军来台，曾服务于报社及图书馆，1958年后专业从事创作，为台湾著名现代版画艺术家。

秋、笑浓、渭雄、云鹏、石华、克士、守愚等台湾作家所撰写的《哭懒云兄》等悼念诗文。“杨逵之所以努力于介绍二三十年的历史，却是为了一个理想，希望台湾的文学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留下的废墟上复活过来，迅速走上新的发展道路。”^①

《文化交流》第一辑出版后，杨逵曾专程到台北，向他所熟悉的本省文化界朋友征集意见，邀约稿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王思翔也约请大陆来台的知名作家写稿，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第二辑很快编好，内容也更加充实了。当时，杨逵家境非常困难，但他为了两岸的文化交流，四处奔波征集稿件，专心致志地写作和编辑，却从来不计报酬，不言辛苦。

1947年2月，《文化交流》第二辑稿子编校完毕，正在排版印刷之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在高压政治和动荡时局中，王思翔、周梦江、楼宪相继逃离台湾，庄垂胜遭受当局迫害而愤然辞职，杨逵也不幸身陷囹圄，仅出了一辑的《文化交流》，很快就夭折了。

1947年的杨逵，在文化战线上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台北华东书局合作，开始编印出版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

战后初期，知识分子最大的课题是台湾的复兴和文化的重建，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语言问题。当时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曾经谈道，“当地做工作很困难，最大的障碍乃是语言的沟通；因为台湾同胞皆讲日本话，读日本文，有关国语、国文，程度甚低。现在为此事贯注力气，但效果几乎还没有。”^②

杨逵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于“中国文艺丛书”的翻译和编印，是与台湾的国语普及运动分不开的。当然，它也包含了杨逵推广平民文

^① 张禹：《忆杨逵》，原载《清明》，1980年第3期；收入《从心随笔》，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7页。

^② 下村作次郎：《台湾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收入《台湾文学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3页。

学、提升大众知识水平的热望。

另一方面,编印“中国文艺丛书”,与杨逵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的初衷不无关系。在台湾政治形势日趋紧张背景下,对带有五四文化精神和左翼色彩的进步文学作品的弘扬,也让杨逵的文学编辑活动有一种时代的自觉意识:

当时许多团体被破坏了,大多活动进入地下了,与共产党有些接触。我当时心想不能进入地下,否则文学活动会丢掉;另外我不愿离开台湾,应该继续贡献家乡,所以创办《中国文艺丛书》,翻译鲁迅、老舍、郁达夫、沈从文的作品。我希望以翻译改进汉文能力,并以日汉文对照,使我们这辈人有学习机会,并接触先进作家作品。^①

杨逵希望台湾民众能够正确地认识祖国文化,更要培养它,弘扬它,以便把那真正的精华传播于世界。“为了达成这目标,我敢大胆说,过去在本省所发行的几种书籍,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此次,东华书局大大有感于此,毅然立了出版中国文艺丛书的计划。”^②

从1947年1月起,杨逵开始与台北东华书局合作,编印出版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

二二八事件后,杨逵夫妇于4月间双双被捕,8月释放回家。

出狱后的杨逵致力于文学翻译,大量介绍祖国大陆的作家作品,传播新文学的精神。“中国文艺丛书”陆续出版六辑,封面多为黄荣

^① 杨逵语,见《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访谈录》,原载《美丽岛》第3期,1982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3页。

^② 参见“中国文艺丛书”第2辑及第6辑苏维熊的《中日对照中国文艺丛书发刊序》,转引自下村作次郎《台湾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收入《台湾文学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5—36页。

灿所画。入选作家均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且多带有左翼文学色彩。其作品所突出的皆为强烈的反抗精神，表现了杨逵一贯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立场。其出版内容如下：

《阿Q正传》，鲁迅著，杨逵译，“中国文艺丛书”第一辑，1947年1月

《送报伕》，杨逵著，胡风译，“中国文艺丛书”第六辑，1947年10月

《大鼻子的故事》，茅盾著，杨逵译，“中国文艺丛书”第二辑，1947年11月

《微雪的早晨》，郁达夫著，杨逵译，“中国文艺丛书”第三辑，1948年1月

《黄公俊的最后》，郑振铎著，杨逵译，“中国文艺丛书”第五辑，1948年

《龙朱·夫妇》，沈从文著，黄燕译，“中国文艺丛书”第四辑，1949年1月

杨逵还译有中日文对照的《鲁迅小说》和《赖和小说选》两种，原定由东华书局出版，它们曾与《新闻配达夫》（送报伕）的广告同刊登于《台湾评论》杂志的封底，题为“中日对照，革命文选”，后来却因时局的急剧变化而未能正式出版。

五、1948：《台湾文学丛刊》与《台湾力行报》副刊

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时局变动，台湾新文学的重建道路显得更加艰难。因为二二八事件而坐牢一百零八天的杨逵，出狱后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更强烈地意识到台湾新文学重建的任重道远。1948年的台湾文学战线上，杨逵最重要的文学编辑活动与贡献，就是担任

《台湾文学丛刊》和《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主编。

1948年8月10日,《台湾文学丛刊》在台中市创刊,封面以“台湾文学”为题,版权页则注明为“台湾文学丛刊”。杨逵担任主编,发行人张欧坤,由台湾文学编辑部发行。出版资金由台北一位朋友全额支付,刊物广告中的华南银行董事长为杨逵昔日农民组合时期的战友刘启光(原名侯朝宗)。丛刊执笔人有编辑杨逵、守愚(杨松茂)、王锦江、俞若钦、郑重、廖汉臣、叶石涛、章仕开、洪野、鸿赓、欧坦生、陈涛、吕诉上、杨启东、林曙光、愁洞(蔡秋桐)、朱实(朱商彝)、张红梦(张彦勋)、扬风(杨静明)、黄荣灿、史民(吴新荣),还有译者萧荻等二十二位作家。其中本省籍作家十二位,外省籍作家十位。“杨逵集合不同省籍与世代的左翼作家,并将发行所定名为‘台湾文学社’,可见他亟思以此结合文学工作者,组织他所谓的‘自主、民主的’文学社团,并以集团的力量推展战后的台湾文学运动。”^①

《台湾文学丛刊》所收录的作品多为转载,其征稿原则为:

* 本刊欢迎反映台湾现实的稿子,尤其欢迎表现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动向的创作,报告文学,生活记录等。

* 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空洞梦幻的美文不用。

* 稿酬千字斗米计算刊出即可。^②

《台湾文学丛刊》是本薄薄的三十二开小册子,纸质非常差,仅出版了三辑,第一辑定价一百五十元,第二辑为二百元,短短三个月后发行的第三辑已涨至一千元。售价的节节攀升以及稿酬用“千字斗

^① 黄惠祯:《杨逵与战后初期台湾新文学的重建——以〈台湾文学丛刊〉为中心的考察》,收入《杨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6月。

^② 转引自林梵:《杨逵画像》,(台北)笔架山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148--149页。

米”来计算,充分反映了当时台湾物质匮乏、生活境遇困苦的现实,更显示了杨逵在贫穷中节衣缩食,也要坚守和追求自己精神信念的可贵品质。

《台湾文学丛刊》第一辑目录如下:

小东西	扬风……1(小说)
同样是一个太阳	守 愚……12(诗)
历史	王锦江……13(诗)
裁员	俞若钦……14(小说)
摸索	郑 重……21(小说)
台湾民主歌	廖汉臣……27(介绍)
复仇	叶石涛……30(小说)
黄虎旗	杨 逵……32(民谣)

《台湾文学丛刊》第二辑目录如下:

失学之日	邱 陵……1(版画)
却粪扫	杨 逵……1(童谣)
X 区长	章开仕……2(小说)
学店	洪 野……7(小说)
鹿港的渔夫	鸿 廉……10(诗歌)
文艺通讯	史 民等……10(通讯)
沉醉	欧坦生……14(小说)
漫画二题	画/张麟书、阿鸾 谣/杨逵……20
签呈	陈 涛……37

《台湾文学丛刊》第三辑目录如下：

农村曲	……1(歌谣)
民谣小论	朱 实……2(评论)
葬列	张红梦……3(诗歌)
漫画三题	画/张麟书、阿鸾 谣/杨逵……4
模范村	杨 逵……5(小说)

《台湾文学丛刊》问世的时候，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台湾知识分子，目睹官方高压政策下的社会现实和寂寞文坛，胸中有太多的情感郁积，愈发感到推展战后台湾文学运动的艰难性和重要性。从杨逵在《台湾文学丛刊》的编辑中可知，刊载作品或以台湾人民的抗暴事件为表现中心，或着眼于台湾历史的重构，或呈现战后初期的台湾社会现实，其中所彰显的，正是杨逵一贯提倡的文学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它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社会人生态度和文学理念。具体而言：

其一，针对战后初期一些来台的外省人对台湾历史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无知现象，杨逵有意通过丛刊作品的辑录，见证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压迫的历史，也凸显出赖和以降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

例如，廖汉臣介绍的《台湾民主歌》，是从清廷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奋起反抗，直到日军强行占领台北城为止。“台湾民主歌”正是台湾沦陷时，风靡全省的一篇可歌、可泣、可悲、可愤的“民间的史诗”。杨逵写的民谣《黄虎旗》，也反复讴歌了台湾人民反满抗日的决心。其小说《模范村》所塑造的阮新民形象，毅然与自己出身的地主阶级相决裂，走上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解放普罗大众的抗争之路，成为日据时期知识分子行动者的写照。蔡秋桐的《春日猪三郎摇身三变》，则在历史的观照中，以一位先后参

加社会运动、“皇民化运动”、国民政府筹备会的乡下保正“春日猪三郎”的形象,无情嘲讽了少数台湾人厚颜无耻、攀附权贵的奴隶性格。

1948年,杨逵在丛刊中刊载了史民(吴新荣)的《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把构建台湾新文学运动史当作重要课题,一如文中所说:

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赖和路线可以说是台湾文学的革命传统,谈台湾文学,如无视此一历史上的事实便不是了解台湾文学。有人说台湾的过去没有文学,其认识不足才是笑话呢。^①

杨逵致力于台湾人民反殖民斗争历史和台湾新文学运动史的建设,是有其明确所指的。台湾光复时,有些来台的大陆人士以解放台湾的功臣自居,对台湾人民五十一年间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日斗争视而不见,而是一味强调台湾在经历了五十一年日本殖民统治后,存留了严重的奴化遗毒,当前的首要工作,就是清除这种遗毒。1946年间,陈仪政府曾以台湾人接受日本奴化教育为口实,阻挠台湾人自治与参政的权利。上述情形,也在无形中造成两岸同胞的隔阂乃至省籍的矛盾。杨逵在《台湾文学丛刊》中编辑刊载了上述作品,是从尊重台湾历史与文化的立场出发,让两岸知识界与民众加强交流与了解,对历史真相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后来在1948年《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中,杨逵通过《“台湾文学”问答》一文,仍然继续了这个问题的思考,文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基于希望永久殖民台湾的想法,自然以奴化教育为重要国策之一,但是台湾人奴化没有是另一个问题。他说:

^① 史民:《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原载《台湾文学丛刊》第2期,1948年10月8日,第12页。

部分的台湾人是奴化了,他们因为自私自利,愿做奴才来升官发财,或者求一顿饱。但这种人,在今日原是一批的奴才,他们的奴才根性,说因教育来,宁可说是因为环境。在帝国主义对封建主义控制下的这个孤岛上,自私自利的人都做得奴隶才得发其财。托管派、拜美派当然也是这一类的人。但大多数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湾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斗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证。^①

其二,《台湾文学丛刊》本着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直面台湾社会现实,批判腐败政权,抨击时弊,揭示社会不公现象,体现出台湾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

《却粪扫》叙述家境贫穷的失学儿童只能沦落到捡拾垃圾维持生活的悲惨命运;《营养学》这幅漫画,则描绘出细瘦如白鹭鸶的老师,在教导一群干瘪的学生,讽刺黑板上写着的“营养”二字是不能充饥的。《不如猪》的慨叹,竟是农民生养子女不如养猪卖钱划算!其他像《同是一个太阳》、《上任》、《勤》、《裁员》等作品,或大胆抨击了台湾现实社会中营私舞弊、攀亲援戚、假公济私的官场文化现象,或影射了国民党政府接收后的台湾民不聊生的景况。

特别是欧坦生的小说《沉醉》,是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描写一个在台北某机关当佣工的台湾少女阿锦,被从厦门去台湾宝岛“观光”的青年公务员杨先生所骗的故事。男方以结婚为诱饵,逢场作戏,始乱终弃,导致少女落入了失身怀孕的不幸命运。这篇小说最初首刊于1947年上海《文艺春秋》,编辑范泉认为它写得及时,写得好,真实

^①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

地“揭露了我们某一部分的祖国的同胞正在如何把轻佻与污辱抛给了这块新生的土地。”^①杨逵也高度称赞《沉醉》是“‘台湾文学’的一篇好样本。”^②

总的来看,杨逵编辑《台湾文学丛刊》,是集合不同省籍与世代的左翼作家,将重建台湾文学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在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经济压力下,尽管《台湾文学丛刊》只有发行三期的短促生命,但它对那个时代的见证和审视,却有着相当深远的文学意义。

1948年,杨逵的文学活动还主要表现在《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中。《台湾力行报》为青年军出身的张友绳^③顶让北迁的和平日报社而创办,工作人员也以青年军第一期的同学为主。1947年11月12日,以四开三日刊的形式创刊于台中市。张友绳于二二八事件后来到台中,听到被解散的《和平日报》档案资料和人员都还在,听从朋友建议,想办一个地方报纸。后来看到《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受到启发,特地开设“新文艺”副刊,1948年8月邀请杨逵出任主编,以培养台湾的青年作家。^④

从《台湾力行报》总体的编辑方向来看,何义麟针对《台湾力行报》的研究指出:“创刊词与许多表明该报立场的言论都强调,该报表明自身为三民主义信徒,反对共匪作乱的行径,呼吁为和平建国努力

^① 范泉评价,原载《文艺春秋》第5卷第5期,1947年11月;转引自横地刚:《范泉的台湾认识——四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文学状况》,陈映真编:《告别革命文学?》,(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89页。

^②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

^③ 张友绳,1922年生,浙江浦江人。抗战时参加青年军,曾响应国民党政府号召,赴新疆推动文化建设而遭逢伊犁事变。二二八事件之后来台,于台中办《台湾力行报》。四六事件时被警总侦讯。

^④ 参见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05页。

之重要。其言论显示,国民政府溃败之前,尚存在一些模糊空间,三民主义信徒可左可右,和平建国信念转换空间更大。因此,力行报社具有左翼人士活动的空间,但这也并不表明该社为左翼报刊。”^①何义麟给予《台湾力行报》的历史定位,是“延续了左翼思潮的地方小报”。

1948年8月1日起,《台湾力行报》改为日刊,并开设了十三种副刊栏目。杨逵主编的“新文艺”栏目于8月2日登台亮相,出刊以定期或不定期形式不断变换,1949年1月23日仍然刊出第三十八期,有可能延续到1949年“四六事件”杨逵被捕而中止。

《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其编辑方向十分明确,每期刊头都有主编杨逵具名的《欢迎投稿》。其曰:“欢迎各种投稿,没有内容的空洞美文不要。反映台湾现实,而表现着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动向的有报告性的文字,特别欢迎。”这符合杨逵一贯的办刊方针,他总是自觉地通过编辑活动,以文学再现台湾社会现实。这其中也体现着他对现实主义的、人民群众的普罗文学理念始终不渝的坚持。不管是反映民生之焦苦,百姓之抗争,还是抨击时弊,嘲讽现实,像《福?》、《荣归》、《鲁嫂》、《荒野哀歌》、《林湖大队》在这类《新文艺》副刊登载的作品,多表明了上述创作指向。杨逵还在该副刊发表《人民的作家》、《论反映现实》、《论文学与生活》等三篇文章,大力呼吁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杨逵在阐释了生活之于创作的意义,反映现实的重要意义之后,以充满不平之情的语言,尖锐地指出:

大家须要理解,天天在酒楼菜馆吃大菜的人有多少?
天天愁米愁衣的人有多少?而坐在新式的小包车狂东狂西
的人是什么种人,无工做甚至有工做尚且不能活命的人是

^① 参见何义麟:《媒介真实与历史想象——解读1950年代台湾地方报纸》之附录《国立台中图书馆珍藏十八种报刊简介》,《台湾史料研究》第24号,2005年3月,第18页。

什么种人——确切地了解到这点,才得算是对这现实有点认识,写出来才能算是真正反映现实的。^①

本着反映现实的文学立场,杨逵在“新文艺”副刊的第八期、九期、十一期连续登出“实在的故事”征稿启事:

“白昼说梦”与“空唤乱嚷”的文章;不是现实的需要,读者也已经不觉得什么兴趣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如其能够使我们感奋、高兴、愤慨、伤心的事情,我们当要将其发端,经过,结末仔细考察记录下来——这叫做“实在的事”,它已然会感动我们的心,如果写得不错的话,应该也会鼓动读者的。在取材上,表现上,采取这些样客观而认真的态度,才是“新文艺”的出路,也是文艺大众化的捷径。^②

“新文艺”副刊的第十一期,刊出了“实在的故事”特辑,共收有阿涛的小说《扁头哪里去?》、萧金堆的小说《两个世界》,铁的诗歌《囚徒》,以及杨逵的《“实在的故事”问答》,从中可见杨逵利用副刊阵地推动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为战后台湾的文学重建寻找出路的执著努力。

在坚持现实主义主导方向的同时,《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的创作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这种倾向的形成,与作家组成的多样化、文学经验的多元化以及文体类别的多样化都是密切相关

^① 杨逵:《论“反映现实”》,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第19期,1948年11月11日。

^② 杨逵:《求征“实在的故事”》,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第8期,1948年9月20日。

的。在执笔作家的组成上,杨逵立足于两岸作家的融合,不同世代作家的组队,以促进文坛的交流互动。大陆作家中,有茅盾、徐中玉、楼适夷、扬风、姚理、石火、啸风等人的作品;台湾老作家中,有吴新荣、杨启东、蔡秋桐、蔡申发等的创作;年轻世代的作家,则以林曙光、叶石涛、志仁、金秋,以及银铃会的朱实、萧金堆、许育诚、张有义、张彦勋等人为代表。

作家队伍的多种身份,带来了多元的生活经验,从表现中国大陆社会题材的《林湖大队》(适夷)、《荣归》(老默)、《选举》(啸风)、《漂泊记》(扬风),到反映台湾现实弊病和贫富不均现象的《扁头哪里去?》(萧金堆)、《腐鱼群》(金秋)、《归乡》(叶石涛)等作品,加之介绍外国作品的文章,可见“新文艺”的视野不仅包括海峡两岸,也延伸到世界文学的视野。

“新文艺”副刊所涉及的文体类别,有小说、新诗、方言、歌谣、书信、散文、评论等,涵盖面相当广泛。特别是民谣类作品的较多出现,成为一个突出现象。蔡秋桐、高田等人都有民谣作品发表,其中多是台湾民谣,同时也涉及浙西等地的民谣。

杨逵这一时期执笔书写的台湾民谣多达六首。其《童谣》所反映的台湾社会现实,是一幅典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

太太抱狗坐车跑/看顾门的抱甕跟着走/拖车的,大气
小气,/拖到呷!呷!呷,/给伊拖到市场口,/太太进入市
场/买肉来饲狗/老百姓,无米食/饿到叫!叫!呷!^①

《上任》这首民谣所嘲讽抨击的,则是靠裙带关系任职的官僚体系:

① 杨逵:《童谣》,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学”副刊,1948年8月9日。

今天上会去视事，/菜瓜藤，肉豆须，/也有姨太太，/也
有大团小叔合媳妇。/茶役，股员；/股长，课长合秘书，/应
有尽有；/什么货都有，/也有烂盐菜，/也有臭豆腐！^①

这种写作情形，标志了杨逵在战后初期编辑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创举，它与杨逵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台湾乡土的创作追求是一致的。1946年，杨逵创办民众出版社的时候，也曾预计出版《谢赖登歌集》、《陈君玉歌集》、《蔡德音歌集》，却因故未能实现；如今在《新文艺》副刊上对民谣类创作的提倡，也可看作对上述文学思想的坚持和实践吧！

^① 杨逵：《上任》，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学”副刊，1948年8月9日。

第五章 文艺批评：杨逵的理论战场

杨逵在台湾文坛，一向具有小说家、剧作家、编辑人、翻译者等多元文学身份，并多以左翼小说家形象的历史定位而被人们普遍认知。其实，杨逵一生中还有大量的文艺批评论述，见证了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另一种文学形象。也就是说，杨逵不仅用文学作品言说社会与人生，也在用文学的理论与批评来言说文学。

在洋洋大观的十四卷《杨逵全集》中，根据第九卷（诗文卷·上）、第十卷（诗文卷·下）、第十三卷（未定稿卷）、第十四卷（资料卷）统计，杨逵平生大约写了九十一篇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其中公开发表的就有七十九篇。这种文学理论构建与文学批评活动贯穿了杨逵的一生，无论是活跃于文坛的时期，还是隐居首阳农园的岁月，甚至是囚禁绿岛监狱的日子，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他都在坚持这种文学的思考与言说，并不断形成杨逵“文学批评”书写的高潮。

具体来看，杨逵的文艺评论写作，日据时期主要集中于1934年10月至1945年3月，这段时间共创作六十二篇，扣除期间1937年9月至1941年初因为时局、疾病和家事而导致的“书写空窗期”，平均每年七篇；杨逵光复以后的这种创作，多在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期间进行，写作总量为十二篇；绿岛时期的杨逵，1956至1957

年期间所写的文艺评论为十一篇；进入 70 年代以后，从 1974 年至 1985 年，杨逵共写了六篇文艺评论。

由此可知，杨逵对于文学理论建设的自觉，对于文学批评场域的积极介入，为台湾新文学批评史的书写提供了多么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文学批评话语。

一、文学理念：写实的、大众的、草根的文学

杨逵的左翼文学理念主要形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它与这一时期台湾无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的沛然兴起，不无内在联系。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高潮的形成与高涨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个领域的广泛传播，直接推动了二三十年代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并改写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各国无产阶级风潮，不仅让“普罗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成为这一时期文坛的流行语，而且带来了“红色的三十年代”。

在这种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中，中国大陆左翼文学的诞生过程与发展模式，直接受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和日本左翼文学的影响。从苏联“拉普”^①所推崇的带有绝对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

^① “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苏联 20 世纪二十三年代最大的文学团体。其前身是“十月”文学小组、“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莫普”）等组织。1925 年成立“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瓦普”），后改名为“拉普”，最后于 1930 年联合成立了“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联盟”。这些组织的领导核心是同一批人，“拉普”实际上也包含了上述几个组织。“拉普”在 20 世纪复杂的文艺思想斗争中，坚持过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反对文艺界的形式主义和各种非政治倾向，以及庸俗社会学。但他们以正统和文学权威自居，以宗派主义态度，否定和排斥“同路人”文学以及其他作家创作，后来已成为阻碍苏维埃文学事业发展的羁绊。1934 年 4 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拉普”随即解散。

到日本“纳普”^①所提出的建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阶级文学”，再至日本“克普”^②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理论，上述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的成败得失、正确谬误，都对中国大陆左翼文学主潮的形成起到导向性作用。而台湾文化界自20年代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对祖国大陆以及日本的社会情势乃至国际新思潮，一直保持了密切关注。30年代的这股世界性的普罗文学思潮，特别是中国大陆与日本的左翼文学流向，不能不波及到台湾岛内。

台湾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无疑是世界性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个环节。20年代的台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岛内的引进传播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成为当时社会革命的突出现象，它为30年代的普罗文学运动奠定了基础。1928年4月15日，由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谢雪红等七人于上海正式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共），台湾文化协会也由此转向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0年6月21日，由台湾共产党员王万得主倡，并与陈两家、周合源、江森钰、张朝基等五人，出资创办了《伍人报》。此报以抨击时弊、宣扬民族意识和社会主义为方向，投稿与传播网络在台湾有70余所之多，并与日本的普罗文艺团体和报刊保持了密切的联络，由此成为台湾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先驱。仅在1930年这一年，台湾进步文化界就有《伍人报》、《台湾战线》、《洪水》、《明日》、《现代生活》、《赤道》、《新台湾战线》等七种宣扬普罗文学精神的报刊问世，足以见得当时台湾普罗文艺运动势头之迅猛。1931年，受日本“纳普”机关报《战线》的影响，由台湾作家以及在台的日本作家王诗琅、张维贤、周合源、平山勋、汤口政文等人成

① “纳普”，是“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NAPF）的略称，它于1928年3月25日成立于东京，主办普罗文艺，刊行有《战旗》等机关杂志，1931年合流于“克普”。

② “克普”，即左翼文化团体“日本普罗列塔尼亚文化联盟”（KOPF）的略称，1931年11月7日由藏原惟人发起成立，并发行有关杂志，1934年被迫解散。

立了“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发行《台湾文学》杂志，力主在殖民地树立革命文学，更具有国际普罗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色彩。上述文学报刊后来虽因官方查禁而迅速停刊，普罗文化运动的推行已由此趋向衰落，但普罗文艺观念还是在台湾文化界传播开来，并对台湾文学作家的创作路向发生明显的引导作用。

1934年，《送报伙》在日本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发表并获奖，杨逵也从此进入了理论言说的高潮期，仅1934年10月至1935年11月，一年之间就有二十五篇文艺评论发表。这些文章，既发掘了普罗文学的理论资源，也审视和反思了普罗文学存在的问题。日本普罗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以及左翼作家德永直等人的文学主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杨逵的文学理念。杨逵的评论文章中，经常引述到日本普罗文学家的观点。这一时期，杨逵与日本普罗文学界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起来。1934年创刊的日本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以及翌年创刊的《文学案内》，其刊物园地中的文学同仁，日后都成为杨逵创办《台湾新文学》所开拓的作家资源。杨逵30年代的文学评论，除部分文章发表于《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杂志外，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刊载于日本东京的《文学评论》、《文学案内》、《行动》、《新潮》、《社会评论》、《进步》、《时局新闻》、《土曜日》、《星座》、《日本学艺新闻》、《文艺首都》、《人民文库》、《现代新闻批判》等刊物上。上述情形，不仅奠定了杨逵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也使当时已经走向低谷的普罗文学思潮出现了新的生机。

具体到杨逵的文艺理念，它主要分为三种路向：

第一，对写实主义文学观的认同与推崇，是杨逵终生坚持的文艺路线。

作为一个普罗文学家，杨逵的写实主义文学观，是对台湾新文学精神的深刻认知和对作家创作使命的勇敢承担。基于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经验，噍吧哖事件的惨痛记忆和看到《台湾匪志》时的心灵震撼，

让杨逵从小就立下了用文学来纠正被殖民统治者歪曲了的历史的志向。跻身文坛后,杨逵对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那就是“自始至终即以抗日、反殖民统治的武力压迫和经济压榨为前提;以关怀绝大多数被欺凌被掠夺的大众生活为骨肉;以争取民族自决、返归祖国、建立平等合理的生活为最终目标。”^①既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是针对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类的文学游戏而产生的,对文学的第一要求是‘呐喊’”。^②要创作这种反映时代、带动时代的“呐喊”文学,殖民地作家必须描写殖民地台湾的真实面貌;而要担当这种文学使命,就必须遵循写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因为无数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写实、激进、伟大的社会变革小说才是世界文学的好传统,在世界含有共通性。”^③“进步的文学原本就是主动积极的,也就是现实主义。”^④

要实现写实主义的文学观,取决于什么途径与原则呢?

杨逵在《台湾文坛近况》、《作家·生活·社会》、《拥护粪便现实主义》、《新文学管见》、《“实在的故事”问答》、《论“反映现实”》、《论文学与生活》、《文章的味道》、《文章的真实性》等一系列论述中,集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其一,从文学本源论的角度,杨逵认为:生活是创

①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遗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页。

② 杨逵:《台湾文坛近况》,原载日本《文学评论》第2卷第12号,1935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遗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11页。

③ 杨逵语,见廖伟竣《不朽的老兵》,原载《师铎》1976年第4期;收入杨素娟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99页。

④ 杨逵:《艺术是大众的》,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2号,1935年2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遗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8页。

作的源泉,写实主义文学必须从生活本身出发。其二,以作家的创作主体而言,要真正地拥有生活,正确地反映现实,作家的人生态度、写作立场和艺术良知,往往决定着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面貌。杨逵“认为文学作品除了反映时代之外,还要进一步带动时代。”^①在他看来:

读文学的人,创作文学的人,都是从生活中出发。

(《台湾文坛近况》,1935年11月)

真正的现实主义终究要立足在现实之中,使浪漫得以滋生;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虚无主义者的那种自然主义,它没有大爱是不会出现的。

(《拥护粪便现实主义》,1943年7月)

体验更多的现实生活,是作为作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作家·生活·社会》,1934年6月21日)

这不仅是“写”的问题,根本就是生活的态度。

(《“实在的故事”问答》,1948年10月11日)

真正的写实主义是要捕捉真实状态下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新文学管见》,1935年6月)

一篇作品为要反映现实,作者须要确切认识现实。

^① 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5页。

（《论“反映现实”》，1948年11月11日）

文学须要反映现实，似乎已成为定论，而什么叫做现实，各人有各人的立场，更因其主观的愿望的高低当然也有等级。

文学本身没有比生活较高尚的因素，高尚的文学就是由高尚的人生态度产生出来的东西。

（《论文学与生活》，1948年12月4日）

事实上，杨逵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经历了写实主义——真实的写实主义——粪便现实主义——理想的现实主义的演变过程，它是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为了区别于30年代文坛上流行的那种被认为是自然主义末流的低俗写实主义，也为了团结更多的作家，推动文艺大众化，杨逵认为应该把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称之为“真实的写实主义”。40年代初期，在驳斥西川满打压台湾现实主义创作的论战中，杨逵旗帜鲜明地提出拥护“粪便现实主义”主张；杨逵晚年，则更倾向于“理想的现实主义”。

基于写实主义的文学观，杨逵对报导文学这种文体类型情有独钟。报导文学所具备的观察、思考、生活三位一体的性质，使其带有浓厚的写实色彩，更为杨逵所重视，并成为其写实主义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杨逵主办的《台湾新文学》一经创刊，即曾设置“乡土素描”与“街头写真”栏目，并在日后登载“募集报导文学”的启事。1937年2月至6月，杨逵连续发表了《谈“报导文学”》、《何谓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问答》三篇文章，大力倡导报导文学写作。他从文学理论角度，对报导文学的概念、性质、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深刻阐释，由此成为台湾报导文学的首倡者。不仅如此，他在1935年发表的《台湾地震灾区勘察慰问记》、《逐渐被遗忘的灾区——台湾地震灾

区劫后情况》，还以报导文学理论的实践，开启了台湾新文学史上报导文学创作的新篇章。

何谓报导文学？

杨逵的文章开宗明义：“报导文学顾名思义，是笔者以报导的方式，就其周边、其村镇，或当地所发生的事情所写下来的文学。”“报导文学可说是最简单、最自由奔放的写作方式；其素材之丰富与多样性也具有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多样性，因此是反映时代的最佳文学形式。”^①

如何认识报导文学的性质和特点？

杨逵的观点明确而深刻：“写实是报导文学的生命”。“但报导文学要作为文学的话，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形象。将某一事物或事件以生动的姿态，让读者深刻地印在脑海里，这就是文学的生命。”故创作者切不可忽视“报导文学的必备条件：思考和观察的两位一体，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必要。”^②具体言之，其特点在于：“第一，极为重视读者（阅读报导的人）。第二，以事实的报导为基础。第三，笔者对应该报导的事实，必须热心以主观的见解向人传达。……为求尽善尽美，报导文学虽然允许对事实做适度的处理与取舍，但决不允许凭空虚构。”^③

值得注意的是，杨逵的报导文学理论不是孤立为之，而是在与小说、通讯、新闻报导等多种文学体式中比较中展开阐释，在中国、日本

① 杨逵：《何谓报导文学》，原载《台湾新民报》，1937年4月2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03—504页。

② 杨逵：《报导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文学》第2卷第5号，1937年6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25—526页。

③ 杨逵：《何谓报导文学》，原载《台湾新民报》，1937年4月2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03页。

乃至世界文坛的报导文学格局中进行观照,这就让台湾的报导文学理论拥有了深广的参照视野。杨逵所期望的报导文学创作,是能够网络各行各业的社会人士,写出最完备的社会地图与文学地图。它既为台湾文坛上写实主义文学经典的创造,奠定扎实的文学基础工作,也为提升台湾的文化,最终将台湾作家推向世界文学的舞台,提供新的视窗。

第二,对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强调与传承,是杨逵普罗文艺观的集中体现。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是苏联、日本、中国左翼文学阵营努力倡导又争论不休的议题,台湾普罗文学界也不例外。进入30年代以后,随着左翼刊物的相继创办,正式树立了普罗文学的旗帜。《伍人报》成为当时第一个标举“文艺大众化”的理念的刊物,“文艺大众化”也很快主导了30年代的文学路线。1931年6月,以别所孝二为首的台湾文艺作家协会结盟,创立当天的会场上贴有“朝向文艺大众化”的标语;1932年1月《南音》创刊时,即直陈负有文艺大众化的使命;1934年5月台湾文艺联盟召开成立大会时,墙上书写的标语就是:“推翻腐败文学,实现文艺大众化。”在文艺大众化的时代潮流中,杨逵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倡导者。

杨逵的文艺大众化理念,首先是基于普罗文学立场的解读,同时也是在30年代台湾文坛的文艺论争中确立的,所以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刻也没有脱离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进程与实践。

关于普罗文学是为谁而写的问题,杨逵明确提出:“新的文学是劳工阶级的文学”^①，“从历史的使命来看,普罗文学本来就应该以劳

^① 杨逵:《新文学管见》,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7月29日至8月1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1页。

动者、农民、小市民作为读者而写。”^①文学艺术属于大众，“真正鉴赏艺术的是大众，只有少数人理解的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是掳获大众的感情、撼动他们的心魂的作品。”^②

不过，杨逵没有把文艺大众化绝对化，普罗文学虽然是为无产阶级代言，但它并非只能描写无产阶级，而是要以劳动者的立场和世界观去书写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

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后不久，在文艺大众化的论争中，针对“大众”为何、“大众文艺”内涵等问题，杨逵与张深切、刘捷等人曾经展开了一场论辩。杨逵的“大众”，是指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即“第四阶级”；张深切的“大众”，则是相对于贵族阶级的市民阶级，也就是“第三阶级”。言及“大众文艺”，张深切认为它是具有市民阶级倾向的通俗文学，其作用在于娱乐大众；而杨逵则明确指出，“大众文艺”就是普罗文学，是以无产阶级立场来书写民众心声的文学。当它真正打动大众的时候，它就是最崇高的艺术。“捉住大众”的表现方法，这正是台湾新文学所面临的最迫切而紧急的任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普罗文学就永远都是一种象牙塔式的存在，到最后都脱离不了博物馆式的存在。”^③

杨逵的文艺大众化理念，从 30 年代创办《台湾新文学》致力于解决文学品质的提升和大众化等问题，到战后初期支持麦浪歌咏队，推崇“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文艺路线；从 40 年代末期加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讨论，继续呼吁文艺大众化创作，到 80 年

① 杨逵：《艺术是大众的》，原载《台湾文艺》第 2 卷 2 号，1935 年 2 月；收入《杨逵全集》第 9 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 2001 年 12 月版，第 138 页。

② 同①，第 140 页。

③ 杨逵：《写给“文评奖”评审委员诸君》，原载《文学评论》第 3 卷第 3 号，1936 年 3 月；收入《杨逵全集》第 9 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 2001 年 12 月版，第 445 页。

代前半期提出草根文学主张,深化与提升文艺大众化命题,在台湾左翼文化与文学传统的传承中,杨逵无疑是用毕生追求来维系这一传统的关键性人物。

第三,对“草根文学”的阐释与倡导,标志了杨逵晚年文艺理念的新发展与总概括。

进入80年代以后,杨逵虽然已是高龄老人,仍旧没有放弃他在夕阳窗下的文学思考。1982年8月22日,杨逵应邀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文学活动。访美期间,杨逵于9月12日下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草根文化与草根文学》的演讲;10月30日下午,杨逵受南加州台湾同乡会、台湾文学研究会之邀,在洛杉矶做了《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演讲。在这两次演讲中,杨逵首次提出了“草根文学”的主张。之后,从1983年4月发表《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到1983年11月发表访谈录《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直至1985年3月收入《压不扁的玫瑰花》一书的《“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可以说,杨逵是通过回眸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观照台湾当下文坛的创作,融入自己毕生从事社会运动和文学事业的生命经验,来让“草根文学”的主张愈发成形、完善、坚定。杨逵毕生追求的“文学的社会性”、“文艺的大众化”、“评论的庶民化”等文艺理念,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以时代与乡土的汇合,达到新的提升和超越。

杨逵的“草根文学”理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意义。由农业战线上推动底层乡村工作的“草根大使”形象的启发,联想起自己当年充当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草根大使”经验,并有感于80年代台湾文坛“草根性”断失所造成的畸形现象,杨逵以一个世纪老人的眼光,更以一个毕生追求普罗文艺理念的文学家胸襟,明确主张“草根文学”理念,大力疾呼今天“文化的草根大使”来一次热热烈烈的再出发。

杨逵如是说:

我希望文艺创作或文化都应该效法农业上的“草根大使”，利用各种带有“草根性”的场所举办集会、交流经验、体验生活，把作品扎根于乡土。我们不要宫廷文学、不要贵族文学。^①

草根文学的理念，与80年代台湾过于“纯”的“纯文学”是针锋相对的：

所谓“纯文学”，可以说是文学作者的象牙塔，它的弊病是：第一，“纯”技巧的炫弄；第二，使用的语言与现时社会不合；第三，强引入外来观念，不能够贴切反映此时此地一般人的意识内容。七十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运动，曾经对这些毛病作过不少的针砭。我愿更彻底地提出“草根文学”的主张来。^②

何谓草根文学？杨逵对其概念性质要点作了全面界定和阐释：

所谓草根文学，简单地说，就是将我们日常生活中周围所发生的实际状况真实地描写下来的文学，也就是要反映

① 《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访人道的社会主义者杨逵》，陈春美访问，原载《前进广场》第15期，1983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8页。

② 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00—201页。

真实的人民生活与社会状况的文学。^①

“草根文学”要点何在？杨逵的认知简洁而明确：

第一，使用通俗的语言，平实的技巧，让一般识字的人看得懂，念给文盲也听得懂。

第二，情节要带有趣味性，能够吸引读者有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第三，取材于一般人日常生活，反映时代的社会事实，健康的，能振奋人心的。^②

如何才能实现“草根文学”？杨逵从“草根作家”、“草根文化”、“草根政治”三个层面上提出建言，颇有建设性地描绘出文化蓝图，藉以阐发杨逵及其这一代新文学作家毕生为之追求的文学理想。杨逵如是说：

我要鼓励所有写作者“多多下乡，并且多多参与劳动，实际跟土地接触，跟群众接触”，这样才能避免在象牙塔里幻想，与实际现实脱节现象发生，这样的真实生命、真实感触的作品也才能获得读者大众的共鸣与接受。^③

①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页。

② 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01页。

③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9页。

文学作者与其坐待“认同”，不如主动出发，做个“文学的草根大使”，跨出自己的斗室，走入群众中，并且动员漫画家、民谣家、雕刻家、舞蹈家等，配合各种艺术形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走动、宣传，来唤起群众的兴趣。这是从文学扩展到整个文化层面，必须这样实践做去，“草根性”才能往下扎根、落实。^①

具体到草根文化的实践途径，杨逵从自身的经验，到民间的记忆，多方面发掘了来自乡土台湾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并在此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文化村”的理想。杨逵晚年梦寐以求的，是能够在东海花园的土地上创建一座“文化村”，让文学家在这里写作，并用“演出”的方式发表自己的作品；让民谣家演奏自作的曲子，并广为录音、传播；让雕塑家的创作，画家的写生，激发更鲜活的艺术教学，唤起民间的人群和年轻朋友们的艺术创造兴趣。然后，办个实验剧场，让各种艺术家通力合作，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在杨逵的心目中：

“文化村”的理想，是‘理想社会’的一个小模型。让每个人体会自己的创发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便是这个社会的‘头家’”。^②

从文化的“草根性”联想到政治的“草根性”，杨逵认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完全可以和“草根文化”活动相结合，诸如通过在各乡镇创设“草根机构”，兴办各种形式的来自民间的文学艺术活动，“在平常日子中扎根、落实，结合各种文化活动，在‘育’‘乐’之间，把

① 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02页。

② 同①，第204页。

民主自由的种子散到每一个角落去!”“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快乐、和平的新社会,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民主政治需要把‘民主’,确实确实落实了它的‘草根性’,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政治。”^①

总的看来,杨逵的一系列文学论述,从30年代的“文学社会性”、“文艺的大众化”主张,到光复之后的台湾新文学重建思想,再至80年代的“草根文学”理念,它蕴含了杨逵从一个奔突呐喊的普罗文学家,到作为“人道的社会主义理想家”的精神历程,寄寓了杨逵旨在构建台湾新文学史上文学批评理论、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也不言放弃的全部努力。在上述文学理念的演变中,文学的写实精神、时代色彩与广泛的人民性,以其一脉相承的精神血缘,成为其永远不变的生命内核。

二、文学评论：从文学标准到批评实践

1937年7月,当时正在日本的杨逵与《植有木瓜的小镇》的作者龙瑛宗,经《日本学艺新闻》杂志社的安排,首度在东京会面,并讨论了台湾新文学相关之种种。有感于台湾新文学批评环节的薄弱,龙瑛宗建议杨逵:“我想你应该做一点评论。因为实际上台湾似乎没有像样的评论家。你如果用评论来领导台湾的作家……。”^②从这段对谈可知,30年代台湾文坛上的杨逵,在龙瑛宗这种有成就的作家心目中,足以能够担当“用评论来领导台湾的作家”的责任。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杨逵的文艺批评始终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他对文艺批评寄寓殷切的希望,期待着“一出现值得

^① 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05—206页。

^② 杨逵:《谈台湾文学——〈植有木瓜的小镇〉及其它》,原载《日本学艺新闻》第35号“台湾文化”特辑,1937年7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42页。

瞩目的作品,评论家便展开研讨争论,这种检讨论争是我们日后发展的一个理论的方向。”^①无论是在文坛批评的活跃期,还是面对批评现状的沉寂,杨逵都不断地激扬文字,挥洒热辩,为文学批评的振兴鼓舞与呼。杨逵的文学批评往往置身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现实场域,以文学现象的具体考察和作家作品的针对性评论为出发点,始终坚持“评论的庶民化”路线,深入浅出,切中时弊,又不乏文艺理论高度的观照。文章字里行间所跳动的,是特定时代的文艺脉搏;其中贯穿的,是杨逵的普罗文艺观在批评场域的实现。

杨逵的文艺批评,首先针对文坛评论的弊病而发言。3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文学批评时弊的集中表现,一是喜欢搬弄流行词句术语的概念式批评,整篇评论不知所云;二是过度讲究细节的肢解式批评,沉溺于雕虫小技,重视咬文嚼字,让文学批评失去了内在的精神和生命的活力;三是脱离大众鉴赏视野的书斋式批评,导致文学评论过于偏重知识分子,进入“桌上文学评论”的狭小天地。而对于40年代台湾文学的过渡期来说,批评界的沉寂与滞后反应,以及一味否定式的发泄式评论,则是影响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直面文艺批评界的现状,杨逵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融入了他对于文艺批评标准、文学评论的道路、文学评论的作用,以及评论家、作家、读者的互动关系等一系列命题的思考。在杨逵的批评视野中,他坚持这样的观点:

批评家或者作家在批评、分析一部作品的目的,应该是追究该作品主题的社会性、主题发挥的程度、读者的反响、或者未得好评的原因,来作为自己或别人创作时的参考,同

^① 杨逵:《台湾文坛一九三四年的回顾》,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1934年12月;收入《杨逵全集》(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21页。

时提高读者的水准。^①

这里所说的“评论”，不应该是时下流行的这种发泄式的言论。评论必须能够具体地剖析现有的作品，能够给予作品好的引导。我们所期待的是这样的评论，……期待它“振兴萎靡的台湾文学，更新台湾文学，唤醒台湾文学，进而开创新局面。”^②

在文学评论与大众的关系上，杨逵认为，我们除了关注批评家的观点外，更应该特别倾听一般读者、劳动者和农民的声音。杨逵如是说：

现在的文学评论过于偏重知识分子，应该多为劳动者而写。我也认为这才是普罗文学评论的正确道路。而且只有选择这样的道路，才是扭转时下风气的惟一途径……也是打破文坛文学的不二法门，让文学回归到真正艺术的道路之惟一的方法。^③

在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上，杨逵尖锐地提出：是作品的存在为了批评家，还是批评家的存在为了作品？他认为，“好的作品会激发评论

① 杨逵：《文艺批评的标准》，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4号，1935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9页。

② 杨逵：《绝不贫乏——谈时下的台湾文学》，原载《兴南新闻》，1942年5月1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页。

③ 杨逵：《艺术是大众的》，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2号，1935年2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9页。

家的热情,好的评论能给作家好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①他相信,“有生气的评论必定能够唤起文学创作、诗、电影、美术、音乐等各部门的活力。”^②所以,文学评论在启发文坛时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吸引读者大众关心阅读台湾文学作品方面所发挥的引导作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

基于上述认知,杨逵的文艺批评,又多在具体的文艺作品评论中展开,与台湾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从《送报伙——杨逵君的作品》所做的作者自审,到面对《台湾文坛——九三四年的回顾》这种高屋建瓴的俯瞰;从《推荐中国的杰出电影〈人道〉》,到《新剧运动与旧剧之改革——〈锦上花〉观后感》;从对《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夜猿》等台湾文学创作的评价,到以日本作家坂口柊子小说《郑一家》为解读对象的批评,特别是在台湾总督府全面禁止报刊使用汉文、封锁中国大陆文化传播的背景下,杨逵对大陆作家肖军小说《第三代》的热情评论,都让人看到他的文艺批评与台湾文坛创作现象之间的感应和共鸣。杨逵的文艺批评实践涉及小说、电影、戏剧、美术、文艺杂志等多种题裁,拥有台湾、大陆、日本的文学界的创作视野,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别发挥了文学评论的鼓与呼力量,并在创作与批评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作用。

三、文学论争之一：关于“粪便现实主义”

自 30 年代登上台湾文坛以来,杨逵的文学生涯就不断经受前沿

①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文学》第2卷第3号,1942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页。

② 杨逵:《推出中国的杰出电影〈人道〉》,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9月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57页。

文坛的风风雨雨,大大小小的文艺论争也构成了他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关于“粪便现实主义”^①的论争,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同时,加紧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1940年1月,由日本作家西川满、矢野峰人、滨田隼雄出面,打着纯文艺的旗号,在文学社团与刊物几乎空白的情形下,拉拢诱惑一些台湾作家参加台湾文艺家协会,并发行《文艺台湾》。西川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文学”的总代理,旨在将《文艺台湾》办成殖民当局政治需要的御用团体与杂志。而曾经参与创办《文艺台湾》的台湾作家黄得时和张文环,后因反感于西川满的独裁作风与《文艺台湾》的“皇民文学”色彩,毅然退出台湾文艺家协会。他们于1941年5月成立启文社,创办《台湾文学》,重新凝聚了杨逵、吕赫若、巫永福、龙瑛宗、杨云萍、吴新荣等作家的创作。《台湾文学》作为能够曲折传达战争期台湾同胞心声的文学园地,其写实主义的路线与西川满《文艺台湾》那种唯美、御用路线形成鲜明对立。

1943年4月,西川满为总干事的“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以文学宣扬皇民精神”为基调。同年11月,台湾文学奉公会在台北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以文学杂志必须接受言论统治为会议结论。面对西川满“献上文艺杂志”、“服从战时配置”的废刊要求,黄得时、杨逵等人曾正面反弹,全力抗争,会场氛围一时紧张肃杀。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台湾文学》最终还是被强令废刊。遭逢这样的时局,台湾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渐次被收编成一元化的组织,成为动员“国民精神”的宣传机构。

在战争期的台湾文学格局中,西川满靠着协力国策而一再取得

^① 关于“粪便现实主义”,有“粪写实主义”、“狗屎现实主义”、“粪便现实主义”三种翻译。本文采用《杨逵全集》中“粪便现实主义”的翻译。

文坛领导地位,不断地掌控话语霸权以及支配文学资源,并于1943年挑起“粪便现实主义”事端,由此引发台湾新文学界与日本御用文人之间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文艺论战。这场论战的发生并非偶然,正如学者柳书琴所言,它是“亲官方立场的日人文学者有意与台湾文学者奉公会的文艺统制政策呼应,对台湾文坛进行更彻底的统制,因此导致本土作家反弹。此论战可视为官方系列收编本土文坛的最后一役。”^①

1943年2月,在台湾总督府颁发的“台湾文学赏”中,滨田隼雄、西川满、张文环三人同时获奖。这其中,日本作家的获奖小说是以奉公报国的精神为特征,而张文环的《夜猿》、《阉鸡》、《地方生活》等作品却没有皇民意识。由此看来,“张文环获奖的这个难以解释、匪夷所思、耐人寻味的结果,或许就是促使西川满忍无可忍必须表态的触媒。”^②1943年3月,时任“台湾文学赏”评审之一、台北帝国大学教授的工藤好美,在台湾总督府官方刊物《台湾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文学与台湾文学——特别关于滨田、西川、张文环三人》的文章。工藤好美批评了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又暗讽了西川满的作品,而对张文环的写实主义创作却大力推崇,这被学界认为是引发“粪便现实主义”论争的导火索。

1943年4月5日,滨田隼雄在《台湾时报》首先发难。他以《非文学的感想》一文,指责台湾文学有所谓“艺术至上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末流”两大弊病,从而影射张文环与吕赫若的创作,并指责这些台湾作家没有积极参与文学奉公的任务,反而从事描写现实的否定

^① 柳书琴:《谁的文学? 谁的历史? ——论日治末期文坛主体与历史诠释之争》,发表于成功大学台文系举办的“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研讨会”,2002年11月22—24日,第21页。

^② 赵勤达:《大东亚战争阴影下的“粪写实主义”论争——以西川满与杨逵为中心》,《杨逵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静宜大学台文系举办,2004年6月19—20日,第8页。

面的写实主义文学。

滨田隼雄的文章发表后,张文环随即在隔月的《台湾公论》上,以《台湾文学杂感》一文回应之。张文环的文章虽有少许批评和讽刺,但说话口吻小心翼翼,反击态度不够明朗。

1943年5月1日,西川满在当日出刊的《文艺台湾》上,发表了《文艺时评》,大肆辱骂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粪便现实主义”,让论争的战火燃烧开来。西川满的态度恶劣而蛮横,充满话语霸权。他首先以日本人的文学传统与精神为衡量标准,全盘否定台湾文学:

大体上,向来构成台湾文学主流的“狗屎现实主义”,^①全都是明治以降传入日本的欧美文学的手法,这种文学,是一点也引不起喜爱樱花的我们日本人的共鸣的。这“狗屎现实主义”,如果有一点肤浅的人道主义,那也还好,然而,它低俗不堪的问题,再加上毫无批判性的描写,可以说丝毫没有日本的传统。^②

接着,西川满以“皇民意识”为武器,大肆攻击台湾作家的写实主义:

真正的现实主义绝对不是这样的;在本岛人作家依旧关注“虐待继子”的问题或“家族藤葛”的问题,只描写这些陋俗的时候,下一代的本岛青年早已在“勤行报国”或“志愿兵”方面表现出热烈的行动了。对于无视这种现实又缺乏

① 曾健民将《糞リマリズム》译为“狗屎现实主义”,这里转引的《文艺时评》一文,为曾健民所译。

② 西川满:《文艺时评》,曾健民译,转引自《喋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

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这是多么地讽刺的事啊!①

然后,西川满在对日本小说家泉镜花②的大力吹捧中,进一步斥责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标举“皇国文学”创作:

回头看看台湾作家的情形吧!说他们是“饭桶”!“粗糙”!那还算是客气话;看看他们所写的“文章”吧!简直比原始丛林还混乱。

应该把镜花那样的大作家的作品中值得学习的东西为今日的我们所用,在大东亚战争中,不要成为投机文学,应该力图树立“皇国文学”。

高呼什么巴尔扎克啦托尔斯泰啦,如果那么有闲读那些挂着洋名的玩意,至少也应该去学习一些比较近的、像镜花那样的作品吧!③

西川满蛮横无理的殖民主义态度,引起了台湾作家的强烈愤怒,世外民(邱永汉)、吴新荣、台南云岭、伊东亮(杨逵)、吕赫若等人以各自的方式,同西川满、滨田隼雄以及追随日本御用文学家的叶石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43年4月到7月,论争持续三个月,公开发表的论战文章达九篇之多,另外还有当时没有发表的潜在写作,

① 西川满:《文艺时评》,曾健民译,转引自《啞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4页。

② 泉镜花(1873—1939),主要作品有《照叶狂言》、《高野圣》、《和歌灯》、《妇系图》、《日本桥》等。其作品世界与日本的前近代文化及土俗社会有很深的关联,追求神秘、唯美主义写作路线,作品富有鲜艳的色彩和梦幻性。受少年丧母的影响,泉镜花把恋母之情转移到文学描写中,对自然和女性抱有无限的向往,往往逃避现实,陶醉于空想的世界中。

③ 西川满:《文艺时评》,曾健民译,转引自《啞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5页。

如杨逵的《插秧比赛》，以及《吕赫若日记》等。

5月10日，世外民（邱永汉）在《兴南新闻》学艺栏上，发表《粪便现实主义与假浪漫主义》，首先对西川满的《文艺时评》进行反击：

读了五月号的《文艺台湾》上刊载的西川满的《文艺时评》，它胡说八道的内容真使我惊讶，与其说它率真直言，倒不如说全篇都是丑陋的漫骂；实在让人感受强烈。^①

针对西川满用日本传统精神来指责台湾文学的观点，世外民对日本文学创作的症结，与所谓传统的真正内涵，给予了清理或正名。在“浪漫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西川满面前，世外民大力推崇“现实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勇敢地捍卫了台湾文学的尊严。

5月17日，狂热追随西川满、曾经信奉“皇民意识”的叶石涛，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在《兴南新闻》“学艺栏”里，抛出《给世外民的公开书》。叶石涛一方面大唱颂歌，赞扬“西川（满）所追求的纯粹的美，是立足于日本文学传统的”，“他的诗作热烈地歌颂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自觉”；另一方面则拼命挥舞棍棒，点名批评张文环与吕赫若缺乏

^① 世外民（邱永汉）：《粪便现实主义与假浪漫主义》，原载《兴南新闻》“学艺栏”，1943年5月10日；转引自《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8页。

皇民意识,由此造成台湾作家一片哗然。^①

早在5月7日的日记里,吕赫若就曾表示:“西川满总归无法以文学实力服人,才会想用那种恶劣手段陷入入其奸计也。文学阴谋活动家也。”^②叶石涛的污蔑文章发表的当日,吕赫若又在日记中写道:“今早的《兴南新闻》学艺版上,有个叫叶石涛的,断言本岛人作家无皇民意识,举张氏和我为例立说。立论、头脑庸俗,不值一提。气他做人身攻击。中午在荣町的杉田书店和金关博士、杨云萍碰面,一同在‘太平洋’喝茶。谈及叶石涛的事,有人说出他是西川满的走狗,一座愕然。”^③

5月24日,在《兴南新闻》“学艺栏”上,吴新荣发表《好文章·坏文章》,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口吻,曲笔嘲讽了西川满与叶石涛的谬论;署名“台南云岭”的短文《寄语批评家》,则是投枪匕首,直逼西川满:“把现实主义冠以‘狗屎’,暗示自己的作品才是真文学,真不愧是一个度量狭小的人。”

一意孤行的西川满又接着在《文艺台湾》六月号上发表《文艺时评》,还是围绕“粪便现实主义”做文章,并对台湾文学提出质疑:那种

① 关于叶石涛1943年追随西川满阵营、痛骂“粪便现实主义”一事,叶石涛在1980年写的《日据时期文坛琐忆》[收入其《文学回忆录》,(台北)远景出版社1983年]一文中,曾谈道:“龙璜宗先生常常嘲弄我的一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幼稚与昧于知悉台湾社会转变的悲惨历史,强调惟有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写实主义文学才是殖民地统治下的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我心至今仍觉得惭愧的是,这时候我心血来潮撰写一篇驳斥写实主义的散文寄到《兴南新闻》去,幸获刊登。”“我这篇短文等于向民族主义新文学运动的庙堂投下了一枚小小的炸弹。”近年间接受访问时,叶石涛又出尔反尔,修改自己的历史劣迹,否认《给世外民的公开书》是他的文章,表示当初乃西川满借他之名发表。参见《“粪写实主义事件”解密——访叶石涛先生谈〈给世民的公开信〉》,《文学台湾》第42期,第22—36页。

② 引自《吕赫若日记(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译本》,钟瑞芳译,(台南)“台湾国家文学馆”2004年12月,第339页。

③ 同②,第344页。

“吊儿郎当的、不平不满的、毫无气力的、毫无节操的文学中，怎么能树立作为日本文学的一环、光辉的皇民文学？”

面对这种论争的阵势，杨逵以“伊东亮”的笔名，在1943年7月31日的《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全面驳斥西川满的谬论，掀起论战的高潮，杨逵也由此成为“粪便现实主义”的最佳代言人。在这之前，西川满以“皇民意识”与“日本传统”双重缺乏的论调来攻击台湾文学，世外民、吴新荣等台湾作家也多是针锋相对，在相应的层面上进行回应。而到了杨逵的发言，其回应方式发生了变化。西川满以排斥“粪便现实主义”，来批判打压台湾的现实主义；杨逵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拥护粪便现实主义”，来反讽西川满的观点，维护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这种回应方式不仅深刻而有力，而且独树一帜。

《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粪便的功用；二、浪漫主义；三、现实主义。杨逵高屋建瓴地阐释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揭露了西川满打压和践踏台湾新文学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维护了台湾新文学的品格和尊严。杨逵的这篇文章，在台湾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当时惟一的具有如此深度和力度的关于现实主义文学内涵的理论阐释文章。

杨逵的文章，首先列举鲜活生动的事例，用朴素的生活真理来证明“粪便”的功用：没有粪便，稻子就不会结穗，蔬菜也无法生长。随即笔锋一转：“这就是现实主义。是真正的粪便现实主义。粪便可不是浪漫的。”^①然而施肥以后，那闪着光泽的蔬菜，欣欣向荣的植物，却充满浪漫风情。接着，杨逵针对西川满的谬论，引证台湾文坛上某些日籍作家的写实文学现象；他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批驳：

^① 杨逵：《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3号，1943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20页。

其一，直面西川满之流对“粪便现实主义”的污蔑和攻击，杨逵戳穿了他们旨在抹煞台湾新文学写实精神的实质，并指出这种遮蔽现实的自欺欺人的做法，难免会成为海市蜃楼和沙土阁楼那样的东西。杨逵一针见血地指出：

西川等人则是一开始就用盖子盖住腐臭的东西，看都不看。结果是别开脸、捂住鼻子，不看真实，不看现实。可是现实就是现实。

就算别过脸不看，捂住鼻子不闻，现实还是以现实的状态存在。他们遮住的，不是存在的现实，只是他们自己的眼睛、鼻子罢了。^①

其二，针对西川满标举浪漫主义来排斥“粪便现实主义”的做法，杨逵在批判其狭隘而荒谬的浪漫主义之后，科学地阐释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正确关系。杨逵如是说：

真正的浪漫主义必须从现实出发，对现实抱着希望，遇到恶臭就除去恶臭，碰到黑暗就多少给它一点儿光明。对于人人别开脸，人人捂着鼻子躲开的粪便，必须看出它的肥料价值，看到它让稻米结穗、让蔬菜肥大的功效。必须把希望寄托在粪便上，喜爱它，活用它。^②

只有立足在现实主义上，这种浪漫主义才会开花结果。

^① 杨逵：《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3号，1943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21页。

^② 同^①。

如果说不排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就无法存在,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荒谬极了。那是舍飞机不坐而坐舢斗云,那是痴人说梦。那只不过是和妈祖的恋爱故事而已。^①

其三,针对西川满指责本岛作家拼命描写虐待继子或家族纷争的谬论,杨逵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大多数的本岛人作家就算是描写这样的黑暗面,也有心想从这里再往前跨出一步;如果故意忽视他们的这种意志,就不得不说那是令人不齿的‘曲解’了。”“要看他们在这种现实之上,是如何努力奋斗,如何发挥有建设性的意志。这才是问题所在。”^②

其实,杨逵对西川满阵营的回应不止于此,他还创作了极短篇《插秧比赛》,来继续自己的批评,或许是因为当时“皇民化运动”的高压氛围,作品未能公开发表。这篇小小说以生动的寓言故事,透过作品中刘、田两位老师的形象,影射曾以“刘密”为笔名的西川满和姓氏中的有“田”字的滨田隼雄,讽刺他们虽然以“皇民化文学”的领导自居,却不知道结出美丽的稻穗必须要有肥料,粘满粪便的泥巴尽管臭味四溢,却是不可缺少的养分来源。在杨逵笔下,刘、田二位要去担任领导群众的工作,他们坐在舒适的二等车厢里讨论着:用什么称呼农人比较好?“各位岛民”、“各位国民”、“各位皇民”?基于文学价值的考量,决定采用刘老师所说的“各位皇民”。到了乡下,农人们正在插秧比赛。刘、田两位老师先后喊:“各位皇民”!农人们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只是埋头插秧;水牛却扬起尾巴,把老师们的衣服和农人的脸上都溅上了臭泥巴,可农人们还是头也不抬地干活。接下来,杨逵

^① 杨逵:《拥护粪便现实主义》,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3号,1943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22页。

^② 同^①,第125页。

分别描写了刘、田两位老师的反应：

“一群没有皇民意识的家伙！”

在回程的二等车厢里，刘老师很介意沾满泥巴的衣服上的恶臭，怒气冲冲。

——好了，好了，如果我们不是光嘴巴上说增产，而是有沾满淤泥的决心，一头跳进去帮忙，即使笨手笨脚，成为笑柄，至少他们也会说声谢谢呀。因为听说农人是很现实的呢。

田老师这么劝慰着，刘老师就摇头说：

——不行，我是弄文学的，我可不敢领教粪便现实主义。^①

如果说，《拥护粪便现实主义》是杨逵以文艺批评为武器，来参与论战，驳斥西川满之流的险恶用心和荒谬理论；《插秧比赛》则是意犹未尽的杨逵采用极短篇的创作方式，用文学快笔为西川满、滨田隼雄之类人物画像，让其以文学奉公者自居的心态和嘴脸昭然若揭。

1943年发生的这场“粪便现实主义”论争，并不单纯起源于西川满、滨田隼雄因“台湾文学赏”而引发的个人恩怨，也非叶石涛“不由自主地”“心血来潮地”为西川满阵营鼓吹辩护的偶然举动；从他们对台湾文坛“粪便现实主义”的发难与攻讦，到论战结束时西川满即在《文艺台湾》上推出陈火泉的《道》，为“皇民文学”树立样板，可见西川满之流争夺话语霸权，让文学服膺“皇民化运动”的御用动机与心态。正因如此，原来不在暴风圈内的杨逵、吴新荣、邱永汉等人才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与西川满之流展开激烈论辩，反对西川满打压台湾

^① 杨逵：《插秧比赛》，未发表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04页。

文学、收编台湾作家的阴谋。这场“粪便现实主义”论战不同寻常的意义，正如曾健民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这场论争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流派之间的论争，而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一部分的皇民文学势力对不妥协于体制的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攻击；而大部分的台湾作家也并未妥协，奋起驳斥，高声喊出拥护台湾的现实主义，予以反击。^①

四、文学论争之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重建

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在“二二八事件”之后的高压氛围中出现的这种文学现象，无异于一种奇迹，它特别体现了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顽强生命力。

《新生报》“桥”副刊创办于1947年8月1日，由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文学青年歌雷（史习枚）担任主编。1947年11月，“桥”副刊不顾当时七家报纸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多位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入狱的危险，勇敢致力于劫后重生的台湾文学重建运动。其宗旨在于：为“二二八事件”之后严重的省籍矛盾，提供一个省内外作家沟通的桥梁。这次讨论收获了前后约二十七人的四十余篇文章。从大陆作家歌雷、骆驼英（罗铁鹰）、扬风、雷石榆、钱歌川、孙达人（孙志煜）、何无感（张光直）、陈大禹、萧荻，到台湾作家杨逵、欧阳明（赖明弘）、濂南人（林曙光）、黄得时、吴浊流、吴瀛涛、吴坤煌、陈百感（邱

^① 曾健民：《评介“狗屎现实主义”》，《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0页。

永汉)、吴阿文(周青)、籁亮(赖义传)等人,他们都以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热望和行动共同见证了两岸作家团结合作的生动例证。1949年4月6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出动军警镇压台大与师大的学生运动,造成震惊一时的“四六惨案”。这期间,《新生报》“桥”副刊被官方查禁,主编歌雷,作家杨逵、孙达人、张光直被捕入狱,骆驼英、雷石榆、朱实等人纷纷逃亡大陆,历时一年多的关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戛然而止,一段被政治力量挫杀的文学历史从此尘封。

《新生报》“桥”副刊的讨论,涉及到台湾文学的历史定位、台湾与祖国的辩证关系,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现阶段台湾文学的路线方向、创作方法问题,台湾文艺工作者的合作问题等等。在这场文学讨论中,杨逵起到了指导和团结文艺工作者的作用。

杨逵对于台湾文学的重建,一向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持之以恒的实践行动。早在1946年5月的《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上,他就发表了《文学重建的前提》和《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两篇文章。杨逵的文章敏锐地意识到台湾文学停顿的现实与症结,并深入发掘其根源,提出批评和对策。针对文艺界包而不办的坏风气,杨逵提出推行民主主义的文学举措;针对殖民地台湾造成的语言混乱问题,杨逵提出应成立强而有力的过渡期翻译机构;针对作家缺少发表园地的问题,杨逵倡导“创造以大众的支持为基础、公正不偏的舞台”;针对缺少文化交流的问题,杨逵认为弥补这条鸿沟,需要从作家交流、刊物和作品交换等方面具体做起;针对文艺界缺少团结的问题,杨逵呼吁成立自主、民主的团体,同时和全国性的组织“文联”汇合。杨逵对当时文坛现状的尖锐批评和热切期盼,是“希望藉此能扮演新文学建设的基础角色。”^①

^① 杨逵:《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原载《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第3期,1946年5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3页。

二二八事件之后,经历了社会风雨和个人情感经历的巨大起伏,杨逵对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信念更加痛切和强烈。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发起的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中,杨逵作为主要倡导者,始终走在文坛前面。1948年3月28日,“桥”副刊以《桥的路》为题,举办副刊作者第一次茶会,杨逵在会上发了言,次日又发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4月3日,“桥”副刊以“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为题,召开副刊作者第二次茶会,这个议题,与杨逵3月29日的文章内容完全吻合。杨逵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发出了消除省内外隔阂、共同再建属于中国新文学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呼吁。杨逵的发言直接推进和带动了“桥”副刊的讨论,引发了文艺界的回声。当年的“银铃会”成员林亨泰,曾经谈到自己参加讨论的缘起:“因杨逵的呼吁而投稿。杨逵向歌雷呼吁为本省作者提供发表空间,请人翻译本省作者的文稿。”^①另一位讨论参与者孙达人,在回忆“桥”副刊讨论时,也特别提到杨逵的影响力:“由于《桥》的媒介,杨逵首先参与,也由于杨逵的转介为省外文学爱好的人们打开了了解过去台湾文学活动的窗户。”^②杨逵在这次讨论中,发表了《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台湾文学”问答》、《桥的路——第一次作者茶会总报告》、《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第二次作者茶会总报告》、《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等一系列文章,多方面阐释自己的文学重建观点。

杨逵倡导并参加这次讨论的宗旨非常明确:即在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来鼓励和重建台湾新文学;而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则是中国新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寄希望于讨论的拳拳之心:

① 有关林亨泰的访谈,见许诗莹:《战后初期(1945.8—1949.12)台湾文学的重建——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为主要研究对象》,(台湾)中兴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9月,第244页。

② 孙达人:《〈桥〉和它的同伴们》,《喋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第6页。

因为这次关于“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是我提起的,所以这事情与经过我负有说明的责任……我以诚恳的心情告诉,为提起此一问题与参加这一次的讨论,我始终是纯洁的,为求台湾文学的充实与广泛的发展以外更没有什么作用与背景。我很坚信,为求一国的文学的充实与发展,地方文学与个别的文学(比如农民文学等)的充实与发展是不能忽视的。在中国领域里,鼓励个别文学的充实与发展,即是中国新文学的充实与广泛的发展,只有这努力,才得珍惜我们的固有光辉和心血。以上是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我的意见和信念。^①

杨逵的台湾新文学重建观点具体有三:

首先,在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定位和评价方面,杨逵从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出发,从台湾新文学血与泪凝结的情感和经验出发,给予其热情的肯定。

杨逵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受到了当时遍布全世界的民族自决风潮以及中国的五四运动影响,“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我们是有着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那时候,文学确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的,它在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上,确有过一番成就,也有它不可磨灭的业绩。”^②“台湾文学的主流都是反帝反封建

^① 杨逵:《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原载《中华日报》“海风”副刊,1948年6月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2—253页。

^② 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2页。

的,在民族观点上都是表现着向心性的。”^①

其次,在台湾与中国、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上,杨逵立足于台湾本岛的历史与现实,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格局与趋向,辩证地阐释了两者之间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杨逵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②“回顾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过去,我们可以发现的特殊性倒是语言上的问题,在思想上的‘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这一点,与国内却无二致”。^③台湾由于被异族殖民的特殊历史和生存环境,汉语创作被强行废弃,这又形成台湾文学的一种特殊性。想对台湾文化运动做贡献的人,“必需深刻的了解台湾历史,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感情,而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这就是需要‘台湾文学’这个名字的理由。”^④关于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及其应有的努力方向,杨逵则具体提出了“反映现实性的真实感,打破伤感的低沉气氛,努力文艺深度的感动”之主张。

再次,针对当时台湾文坛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应对策略,杨逵提出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台湾光复之后,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巨大转折,政治上的变动造成了台湾文学工作者普遍的恐惧与不安;使用中文的陌生和困难,也让作家的写作空间一度受到制约,文学的重建限于停顿状

① 杨逵:《现实的我们需要一次嚷》,原载《中华日报》“海风”副刊,1948年6月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1页。

②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8页。

③ 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第二次作者茶会总报告》,原载《台湾新生报》“桥”百期扩大号及101期,1948年4月7日、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47页。

④ 同③,第147页。

态。痛感于“台湾文艺界不哭不叫,陷入死样的静寂”,杨逵认为:“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他呼吁言文一致的语言表达,倡导贴近现实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希望各作者到人民中间去,对现实多一点的考察,与人民多一点的接触。”^①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杨逵,常常以行动者的角色深入到社会、民间和现实生活中,多方面地推展文化运动。他四处奔走呼吁,支持岛内的歌咏、舞蹈、戏剧以及文学创作活动。杨逵曾倡议台湾大学的麦浪歌咏队举办“文艺为谁服务”的座谈会,鼓励“银铃会”的青年作家深入工厂农村,了解社会现实。据“银铃会”成员萧翔文回忆,杨逵曾给予他们深刻的启发:

杨先生在担任“新文艺”主编时,大力提倡“用脚写”,意思就是要写自己亲自经验的事情,这样写出来才是“真”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足以有力量去感动他人,让他人产生出力量。^②

有感于两岸之间存在的“澎湖沟”,杨逵对于消除省内外隔阂的问题,表现出更为热切和积极的关注。他多次呼吁,“不管内地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今天需要联合一块儿,竭力找寻一条路,““大家都需要通力合作以便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因此大家就需要互相了解,深切的交流。”^③“因此,我由衷地向爱国忧民的文学工作同

^① 杨逵语,见歌雷《桥的路》,收入《1947—1949 台湾文学问题论文集》,(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0页。

^② 萧翔文:《杨逵先生与力行报副刊》,《台湾诗史“银铃会”论文集》,(彰化)台湾磺溪文化学会1995年6月版,第82页。

^③ 杨逵:《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原载《中华日报》“海风”副刊1948年6月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2页。

志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①

杨逵把加强省内外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和交流,看作是将台湾新文学发展为中国文学一环的重大工作之一。在文化实践中,杨逵更是身体力行,用自身行动促进文艺界的团结合作。从光复初期与大陆文艺青年王思翔共同主编《文化交流》,到1948年8月集合不同省籍与世代的左翼作家创办《台湾文学丛刊》,再至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文学重建的积极建言,都可看出杨逵对省内外文艺界团结、两岸文化交流的一贯努力。

然而,随着1949年的全省动乱,《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讨论戛然中断,诸多文艺界的志士仁人不幸被捕入狱,杨逵的文学再出发转瞬间变成了绿岛梦魇。

这之后,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先是经历了戒严时代强权政治的挫杀,又被“台湾意识文学论”所扭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成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直到90年代末期,经由人间杂志社的有识之士力尽艰辛,重新发掘了这批珍贵的文学史资料,并结集为《1947—1949台湾新文学问题论议集》,才将这场讨论的完整面貌公诸于众,这无疑是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澄清和还原。

总的来看,1947—1949年的台湾文坛,尽管有着高压政治留下的痛苦记忆,但《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却以勇敢的探索精神和携手并肩的愿望,留下了政治黯淡岁月里两岸作家结盟文坛、重建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见证。

^① 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新生报》,1948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4页。

第六章 小说世界：以文学见证历史

小说,无疑是杨逵文学创作的重镇。杨逵一向视文学为社会运动的延伸,藉由小说的传播更真实生动地唤起民众,去发现社会的弊病和问题,进而引发改造现实的行动,引导民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益和社会的美好前景而斗争,这就成为杨逵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使杨逵对于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始终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自觉意识,他的文坛地位,也首先是从小说领域确立的。小说,不仅成为杨逵普罗文学观的实践场域,更凝聚了他对于殖民地台湾的血泪经验和人生期待,寄托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悲悯情怀和审美理想。

杨逵一生创作小说四十篇,生前公开发表的有二十六篇,另外十四篇则为从未发表过之手稿。以创作的文学工具区别之,可以分为日文与中文两部分,前者为日据时期的写作,杨逵的小说实践主要是在这一时期。从二十二岁的杨逵于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样办才不会饿死呢?》,到五十二岁的杨逵于1957年6月在绿岛监狱完成他最后一篇小说《才八十五岁的女人》,这期间,杨逵小说创作的起始与终结足足相隔了三十年。

三十年的小说生涯中,尽管杨逵以《送报伙》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又因《压不扁的玫瑰花》成为年轻一代仰慕的抗日英雄,但杨逵

心中还是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日据时期,杨逵曾经有将《死》、《红鼻子》以及《剃柴团仔》三篇作品写成大河小说的计划,但最终却只写到第一章而无下文。^①光复以后,正值人生壮年的杨逵,在1946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鹅妈妈出嫁》之后,也曾雄心勃勃地计划多写几篇小说,以历史见证者再现台湾的历史影像和社会现实风貌。更何况,作为小说家的杨逵,毕竟留给小说史的作品数量还不够丰富,毕竟还没有从容而完整地实现长篇小说的创作心愿。然而,漫长而辛酸的日据时期,不断剥夺杨逵这一代作家的生存权利和写作空间,并造成艺术的“难产”和低产;原本渴望在战后初期的文学再出发,又不幸因绿岛冤狱而中断。这一切,诉说着小说家杨逵无法自由伸展创作理想的太多遗憾与愤懑,更见证了台湾一代新文学作家颠沛流离的时代命运。

一、主题形态：殖民地创伤与抗争精神

杨逵的文学创作,缘起于创伤性的殖民地生存经验。

日据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异族统治造成的殖民地痛苦,以及被压迫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台湾人的

^① 《死》曾连载于《台湾新民报》,1935年4月2日至5月2日。依据杨逵的创作底稿来看,原名为《贫农的变死》,是长篇小说《立志》的第一章,以台湾话文书写,许多修改的部分将台湾话文改为北京话文,可能是赖和的笔迹。其五章的标题依序是:“立志”、“苦斗”、“慈善家的假面具”、“迷梦”、“曙光”。依第一章情节的发展来看,杨逵有意将自己参加农民组织的斗争经验融入其中,可惜未能完成。

《红鼻子》为日文作品,发表于《台湾新报》1944年4月以后,是长篇小说《侵略者》第一部分。此在杨逵剪辑报资料中所发现,剪贴封面里有杨逵笔迹条列长篇小说《侵略者》之五章标题如下:“1. 赤鼻,2. 牺牲,3. 侵略,4. 若人,5. 新生”。目前仅见《红鼻子》一章。

《剃柴团仔》写于1932年4月14日,为台湾话文创作,未曾发表。

生命过程。对于杨逵而言，他在十岁那年所感受到的创伤性童年经验，也就是1915年家乡台南一带发生的噍吧哖事件，则成为影响他一生志向和文学创作的精神根源。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残酷的大屠杀，除了引起杨逵强烈的仇恨，还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象。而中学时代读到日本人秋泽鸟川所著《台湾匪志》激起的心灵震撼，却更令杨逵精神轰毁。多年之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我的回忆》、《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经验》等一系列文章里，杨逵多次提及这些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①

明明是对日本压迫政治的反抗，但在书中却被当作“匪贼”来处理，我深感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我决心研读自己所喜欢的小说，并想藉小说创作，来矫正这被歪曲的历史。^②

痛感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力与谎言，震惊于权力话语对历史的编造和歪曲，杨逵乃萌发强烈的创作冲动。通过文学叙事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还原和见证殖民地台湾的生存真相，就成为他创作的

^①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8页。

^② 戴国辉、若林正文：《台湾老社会运动家的回忆与展望——杨逵关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的谈话记录》，原载《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72页。

最初动机,并延伸出他一生追求的文学方向:

我生长在日本的异族统治下,我成人以后从事的无论是实际行动的文化运动、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以至后来的文学创作,无不是跟我整个反侵略、反帝国主义政策、反阶级压迫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有关,直到今天,我的文学观依然如此。^①

正是基于用文学书写解构殖民叙事创作动机,杨逵一生都在以“放胆文章拼命酒”的抗争姿态,来写那种“反映时代,带动时代”的小说,这使他与赖和一道,成为台湾抗议文学传统的开创者。

走进杨逵的小说世界,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在讲述殖民地人民的创伤性经验,都在抗议残酷的殖民统治制度。这无疑构成杨逵小说具有统摄意义的主题指向。

杨逵的小说,一向以反压迫、反殖民的精神而著称。赶走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我国土,这是杨逵最为关心的主题,他的批判锋芒,直逼日本殖民体制和殖民政策,有一种怒目金刚式的抗议和直捣黄龙之勇气。与同时代台湾作家相比,同样是表现对日本殖民者的抗议,杨逵有其独特的侧重点。如果说,赖和是以深沉的控诉力量,去揭露日本殖民者给台湾同胞带来的灾难;那么,继承了赖和抗议精神的杨逵,则是站在揭露与控诉的立场上,更着力描写了台湾人民不断走向觉醒与斗争的希望和远景,启示人们执著于坚定的行动力量,寻求光明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龙瑛宗认为,杨逵的小说“是指示历

^① 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0页。

史进路的文学,是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心上点燃一盏灯的文学。”^①他对于日据下台湾人民苦难命运的承担,他对于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路线的坚持,“他的道德勇气与文学实践,形成了一块不可毁灭的里程碑,是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②

殖民地的屈辱和创伤,这是留在杨逵心中最深的历史记忆。日本统治台湾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上采取行政、军事、立法三权集中的独裁式军人统治,经济上推行掠夺台湾资源,扩大本国产业规模和消费市场的殖民经济政策;教育上实行差别教育的民族歧视政策,文化上则通过“皇民化运动”,泯灭中国的民族文化形态和传统记忆,把台湾人民变成没有自己祖国的顺从日本殖民者的“皇民”。杨逵小说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特别凸显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的生存状态:那就是弱小民族的贫穷与悲哀。

各种各样的贫穷经验在杨逵笔下得以真实呈现:

其一,饥寒交迫的境遇。

强烈的饥饿感,无时无刻不在袭击着沦落到赤贫的穷人;勤劳劳作的底层人民,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杨逵1927年9月发表于东京《号外》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就是《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样办才不会饿死呢》?它把“生存还是死亡”的现实命题尖锐地提到了人们面前,因为劳动者没有饭吃成为了那个时代巨大而普遍的真实。且看《难产》一篇中,陷入困境的父亲和四岁女儿最常见的生活一幕:

白天和傍晚做饭的时刻,女儿打开米桶看,把空桶打得

① 龙瑛宗:《血与泪的历史》,原载《中华日报》1996年8月29日。

② 张恒豪:《不屈的死魂灵——杨逵集序》,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3页。

当当响,大叫着:“没有米呐!”

每次我都停下工作,怒吼:“守俄,别叫!”

女儿提着洗干净的饭锅,显出讶异的神色,迈着小小的步伐靠过来,反复说着:“没有米呐……”。

每当那时,我就穿着上衣边说:“等等!这就去买米……”说着便走出去,但一个多小时后,又空着手回来。

女儿坐着,靠着门抽抽嗒嗒地哭诉着:“肚子饿……肚子饿”^①

因为贫穷,花农林天和只能穿着一双走起路来咣答作响的破旧鞋子去推销花木(《破旧的鞋子》),《难产》中的一家人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还有更多的农民,如同“憨金福,虽在名字里有金又有福,实在他既没一文钱,又没一丝福。”(《模范村》)。

其二,疾病的阴影。

缺匠少药,疾病蔓延,构成殖民地台湾的另一种生存景象。《无医村》描写一条满是名医的街道,穷人们却求医无门,像僵尸一样死掉;《灵签》中贫苦的劬嫂,半年之间,她的三个孩子相继被营养不良夺去生命;虽然求来灵签保佑,仍然逃脱不了怀孕流产的命运。《难产》中,那个在一贫如洗的家境中出生的孩子,罹患先天性眼疾,导致眼球腐烂,而他的父亲则身受肺结核病菌的侵袭。从《泥娃娃》里自幼不断生病的小孩,到《不笑的小伙计》中那个虐疾缠身、却无钱买药的花农独子;从《长脚蚊》里高烧不退的女儿,到《鹅妈妈出嫁》中咯血而死的林文钦,疾病的书写遍布杨逵笔下,让其小说成了一部“疾病备忘录”。

^① 杨逵:《难产》,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至第4号,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4卷(小说卷·I),(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235页。

事实上,日据时期的台湾民众面临的两大困扰,除了日本人的压迫外,应当算是疾病了。“疾病在卫生水准甚低的当时,侵袭着岛上的居民,几乎岛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均曾患过疟疾。”^①杨逵在疾病环伺的环境中成长,一再遭到病魔打击。从小目睹了一姊二妹一弟四人数年间相继病死的惨相,自己也因体弱多病,被人取了“鸦片仙”的绰号,在同龄的孩童中,成了很突出的弱小者。初为人父,经历了长子资崩先天不足、身染痼疾的苦痛;中年时光,遭逢《台湾新文学》被查禁打击,开始咯血,从此被肺癆缠身 20 余年。

日本殖民者口口声声标榜,他们将现代医学带进了台湾,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伴随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而来,它决非以改善台湾民众生活环境为目标,中下层阶级的百姓并不能分享这种“现代化”的好处。《无医村》最典型地触及了这种现象:没钱请医生看病的贫民,从现代医学那里得到的只能是一纸死亡诊断书;殖民地台湾现代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以及现代医学伦理的虚妄,给那种缺医少药的殖民地现实做了真实的注脚。更何况,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疯狂剥夺,本身就是制造台湾人民贫穷和疾病的祸源。如果说,杨逵生命的个体经验构成了疾病书写的第一重层面,那么,有关殖民地台湾的整体经验则提供了这种疾病书写更为深广的背景:正是日本的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巨大的社会病灶,让“台湾的春天”变成丧失免疫力的病弱肌体。“那儿表面上虽然美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恶臭逼人的脓底进出。”^②

其三,土地的大量流失。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扩张自己的糖业帝国,导致台湾社会“米糖相

^① 杨逵口述,王世勳笔记:《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2页。

^② 杨逵:《送报伙》,原载《文学评论》第1卷第8号,1934年10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8页。

克”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激烈。制糖会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资本家大肆掠夺土地,农民因此失去耕地,沦为制糖会社或地主农场的佣工。而制糖业的经济利益,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日本财阀所垄断。台湾农民辛苦拓荒,如同《模范村》农民憨金福所“开垦的那块土,父子两代,费了多少功夫,下了多少本钱!家里的东西全部卖光了不说,还要天天到镇上挑大粪,载垃圾来作肥料,好容易把这块满是石头的荒地弄成了熟田,那么好的水田”^①,可它却被地主强行霸占,转租给日本糖业公司。因为殖民当局要促进产业的发展,就强行要求一向只把水牛当作耕牛饲养的台湾向华南输出数以千计的水牛。结果不仅没有促进产业的发展,反而让疲惫已极的农村现实,陷入了更加破败的局面。《水牛》中那个失去了水牛的佃农女儿阿玉,所经历的正是台湾乡村这悲惨的一幕。

《送报伙》中杨君的家破人亡遭遇,更是在日本财阀强行掠夺土地背景下发生的典型悲剧。

杨君的父亲因为抗拒日本制糖会社低价征用土地,被定为“阴谋首领”的罪名。“拖出去,这个支那猪!”父亲被抓到警察局六天后,带着满身伤痕含恨而逝,弟弟姊妹也相继夭折。母亲上吊自杀前,留给在东京漂泊、求学的儿子一封遗书,其中写道:“村子里的人们底悲惨,说不尽。你去东京以后,跳到村子旁边的池子里淹死的有八个。像阿添叔,是带了阿添婶和三个小儿一道跳下去淹死的。”^②

特别可恶的是,日本财阀这样掠夺台湾的土地资源,逼死无辜的农民,他们还居然口口声声宣称是为村民着想,并制造出一套殖民者的强盗逻辑:“公司的这次计划,彻头彻尾是为了本村利益。对于公

① 杨逵:《模范村》,写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的东京近郊鹤见温泉,作品几度修改发表。见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56页。

② 杨逵:《送报伙》,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8页。

司底计划,我们要诚恳地感谢才是道理!……公司选定了这个村子,我们应该当作光荣的事情。”而对于不肯就范的村民,日本警察则吼道:“听说一部分人有‘阴谋’,对于这种‘非国民’我是决不宽恕的。”^①这幅农村场景所提示人们的,一是殖民者对自己侵略逻辑的合法化和殖民话语的霸权化,它的背后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等级分明的位阶关系和强弱悬殊的对立关系,是失去了祖国的弱小民族哀而无告的可悲现实。二是日本统治者对台湾殖民地历史的扭曲和篡改过程。从抗日领袖余清风、林少猫以“匪徒”罪名被杀害的历史记忆,到杨君的父亲被日本警察强行由“农民”——“阴谋首领”——“支那猪”的现实置换,写尽了殖民地台湾无从言说的历史。而杨逵,他痛感于台湾历史被篡改的沉重,他志在用文学书写解构殖民叙事的决心,也尽在字里行间。

其四,死亡的威胁。

杨逵一生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惨相,它们不断地呈现在作者的小说里。从童年岁月亲历手足四人夭折的死亡经验,到噍吧岬村民被屠杀、大目降街头小贩杨傅被打死的恐怖记忆;从中年时代目睹日本警官入田春彦自杀的死亡震撼,到二哥杨趁自杀、父母相继病逝的情感创痛,杨逵一生挥之不去的死亡记忆,写照的正是殖民地台湾最深层的苦难经验和命运归宿。

杨逵的小说,以各种各样的死亡景象,诉说着一个同样的死亡主题。《送报伙》里,父亲被打死、弟妹饿死、母亲自杀,转眼之间,家破人亡的杨君变成了孤儿;《无医村》里,得了瘟病的穷人只有死路一条;《蕃仔鸡》里,被日本老板强奸的台湾下女素珠不敢告诉亲人真相,只能以上吊自杀解脱自己;《模范村》里,日本警察制造的所谓“模范村”,把被剥夺一空的村民憨金福逼得跳了河;《鹅妈妈出嫁》里,知

^① 杨逵:《送报伙》,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37页。

识分子林文钦则是报国无门，咯血而死。在《死》这篇小说里，死亡之痛更是被推向了极致。农民阿达叔因为欠缴佃租，被地主逼得卧轨自杀，破碎的尸体惨不忍睹。而日本警察左藤用剑鞘掀开包尸体的草包，看到阿达叔的头置在两腿中央，胸放在脚下的时候，竟然大笑起来：“嘻！排叠得真凑巧！头壳走来在××的下面！”井上公医也以戏谑的口吻评论道：“脚手这么细小，真是贫弱的人呀！看起来怕一日无食一顿饭、营养才这样不良。这样的人还是死了干净。既不能做工、活着空秽地面。”^①如此触目惊心的场面，形形色色的非正常死亡，底层劳动者形同草芥般的人生命运，特别是殖民者对被压迫者居高临下的丧尽天良的“凝视”和“他看”，呈现出殖民地台湾最悲惨的一幕：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下，被压迫的台湾人民，在遭受政治强权、经济压榨、法律不公，以及差别教育种种不平等命运的同时，弱小者的生命权，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强权者剥夺。

杨逵的小说，不仅呈现了形形色色的殖民地苦难，更凸显出殖民地台湾不屈的反抗意志，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揭露与批判，并体现了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双重觉醒。

《模范村》通过对日本殖民当局建造所谓“模范村”的描写，揭露了“共存共荣”样板背后上演的台湾农村悲剧，并特别表现出抗日志士阮新民在阶级反抗和民族反抗方面的双重斗争。小说中，殖民统治者为了夸耀现代化给台湾农村带来的所谓恩德，便由泰平乡的日本警察和大地主阮固互相勾结，出面打造“模范村”。强权者把村民编成“保甲民”，随时随地无偿地征用劳动力。他们先是在一大片良田里强行修筑一条十多米宽的“保甲路”，又开辟了与其交叉成十字的20米宽的“纵贯道路”。“模范村”的样板路换来了那些公共汽车、

^① 杨逵：《死》，原连载于《台湾新民报》，1935年4月2日至5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4卷（小说卷·I），（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279—280页。

卡车、摩托车的驾驶人和他们的主人的衷心称赞,换来了木村警长的地位升迁,而给农人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小说写道:“在各十字路口立起‘牛车禁止通行’的禁牌时,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开的路,不让我们的牛车走!’”^①为了追求所谓“模范村”,官方命令村民整理周围环境,水洼要填,杂草要除,竹林超过屋顶高度的部分要剪掉,连房屋附近的凤梨、香蕉,也都被残忍地砍掉。他们还强迫农民自家出钱建造铁窗栏和修水沟,购买日本神牌和“君之代”的挂幅,这对于贫穷的农民,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至于造成憨金福的走投无路,投水自杀。

富有正义感和抗日精神的阮新民东京留学归来后,看到贫富不均的乡村和殖民地台湾的破败,很快与他的地主父亲阮固形成势不两立的阵营。阮新民鼓动村民们:

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愈来愈大,手段愈来愈辣,近年来满洲又被她占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的命运。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我父亲这种作风确是忘祖了。他不该站在日本人那边去,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②

阮新民在反抗台湾殖民地统治的过程中,最终前往大陆,投身到全国同胞抗日救亡斗争的潮流之中。

《无医村》通过一个贫苦青年得不到医治而死亡的遭遇,对日本殖民统治下不合理的医疗制度大胆谴责:“这政府虽有卫生结构,但到底是在替谁做事呢?”《泥娃娃》写的是几个孩子用泥巴塑造日本人

^① 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37页。

^② 同^①,第259—260页。

的飞机、大炮、军舰和士兵，彼此间互相开战的故事。小说一方面以沉痛的口吻，传达出殖民地儿女的精神之痛和生命悲哀：“不，孩子，再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事了”；另一方面，他又以情绪激烈的言辞，象征性的小说结尾，表现了对殖民者的蔑视和对侵略战争的厌恶情绪：

如果以奴役别的民族，掠取别国的物资为目的的战争不消灭；如果像富岗一类厚颜无耻的鹰犬，不从人类中扫光，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光明和幸福的一天！

当天夜晚，一场雷雨交加的倾盆大雨，把孩子的泥娃娃们打成一堆烂泥……^①

《鹅妈妈出嫁》中，曾经留学东京研究“共荣经济理论”、呕心沥血撰写专著的林文钦，他要追求的那种“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的共存共荣，在殖民地台湾根本无法实现，到头来只能落得家破人亡、咯血而死的悲剧。日本人鼓吹的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真相，恰恰是“不存不荣”的现实。林文钦的结局造成了小说中另一位知识分子“我”的觉醒：只有消灭侵略、压迫和剥削，才能有真正的人生出路。

1942年的台湾，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被日本殖民当局推向“决战体制”之际，杨逵利用殖民当局内部的矛盾和一部分有正义感的日本人的厌战情绪，应当时《台湾时报》编辑植田的约稿，创作了《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这类内蕴抗日情绪的作品。杨逵说：“我给他写了《泥娃娃》和《鹅妈妈出嫁》，我的意图是剥掉它的羊皮，表现这

^① 杨逵：《泥娃娃》，原载《台湾时报》第268号，1942年4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4页。

只狼的真面目。”^①

杨逵小说的抗议主题,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往往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民族意识,站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立场,去谋求超乎种族的阶级团结,这使他的作品多有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相互交叉甚至重叠。杨逵的代表作《送报伙》写于1932年,这是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各种组织和刊物被破坏的白色恐怖时期,也是杨逵生活上最为失意和潦倒的时候,但是生活环境的困难并不代表杨逵精神上的潦倒,他仍然写出了极具精神力量与思想含量的扛鼎之作。

《送报伙》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两条故事线索,一则讲述台湾青年杨君即“我”在日本的生存打拼和心智觉醒,表现日本本土的资本家对劳工的欺诈和剥削;另一条线索则回忆“我”的故乡台湾地狱般的农民生存真相,揭露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残酷掠夺。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互动,突出了杨逵左翼思想中的世界性阶级视野。杨君为寻求殖民地台湾的救赎之道来到日本,却在报馆老板的残酷剥削下生计无着;走投无路之际收到家信,得到的竟是家破人亡的噩耗。在杨君陷入绝境的时候,是日本进步工人田中伸出援手,动员他参加反剥削反压迫的劳工运动。杨君的阶级意识也在此时开始觉醒:

在故乡的时候,我以为一切日本人都是坏人,恨着他们。但到这里以后,觉得好像并不是一切的日本人都是坏人。

而且,和台湾人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似的,日本人也一样。

诸如小说中日本进步工人田中所说的那样:

^① 杨逵:《鹅妈妈出嫁·后记》,《鹅妈妈出嫁》,(台北)香草山出版公司1976年5月版,第216页。

不错,日本底劳动者大都是和田中君一样的好人呢。日本底劳动者反对压迫台湾人,糟踏台湾人。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像你底保证金抢去了以后再把你赶出来的那个老板一样的畜牲。到台湾去的大多数是这种劣根性的人和这样畜牲们底走狗!但是,这种畜牲们,不仅是对于台湾人,对我们本国底穷人们也是一样的,日本底劳动者们也一 样地吃他们底苦头呢。^①

由此,杨君逐渐明白了,无论台湾岛上还是日本国内,都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分;为了谋求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全世界的劳动者只有携手联合,才能对抗凶恶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后来他决定返回台湾,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篇小说超越了当时台湾文学的水准,不仅启示人们探求积极向上的历史进路,还以高度的民族主义和朴素的国际主义的结合,开拓出一种高远深刻的思想境界和阶级胸怀。正因如此,《送报伙》得以在30年代的日本文坛获奖,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广为影响,并被大陆的左翼作家胡风所关注和翻译。当年的台湾文坛,不仅赖和对《送报伙》的获奖与传播感怀落泪,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有同感,因为这是殖民地台湾的作家,第一次在世界文坛上传达出弱小民族的文学之声。正如作家赖明弘在《文学评论》的“读者评坛”中所表达的那种心情:

经过重重困难,虽然比朝鲜晚了一年,我辈的台湾作家终于得以在日本文坛出头。当我在《文评》看到杨逵的名字

^① 杨逵:《送报伙》,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5—56页。

时,当真欢喜到无法言语。为了能在日本文坛出头,我们都竭尽心力地在努力。^①

杨逵小说的抗议主题,其独树一帜的地方还在于,在最黯淡最孤独的殖民地台湾的生存境遇中,其小说燃起了一丛丛的篝火,让希望、信念和光明温暖人心,唤起被压迫者对于斗争之路和未来前景的行动力量。这种小说是杨逵对人道的社会主义信仰的期待,也是他在真实的写实主义基础上融入的理想色彩。在作者笔下,杨君返乡之际立志成为拯救台湾斗士的决心(《送报伏》),辛勤耕耘的妻子盼望投身社会运动而坐牢的丈夫归来的期待(《萌芽》),还有石头缝里抽芽开花的玫瑰花(《春光关不住》),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杨逵传达的希望所在,力量所在。正如《模范村》里那个病弱的乡村教师陈文治,在抗议殖民统治的团结斗争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行动力量:

他们摸索着路走,互拉互牵着,每个人的心都激动得很厉害。

很久很久,他在灵魂的空虚中发闷,今天却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注入了他的周身。他感到快乐,体会到生活的意义。

“他们在我困苦的时候,拯救了我。我也得拿出我最大的力量,为他们……”

他自言自语地站了起来。山后一道霞光,已经透过窗口射了进来。^②

^① 赖明弘语,转引自施懿琳等合著:《台湾文学百年显影》,(台北)玉山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67页。

^② 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97页。

这种在最黯淡的现实中也要留下一些希望的种子的写法，杨逵说：“我认为可以称为理想的写实主义。意思是说：不迷失在黑夜中，做一些准备工作来迎接将要到来的早晨。”^①

二、形象塑造：殖民地台湾的人物画廊

杨逵小说的中心视点是人物的。

带着历史的烟尘和殖民地台湾的现实色彩，各种各样人物走进了杨逵的小说世界。从农民、樵夫、园丁、工人、送报伙、缝纫工、下女、乞丐，到教师、作家、医生、画家、斗士、留学生；从警察、财阀、老板、公医，到地主、巡查、奴才、御用士绅，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应有尽有。杨逵以写实手法为这些人物画像，一幅幅生动逼真的人物素描和世态写真，也就有强有力地还原和再现了殖民地台湾的社会生活面貌。

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尽管他们身份不同，角色多元，但都个性鲜明地生活在杨逵的小说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哭着、笑着、思想着、行动着，用他们自身命运的悲欢离合，人理想生死歌哭，举手投足的行为方式，传达着作者对殖民地台湾的现实诅咒，以及对美好人性和未来社会的深深期许。

杨逵的小说大多描写殖民地时代的台湾，而当时社会中的四个主要阶层人物及其关系，不可避免地进入杨逵的创作视野，并引发他对于殖民者、走狗、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民众的社会思考和文学想象。这些人物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有其性格生成的现实规定性，并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相依并存。大而言之，日据时期所有人物

^① 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遗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6页。

的关系扭结和矛盾滋生,皆与殖民地台湾的现实发生有形无形的联系,这使杨逵没有无病呻吟的象牙塔之作,笔下的人物都来自生活的第一线,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社会氛围。具体来看,杨逵的小说人物又有着类别的区分,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形象系列。这些人物谱系大致可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女性、儿童、殖民者及其走狗五类,每一类形象的塑造,都蕴含着作者褒贬好恶的情感取向,以及与社会人生、人性的深度思考。

第一类人物塑造:知识分子与启蒙角色。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两种基本品格,一是对理想、正义、真理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二是对不合理现实的质疑和批判,这使知识分子在社会的进程中,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动力,时代良知的代言人。日据时期具有积极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他们承担了殖民地台湾沉重的使命感,或飘洋过海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或立足本土投身台湾社会运动和文化斗争,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唤起台湾民众精神的斗争中,往往充当了一个冲锋陷阵的启蒙者角色。所以,知识分子在殖民地台湾不可或缺的社会形象,他们自身存在的思想性格问题,都会对台湾的社会进程与民众觉醒发生重要影响。

“在杨逵心目中,这些洞察社会之丑态、怀抱热情与理想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通过知识分子的觉悟和义无反顾、不屈不挠的奋斗,社会的光明前途才得以实现。”^①基于这样一种体验和认知,杨逵每每把启蒙民众的责任和改造社会的理想赋予知识分子,让他们成为社会良知的化身。

杨逵几乎每一篇小说里,都有知识分子的身影在活动。作者

^① 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原载《中外文学》第2卷第7期,1973年12月;收入杨素娟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98页。

对其身份的设置,多选择医生、教师、作家、画家,兼及法学士、经济学研究者,在暗含了知识分子对于殖民地民众身体与精神双重拯救的同时,也希望知识分子能够面对殖民地台湾的法律、经济来发言。这些知识分子,一类是土生土长的,如《模范村》中的乡村教师陈文治,《萌芽》中的社会斗士“亮”,他们见证着乡土台湾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力量;另一类是远赴日本的留学生,如《模范村》中的阮新民、《鹅妈妈出嫁》中的林文钦、《水牛》中的“我”等等,他们更多代表了知识分子在新的思想文化视野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成长道路,也反映出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大抵是由海外首先发动的某种规律。这两类知识分子,在投身反抗异族压迫、拯救殖民地台湾的现实斗争中,互为参照和作用,完成了一种精神视野与文化传统的融合。《模范村》里,阮新民给家乡寄来的一箱书报,如《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史》、《土地与自由》、《报纸的读法》、《农村更生策》、《团结就是力量》等等,通过陈文治的讲解和乡村年轻人的学习,完成了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与本土知识分子之间的薪传,陈文治也由此成长为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知识分子。

杨逵笔下的知识分子,突出地表现为两种人生模式。

首先,离乡/返乡的人生模式,大多涵盖了留学海外的台湾知识分子致力于社会拯救的心路历程和行动路线。《送报伙》里的杨君,《模范村》里的学法律的阮新民、《鹅妈妈出嫁》中专攻经济学的林文钦,《水牛》里的留学生“我”,都经历了从远赴日本求学,到返回台湾济世的人生过程。当初的离乡,多是有感于殖民地台湾的现实黑暗,志在寻求人生之路和救国救民真理,就像当年杨逵义无反顾地飘洋过海,到日本去谋“九工一读”的留学生活。而如今的返乡,带着济世情怀的归来,却让他们遭遇精神的困惑和打击。“阮新民出外留学将近十年,怀着很大的抱负回到了故乡,没想到刚回到家,就像走进了

神经病院一般,被成群的疯子包围了,他非常失望。”^①故乡农民的贫困、病弱、衰老,地主父亲的为富不仁,还有日本殖民当局大肆制造“模范村”的荒唐和疯狂,都让归乡的阮新民心情沉重。《水牛》中返乡度假的“我”,原本那种享受故乡山水美景的愿望,一再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佃户缴不起田租,耕地的水牛被强行出口,乡村少女被卖作丫环……《鹅妈妈出嫁》中的林文钦,一心想通过“共荣经济理论”的研究来获得民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等待他的却是“不荣不存”的社会现实。杨逵的《顽童伐鬼记》,还透过一个有正义感的日本画家井上健作的眼睛,来传达他初到台湾的感受:

“学美术出身、对美丽的宝岛——台湾——向往已久的健作,在未抵达这个小镇之前,对沿海景色以及从火车窗外所眺见的自然风光和街上堂皇的建筑物等,的确曾留下很好的印象。但他看到这种情景,再回想起昨晚被跳蚤、蚊子夹攻的事情,不由感到无比失望。”^②

返乡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的失望感,痛切地触及到问题实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越来越走向破败,民众的生存境遇越发走向水深火热。殖民地台湾的凋敝,让返乡知识分子更加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更促使他们采取切实的行动。这就是阮新民们迅速从困惑和失望中走出来,投身社会运动的原因。

其次,从文/归农的人生模式,则主要讲述台湾知识分子在现实生存境遇中的人生选择,这其中带有杨逵浓郁的自我经验色彩,包含

① 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54页。

② 杨逵:《顽童伐鬼记》,原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70页。

了他以文学延伸社会运动的理想,当然也寄寓了他期望知识分子走向乡土、拥抱大地的一种信念。《泥娃娃》中的“我”,一个穷作家,生活在艰辛开垦的花园里,一边在曙光初起时大声吟诵东方朔的赋,一边在夜晚的虫鸣中一页一页地写着自己的小说,始终坚守了不与殖民统治者相妥协的意志。《鹅妈妈出嫁》中那个不愿出卖灵魂的“我”,一个穷艺术家,选择了归农种花,并在为理想而夭折的朋友林文钦那里,激起了新的人生奋斗勇气。在《泥娃娃》、《鹅妈妈出嫁》、《难产》等作品中,“我”是一个在穷困中仍然坚持写作理想的父亲;而到了《萌芽》中的“我”,则是一位独自带着孩子,等待从事社会运动的丈夫从狱中归来的妻子。她从一个热爱文学的女侍者,走向了开荒种花的女园丁;从归农的艰辛劳动中,获得了许多人生的信念和快乐。上述人生模式,写出了台湾知识分子在日本“皇民化运动”高压下决不妥协的心声:那就是以孤竹君的精神,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以归农的劳作,保存“首阳山”的生命!

上述知识分子,在杨逵的小说世界里,担当了启蒙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并以理想的追求,唤起民众,烛照人生。作为杨逵社会人文理想的化身,这些知识分子形象承载着故事推展的力量,是挖掘不公不义、反抗殖民统治的灵魂性人物。《送报伙》里那个一心要拯救台湾的杨君,《模范村》中反抗压迫、坚持抗日的阮新民,《鹅妈妈出嫁》里用生命探寻真正的“共荣共存”理想的林文钦,《泥娃娃》中以“归隐”方式坚持文学抗争的“我”,《无医村》里大胆质疑殖民统治机构的医生,《难产》里忍着饥寒依旧坚持写作的父亲,《春光关不住》中那个呵护着“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数学教师,皆是如此。且听他们的心声:

杨君决心返回故乡,去担当斗士的使命:

能够替陷在地狱边缘的乡人出一点力,救救他们、我们
惟一而最好的法子就是团结,团结才有力量!

(《送报伙》)

面对故乡的贫富不均和殖民地的破败，日本归来的法学士阮新民产生了新的觉悟和行动：

由此使他更憎恶他父亲的强横霸道，剥削穷人。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

你们是应该有田种的。这是你们的权利，我将帮助你们去争取。

（《模范村》）

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陈文治，开始利用农闲时节给村民讲课：

台湾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曾经把台湾占领了，叫台湾同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大家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让人家管，不愿当人家的奴隶，这也是不教自通的道理。

（《模范村》）

在日本殖民当局疯狂推行“战时体制”，台湾处于最黑暗的殖民地岁月的时候，坚守“首阳”之志的“我”这样期待着：

我真巴不得自己写出充满光明、喜乐的作品的日子早些到来，并且以我的真正明朗的作品愉人并以自愉。

（《泥娃娃》）

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无异于社会光明的希望；这些行动的知识分子，正是社会改革的力量所在。

第二类人物塑造：农民形象与土地情结。

杨逵推崇知识分子的启蒙价值,但他心目中的真正英雄是普通民众。只有人民大众,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才能真正承担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动力。杨逵的大众主要是农民。日据时期的台湾处于封建性的农业经济形态,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再加上日本财阀的疯狂掠夺,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却耕者无其田。农民靠种地谋生的基本生存方式,与土地资源被殖民统治当局残酷剥夺的现实发生尖锐矛盾,殖民地台湾的土地争议事件屡屡出现。杨逵从日本留学归来,即是听从台湾文化协会的召唤,返乡参加农民组合运动。这期间,他了解了殖民地台湾最广大最深刻的苦难命运,也从参加农民组合的社会运动中,发掘到一种源自乡土和民间底层的最鲜活的革命力量。殖民地台湾的社会解放运动,必须以广大乡村和农民的普遍觉醒为标志。杨逵一生对农民和土地情有独钟,视劳动为人生第一要义。每每陷入人生困境,政治信仰与文学追求无法兼济天下的时候,他总是选择了“归农”,一如伴他度过漫长岁月的首阳农园和东海花园,这也成为他人理想实践的另一种场域。

杨逵笔下的农民形象,往往离不开土地情结的缠绕。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使农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多从土地权利的争取肇始。《送报伙》中,父亲杨明的反抗,正是源于“我的土地,我要自己耕种才能生活”这种朴素的农人信念。杨明坚决抵抗日本制糖公司变相掠夺台湾土地的阴谋,直到被关押、殴打乃至含悲而逝。憨金福的土地有着父子两代的血汗,却被地主阮固霸占,再作低价转租日本产业公司。作为农村小人物的憨金福,虽然无奈于不公不义的现实,但心中一直藏着愤怒和仇恨。一旦他们觉醒,就会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潜力和强烈的反抗性,如同《模范村》的农民所盼望的:“还不如来个天翻地覆,把世界翻过来,统统死光了好些,省得活受罪。”《模范村》里的贫苦人,接受了留学生阮新民的思想启蒙,聆听了乡土知识分子陈文治的现实教诲,他们决定团结起来,投入到赶走日本殖民者、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之中。这种农民式的觉醒,正是杨逵小说寄希望于大

众发生的结局。

农民自身的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农民从劳动创造中获得的朴素而鲜活的人生理念,农人生活对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精神启蒙,都与土地相关。杨逵的小说歌颂土地和劳动,歌颂像土地一样质朴的农人,又常常把它当作比照知识分子或其他阶层人生弱点的一面借镜,用来进行自身反思。在《归农之日》里,小商人李清亮因杂货店倒闭,与妻子阿却拉着堆满家财道具和婴儿车的板车,上山归农。却不料路途崎岖,脚下一滑,连人带车摔倒。在即将跌下悬崖的危急时刻,是一个很像山贼一样的农人舍命般地救了他们;安家之际,又有朴实热情的农家阿婆无私地帮助他们。对照自己过去经商时某些利己主义行为,夫妻俩发出由衷的感慨:“农人是好人,我一直到二十岁还是个农人的孩子,而且也是个农人。”他们把归农之日的经历看作农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觉得自己要坚强起来,而且在心中发誓,非得做些事情来报答他们的亲切之意才行。”

《蚂蚁盖房子》虽是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却完整地体现了杨逵关于农民、土地与知识分子的深度思考。小说中已经六十八岁的老农民金池爷爷,勤劳、求实、耿直,说话单刀直入,不乏农民式的哲理思考,对蚂蚁的劳动尤其称赞。他用一生积蓄买来五分山地,自己开垦,自己盖屋,种菜种粮,养鸡养鹅,不仅丰衣足食,还帮助意欲继续开荒种花、却犹疑不决的归农文人“我”解决了缺粮断顿的燃眉之急。小说特别写出了知识分子与老农民之间的“互看”:

老农民看归农的知识分子:

光读书,拿书本做靠山,一肚子优越感;开口闭口就说“我是农人”,做起事来却完全没有农人的样子,连农人一半也没有!……吃东西挑剔,像戏子(演员)一样老是在意衣

着,简直就像人的价值是用衣著来衡量的!①

而当归农的“我”与金池爷爷有了深刻交往之后,他发现这位老农民有许多优良品质:

虽然他没有知识,但从前也是有学问的,连现在也常在休息时讲些孔子、老子、墨子的学说。不过,他的职业是日薪工人,就是所谓的苦力,也就是所谓的下层阶级。

和那些囫圇吞枣,不求甚解,自吹自擂,自称是“知识分子”的比较起来,他的态度其实更体面。而且,他为人表里一致……对自己不懂的事……他会打破沙锅问到底,但是,一旦理解之后,他就会言出必行,决不敷衍了事。②

起初,归农的文人不屑于地里的蚂蚁,认为人才是万物之灵长;对金池爷爷赞美蚂蚁勤劳、并要他以蚂蚁为师的告诫很不以为然。可当他眼见老人在五分地上创造了丰收的奇迹,做了土地的主人之后,他不由发出了心底的赞叹:

说起来,这位老人就很像蚂蚁。他像蚂蚁一样,一点一滴存钱买山地;也像蚂蚁一样,如今在自己努力盖好的家中,储藏了丰富的粮食。而我现在还在租来的漏水小屋里,无所事事地一天过一天,为了卖两百公克都不到的杂鱼干浪费半天的时间。

① 杨逵:《归农之日》,中文版本原载《台湾文艺》革新第10号(第163期),1979年7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第221页。

② 杨逵:《蚂蚁盖房子》,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5—246页。

我为自己瞧不起蚂蚁，自傲为万物之灵的生活态度感到懊悔。^①

透过上述描写，杨逵对农民的优良品质的赞美和对知识分子自身弱点的审视批评，不言而喻。

第三类人物塑造：女性形象与大地之母情结。

杨逵对女性的感受和认知，从小受到性格坚毅的母亲的影响；长大后则与他和叶陶的终生为伴直接相关。女性的温柔、宽怀、坚忍和无私奉献，以大地之母的形象，成为他对女性的内心记忆，也温暖了他风雨坎坷的一生。在参加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杨逵有关两性平等、共同奋斗的女性意识逐渐形成，并与他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他和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人物叶陶的结合，更让他领略了新女性的精神内涵和情感世界。叶陶一生跟着杨逵出生入死，经历种种磨难，仍然相濡以沫，无怨无悔，更让杨逵深知女性人生之伟大，生命力量之坚忍。所以，他的小说往往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写女性，那些坚贞的妻子和勇敢的母亲，自然成为他笔下的大地之母形象。

杨逵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离不开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角色。一方面，杨逵写出殖民地台湾女性更为深重的人生命运悲哀，女人的卑下地位使她们经受多重压迫。原本纯真可爱的乡下女儿阿玉，现在面临的是一连串的厄运：相依为伴的水牛被殖民当局强行征集出口，自己被卖到地主家里当丫环，而未来的命运则是被地主蹂躏做妾（《水牛》）；《蕃仔鸡》中的下女素珠，《毒》中写到的妻子，都没有逃脱被日本老板或工厂主强奸的命运；还有半年之内三个孩子相继夭折而祈求灵签保佑的効嫂（《灵签》），以及因为生出了先天性眼疾的儿

^① 杨逵：《蚂蚁盖房子》，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0页。

子而痛苦的妻子(《难产》),她们都苦于生命孕育的悲剧和难以平复的女性心灵创伤。杨逵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更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

另一方面,杨逵着力塑造了那种坚忍的、负重前行的、默默支撑了家庭和人生的女性,其中又以母亲与妻子的形象而见长。作者在她们身上寄寓的,是真善美的生命理想,是男女平等相处、夫妻相濡以沫的现代两性观念。

杨逵小说中的母亲,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母亲形象,大地之母般的宽怀、坚强,构成她们主要的性格特征。一如那个八十五岁的高龄仍在砍柴背草、料理家事,却从来没有年龄困扰的乐观阿婆(《才八十五岁的女人》);又如那个独自在家生活、苦苦等待被强行应征志愿兵的儿子从前线归来的瞎眼阿婆(《犬猴邻居》)。特别是《送报伙》中杨君的母亲,更集中了殖民地台湾无数不肯屈服的母亲形象,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概括和写照。

《送报伙》中的母亲,是一个决断力很强的女子。她那么爱自己的孩子,一想到孤苦零丁飘泊在东京的儿子,“胸口就和绞着一样”。但是当乡下的大儿子当了巡查,开始欺压乡邻的时候,母亲马上把他赶出去,与他断绝了关系。当丈夫为抗议日本人掠夺土地而被殴伤致死、两个小孩子又相继夭折的时候,母亲是以自杀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个殖民地社会的最后抗议。她留给东京求学的儿子的遗书,更是字字血泪,掷地有声:

我所期望的惟一的儿子……

我惟一的愿望是希望你成功,能够替像我们一样苦的村子底人们出力。

村子里的人们底悲惨,说不尽。你去东京以后,跳到村子旁边的池子里淹死的有八个。像阿添叔,是带了阿添婶和三个小儿一道跳下淹死的。

所以,觉得能够拯救村子底人们的时候才回来罢。没有自信以前,决不要回来!要做什么才好我不知道,努力做到能够替村子底人们的出力罢。^①

杨逵小说中的妻子形象,在《难产》、《归农之日》、《鹅妈妈出嫁》等小说中多有表现,尤其《萌芽》一篇,通过妻子写给狱中丈夫的三封信,将一个独自带着幼儿垦荒种花、等待丈夫从狱中归来的妻子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妻子用自己双手创造生活的勇气,她在逆境中与丈夫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爱情,她的乐观情绪和对未来的期许,都让从事社会运动而坐牢的丈夫获得巨大的人生支持。这其中,人们看到的是台湾新女性的成长,新型的家庭模式的塑造。

第四类人物塑造:儿童形象与未来意识。

杨逵的小说世界里,儿童形象实际上是很耐人寻味的角色塑造。它或是成人世界的一种补充,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孩童世界,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小孩子的形象,往往作为杨逵揭露和抗议殖民统治的一种借镜,让人们从孩提角度看殖民地台湾的不公不义,更突出了弱者的悲哀。那个敲着空米桶不停喊饿的小女孩守俄(《难产》),那个因为父亲生病、家庭重压而失去了笑容的小伙计生旺(《不笑的小伙计》),还有那群受战时体制影响、做泥娃娃互相开仗的孩子(《泥娃娃》),都让人们看到了殖民地孩子的一种生存真相。

但更重要的是,杨逵特别写出了孩童的世界,并在其中寄托了一种未来期待,一种乐观情绪和希望前景。《顽童伐鬼记》将一群小孩子惩治恶人、“伐鬼”有方,终于赢得了安心玩耍的场合的故事,写得生动曲折;《鹅妈妈出嫁》的背景虽然是战争气氛高压、物质生存条件极为匮乏的年代,孩子们养鹅、爱鹅、护鹅的童心童趣却依然生动活

^① 杨逵:《送报伙》,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8页。

泼,令人心存希望;《公学校》通过公学校的台湾孩子和小学校的日本孩子的一场群殴,让屡受责罚的殖民统治下的孩子们喊出了“打倒臭狗学校”的口号,从平凡的生活场景见出了新一代的抗争和成长。杨逵在孩子们的世界里,有意撒下一些希望的种子,等待她来年的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孩子是社会的未来,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希望。杨逵在困境中苦苦坚守的,是这样一种未来期待:

只要我不满的现况不从世上消失,无论怎么艰苦都不该抛弃笔杆的。即使是难产,谁敢断言就不会生出生龙活虎般的健壮的孩子呢?不,历练了暴风雨,这些孩子才会更坚强地冲向光明吧。如果下一代不能成功,就让第二代、第三代再接再厉吧——①

第五类人物塑造:“四脚仔”、“三脚仔”形象与殖民意识。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造成了殖民地台湾扭曲的人际关系。以一个地方基层而言,在日警→地主→走狗→佃农之间,形成了层层压迫和制约的关系。杨逵对殖民者、压迫者丑恶嘴脸的勾勒,又以“四脚仔”、“三脚仔”这类人物形象的描摹用力最多。

凡是从日据时期走过来的人都会知道,“四脚仔”、“臭狗”这类称呼,正是日本殖民者的代称。在殖民地台湾,日本警察往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法律的化身自居,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直接体现了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强权政治、经济剥夺、法律不公、教育差别等一系列压迫。而日本产业公司的老

① 杨逵:《难产》,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至第4号,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4卷(小说卷·I),(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234页。

板、工厂主、校长、公医等人物，多是这个阶层的延伸，他们与日警合谋，共同代表殖民者的利益。在杨逵笔下，那些逼着乡民低价“卖地”的山村经理、警察分所主任（《送报伙》）；嘲笑、“欣赏”自杀农民尸体形状的左藤警长和井上公医（《死》）；因为强迫百姓修路、建沟、修铁窗栏而升迁的木村警长（《模范村》），还有《鹅妈妈出嫁》里那个强行夺取孩子们心爱的母鹅的医院院长，以及《顽童伐鬼记》里凶神恶煞、常常唆使恶犬扑咬儿童的工厂主，他们都是殖民主义政策的直接体现者、实施者，也是殖民利益的拥有者。这样的日本人往往被台湾老百姓称为“四脚仔”、“臭狗”。杨逵小时候，在家乡台南一带，就流传有这样的歌谣：“花はせんたん，田舎は警察官”，即最野香的花是苦楝，最野蛮的人是乡下的警察官，由此可见日警形象的蛮横以及台湾老百姓对他们的仇恨。

“三脚仔”的形象，是杨逵小说着力嘲讽和批判的一类人物，这群有着奴才嘴脸的无耻走狗，往往是殖民地台湾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换取金钱和地位，自然会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摇身一变，充当日本统治机器的乡长、村长、巡查和御用士绅，帮助日本人压迫自己的同胞，助纣为虐，成了民族败类。《模范村》里与殖民者同谋的大地主阮固，《送报伙》里充当日本人帮凶的陈巡导、林巡查，《鹅妈妈出嫁》里替当权者帮腔的王专务，以及《犬猴邻居》中，那个经常咆哮百姓的管理人阵辉，那个霸道贪吃、克扣百姓配给物品的甲长刘通，都是这一类殖民者帮凶。此外还有一些趋炎附势的青年人，被殖民当局所奴化，一心想做日本的皇民，忙不迭地改日本姓名，穿和服，讲日语，学日本习惯，惟恐不像。但结果怎么也学不像“四脚仔”的日本人，只能落得个“三脚仔”。如同那个改换日本姓名、以学做日本人为荣的富岗，在台湾人看来，他早已变成了“厚颜无耻的鹰犬”（《泥娃娃》）。

总之，杨逵小说世界中经常活跃的这五类形象，构成了殖民地台湾社会关系的人物谱系。循着它一路走过去，你会发现杨逵的许多

社会理想和审美方式,都真实而生动地复活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这在较多重视生活事件铺陈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三、风格呈现：写实主义的叙事方式

杨逵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涉及多种层面,有其丰富的内涵构成。

1. 文本修改中的叙事演变。

阅读杨逵小说,首先涉及一个版本改写的问题,它与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仍然有着关联。

杨逵多数小说写于日据时期,其作品主题又以强烈的反抗主题为指向,这种创作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往往不能直言发表,而更多以曲笔传达心声。杨逵作品曾几度被查禁,这种情况使他的写作常常意犹未尽,叙事表达的畅快受到诸多制约。加之这些作品多为日据时期里的日文写作,战后重新以中文发表、出版的时候,就面临着翻译修改的问题。从日据时期→光复时期→戒严年代,这漫长岁月里,政治环境变幻不定,杨逵本身命运也在起伏跌宕,如何应对政局嬗变,以保持创作生命的延续呢?在不同时期重新发表和出版过去写作的小说,是原封不动,还是发掘创作初衷,还原自己想写的文字,这都成为研究杨逵创作演变的重要切入点。事实上,杨逵的《送报伏》、《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萌芽》、《犬猴邻居》、《模范村》等重要小说,都存在版本的修改演变问题。在其手稿与发表稿之间,中文版与日文版之间,不同的版本所印证的,正是杨逵的崎岖的心路历程。

对于杨逵版本的修改和演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作者本人的态度十分明确。第一,杨逵提醒人们,要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来阅读作品。诸如 1944 年以日文发表的《犬猴邻居》,当时作者曾注明,在

全岛都以“实践”无私奉公精神为风气的背景之下，他却写出表现乡村管理者克扣配给猪肉和布匹的犬猴相争事实，是大逆不道的。这其中的曲笔隐情，再加上作品极具反讽色调的描写，我们应当能够觉察。1945年光复后，《一阳周报》以中文版本发表《犬猴邻居》时，作者在小说后记中特意声明：

这篇作品，是两年前写成的。为了避开严密的检查制度，曾经费了一番惨淡的苦心，却终于没能逃避得了，而被禁止发表。在自由的青天白日底下，大概有一点好笑吧！可是请诸位用那种心情来读读看！^①

第二，杨逵强调作者对自己已发表作品的修改权利。

日本塚本照和在比照《送报伙》的中日文版本时，发现光复后出版的中文版增补许多抨击殖民政权的内容。塚本认为如此增补修改，是一种不忠实原作的做法。

杨逵反驳说，作者为了顺应自己的思想的进展，以及客观时事的变化，自然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他认为：

1. 在未死之前，我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一直在成长。
2. 为了发表，如果当时说得较激烈些，根本无发表的机会。
3. 为了使现代的读者更加了解我作品中的精神，所以

① 杨逵：《犬猴邻居·后记》，《一阳周报》第9号，1945年，第22页。

有必要修改。^①

其实,中日文两种版本的存在,让我们既能看到殖民地台湾时代作者的惨淡经营、曲笔写作,由此凸显那个时代作家创作的历史语境;同时又能看到杨逵的思想理念与文本叙事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轨迹。这种对照式的版本阅读和研究,或许更能让人把握杨逵的创作全貌。

2. 写实主义的小说叙事。

杨逵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写实主义特质。从取材方向上看,“每一篇都是日据时代到处经常可以听见看见的事,除了《种地瓜》和《模范村》以外,其余大多是我亲自经历过的。”^②这种小说素材的亲历性,使其作品打上了某种自传的色彩。可以说,杨逵笔下的作品,篇篇都有自己生活的影子,句句凝结着生活的真情。《送报伙》中的杨君,带着杨逵漂泊东京时“九工一读”的生活经验;《归农之日》让人看到的,是台湾社会运动挫败时杨逵带着妻子儿女四处流浪的经历;《难产》所写的,是杨逵与叶陶在小说与孩子双重难产困境中的挣扎;《萌芽》一篇,杨逵目睹许多被拘禁爱国志士的家属沉痛颓丧,意在安慰激励这些眷属,坚强起来,面对新的现实奋斗;《鹅妈妈出嫁》、《泥娃娃》都有杨逵首阳农园的生活背景;而《种地瓜》这样的素材,虽然不为杨逵亲身经历,也是当时社会常见的,杨逵曾想:万一有一天我也被抓去当所谓“东亚共荣的皇民战士”,我自己在前线的饥饿中吃蚯蚓过活无所谓,可是家中弱小的子女怎样生存?从这种素材的选

^① 王丽华:《关于杨逵回忆录笔记》,原载《文学界》第14集,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集(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遗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7页。

^② 杨逵语,转引自基聪:《硕果仅存的抗日作家——杨逵》,原载《育才街》(台中一中)42期,1975年;收入杨素娟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82页。

择可知,杨逵的小说完全植根于生活的底层,所有的小说经验都是他人生经验的艺术化。

与这种强化的写实特质直接相关的,是杨逵小说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是杨逵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人称选择。“我”奔波于东京报馆;“我”为艺术的难产而苦熬,为文学的呐喊而写作,为坚守孤竹君之志而劳作;“我”走在归农路上,“我”开垦出美丽的首阳花园……“我”的身影无处不在。第一人称“我”的直接介入,既是小说发展的核心人物,也是观察世界的见事眼睛,它把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真实力量带给了读者,有一种原生态的美感。

3. 写实土壤中的象征意蕴。

杨逵小说中的写实,并非那种一味趋实的生活摹写,而是融进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美好理想和人文情思,融进了源自生活本身的一种浪漫气质和审美情趣,表现在文本的叙事面貌上,就是具有象征小说意象的营造。

杨逵运用象征手法,创造了为数不多的意象,且主要在于花草意象。这种情形与杨逵两度归农,开垦首阳花园与东海花园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这使他笔下的花草意象,来自于大自然的美好赋予,源自于作家自身的生命感悟。

这种花草意象的典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征了“欺负善良的恶势力”,如《鹅妈妈出嫁》中的野草牛屯鬃;另一种是象征了与邪恶势力坚决斗争的正义力量,如《春光关不住》中的“压不扁的玫瑰花”。

《鹅妈妈出嫁》里的牛屯鬃,根须又密又长,每拔起一丛都会带出几株花苗,非费很大的力气和不少的牺牲是铲除不掉它的。“我”用尽全身力气拔,“我”叫来孩子父子俩合力拔,终于把牛屯鬃拔了起来,这时的家人,“好像是尽了心机和力气之后,终于把欺负善良的恶

势力除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而欣然大笑。”^①

这里，牛屯鬃与恶势力相对应，拔草与除害相对应，恶势力的顽固、棘手，使得除害的斗争格外艰难、且充满牺牲。所有这些，是花园劳动的实写，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喻写。

《春光关不住》写光复前夕，行将灭亡的日本侵略者强征劳力修工事，娃娃兵和老师都被派上工地。娃娃兵林建文从水泥块下发现了一株被压得扁扁的玫瑰花，便想方设法将其送到姐姐那里，让这株玫瑰开出美丽的花朵。

选择玫瑰花的意象，用来象征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用来寄托人民对和平、美好与爱的珍视，是“因为一般人普遍对玫瑰存有好感，玫瑰代表和平、代表爱，可是玫瑰本身却也多刺，只要好好的施肥、灌溉，玫瑰会开得很漂亮，可是如果你要任意摧残它，它也会用自身的刺来保护自己。”^②

上述意象的运用，透过表层事象暗喻表现作品的深层寓意，不仅带来艺术上的含蓄内蕴，也可避开特定年代的政治环境制约，让心底的声音得以曲折地传达。

4. 简洁明朗、幽默生动的叙事语言。

杨逵小说写实风貌的构成，也得力于他特色鲜明的叙事语言。

鲜活、真实的生活，是杨逵发掘不尽的语言宝库；而写实作家强烈的思想倾向，又使这种语言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作为一个在社会运动中奔波呼号的斗士，一个在饥寒惊扰中维持写作生命的作家，一个在耕读生活中坚守理想的农园“隐士”，杨逵对文学语言的选择，

^① 杨逵：《鹅妈妈出嫁》，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6页。

^② 杨逵语，见《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访人道的社会主义者杨逵》，原载《前进广场》第15期，1983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70页。

是以大众化、生活化为标准,那些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空洞梦幻的美文是他所摒弃的。来自生活本身的语言,往往以它坚实的质地、明朗的色彩,简洁的力量出现在杨逵笔下,且照样表现出美好生动的思想感情:

种花的人都像天下的父母,谁不想把他们养的花栽培得既茁壮又漂亮!①

围观着鸭子们的表演的孩子们却直乐得手舞足蹈,比看马戏还要高兴。②

在草地上,公鹅走了一步,母鹅也跟着走一步。有时候碰着屁股并排走着,就像要好的新婚夫妻的散步一样,甜蜜蜜的。③

添进是个倔强的青年,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用力把着犁柄,不停地挥着鞭子,吆喝那条老水牛。他仿佛不曾听见父亲的叫唤,连头也不转动一下。只是焦灼地仰望
着白云半遮飘的天空。④

公路上,从早到晚,汽车络绎不绝地在奔驰着,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满身都是污泥的孩子们,每天看到这些漂亮

① 杨逵:《鹅妈妈出嫁》,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5页。

② 同①,第128页。

③ 同①,第130页。

④ 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36页。

的车子在公路上如飞的奔跑，都高兴地呼喊著：

“摩托车，自动车！”

“鹿咯马，蕃仔骑！”^①

杨逵的叙事语言，还多采用幽默讽刺的手法，从殖民当局的奴化政策与台湾现实的极度错位中，来推展出颇具政治讽刺意味的生活图画。诸如，在日本侵略者鼓吹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下，一心研究“共荣经济理论”的林文钦，却是咯血而死，家破人亡的“不荣不存”（《鹅妈妈出嫁》）；那个被官方展示为样板的“模范村”里，竟是农民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悲剧。小说还写到了严格执行“皇民化”规定，村民们被迫供奉日本式神牌，而把妈祖、观音的佛像藏在肮脏的破家具堆里。作者用幽默的语言写村民拜妈祖的情景：

但是，不拜菩萨他们是无法安心过日子的，因而常常把佛像从肮脏的监牢里解放出来，悄悄的流着泪，提心吊胆的焚香礼拜。在这严肃的礼拜中，偶尔听见皮鞋声音一响，便又慌忙地一手抓着佛像的手，一手捏熄线香，匆忙把它藏到床下草堆里去，可怜的观音妈祖竟毫不叫屈。^②

辛辣的嘲讽，含泪的幽默，由此可见一斑。

① 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38页。

② 同①，第288页。

第七章 戏剧天地：以舞台演绎人生

戏剧，是杨逵不可或缺的文学创作领域。借舞台小世界，演绎人生百态，世间万象，杨逵的人生理想与文学观念在其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杨逵的戏剧创作主要集中于日据时期和绿岛时期，他一生共创作了十八个剧本。日据时期采用日文创作，公开发表的有《猪哥仔伯》、《父与子》、《扑灭天狗热》，以及改编自俄国剧作家特洛查可夫的《怒吼吧！中国》等四部剧本。另有一部标明写于“首阳农园”稿纸上的日文剧本《都是一样的啊！》，应当是未曾发表的遗稿。绿岛时期创作的十三个剧本，皆为中文写作，且属于作者生前不能在公开发表的“出土作品”。杨逵在蒙冤入狱、囚禁绿岛的日子里，仍然以十三部剧本惊人成绩，提供了戒严年代里潜在写作的典型案例。杨逵生前，这些剧本虽然被长期埋没于“地下”，杨逵作为戏剧家的形象也不能全然呈现；而“他的过世，代表战后初期跨越时代、跨越语言的台湾剧人已然凋零”^①，却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① 焦桐：《台湾战后初期的戏剧》，（台北）台原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72页。

由于历史的遮蔽以及其他原因,杨逵的戏剧创作,一向是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其实,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小说和戏剧可以说构成了杨逵写作的重要两翼,这其中不仅延伸着他的社会理想,也以互相的参照与补充,实现了他有关文艺理念的整体认知。透过杨逵的戏剧,还可以看到作家在不同人生阶段和人生境遇中,对写实的、大众的、草根的文艺观的坚守与发展,对多种文学形式的尝试与实践,以及对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的发掘和运用。

一、戏剧生涯：与戏结缘的另一种人生

杨逵的戏剧生涯,始于1924年至1927年留学日本期间。

1925年冬天,通过专检(专科学校入学资格检定试验)考试的杨逵进入日本大学文学艺术科夜间部学习。此时正值日本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纷起,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运动勃兴之际,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于1924年6月创办的《文学战线》杂志相当流行,以社会主义意识为色彩的文艺创作成为文坛主流,这对开始步入文学思考与探索的杨逵影响颇深。杨逵与日本大学的一些台湾留学生组织了读书会,他们在研读社会科学书籍、报刊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对社会问题的考察。杨逵那时拼命阅读《文艺战线》等左翼文学杂志,而左翼文艺理论家青野季吉这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在强调“社会调查”对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杨逵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确立了他用“文学之笔”和“社会运动”两种方式关怀无产者的信念。

与此同时,日本著名的新剧领导人、普罗文学的重要作家佐佑木孝丸在自己住处创办“前卫演剧研究会”,吸引不少日本左翼文艺人士和台湾留学生来此聚集。杨逵常去出席,也加入了“前卫演剧研究会”。从德国回国的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成员的日本著名演员千田是也,也曾在这里指导过杨逵的演剧训练。虽然杨逵所担任的主要是像行路人那样跑龙套的角色,更多是在帮忙做舞台装

置之类的事情,但这毕竟是杨逵与戏结缘的开始,它奠定了杨逵戏剧活动的基础。“前卫演剧研究会”曾演出过以矿工生活为题材的戏剧《炭夫坑》,他们试图通过舞台剧的具体形象,将底层劳动者牛马一样的生活现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以唤起观众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由此萌芽的对戏剧艺术的爱好和兴趣,贯穿了杨逵一生的文学活动。

在参加“前卫演剧研究会”戏剧活动的时候,杨逵还认识了日本的左翼文学作家,如秋田雨雀、岛木健作、洼川稻子、叶山嘉树、前田河广一郎、德永直、贵司山治等人,他们对杨逵普罗文学观的进一步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显然杨逵和戏剧结缘,也就是他开始接触普罗文艺思想、开始写作、开始参与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同时。”^①

1927年9月,应台湾文化协会邀请,杨逵返台参加社会运动。他先是参加了文化协会举办的巡回民众演讲会,又与台湾农民组合结下不解之缘。这一年,配合台湾文化协会的社会运动而演出的“文化剧”达到高潮。据叶荣钟《台湾社会运动史》统计,1927年“文化剧”公演计五十回之多。它多以反对殖民当局专制、攻击日本警察,打倒封建思想、消除陋习和迷信,介绍世界民主政治为内容。受此影响的杨逵,藉由自己在东京的戏剧经验,也曾提倡用街头剧的形式来唤起民众。他设想“以少数的几个人提着道具箱,四处走动,随时演出。因为这一切都很简单,演完之后,提着皮箱又赶到另一个地方去,所以又称之为‘皮箱剧’。”^②然而在当时殖民统治的政治高压下,杨逵这种街头剧的理想当时并没有能够实现。由于惧怕“文化剧”所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日本殖民当局遂实行剧本检查、设障禁演等手段,压制台湾文化协会的演讲和演剧活动。1928年以后,“文化剧”

^① 焦桐:《台湾战后初期的戏剧》,(台北)台原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106页。

^② 林梵:《杨逵画像》,(台北)笔架山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75页。

创作走向衰微。

进入 30 年代以后,随着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倡导,新剧运动再次受到社会重视。1934 年召开的第一届台湾全岛文艺大会上,曾经展开对于台湾新剧运动的讨论。大会提案中还有“提倡演剧案”,要求“组织演剧股份公司”、“聘请演剧家及音乐教师”、“招生训练”、“严募剧本”等办法。张深切也在大会呼吁“惟有演剧才能达到大众化,如果闲却了演剧,则台湾的文化是难进展的。”^①

1935 年 12 月,杨逵和叶陶独资创办了《台湾新文学》。这片文学园地的开拓,也为杨逵的戏剧理想提供了某种实现的场域。在十五期^②的《台湾新文学》刊物中,共刊载七部戏剧。从 1936 年 5 月的第一卷第四号起,到 1936 年 8 月的第一卷第七期,《台湾新文学》一共刊出四次“特别原稿剧本募集”的征稿广告,比之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的戏剧活动更为积极主动。其征稿广告如下:

近来新剧的研究、与新剧团的组织计划渐见抬头,岛民对于新剧也渐怀抱关心来了。但是各实际的关系者所苦的总是在剧本难。老实说我们也未尝看出一篇值得注目的剧本出世。这是从事文学的兄弟们的责任。本社鉴于此现状,为提高新剧运动相信我们要尽力去找好的剧本,所以深望全岛作家对这点特别用工(笔者按:原文为“工”)努力、以副时势的要求。^③

^① 转引自徐迺翔主编:《台湾新文学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第 822 页。

^② 加上最后出版的两期《新文学月报》,1935 年 12 月至 1937 年 3 月,《台湾新文学》一共出刊 15 期。

^③ 原载《台湾新文学》第 1 卷第 4 号,第 86 页,1936 年 5 月;见《新文学杂志丛刊》6,(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复刻本。

杨逵不仅大力呼吁新剧创作,在《台湾新文学》杂志为其提供一席之地,自己也亲力实践,从事戏剧创作。刊登于第一卷第八号(1936年9月)《台湾新文学》的《猪哥仔伯》,就是杨逵最初的戏剧文学尝试。

1937年6月,台湾总督府禁止报纸期刊使用中文,《台湾新文学》也被迫停刊。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杨逵隐居首阳农园,以无声的沉默坚守抵抗意志,一度出现了创作的“空窗期”。1942年,杨逵开始复出文坛,这一年他创作的小说《无医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萌芽》,以及戏剧《父与子》,皆以绵里藏针的方式,重在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真实面目,同时触及社会的黑暗面。

1943年以后,已经被纳入日本“战时体制”的台湾社会,其“皇民化运动”的浪潮越发喧嚣,各种民间剧团被强行编入“台湾演剧会”,到处都有“演剧挺身队”在推行“皇民化戏剧”。在这种高压的政治氛围中,杨逵所走的是一条迂回抵抗的路线。他利用“皇民剧”的形式,内容却深藏抵抗殖民统治的意识,旨在讽刺和打击日本殖民统治,并以此打入民间,唤起民众。杨逵1943—1944年创作或改编的《扑灭天狗热》、《怒吼吧!中国》,就是这样的戏剧。

杨逵再度涉足戏剧创作,则是在50年代的绿岛监狱。因一纸《和平宣言》而系狱的杨逵,是利用做工、上政治课、唱军歌的空隙,坐在权充写字桌的肥皂箱前,辛勤从事写作的。1954年至1959年期间,杨逵一共创作了《光复进行曲》等十三个剧本,其中在狱中演出的有《牛犁分家》、《猪八戒做和尚》等等。然而,在囚犯写一封家信都不能超过三百字的绿岛监狱,杨逵的这些剧作根本无法公开发表于社会。

1961年杨逵出狱后,那些在绿岛写成的十三部戏剧,还有其他未能发表的文稿,就成了一种被封存的沉默的存在。杨逵在世时,一些文友中就有传说,讲杨逵有一大箱不肯轻易示人的未整理的文稿。

直到1985年杨逵去世后,他的家人才从家中深锁的铁柜里,发现了一大批杨逵遗作,其中多是没有发表的戏剧。这些剧本或写在10×20的“台湾文学社制”的稿纸上,或写在三十二开的“六〇四七部队新生笔记簿”内,里面夹杂着童谣、民歌、相声、散文创作,纸张多已泛黄、残破。直到这批遗作的重新“出土”,杨逵戏剧创作的全貌才得以整体呈现。

杨逵的戏剧活动虽然几经周折,时起时伏,他写于战后的戏剧文本也被长期封存,但他钟情于戏剧、期望以戏剧打入民间的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这愈发提醒人们,通过戏剧的杨逵,抵达对杨逵形象的全方位认知。

二、戏剧理想：打入民间与提升新剧

杨逵的戏剧理想,是在台湾戏剧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孕育成熟的,也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得以推动和实现的。

从台湾戏剧运动的历史来看,受到日本明治开化时期的新演剧影响,台湾最初的“新剧”(即话剧)诞生于1911年。20世纪20年代初期,祖国大陆的“文明新剧”进入台湾,台湾开始了话剧移植的时期。1923年以后,在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台湾文化协会以演剧作为改革社会之利器,“文化剧”由此大行其道,并凸显出革新思想与文化运动的性格。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刁难和压制下,“文化剧”于1928年以后渐趋衰微。进入30年代以来,从日本东京筑地小剧场学习返台的张维贤,于1930年夏成立了民烽演剧研究所,同年8月,张深切等人成立了台湾演剧研究所。随着文艺大众化的倡导,台湾文艺联盟于1934年再次呼吁新剧运动,许多作家以戏剧创作积极跟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特别是随着40年代初期“皇民奉公会”的成立,台湾的民间戏剧机构被

强行收编,变成演出“皇民化戏剧”的宣传工具。但即便是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仍然有杨逵等作家通过戏剧的创作和演出,进行迂回曲折的抵抗。

基于台湾新剧运动的观察和自身戏剧实践的经验,杨逵对戏剧的性质和功能,有了明确的认知。在他看来:

戏剧是综合艺术,它要综合美术、音乐、跳舞以及文艺,它可以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发挥它的效果,因而被称为最高的艺术。^①

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特质,使它对文学、艺术、文化以及大众效应诸方面,产生了一种全方位的作用。杨逵如是说:

由于舞台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的重要性不只限于舞台剧的大众性问题。新剧运动的发展,带动了剧本在创作、发展上的文学要素之发展,加速了舞台设计和演出方面的艺术进展,而舞台上的所有律动及音响则属于音乐范畴。又因为这所有的部门都把包括文盲在内观众当成鉴赏家,所以,它们在检讨大众化的技术层面上,也是重要的试金石和研究材料,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②

① 杨逵:《谈街头剧》,原为绿岛时期新生笔记簿上之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3页。

② 杨逵:《新剧运动与旧剧之改革——“锦上添花”观后感》,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10月2日至?日(河原功先生收藏的杨逵剪报资料,因年代久远,多处模糊破损,此处时间无法辨识。——著者注);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6页。

在发扬民族文化的工作上,街头剧是一个很重要,而最容易发生效能的部门。^①

戏剧在台湾文化运动和民众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杨逵在不断的认知和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想。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戏剧面对大众而创作和演出的特点,要求它要打入民间,关怀民众,关怀乡土,发挥“文学的草根大使”作用,这也是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重要途径。

杨逵认为,戏剧原本来源于民众的生活,戏剧是表演给民众看的;要使它成为民众生活的真实反映,就必须到民众中间去,了解真实生活素材,创作和演出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在剧情、人物、舞台和道具等方面,形成随时随地可演、便于深入农村的格局。在以民众的戏剧鉴赏来检讨文艺大众化的技术层面的同时,也使民众的艺术鉴赏力得以不断提升。杨逵明确提出:

我认为艺术要下乡,使各地区都能感受到这种文化气氛。艺术不能一时一地的做,艺术应该长期经年累月随时随地的做。

我希望一些有艺术素养的专家或戏剧指导者,能够下乡与这些地方上纯朴的爱好艺术的工作者合作,进一步指导他们,以提高地方上的艺术水准。这样艺术才能在群众

^① 杨逵:《谈街头剧》,原为绿岛时期新生笔记簿上之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3页。

之间发挥力量,发挥艺术在地方上的影响力。^①

杨逵希望台湾的文艺工作者,配合各种艺术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民间或乡土场合走动,来充当文学的、艺术的、文化的“草根大使”,使“草根性”得以扎根、落实。在《萌芽》这篇小说中,杨逵这样表达自己对于文学和戏剧的期待:“我亲手建立起来的这块新园地,就这样慢慢开始生长起来……我怀著最大的喜悦,期待着他日能够在这个园子里,创造出劳动者精湛的戏剧,把我梦中的感动传达给劳动的人们。”^②杨逵晚年所憧憬的,是能够在东海花园创建“文化村”,为台湾作家的自由创作和乡土关怀提供一个精神家园;而在其中创办实验剧场,则是他戏剧理想的最后实现场域。

第二,戏剧本身的综合艺术特性和民间色彩,要求它着力开掘民间文学艺术的宝贵资源,将台湾的民歌、民舞等因素融入戏剧,更鲜活、更多样化地表现民众的生活感情。

杨逵虽然一生辗转奔波,以斗士的形象出现于社会运动的前沿,但他的双脚始终走在台湾的土地上,他对台湾的乡土文化、民间艺术一直情有独钟。从童年时代在台南故乡观看“驶犁歌”演出的往事,到绿岛时期排演“渔家乐”的经验;从光复前台湾街头流行的“纸戏”,到光复后盛极一时的歌仔戏、布袋戏,许多来自民间的文化记忆让杨逵无法忘怀。在《春天就要到了》一文中,他曾专门论述民间艺术的重要性:

① 杨逵:《〈牛与犁〉演出有感》,原载《时事杂志》第51期,1980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15—416页。

② 杨逵:《萌芽》,原载《台湾艺术》第3卷第11号,1942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5卷(小说卷2),(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9年6月版,第451页。

民众把这些战斗与工作的记录,把这些有喜怒,又有哀乐的生活感情表现出来的歌谣与舞蹈——民众艺术,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的传到我们的世代来,并不是偶然的。

这些民间艺术,都是我们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尽管在某些时代——特别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制下的五十年中受到蔑视与禁压,一直根深蒂固保存在民众心里头,等到光复了,就如“野火烧不尽,春来芽又萌”所说的,它又把头抬起来了。

为什么民间艺术——民族与民舞——能够这样根深蒂固的呢?简单一句话可以说,就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已经与吃饭、工作、战斗生活是分不开的了。

民众以他们的智慧共同创造了它,也由它得到共同的安慰与鼓励,因此,它与民众的生活感情之间没有空隙,它的内容与形式是民众生活感情最自然的表露。^①

基于此,杨逵主张把歌仔戏、民歌、民舞、民间乐器等艺术形式融进戏剧,以增强戏剧的民间文化底蕴,以及来自乡土的鲜活感和趣味性。他自己创作的许多戏剧,都饶有兴趣地进行了这种艺术尝试。

第三,在继承戏剧文化传统的同时,更要坚持全方位的戏剧革新理念,以便戏剧能够更好地符合时代精神,满足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

日据时期,透过观看“锦上花”剧团演出《冯仙珠定国》的剧场体验,杨逵在《新剧运动与旧剧之改革》一文中,认为旧剧改革已成为燃眉之急,呼吁戏剧界能“马上设立一个研究机构,检讨应该改革的各

^① 杨逵:《春天就要到了》,原为绿岛时期新生笔记簿上的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08—309页。

点,决定一个具体方案,然后请合适的人编写剧本。再选一些适当的人,请他们进入‘锦上添花’参与有关演出的各项事宜,和他们同心协力,希望多少能帮忙他们提升表演水准。”^①

针对《冯仙珠定国》的剧本内容一味梦幻的,杨逵认为戏剧改革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剧本的改革。他说:

我们创作新剧本时——当然不只限于现代剧,历史剧也一样——要用我们的写实眼光去看,再进一步赋予现实的表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才会更痛切地感觉到,为了改革舞台剧,首先要有新的剧本。^②

基于戏剧的综合艺术特性,杨逵提出戏剧改革要有全方位创新意识,包括戏剧创作、舞美设计、歌舞穿插、演员技巧等多种层面。诸如:考虑到观众的欣赏要求,特别是忙碌的农民的看戏实际情形,剧作家“必须创作精彩的短剧才行”,“尽量剪裁时间、地点、减少连戏部分”,“而不应冗长地演出无聊的场景”^③;着眼于戏剧又是导演的艺术,“剧本和导演导戏相辅相成,一起改革,舞台剧才能有所发展”^④;吸取中国传统戏曲的虚拟性,台湾新剧在舞台设计方面可以采用虚实结合等多种技法,因为“艺术只要看起来是真的就好,并没有说一定要采用实物”^⑤;在戏剧表演方面,杨逵则根据舞台剧演出的弊病,具体地指出:“戏剧和舞蹈要分清楚。应该是属于踏脚步(此为台湾

① 杨逵:《新剧运动与旧剧之改革——“锦上添花”观后感》,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11月2日至?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8页。

② 同①,第379页。

③ 同①,第380页。

④ 同②。

⑤ 同②。

话文,意为‘走台步’)和舞蹈的所有动作、音乐、歌曲,在一般戏剧中不可过度采用。台湾的戏曲中,戏剧和舞蹈太过于杂乱。在剧情发展到高潮时,却当场高歌起来,就会破坏观众对剧情的感动。”^①总之,杨逵寄希望于剧作家、导演、演员、作曲家、舞美设计师等各路人物齐心协力,加入戏剧改革。这样,“不久之后,想必会在全岛舞台剧界形成一股先进的改革风潮,为戏剧界带来一次革命。”^②

由此可知,杨逵的戏剧理想不仅清晰可鉴,而且有其丰富可感的内容表现,它无疑为作者的戏剧创作实践提供了一种理想的预设和理论的参照。

三、戏剧风貌：多音交响的舞台世界

杨逵戏剧风貌的呈现,得力于多种戏剧元素的融合互动,体现出作者以戏剧演绎社会人生的用心。

第一,就戏剧表现形式而言,杨逵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在他笔下,最常见的戏剧形式有街头剧、歌舞剧、独幕剧、多幕剧、电影式剧本等类型。每一种戏剧形式的尝试,可以说,它都寄寓着杨逵的社会观念与戏剧理想。

街头剧是杨逵最为推崇的一种戏剧形式,他曾专门写有《论街头剧》一文。在杨逵看来,街头剧灵活便捷的表现方式,不仅为它打入民间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颇具唤起民众的传播与鼓动效应:

它不要舞台(街头巷尾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当为舞台),

^① 杨逵:《新剧运动与旧剧之改革——“锦上添花”观后感》,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11月2日至?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集·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0页。

^② 同^①,第381页。

它不要布景,不要笨重的道具,只要有几位同好之士而有几种最简单的乐器(如胡琴、口琴,或是一面锣)就可以把它搞得很不错。它可以参加游行,也可以单独流动表演,在操场上的同乐会也可以利用它。

因它是在观众围拢着的圆场上表演,而演员都由观众中间出入,很容易把演员和观众打成一气,最容易把剧情传达到观众心底,把剧的效果发挥出来。^①

杨逵创作的街头剧,有《驶犁歌舞》(1954年,底稿无存)、《国姓爷》(1954年,底稿无存)、《渔家乐》(1955年,底稿无存)、《光复进行曲》(1955年)和《胜利进行曲》(1956年)等五部,它们皆是绿岛时期所创作。在《光复进行曲》和《胜利进行曲》的剧中名下,杨逵都注明了“台语街头剧”,并开宗明义地写道:

街头剧的特色是深入民众中间去表演,无论歌词与台词都应该用方言,才可以提高观众的兴趣与了解。本剧里,许多台湾话没法用汉字写出,演出时,如用注音符号翻成通俗的台湾话,当可以增加民众的兴趣与了解。^②

《光复进行曲》的戏剧背景发生于荷兰据台时期的台湾农村,它以郑成功驱逐荷兰入侵者的过往场面,来影射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史实。在剧中,荷兰侵略者串通汉奸,打家劫舍,掳走

① 杨逵:《谈街头剧》原为绿岛时期新生笔记簿上之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3页。

② 杨逵《光复进行曲》,原载《民众日报》1989年4月26日至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卷(戏剧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247页。

村女，激起了全村农人的激烈抵抗，双方对峙之中，国姓爷郑成功的军队登陆，逮捕了荷兰人，农人欢呼雀跃，当即决定杀猪宴请国姓爷，并为村中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合婚。剧末国姓爷对百姓说：“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是大家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开垦的，给红毛番侵占很久！”这里写的虽然是脱离荷兰统治的台湾，却也不妨理解为脱离日本统治的台湾。

《胜利进行曲》写的是终战前夕的福建沿海，老农民的三个儿子皆被拉伏当兵，老农民夫妻俩只好负犁荷锄，在残破的荒园上耕耘。

在日本人的阵地上，有日本兵和台籍日本兵在看管中国劳工在挖战壕、修工事。当一对青年夫妻劳工在这里不期而遇时，连讲几句话的自由都被日本兵用武力剥夺。被激怒的台籍士兵与大陆劳工愤起反抗，日本兵遂带领人马前来报复。这时国军赶来，将日本兵全部抓获。剧中以台湾士兵之口，传达出战争期间台湾人民心系祖国的意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与同胞爱，也反映了殖民地台湾深刻的历史痛苦：“台湾原本中国地，满清卖阮做奴隶，几百万民都明白，希望早日回祖家。”“你们受的苦还不到八年，台湾人被日本仔凌治，已经快要五十年了，谁会甘心做牛马奴隶。”^①

从上述街头剧来看，反抗异族压迫、渴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憧憬民族复兴与大同世界的戏剧主题，贯穿剧本始终；紧凑集中的故事情节，充满力度戏剧动作，构成颇有感染力的剧场情境；加之民歌素材的大量运用，为剧本带来生动鲜活的乡土气息。

歌舞剧是杨逵为之倾心的一种戏剧形式。有感于台湾丰富鲜活的民间艺术资源，杨逵不仅在很多剧本中穿插了民间小调、歌舞片段，还尝试创作了歌舞剧《丰年》（1956年）。这出戏在单纯而明快的

^① 杨逵：《胜利进行曲》，原载《自立晚报》1989年4月18日；收入《杨逵全集》第2卷（戏剧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88年6月版，第26页。

戏剧场景中,表现丰收之后的农家情感生活向往。一对农村老夫妻由30年前他们海誓山盟的往事,联想到两个儿子的现实婚事进程,心中很是放心不下。经过暗中观察,发现两个儿子已经在村姑阿腰仔和阿却仔那里分别找到自己的感情归属,于是欢天喜地,准备杀猪宴请,为两对青年完婚。《丰年》为台语剧,人物对话幽默风趣,喜剧氛围浓郁。短短一台戏中,穿插了《百家春》、《丰年舞》(一)、《丰年舞》(二)三支民歌,以熟悉的民间曲调传递了60年代台湾农村的生活情趣与丰年景象,充满欢乐色彩的载歌载舞表演特别突出了它作为歌舞剧的功能。

事实上,杨逵的其他剧作虽然不是纯然的歌舞剧,但都尽可能地融入了民歌民舞的片断,体现出杨逵对台湾民间艺术资源的钟情与发掘,也可看出他对戏剧娱乐民众的功能的重视。杨逵的中文剧作里,附有词、谱的歌曲有:

1. 《牛犁分家》:有《牛犁分家主题歌》一首;
2. 《光复进行曲》:有《收工》、《情歌》、《驶犁歌本曲》、《春天花》(即《四季红》)、《杀汉奸》五首;
3. 《胜利进行曲》:有《透早就出门》、《做牛拖犁》、《奴隶的喊声》、《思想起》、《看国旗风翻》五首;
4. 《赤嵌拓荒》:有《驶犁歌序曲》、《驶犁歌本曲》、《四季红》、《丰年舞》、《捕鱼歌》五首;
5. 《丰年》:有《百家春》、《丰年舞》(一)、《丰年舞》(二)三首。

其他剧作虽然不曾附有歌谱,但杨逵经常使用《思想起》的曲调,自己创作歌词,让剧中人物根据剧情需要,随时随地可以吟唱。杨逵的十三种中文剧作,除了《睁眼的瞎子》、《婆心》以及《乐天派》之外,其他皆有歌曲穿插。其方式不仅有独唱、合唱、轮唱、对唱,甚至大量运用吟唱代替独白、对白,为剧作带来强烈的音乐性。

杨逵的独幕剧创作,一向具有主题集中剧情紧凑、场景单纯、篇幅短小精悍的特点,它突出了文艺轻骑兵的作用,“可以在短短の時

间里给观众一个艺术的享受,而把他们的感情统一成一个坚强的堡垒。”^①《猪哥仔伯》(1936年)、《睁眼的瞎子》(1956年)、《真是好办法》(1956年)、《丰年》(1956年)、《差不多先生》(日文,写作年代不详)、《婆心》(写于绿岛监狱,年代不详),可谓这类剧作的代表。

杨逵的多幕剧创作,可以列举《父与子》(1942年)、《扑灭天狗热》(1943年)、《怒吼吧!中国》(1944年)、《牛犁分家》(1958年)、《猪八戒做和尚》(1959年)等五部。这类剧作多以较大的篇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通过具有鲜明个性的戏剧角色造型和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来展示杨逵的社会理想和精神指向,传达出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戏剧主题。这类剧作,当属杨逵在戏剧领域的创作重镇。

杨逵还运用电影分镜头式的手法,创作了《赤嵌拓荒》(1959年)。以这样的戏剧手法来呈现一部台湾拓荒者的移民史,杨逵的历史叙事显示出它的流贯性和独特性。

第二,从戏剧角色的构成来看,杨逵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刻画,来演绎丰富多彩的人生世界,这其中,又以乡土台湾的人物造型最为突出。

与杨逵的小说创作不同的是,其戏剧中的主要人物角色发生了变化。日据时期不平等的差别教育制度,底层人民挣扎于贫困线上的社会现实,使台湾的文盲率居高不下,小说的阅读也无法超越知识分子层面。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字为创作工具的小说,均以一般知识阶级为对象。杨逵小说中一再出现的知识分子角色,应该与上述原因不无关系。

至于戏剧,因为它必须走入民众中间,表演给包括文盲在内的各种人群观看;而处在农业社会的台湾,一般大众中间,农民又占据最

^① 杨逵:《论街头剧》,原为绿岛时期新生笔记簿上之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3页。

广大的人群,这使杨逵的戏剧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农民,故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多选择了农人的形象。

《赤嵌拓荒》中开垦孤岛的王克旺,《牛犁分家》中的勤劳的种田人林耕南、大牛、铁犁,《丰年》、《光复进行曲》、《胜利进行曲》中质朴坚忍的老农夫妻,还有剧中那些正在恋爱的乡村男女青年,他们都是来自大地的底层农民形象。在乡土家园上,他们生生息息,世代耕作,怀有一种朴素的爱恋情感和生命维系;生活中以劳动为本色,与大自然为伴,这使他们充满了拓荒者的顽强性格,成为大地基石一般的人物。杨逵怀以草根的情感,为农民们唱出了劳动者之歌:

且听《牛犁分家》启幕时,一群小孩子的歌唱:

春天到了,草木青。家家户户,忙春耕。大小动手,创造美丽的田园。

再看《赤嵌拓荒》的劳动声场面:

手拿锄头开荒地,开呀开呢开到偌大块,这块种稻那块种番麦,自由世界无皇帝。

一旦异族侵略者要来侵占这汗水浸润的田园,那些来自大地的农民方显出英雄本色,成为乱世中的希望,人格坚守的力量。且听他们在《赤嵌拓荒》中的铮铮誓言:

为着自由平等/人人武艺练得精/大家协力去拼命/不惜任何的牺牲

女性角色的塑造,也是杨逵戏剧特别关注的内容。在杨逵笔下,女性多来自乡村,她们也有险遭凌辱的或被欺压的命运,例如《睁眼

的瞎子》中,采莲遭到父亲林醉生的严厉逼婚;《真是好办法》中,阿笑仔被父亲卖与吃喝嫖赌为生的小知歌为妻;《猪哥仔伯》中,做酒女的阿秀,险遭担任株式会社会长的父亲凌辱等等。但杨逵剧中女性人物性格的凸显之处,是她们绝非弱者。女性的奋争与反抗,一是面对男性沙文主义的传统压力,她们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如采莲的逃婚出走;二是在邪恶势力和金钱诱惑面前,她们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和气节,如《睁眼的瞎子》里对抗男权威力的母亲形象,以及《猪哥仔伯》中那个纵然贫病交加,也不接受道德败坏、人性邪恶的丈夫用金钱来息事宁人的妻子形象。

为了对比正面人物以突出他们的不幸遭遇,反派人物的角色塑造,与正面人物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

《真是好办法》中的小知歌,吃喝嫖赌,夜夜寻欢。自恃“阮祖传的事业就是酒赌阿片,讨查某”,却用“三从四德”来训斥和规范独守空闺的妻子。《猪哥仔伯》中那个担任株式会社社长的猪哥伯,是个常常光顾酒家的好色之徒。没想到前来应征酒女的贫女阿秀,竟是猪哥伯多年前抛弃于乡下的亲生女儿。《父与子》中的资本家陈不治,则泯灭良知、自私虚伪,抛弃了自己私生子。这些人物或代表男权专横的霸权主义,或代表灵魂卑污、心态阴暗的丑恶人性,作者对他们的嘲讽和鞭挞,表现于字里行间。

另一类反派人物,则是民族侵略者、汉奸走狗、贪官污吏等等。凶狠、残暴,贪婪、好色,强权霸道、鱼肉百姓,是他们共同的行为特征。《光复进行曲》和《赤嵌拓荒》中的荷兰侵略者,《胜利进行曲》中的日本兵和《牛犁分家》中的日本警察,《猪八戒做和尚》中那个昏庸无能又贪得无厌的州主,以及《牛犁分家》中竭力推行“皇民化政策”的课员、税吏,《扑灭天狗热》中欺压百姓、充任殖民当局走狗的李天狗等等,皆为此类人物。

总之,杨逵笔下的戏剧角色,体现了作者褒贬好恶的鲜明价值判断,也承载了他对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艺术性表达。

第三,以戏剧的内容、主题以及创作特质来论,杨逵的日文剧作重在社会写实,矛头直指日本殖民统治和社会丑恶现象;中文剧作则以台湾抵御外侮的历史为中心,表现台湾民众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向往。喜剧的创作,也构成杨逵绿岛时期戏剧创作的突出特点。

首先,对日本殖民地统治包括一切外来侵略的抵抗意识,是杨逵戏剧贯穿始终的主题。《扑灭天狗热》、《怒吼吧!中国》、《光复进行曲》、《胜利进行曲》、《牛犁分家》、《赤嵌拓荒》等剧作,都强烈而鲜明地传达了这种主题意识。

《扑灭天狗热》写于1943年“皇民化戏剧”甚为喧嚣的年代。杨逵以天狗热(恶性疟疾)影射专放高利贷、危害乡邻的李天狗,表面上是顺应当时国策,消灭猖獗于农村的流行病,实际上则是借打倒“皇民化运动”的拥护者、吸血鬼李天狗,曲折地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日本学者尾崎秀树对此剧有过专门评论:

杨逵所创作的,作为“皇民化剧”、岛民剧运动之一的两幕戏剧《扑灭登革热》(笔者按:即《扑灭天狗热》),表面上说的是扑灭流行于台湾贫穷农家之间的登革热运动,但实际上是包含著杨逵所特有的痛烈的讽刺,矛头指向压榨农民的高利贷者李天狗的淋漓尽致的作品。

其演出内容,实际上强烈地贯穿著台湾人的、具有阶级性的尖锐视角。在当时的台湾,有因为“皇民化”而苦恼的作家,但与之相反,也有像杨逵这样的作家。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高利贷者的同时,也即指向了日本的统治。杨逵以写“岛民剧”的手来反击,这就是他深邃、迂回的抵抗方

式。^①

《怒吼吧！中国》是杨逵于1944年改编并排演出的剧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开始对同盟国英美宣战，及至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反攻，战火燃烧到台湾岛附近，反英美也成为“皇民化运动”的任务之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杨逵改编自俄国剧作家的剧本《怒吼吧！中国》，因为原来的戏文内容主要是反对英国，符合当时的日本国策，遂得以演出和出版。

《怒吼吧！中国》改写本表现的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故事。一艘英国炮舰的美国商人在长江上失足落水身亡，英军舰长却污蔑中国人是凶手，并以炮轰全县来威胁县长交出凶手就地枪毙。在交涉过程中，英军欺压迫害中国人的手段令人发指。在两名无辜的中国平民以“替罪羊”被处决之后，怒吼的中国人与县长在报仇雪恨的呐喊声中，愤然宣誓，一定要赶走洋鬼子。

杨逵曾这样谈到自己戏剧本的改编：

《怒吼吧！中国》描述的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剧。但这是在抗战期中，此剧无形中影射日本的侵略战争。尤其是我把在台中中山公园殴打林献堂的日本浪人卖间，抓起来当作剧中的主要角色，更明显的表现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嘴脸，以及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的真相。^②

《怒吼吧！中国》先在“台中艺能奉公会”颜春福先生的楼上排

① 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94—195页。

② 杨逵：《光复前后》，原载《联合报·副刊》，1980年10月24日；收入《宝刀集——光复前台湾作家作品集》，（台北）联合报社1981年10月版，第12—13页。

练,于台中、台北及彰化三地演出时,引起观众强烈反响;正当这出戏在充满抗日意识的“首阳农园”以台语排演的时候,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排演亦就此中断。

其次,在表现不屈的抗议精神的同时,杨逵的剧作还特别传达了化解省籍隔阂与冲突,两岸人民团结共建祖国美好前景的愿望。

杨逵因为《和平宣言》而被捕坐牢,心中郁结了太多的质疑、愤懑与反叛。虽然是与社会长久隔离,但杨逵没有因此放弃历史的追问和现实的反思。他这样谈及自己在绿岛监狱里的戏剧创作:

我写了《三战赤嵌城》,用电影剧本的方式表现了我们祖先反抗荷兰侵略者的历史,以及话剧《牛犁分家》以表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史实,又想起了现在许多苍白的知识人却蚂蚁都不如地过著迷失沉沦的生活……真是人不如蚂蚁……^①

四幕话剧《牛犁分家》写于1958年,是杨逵根据自己的一篇寓言《大牛和铁犁》改编而成的剧本。同年11月,此剧在杨逵的执手下,于绿岛监狱中正堂的晚会中首次演出。杨逵出狱后,《牛犁分家》经过了20多年的沉默之后,最终由高雄大荣高工的学生剧团排演,1980年12月在高雄、台中演出多场,杨逵亲临现场指导,效果颇为轰动。

《牛犁分家》的故事发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村,老农林耕南的两个儿子大牛与铁犁被日本殖民当局强行征兵,送往南洋打仗。两年之后,太平洋战争已近尾声,台湾农村一片破败、凋敝景象,苛捐杂税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林家惟一的耕牛被日警拉去抵税,林耕南只

^① 杨逵:《园丁日记》,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05页。

好当牛拖犁,日子苦不堪言。

台湾光复后,大牛和铁犁终于归来。然而,日据时期颇有民族意识,不愿当“大日本帝国国民”的林家父子,光复后却发生了矛盾分裂与命运逆转。林耕南被一味贪图享受、好吃懒坐的二儿媳金枝活活气死;大牛、铁犁兄弟俩也因为媳妇妯娌间的矛盾而闹分家。大牛分得牛,铁犁分得犁;分不平的锅碗物件就统统砸碎,结果谁也无法耕种,大家都不能再生活下去。两兄弟冷静后想起了父亲临终前,拉着他们的手流泪叮嘱,要他们彼此宽容、忍让,于是两兄弟相拥而泣,前嫌尽释。

对于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的台湾民众来说,《牛犁分家》的象征意义再清楚不过。杨逵痛楚的历史经验和热切的时代呼唤,深刻地传达出两岸人民共同心愿。杨逵为呼吁和平而蒙冤坐牢,仍然以宽容之心呼唤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其思想境界的高远豁达,令人感佩。正像台湾学者焦桐所评论的那样:

《牛犁分家》寓意辛酸,象征战后台湾和大陆之间一场历史和地理的误会。剧中强烈透露两个希望,第一,台湾光复之初,许多发接收财的商人狂嫖阔赌,过著不事生产却非常奢靡的生活,本剧藉林耕南活活被气死,突显事情的严重性。第二,杨逵希望经历“二二八事件”之后,外省人和本省人能够打破意识樊篱,相亲相爱,彼此宽容、体谅,以理性的态度相互合作,努力耕耘,开创出美丽新世界。这是战后初期每个人的共同心声,也是杨逵系狱十二年不灭的热情,充分体现他不屈不挠对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精神和对自己人宽宏的胸怀。^①

① 焦桐:《台湾战后初期的戏剧》,(台北)台原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86页。

再次,理想主义精神的融入,乌托邦理想的构想,这种对美丽新世界的期待,也成为杨逵剧作的主题之一。

在《赤嵌拓荒》这出剧作中,杨逵让前仆后继渡海来台的大陆移民,在开拓台湾的艰辛耕耘中,不断赞叹台湾的美丽富饶、自由和平:“这里叫做赤嵌,是喜爱自由的人来开发的。大家都明朗活泼,过得无拘无束。”开荒者所向往的是“自由世界新天地/青山苍海属大家/你捕鱼呀我打猎/我开荒呀你种地/协力征服自然界/开发富饶新天地”。作者在这里描绘出一幅男耕女织布,清静自由和平的小康社会图景,并借剧中人物来创造一种桃花源情境。而一旦荷兰军舰入侵,当地剧民与渡海来台的移民则团结协力,同仇敌忾,表现出抵抗异族侵略、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强意志。而这一切,正是杨逵对台湾民众的期待。

《猪八戒做和尚》是一出四幕喜剧,它以丰富的联想,幽默诙谐的笔调,凸显了猪八戒的个性,并借此暗喻出一个“三藏取经的西方极乐世界”,进一步描画出作者的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在剧中,作者将打家劫舍、搜刮民财的猪八戒比作土匪,将鱼肉百姓、贪污赌钱的官府、奸商比作强盗,以此唤起人们对不义不公社会的反抗意志。当三藏与悟空、八戒一行人最后来到桃花源时,舞台上响起孔子的纪念歌,幻灯片映出一张张礼运大同篇的蓝图,杨逵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尽在其中:

幻灯(1)大道行也,天下为公(运动大会)

幻灯(2)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群众大会选举长老)

幻灯(3)故人不独亲其亲(养老院许多孩子们为老人服务)

幻灯(4)不独子其子(养育院寡妇照顾许多孩子)

幻灯(5)使老有所终(老人清闲游玩散步读书)

幻灯(6)壮有所用(壮人做水坝耕地)

幻灯(7)幼有所长(幼年学校教育情形)

幻灯(8)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疗养院废疾者互相照顾快乐生活的情形)

幻灯(9)男有分,女有归(集体结婚典礼)

幻灯(10)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稻谷、果实、布匹等捐献大会)

幻灯(11)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修道筑桥植树献也)

幻灯(12)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法院闭门无事做,法官们有的种花,种树,读书)

幻灯(13)故门而不闭,是谓大同(门户开放群集在外面歌舞)^①

在《猪八戒做和尚》中,还穿插着一种喜剧氛围。它把那些假丑恶的东西撕破了给人们看,给人带来戳穿画皮的艺术快感。另外,像《猪哥仔伯》、《睁眼的瞎子》、《丰年》、《真是好办法》、《婆心》这些剧作,本身就标明了“讽刺喜剧”。杨逵在蒙冤绿岛的日子里,仍然能以笑看人生的态度来面对命运打击,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对世事的深层透视,使他绿岛时期的戏剧创作越来越趋向“写实的喜剧”,并构成独特的“杨氏喜剧”风格。

杨逵带有喜剧风格的这类剧作,在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中,最终往往是新事物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压倒旧事物,并由此否定旧事物。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

^① 杨逵:《猪八戒做和尚》,收入《杨逵全集》第2卷(戏剧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148—149页。

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①

杨逵剧作的喜剧精神，鲜明地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意识，二是乐观主义精神。前者让他以犀利的思想锋芒，洞穿世事，悟彻人生，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后者让他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并始终怀抱新生活的信念，从中获得精神再生的力量和愉悦。这种喜剧精神，正如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弗莱在《喜剧》一文中，对具有喜剧精神的人的一种认知：

应当去认识生活，承受死亡，保持欢乐。他们的心灵必须象长生鸟一样坚不可摧，即自焚者必须自行点燃并获得再生：这不是出于一种脆弱的乐观主义，而是靠一种来之不易的深沉的愉悦。^②

杨逵绿岛时期戏剧中所蕴含的，正是这样一种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长生鸟精神，如同那压不扁的玫瑰花，任何时候都保持了绽放的姿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页。

② [英]克里斯托弗·弗莱《喜剧》，转引自《喜剧：春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4—5页。

第八章 绿岛言说：以生命倾诉心语

绿岛时期的杨逵，在生命被囚禁的岁月，以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仍然坚持了戏剧、散文、诗歌乃至家书的写作。这些作品，有的文章刊载于监狱里的《新生活》壁报上，有的剧本得以在年节佳日的绿岛监狱晚会或绿岛街头演出，有的家书记录在“新生笔记簿”上，但在当时，它们根本无法公开发表。即使杨逵出狱后，这些作品不是被封存在家中的铁柜子里，就是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失落多年，杨逵生前并没有看到它们的正式发表与出版。直到1985年杨逵去世以后，这些被“出土”的绿岛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绿岛时期的写作，是杨逵在世间最黑暗的地方放射出来的生命光芒，它不仅透过杨逵心灵历程的忠实记录，发掘出一种冰山底下也不致冻僵的生命能源；而且以其体裁多样、数量丰富的作品，构成杨逵文学生涯中的另一创作高峰。

一、绿岛家书：黑暗中发出的爱与热

《绿岛家书》是杨逵系狱绿岛时期，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家信底稿。这批家书原来写在二十五开的“新生笔记簿”上，一共有四本。

从1957年10月12日写起,至1960年11月18日止,前后超过三年的时间,总计一百零七封。从泛黄的笔记本来看,这些信件可能是杨逵所写的草稿,其书写字迹时而整齐,时而凌乱;有删改明显的地方,也有画了增补线却未曾补入之处;有写着“返回”字样的信件,也有标明“不发”记号的信件。按照绿岛监狱的规定,每位受刑人一周最多只能寄出一封经过严格审查的家信,且字数不能超过三百字。所以,杨逵写信时总是先打草稿,如果超出了规定字数,再做修改。这些“新生笔记簿”上所写的,正是绿岛家书的草稿。

这些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信件,不仅杨逵家属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连杨逵本人也早已遗忘,生前未向任何人提起过。直到1986年,也就是杨逵逝世一年之后,正在东海大学读硕士的杨逵的孙女杨翠,从朋友那里,得到了有人辗转送来的《绿岛家书》手稿。当杨逵次子杨建第一次看到这批家信的时候,百感交集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父亲生前对子女关爱的信件,居然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被子女们读到,历史留下了多少愤懑、痛楚和遗憾!这一切,正如杨建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中所说的那样:

这些家书绝大部分未曾寄发,我乍一接到,当晚挑灯夜读,前景旧事纷纷涌来,可以想见父亲在当时严格的通信字数限制下,不能如愿地将这些关爱寄达家人手中的悲愤之情,二来也可以知道,父亲是想利用书信体的形式,来记下他飘离海外的所思所感……^①

杨建流着眼泪,彻夜阅读。当他合上了《绿岛家书》最后一页的时候,天色已经发亮。杨建细心整理了这批信件,并为它一页页地加

^① 杨建:《一个支离破碎的家》,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页。

了注释。1986年10月18日,《绿岛家书》由《自立晚报》副刊予以连载,至同年12月24日全部刊完,历时两个月有余。《绿岛家书》的公布,受到读者的广泛注目,它让“绿岛杨逵”生前受冤于社稷、死时含悲于家人的沉冤,在杨逵写了《绿岛家书》二十九年之后(从1957年起),在杨逵出狱十五年之后(从1961年起),在杨逵逝世一年之后(1985年),终于得以昭雪。《绿岛家书》后来又经杨建的女婿魏贻君整理一次,并且加上适当的标题,由台中的晨星出版社于1987年3月结集出版,书中收入了从1957年10月12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零七封家信。2001年12月,彭小妍主编的十四卷《杨逵全集》全部出版,其中第十二卷(书信卷)收入了杨逵从1954年10月15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一十一封绿岛家书。至此,目前所能够搜集到的绿岛家书,得以完整面貌地呈现。

《绿岛家书》写作的背景,根据杨建的回忆,是父亲锒铛入狱后全家最困顿的日子:

向电力公司租来的土地,因电力公司要收回以增建员工宿舍,限我们在年底前搬出去,交还土地,这是民国四十六年中的事情,这件事对穷苦的我们而言,形同晴天霹雳,而父亲在家书中所提及的诸事,也从这年开始。……

民国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间,家中情形一如往昔,人人都在窘困的环境中冲撞、挣扎,企图走出一条路来。

但是这一连串的变动,只是家中每个份子各自投入生活,各自与环境搏斗,容或稍有助于家庭,也是微不足道,妈妈仍然每日卖花糊口,债务和利息像滚雪球一样,担子愈来愈重。

家中恒是这般,而在绿岛的父亲在这期间也曾旧病复发,我们断续寄出一些药。这便是这批家书的背景,父亲为理想而受罪,帝制中国有所谓“诛连九族”,而我们虽然没有

一起牵连入狱,却在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亲友走避,人情冷漠。我们知道,在这个矛盾的时代中,身为一个政治批判者的家属,需要更大的觉悟和勇气。^①

在这种背景下,被囚禁在绿岛的杨逵,对家庭的困境,家人的悲苦愁闷心情,特别是子女在求学、就业、婚姻等方面遭遇的人生问题,用尽言语相劝勉励,频频以出狱、团聚、重建未来新乐园来激励家人,盼望大家携手扶持,共同走过这段悲剧岁月。

有一段时间里,长女秀俄流落花莲当厨师,与家人失去联系;长子资崩只身前往台北谋生,当园丁,做木工,四处转徙;次子杨建从三餐不济的大同工专生涯中脱身,前往高雄入伍受训;次女素绢在南投一带读师专,么女杨碧在台中投考家职,妻子叶陶也留在台中,仍旧以卖花为生。加之远在绿岛的杨逵,全家七口人竟然离散在六个地方!家庭成员各有各的困扰,杨逵每星期依次往每个地方给每一个亲人发一封信,要六个星期才能轮一遍。杨逵面对的是这种现实:按照狱中规定,每位受刑人“每周只能寄出一封三百字的信,心有余而字不足,恐怕很难发生有效的帮助”。^② 有一次,因为子女的事情,杨逵多写了几句话,竟被罚以三个月不能寄发家信。后来,杨逵在写家信的同时,开始利用狱中刊物《新生月刊》的版面,与家人讨论问题,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这成为杨逵解决家书“心有余而字不足”的一种变通办法。杨逵在1958年10月11日给次子杨建的回信中,就曾提到:“关于你面临的诸问题,我很高兴同你讨论一下,一写便写了几千字,这么长的信是不能获准寄出去的,只好等新生月刊发出后寄给你

^① 杨建:《一个支离破碎的家》,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4页。

^② 杨逵:《快车配上灵刹车》(1959年7月18日,给萌、梅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6页。

作参考。”^①

《绿岛家书》的每封信，有专门写给的对象，如“亲爱的陶”、“亲爱的绢”等等；也有写给非特指对象的，如“亲爱的孩子”、“陶、绢、碧”等等；每封信都注明写作时间，还有专门署了题目的信件，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凡此种种，跟随著时序的推衍、心绪的起伏、事件的切入、字迹的急缓，都让人感到，在薄薄的笔记本中翻腾著的，是一个父亲在有家归不得的情况中、急切地发出了对受伤的家庭的祷祝，却又无力而彷徨。”^②

《绿岛家书》的写作，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离散命运中的亲情凝聚与爱心温暖。

在家庭成员四散、每个人都在艰苦挣扎的时候，杨逵对于受伤的家庭，是以深情关爱和热情鼓励，来尽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尽管他在绿岛监狱经受那样沉重的人生，但写给家人的信中，流露的不是个人困顿与烦忧，而是对家人的关心、呵护之情。对于子女们自幼就得承受因父亲而来的灾难，杨逵一向自责极深。尤其是对于小小年纪就辍学、打工，为家庭承受重压的长子资崩，杨逵更是怀有愧疚之心。《绿岛家书》中有四十七封信的署名都涉及资崩，其中单独写给资崩的就多达二十三封。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封信里，杨逵对资崩说：

近来你的信都充满著悲观、忧闷、颓丧的气氛，叫我很担心，也觉得惭愧。十年来，我未能尽到做一个爸爸应尽的责任，才让你们兄弟姊妹；特别是你，吃得太多的苦了。

^① 杨逵：《人生不怕问题多》（1958年10月11日，给杨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0页。

^② 向阳：《阳光一样的热——读杨逵先生〈绿岛家书〉》，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页。

小雏们刚出蛋壳，需要的是母鸡用翅膀来防护、来温暖，也需要母鸡帮其觅食、带头找路的，在这个时候，你才十几岁的时候，就让你带着幼小的弟妹们在冷酷的环境里奔波，就是钢铁做的心也会痛的。这是我生活历程中惟一的遗憾。

在你们正需要温暖的时候，我的翅膀离得这么远，无法把你们抱在怀里，使你们免致冻僵。在你们正在迷途上徘徊的时候，也未能带头指点你们，使你们避免踏上这许多陷阱与险崖。^①

十年的绿岛生涯，强行割断了杨逵与家人朝夕相伴的现实生活，却割不断他与家人精神情感上的联系。杨逵在最黑暗的地方发出的爱和热，使他成为困顿岁月中家庭的灵魂所依，精神情感的能源所在。对于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杨逵是用爱心与亲情、精神与信念，来把它牢牢支撑。在他看来，“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起点，而它的结合是爱。”“永恒的爱一定要建立在互相了解、互相体谅的基础上。”^②面对一家人的离散境遇，杨逵认为最要紧的是精神的安定。他寄希望于全家人互爱互谅、团结奋进、共渡难关。

对于患难与共的妻子，杨逵深深理解寂寞岁月中的叶陶独自拉扯五个孩子的艰辛，他总是想方设法化解叶陶与孩子们在就业、婚姻问题上发生的矛盾。杨逵叮嘱子女们说：“妈的脾气固然坏，优点却也不少。你们应该原谅她……爸离家太久了，妈因寂寞与艰苦，脾气

^① 杨逵：《人生的意义是什么》（1958年1月12日信件），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8—59页。

^② 杨逵：“绿岛时期家书”（1956年7月的信），收入《杨逵全集》第12卷（书信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6页。

暴躁一点免不了的。”^①这样的言语和口吻，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绿岛家书》之中。而在给叶陶的信中，杨逵则提醒她，要发扬家庭民主，尊重孩子们的意见，给他们以成长的空间。杨逵这样安慰妻子：“陶，新年又过去了。再十五个月我就可以回去了，过一个中秋，一个年，很快就会到的，希望你们再忍受一下。我回去以后，一切都可以复原的，快乐的晚年是可期的。”^②

对于困顿岁月中成长的子女，杨逵更是倾注了他的爱与关怀。从求学就业境遇，到婚姻恋爱问题；从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波动，到工作环境里的事业发展，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杨逵的心。他说：“我的心肝孩子们的痛苦便是爸的痛苦，惟有你们都真正快乐，爸才是快乐的”^③。

看到长子资崩一度因生活重负而苦闷焦灼，萎靡不振，杨逵接连不断地给他写信，帮他规划家庭经济，制定人生计划，鼓励他从困境中走出来。得知资崩的精神状态有了新起色，杨逵非常高兴，他在写给资崩的信中说：

亲爱的萌：

新年又到了，正在这个时候你提高了文艺工作的兴趣，想要著手编纂台湾抗日史，我很高兴。为祝你有意义的工作的开始。我赠给你笔名“萌”。对于播过十多年的种子，种植过上百万棵花木的你，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不必赘言的。

那是多么蓬勃有力啊！

① 杨逵：《不必依靠别人》（1960年2月13日，给萌、梅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98页。

② 杨逵：《保持乐观精神》（1960年1月2日写给叶陶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90页。

③ 杨逵：《黑夜却有星光》（1957年11月，写给杨素绢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5页。

春天又到了，你的理想之芽也该萌了。^①

在这之后，杨逵更多的时候，是在信中直接称呼资崩为“萌”，《绿岛家书》中涉及“萌”的信件多达二十三封，单独写给“萌”的信件就有七封，可见杨逵对长子的殷切期望。

得知次女素绢初涉世事，因幻想纯真缺少经验，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碰到了困难，杨逵放心不下，几次写信鼓励女儿：“亲爱的绢，我把你的信反复看过十几次，字背之音都听见了。你的困难是年轻人都会碰到的，我也是曾经碰到过的一人。初出校门时，谁都是幻想天真，一切人事物都生疏难应付，跌了一跤又一跤是免不了的，这正是人生的试练，也是对朋友伴侣的考验。”^②透过一封封家书，从遥远的绿岛所传递过来的，正是杨逵那沉甸甸的父爱。

对于家中新生的第三代生命，杨逵则寄寓了更多的欣喜与希望。《绿岛家书》中那些直接写给孙子的信中，如《有个好玩的公公》、《公公永不想偷懒》、《用实力赶上公公》、《公公的烟囱又冒烟了》等等，除了表现出一个老人含饴弄孙的舐犊之情外，还将杨逵的乐观情绪和天真性情展露无遗，让人看到了一个“老顽童”的形象。得知长子资崩马上要做爸爸了，杨逵欣喜万分，他给还未诞生的孙儿起名：

我希望他（她）日日新又日新，天天进步，这样保持求真的精神便能有美与善的表现，男的“又新”、“天进”。女的“真”。^③

^① 杨逵：《理想之芽也该萌了》（1957年12月20日，写给萌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0页。

^② 杨逵：《跌倒了，爬起来》（1959年7月25日，写给绢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9页。

^③ 杨逵：《日新又新，天天进步》，（1960年2月20日，给萌、梅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01页。

长孙天进的出世，让杨逵看到了新的希望，他给幼小的天进写信：

天进你这个小小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了一片欢乐，扭转了家庭危机，我将为你准备一支“天进之歌”让大家合唱。^①

心情的豁然开朗，让杨逵重建家园的计划更加坚定，他曾把出狱后准备创建的花园幻想为“天进花园”。孙子每一步成长，都带给杨逵难以言状的喜悦，他单独写给天进的信就有五封。杨逵在信中这样说：

亲爱的孙儿：十日的信和相片两张都收到，我们藉由相片已经见面了，这封信件可算是见面礼，祝你天天进步。……

爸爸大坏蛋，实在该骂，怎么可以用胡子来刺痛你软软的苹果颊呢！你得严厉警告他一下，如自己懒得修脸，就该请妈妈替他修，要不然呢，叫公公用镰刀像刈茅草一样给他刮胡子，那就不太好受的了。

不过，爸爸曾来信抱怨你爱哭，你也得当心。人家都说婴儿哭叫是一种运动，公公是爱运动的，自然支持你，可是运动是在白天做的呀，怎么可以三更半夜运动起来，吵得爸妈不能睡眠，以致白天没精神工作？逗人笑笑的调皮是可以的，逗人苦恼的调皮可不行，因此挨打小屁股，公公是不能袒护你的啊。

^① 杨逵：《有一次爸爸发疯了》（1960年3月20日，写给天进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19页。

前封信寄去几张相片,是公公参加游泳比赛和跑五千公尺的,公公一直还在水陆两方面力求进步,得了两项第一名,一项第三名,还有一面“自强不息”的锦标哩。你既学会了翻身,再来学爬、学坐、学走、学跑,用实力来赶上公公吧!①

对长女秀俄的两个孩子婵娟和宗能,杨逵同样挂念在心,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

春节又到了,爸不能给孙子们压岁钱,让他们高兴一下,觉得很遗憾。你就把往年我们在园里过年的快乐故事讲给他们听听吧。这样,他们便会觉得有一个好玩的公公多有趣,自然会发生乐观的期望。这是爸惟一能够给你们的礼物。②

1958年,杨逵在绿岛监狱过生日的时候,还在晒衣场上种下七棵榕树,希望多年之后,孙儿们来绿岛玩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人在这绿荫下乘凉玩耍,可以从中体会到一种亲情传递、生命链接的快乐。

杨逵对家人的拳拳之心,在《绿岛家书》中可谓多层面的体现,他让人们看到了有着人间大爱和社会关怀的杨逵,“无情未必真丈夫”的另一面人生。

第二,艰苦岁月中的乐观精神与信念支撑。

① 杨逵:《用实力来赶上公公》,(1960年7月1日,给孙儿天进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48—250页。

② 杨逵:《有个好玩的公公》(1960年7月1日,给秀俄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94—195页。

杨逵是为理想而坐牢的,能够支撑他度过漫漫绿岛岁月的,是“逆风何所惧”的乐观主义精神,是“雷公打不死”的生命意志。杨逵用这种精神鼓励自己,也透过《绿岛家书》,把它传递给家人。在《我会把笑声带回家》、《乐观是人生最要紧的》、《满屋花香的快乐世界》、《梦见快乐的日子》、《带点漫画气氛的家》、《保持乐观精神》等家书中,杨逵这样表明他们乐观向上的人生观:

乐观在人生是最要紧的,只要能够乐观,物质上、工作上多吃一点苦也可以从安慰中得到了补偿。①

人生的意义是争取个人长久的快乐,同时也为众人争取快乐。②

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居乐业,保持乐观精神干下去,如此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填充也可以的。只要孩子们都能保持健全体魄、乐观精神,我回去之后要重建辉煌事业是没有问题的,快乐的晚年自不会发生问题。③

在《我是雷公打不死的》、《爬起来迎接黎明》、《坚持意志与决心》、《人生不怕问题多》、《挺起胸来吧!》、《黑夜却有星光》、《跌倒了,爬起来》、《有勇气面对现实》、《穷是不必畏惧的》、《未来是光明的》等信件里,杨逵始终诉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生命信念:

① 杨逵:《乐观是人生最要紧的》(1958年12月6日,给萌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02—103页。

② 杨逵:《人生的意义是什么》(1958年1月12日,给孩子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65页。

③ 杨逵:《保持乐观精神》(1960年1月2日,给陶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91页。

健全的人生是欢欣而不溺，忧患而不消沉，可伸可屈是
我们应该保持的态度。^①

你知道茅草是割了又长，越长越大，不怕风，不怕雨，不
怕旱，也不怕人家或蹂躏的。^②

对于困顿岁月中满是伤痕的家庭，杨逵用《绿岛家书》传递的爱
与亲情来抚慰它，用坚忍的生命意志和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来修复
它，他一次次地憧憬着出狱后能为家庭遮风挡雨：“等到回家，一切不
理想的事情都可以彻底改善，我们便可以过着温暖和气与充满欢乐
的生活。”^③于是，等我回家——重建家园——全家团聚——创造花
香满溢的快乐世界，就成为杨逵在绿岛岁月中强烈而执著的向往，成
为他对家人深深的承诺与期许。

第三，绿岛生涯中的疾病叙述与生命渴望。

疾病叙述，构成《绿岛家书》中的重要内容。“其数量之多，整部
‘绿岛家书’可以说是一部杨逵自己的‘疾病备忘录’，也可视为杨逵
的另类‘身体书写’。”^④

在绿岛监狱，杨逵始终处于生命挣扎的矛盾境遇。身为政治犯
的杨逵，经受着思想与身体的双重囚禁。他虽然可以用意志坚守自
己的思想和信仰，却无法完全左右饱受磨难的身体，坚贞的思想与辱

① 杨逵：《欢欣而不溺》（1958年10月5日，给碧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88页。

② 杨逵：“绿岛时期家书”（1954年10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2卷（书信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页。

③ 杨逵：《先从容忍做起》（1958年7月19日，给萌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74页。

④ 杨翠：《杨逵的疾病书写——以“绿岛家书”为论述场域》，《杨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页，（台湾）静宜大学举办，2004年6月19日至6月20日。

弱的身体形成突出矛盾。而对于家人,特别是在遭遇困顿岁月的子女面前,身为父亲的杨逵首先要担当“医者”的角色,帮助孩子们化解矛盾,渡过人生难关,诸如对长子资崩的情绪处理与精神疗治。与此同时,身为病人的杨逵,又必须面对体弱多病的现实,通过向家人求援,来帮助自己疗治疾病,走出身体困境。这使得一部《绿岛家书》,既是苦难人生境遇中的励志家书,又成为杨逵自己的“疾病备忘录”。

杨逵原本体弱多病,在严酷的绿岛生活环境中,不断经受扁桃腺发炎、淋巴腺肿大、肝功能衰弱,以及感冒、失眠、沙眼等一系列疾病的缠绕。1958年,杨逵的肺病复发;1960年初,为子女思虑成疾,肝功能衰退加剧。这期间,《绿岛家书》中反复出现的,就是“疾病”、“药品”、“治疗”、“健康”、“生命”之类的字眼,涉及自身病情或向家人求药的信件,大约有三十七封之多,由此可见“生病”是经常困扰杨逵的生命状态。

每每家人因生活贫困、无法及时供应杨逵所需药品时,杨逵便向狱友借药救急。绿岛监狱里,政治犯中有不少医生,他们曾热情地救助了狱友。杨逵后来回忆说:

在火烧岛,政治犯中前前后后大概有十个医生,像吕水阁、胡鑫麟、胡宝珍、王荆树和“阿斯匹林”等。他们就在火烧岛医务室替同学看病。“阿斯匹灵”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得。当时在火烧岛,药真少。遇到感冒、肚子痛、头痛时,这位从西螺去的医生就开阿斯匹灵,反正治什么都用阿斯匹灵,所以大家叫他阿斯匹灵。这些医生,为火烧岛的同学贡献不小。①

① 杨逵口述,何昀录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后》,原载《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第96—97页。

当时在绿岛的医生政治犯,内科有吕水阁、徐水泉,眼科有胡鑫麟,小儿科有陈神传,外科有林恩魁,耳鼻喉科有苏友鹏,皮肤泌尿科有胡宝珍,妇产科有王荆树,可以开个综合医院了。^①

借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生的。杨逵写信说:

我自回到这里,干嗽、喉咙痛、淋巴腺肿起来;身体疲乏不太舒服,恐怕毛病复发,医生朋友都很关怀,经常给我诊察,打针、药吃,慢慢会好的,不要挂念。只因为,这些药都是向朋友借来的,Ameiazid 已经借了四百粒了,Paso 借一大瓶,还有复方维他命等。他们的接济也是有限的,这些药不好意思借得太久,以致影响他们的治疗……^②

四个月来吃的药都是向朋友借的,朋友们也很慷慨借给我,不过,我知道他们的接济也是很有限,不好意思借得太多,拖得太久,以致影响他们自己的疗病,心里免不了有一点沉闷。^③

1958年10月,在连续四个月没有收到家中寄药、已经欠下狱友诸多药债的情形下,杨逵转而向次子杨建及次女素绢求援,因为杨建刚刚进入凤山陆军步校充任二等兵,当时月薪七十五元;素绢1958年9月担任国小教职,稍有收入。杨逵说:

① 参见胡鑫麟口述,胡慧玲撰文:《医者之路》,收入胡慧玲《岛屿爱恋》,(台北)玉山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26页。

② 杨逵:《人生不怕问题多》(1958年10月11日,给杨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1页。

③ 杨逵:《种了七棵榕树》,(1958年10月25日,给萌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6页。

我曾向家里要 Ameia,写过几封信了,却一直没有反应。

我知道家中的经济情形是很苦的,自然不会怪他们的,不过我曾叫他们整理一些不用的书拿到古书铺去换钱来买药,他们也置之不理。实在叫我难以谅解。也许是顾虑面目吧?我不知道把不用的书卖掉会伤害他们面子的。这样拖下去,假如人都没有了,留那些烂书有什么用?

话虽这么说,你哥哥现在够苦恼的了,我又不加添他的烦恼。^①

疾病缠绕的日子里,明知家中经济困难,子女人生负重,杨逵又不得不开口求援,这让他不时陷入焦虑、沉闷、矛盾的情绪之中。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杨逵想方设法,诸如,坚持给《新生月刊》写稿,以保证每月二十元的稿费;杨逵也曾想写些故事向外投稿,这是他惟一可能弄到钱的办法,但是向外投稿的手续办理烦难而长久,远水不救近火。他减少了吸烟,把日常开支压缩到最低点,同时也努力锻炼身体,改善自身体质。

离服刑期满的日子越近,杨逵对健康的渴求也越强烈,因为有那么多重建未来的计划在等待他。他在写给子女的信中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再忍耐一下,让我安然度过这最后一年。只要我能保持健康回去,你们的委曲一定能得到补偿,困难问题也都可以顺利解决。”^②“近来你不能按月寄钱,个半月才寄一次,我可以猜想你的收

^① 杨逵:《人生不怕问题多》(1958年10月11日,给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1页。

^② 杨逵:《我正站在深渊崖上》(1960年3月26日,给萌、梅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21页。

支情形是不理想的。但我想,我是可以想办法的。只剩了七个月,再勉强一下很快就到了,多一点负债也是有限的,只要保持健康回去的话,再多的负债也是没有问题的。”^①基于此,杨逵要咬紧牙关坚持度过最后的绿岛岁月,以健康的身体迎接家族共享的生命背景,所以,疾病述说的背后,是强烈的生存愿望和抗争意志,也是与家人求得互助、共渡难关的一种生命联系方式。这一切,正如杨翠所指出的那样:“疾病可谓杨逵的一种生命本质,‘绿岛家书’中,杨逵兼具病人与医者双重角色,十二年的牢狱之灾,杨逵以疾病为题,透过家书,串织两座禁锢之岛,关照家人的身/心/灵,探索自己的生命姿态,并储存自己的生命能源。”^②

总之,《绿岛家书》让人们看到的,是绿岛杨逵的真实形象和生命历程。透过他的所思、所想、所忧、所历,一个坚持“马拉松精神”的绿岛长跑者,一个有着“雷公打不死”胸襟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坚持《新生月刊》投稿的狱中写作者,一个充满普通人亲情关爱和生命困境的父亲形象,那般鲜明地浮凸出来,引领了受难者家庭的风雨征途,温暖了天底下坎坷的人生故事。

重读《绿岛家书》,其价值和意义正如台湾学者向阳所说:

这样的家书,不该只是杨逵先生家属的纪念物,它是整个社会都可以共享的心灵资产;这样的家书,虽然冠名“绿岛”;也绝不只是一个受刑人自励自勉的笔记,它还是所有在人生路途上正在前进、或陷于困顿的人都可以汲取使用

^① 杨逵:《我们的少年将会爱它》(1960年8月20日,给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65页。

^② 杨翠:《杨逵的疾病书写——以“绿岛家书”为论述场域》,《杨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页,(台湾)静宜大学举办,2004年6月19日至6月20日。

的生命能源。^①

二、绿岛诗文：图囹里放飞的情与思

绿岛时期,可谓杨逵诗文创作的高峰。其散文随笔的数量,达到37篇;诗歌的写作,也有十六篇之多。这些作品,当时根本无法公诸于世,侥幸得以“发表”的,也只是刊登在绿岛监狱的《新生活》壁报和《新生月刊》上面,并且是在严格的审查之后。多数诗文,则无声地存在于杨逵绿岛时期的新生笔记簿中,作者终其一生,都未能看到它们的发表,这样的诗文,至少有二十五篇(首)。然而,绿岛监狱虽然能够隔断文学作品的发表,却阻遏不了杨逵诗文的光芒;潜在写作的作家,在任何境遇里都依旧是一名文化战士。如果说,《绿岛家书》是杨逵在人生最黑暗处点燃的心灵之灯;那么,绿岛诗文就是他在没有自由的铁窗里放飞的生命之鸟。杨逵所向往的诗精神,他所坚守的知识分子情怀,都充溢在绿岛诗文的字里行间。

杨逵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采用纪实性散文和文艺随笔两种形式。前者多表现杨逵在绿岛的狱中生活和困顿岁月中的亲情家事,后者则重在文学性的思考和人生励志。杨逵虽然冤狱绿岛,却并没因此自怨自艾,放弃人生。在他的散文里,无论是对绿岛受刑人的劝勉,还是对离散命运中的家人的鼓励,或是对自我人生的期许,都特别张扬了一种振奋情绪、积极向上、走出厄运的精神气概,励志的色彩贯穿始终。

在《园丁日记》、《拾红土记》、《轻公差》、《上山砍茅草》、《捕鼠记》、《中秋过后》、《季节风侵袭以下》、《贫血的“新生月刊”》、《乌龟与兔子的赛跑》等作品中,艰苦的狱中生活揭开了绿岛囚犯的生存真

^① 向阳:《阳光一样的热——读杨逵先生“绿岛家书”》,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3年3月版,第13页。

相,困顿的人生岁月方显出英雄本色。且看杨逵所面对的生存环境:

旧的台风刚过去,新的台风又要来,一个警报刚解除,另一个警报又来了。什么万达、黛纳、芙瑞达、殷马、茜达、哈利……一个月来差不多没有安静过。

——《园丁日记》

外面天天刮风,天天下雨,每次上山种树砍草,差不多每次要淋湿一身的,感冒又一直积下来未能治愈。

——《季节风侵袭之下》

今天因下雨,山路滑得很,一不小心便四脚朝天,无心看风景了。……为怕跌倒,大家都担心吊胆,好像是蚂蚁的行列,走得很慢。

红土盛好了,马上抬走。下坡比上坡更难。

——《抬红土记》

今天起个早,上山砍茅草。来时天气好,忽变骤雨到,淋湿了和尚头,真糟糕。赶快下山跑,跳过一条沟,走跌了一跤,滚一倒,满身淤泥汗水臭。

——《上山砍茅草》

整个夏天,太阳似火球,室内如烘炉的绿岛,正如她的本来大名所称的,名副其实是火烧岛。

记得,初到这里那一年的第一个夏天,我们的皮肤都被太阳晒焦了,皮剥了一次又一次。无论白昼与夜晚,汗水如泉水,是流不尽、擦不干,是经验。

——《中秋过后》

烈日、暴雨、台风、崎岖的山路，抬红土、打石头、砍茅草、砌墙盖房、种树育苗，肆虐的大自然与艰辛的劳作成为绿岛囚犯的日常生活写照。面对无休无止的苦役，杨逵散文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抱怨和退缩，而是以坦荡心情的应对和生命意志的坚守，他一刻也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精神思索。《园丁日记》透过栽种树木时与大自然搏斗的情景，把绿岛难友坚忍的生命毅力和为后人带来绿荫的美好梦想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抬红土记》记述雨后上山抬红土的艰辛劳动过程，传达的是作者对难友之间互帮互爱精神的一种感念；从《上山砍茅草》摔跤的经历，杨逵悟出的是“人，生在这世间，什么时候要摔倒，什么时候碰到严重的困难是说不定的”^①，所以，坚强的精神更成为人们战胜一切挫折和打击的支柱。《乌龟与兔子的赛跑》描写的虽是杨逵参加绿岛运动会的故事，但它所要张扬的则是杨逵追求的一种人生精神：

这一次五千公尺赛跑，我的成绩固然是倒数第一；但我并不灰心。在乌龟与兔子的赛跑当中，乌龟输了是天经地义，一点也不稀奇；但谁也不能断定，乌龟就没有迎头赶上的一天。

现在我敢说：五十几岁还不能算是老了，五十决不是人生的终结，我们还是前途的。但这前途决不是叫天啊，神啊就可以赐给我们的，魔鬼也不能注定我们的命运。我们一定要经常磨炼，自强不息，有始有终，才能争得到。^②

^① 杨逵：《上山砍茅草》，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09页。

^② 杨逵：《乌龟与兔子的赛跑》，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04—705页。

事实上,身处逆境仍然不放弃人生追求,遭受厄运依旧怀有生命的期许,绿岛杨逵所依靠的,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对未来前途的乐观信念。

走进《太太带来了好消息》、《我的小先生》、《怎样才能把一个家弄得更好?》、《父子游泳赛》等散文作品,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浓浓的亲情,是活泼诙谐的乐观情趣。这种乐观向上的情怀与杨逵及其家人的生活困境形成鲜明对照,从中可看出赖以支撑他们走过人生坎坷曲折的精神柱石。《太太带来了好消息》表现杨逵入狱后陷入困顿的家庭是怎样在亲情爱心的相濡以沫中,团结拼搏,逐渐走出困境,终于步入生活坦途。杨逵这样描写太太带来的好消息:

好消息是我们家里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表现着协力一致与坚强奋斗的精神。就在六个人分为五个家的今天,大家的心越显得牢牢的结合在一起,使我无后顾之忧。

这个结合在一起的心,叫做爱。^①

接下来,杨逵以欣喜有加的口吻,如数家珍般地一一介绍了太太带来的好消息。在这个洋溢着自由、民主、快乐风气的家庭里,有着健康、明朗、活泼性格的太太,持家有方、自称全家“总经理”的长子资崩,勤劳能干、继任家中“副经理”的次子杨建,新近考入师范,曾任杨逵“小先生”的次女素绢,以及在哥哥入伍、姐姐上学之后,接任“管家婆”的么女杨碧,他们都以各自的拼搏和团结协力,共度困顿岁月,走出人生逆境。对于身陷囹圄、思念家人的杨逵来说,再没有什么能比

^① 杨逵:《太太带来了好消息》,绿岛《新生月刊》,1956年4月号;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24页。

这样的消息让他振奋,于是他在文章结尾深情地写道:

太太带来给我的好消息,不是金钱财宝,也不是添丁发财,是太太以及儿女们的牛一般的体格,牛一般的克苦耐劳,与真实人性的爱——这爱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

家是民族社会的基础,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起点,它的结合力就是爱,它正是太太带来的最好消息。^①

杨逵写于绿岛时期的散文,其中有二十余篇长于说理的文艺随笔。这些文章,或侧重于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平凡生活中的哲理发现而见长;或执著于创作问题的言说,以广泛的文学关怀为特点。杨逵的新生笔记簿上有一组“写作漫谈”的文章,它由《谈写作》、《什么是好文章》、《文章的味道》、《文章的真实性的真实性》所组成,加之《文化战士》、《作者与读者》等文章,集中地反映了作家杨逵在狱中的文学思考,并深化了他所坚持的文艺观。在文学的作用、作家的良知以及文学理想的真实根基等方面,杨逵如是说:

文章是反映人生的,人是社会的动物。生活有个人的一面,也有社会的一面,这些结合在一起,唤起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忧郁与雄壮。^②

文章是精神的粮食,是用以传情达意的东西。写文章

① 杨逵:《太太带来了好消息》,绿岛《新生月刊》,1956年4月号;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30页。

② 杨逵:《什么是好文章?》,绿岛《新生活》壁报,1957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56页。

的人,应该先有什么意思与情感要传达,是主动的、带有指导启发作用的。因此,社会对作者的要求,总比厨师更严厉。要是作者没有良知,出卖劣货与毒品,将受到的谴责与批评也是更严厉的。^①

作者藉艺术的形式又常常要提示他的理想,要是他的所谓理想是沙上的楼阁,要到那里的路又是一条虹,一定也不能叫我们向往。固然间接的表现方法是有的,但一定要有实质的事物来印证才能叫人共感与共鸣。^②

杨逵绿岛时期的文艺随笔写作,还特别注重来自民间的文学艺术资源的发掘,有关谚语、民歌、民谣、民舞、街头剧等话题开始大量进入杨逵的文艺思考视野,并引发他对于驶犁歌、捕渔歌、插秧歌、舞龙、弄狮、宋江阵等多种文化习俗和乡土艺术的童年记忆。这些民间素材,曾较多地运用在杨逵绿岛时期的戏剧创作,并在绿岛散文中不时涉及。

杨逵曾一连气写了三篇谈论谚语的文章,从谚语的由来与特性,到谚语的民间运用与流传,一一道来。在杨逵看来:

谚语是民众对某项事物看法的集约表现,个人的与偏

^① 杨逵:《文章的味道》,绿岛《新生活》壁报,1957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62页。

^② 杨逵:《文章的真实性》,绿岛《新生活》壁报,1957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2页。

差的想法，都不能成为谚语。^①

谚语是我们民族伟大文化遗产之一，它用很通俗简洁的几个字，告诉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常常含有很深的哲理，给我们明快的解释。^②

谚语要经过千千万万人的嘴来流传，也就必须要得到千千万万人的公认，才能传到我们耳朵来。宣传要是空虚的、没有道理、没有事实根据的，就得不到那么多人的公认传诵。言论统制只能够禁压那些公开的出版与演讲，绝不能封闭了千千万万张的嘴。^③

不仅如此，杨逵还搜集了许多来自民间百姓的谚语，把它们用于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解读。诸如，将“黄虎生在太平洋未升天牙痒痒”、“三年小反，五年大乱”、“王爷公无保庇害死苏有志”、“大本营发表输的总记在别人的账”这些谚语连贯起来，可以极其简洁而传神地勾勒出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线索，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性。而透过“穷则变，变则通”、“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有心打石石会萎”（穿的意思），无心做事半路废“这类谚语，杨逵特别强调的是谚语中那种集思广益、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并以此来作为一种人生励志。事实上，杨逵在绿岛时期的文艺性思考，已经更多倾向于生活、土地、民间等话题，逐渐凸显其草根性

① 杨逵：《谚语与时代》，绿岛“新生笔记簿”（1）上之手稿，发表于《台湾新生报》1976年10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90页。

② 杨逵：《谈谚语》，绿岛“新生笔记簿”（1）上之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95页。

③ 同①。

文学的性质,并为杨逵晚年明确提出“草根文化的再出发”,奠定了文艺思考的基础。

杨逵绿岛时期的创作,也曾涉足诗歌领域。一般人们了解比较多的,是杨逵的小说、戏剧等创作,其实他的诗歌尝试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实践。早在日据时期,杨逵就已经开始诗歌创作。1942年7月13日刊登于《台湾新闻》上的《孩子们》,应是他最早发表的诗歌。他的遗稿里还有三首日文诗作,如《病儿》、《不要悲伤——写给女儿》、《送别老师》,其原稿纸上标明“首阳农园”的字样,这应该是他写于日据时期的诗篇,内容主要是揭示殖民地台湾的差别教育制度、孩童生活的贫寒以及现实社会的不仁不义。光复初期,杨逵在报刊上继续发表诗歌,作品有《却粪扫》、《上任》、《生活》等。其内容重在反映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社会百业萧条、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场景,诸如《营养学》里所说:“先生教营养/学生学营养/乌板写白字/先生亲像白令系/学生饿到瘦瘪瘪/壁顶的饼不得止饥”。^①这类诗歌多以台湾话文的民谣或童谣形式出现,并配之以充满讽刺与幽默色彩的漫画。

绿岛十年,杨逵的诗歌创作明显增多,《八月十五日那一天》、《十月好风光》、《胜利之歌》,是以回眸的眼光,谱写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可歌可泣历史;《祝你们新年好》、《黎明曲·公鸡叫》、《十年》、《大潮》、《青年》、《我们不是麻雀》、《一粒好种子》等诗篇,则特别表达了希望台湾人民珍惜历史与今天,团结奋进,不断开创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乐园的理想。而在《人生》、《学习》、《工作》等诗篇里,杨逵反复倡扬的,是那种即便征途荆棘满布,依然勇敢前行的韧性斗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百合》、《明年还要好》、《月光光》是以童谣形式创作;

^① 杨逵:《营养学》(童谣),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第3期,1948年8月16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 (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0页。

《我要克难一把琴》采用民歌体而为，无论它们是写家庭的离散情境，还是在写漂泊在外的父亲心愿，都对未来怀有一番美好梦想，充溢着一种笑看人生命运波折的乐观情怀。

杨逵的诗歌写作，内含一种执著鲜明的诗精神，它与作者毕生坚持的文学理念，是一脉相通的。正如杨逵后来在《即兴》一首诗里所表现的那样：

记得小时候
我是蛮喜欢诗的
时常到旷野里追逐
把诗当歌唱！
与蜻蜓、蝴蝶赛跑。

但在好久好久一段时间
我却背向了诗
既不作也不唱
因为讨厌“皇民之道”
赞美“七七”的暴行
更是叫人无法忍受的残酷！

我不爱听悲歌
悲歌却从地牢里响起
就像老牛的叹息
我不爱听悲歌
周遭的阴沟里
却传来一大群老鼠

吱吱叫着在抢食。^①

杨逵所推崇的诗精神,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品格,它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我不会写诗,却喜爱真诗。
为了它,
就是要跑五千里路去找寻也愿意。
真诗里头,充满着诗精神。
它表现的是心声,叫人向往。
它爱真、爱善、又爱美。
等权势碰到头上来了
为所信仰的,
随时可以把生命赌注!
……
屈原——
他用生命写下了史诗。
伽利略——
他在死的威胁之下,
还唱着“地球正在转动”。
在这里——
没有屈服,不会阿谀。
这才是真实的诗精神!^②

① 杨逵:《即兴》,原载《自立晚报》副刊1982年8月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8—69页。

② 杨逵:《诗精神》,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45—446页。

向往真诗,讨厌伪诗;崇尚真善美,反对假丑恶,这正是杨逵的诗精神所在。这样的文学观,与屈原所追求的毕生求索、无怨无悔的文人风骨,是一脉相承的。

杨逵绿岛时期的散文诗歌,是他在日文转向中文的艰难语言转换中磨砺而成的。它往往以真实生动的生活体验,平凡深刻的人生哲理,真挚感人的亲情爱心,素朴自然的文学风格,将身陷绿岛的所见、所闻、所历的生命经验娓娓道来,就像“我手写我口”一般,不加雕饰地自然流泻而出,中文创作由此渐入佳境。且看杨逵在《我的小先生》一文中,描写自己和叶陶向当时尚在小学一年级就读的次女素绢学习国语的场景:

有时候,碰到了她不认识的字,就翻翻字典,女……
尤……女尤。女尤、女'尤、女-尤、女尤'——像妈妈的叫胖!

这样逗得大家大笑一场,笑完了课还是要继续进行。

小先生教得津津有味,老学生也未曾感到厌烦。

在念歌谣的时候,念得高兴时,我们小先生就站起来指挥,要老学生们来一次大合唱;兴致来了,小先生就从我的膝盖上溜下去,在八叠大的起居间开始跳她的舞。

这时候,老学生免不了就要鼓掌来给她捧捧场。①

在真实生动的场景中平添诙谐幽默的情趣,于平凡质朴的文字中蕴含深刻隽永的题旨,即便是日常生活,也被杨逵赋予一种素朴的

① 杨逵:《我的小先生》,绿岛《新生活》壁报,1956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集·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03页。

诗意和乐观向上的生命情趣。由此看来,笔下流淌的是真情,心中放飞的是理想,荆棘之途坚持的是精神,这正是杨逵的绿岛诗文给予我们的人生启迪。

结 语

走进杨逵的世界,你无法不让自己心生感动,情怀敬仰。

杨逵,一部博学厚重的大书,把你带进长长的历史隧道,带进纵深的社会地带。多栖作家、文坛编辑、大地园丁、绿岛囚犯、不朽老兵……杨逵所拥有的多元人生角色,他所经历的殖民地创伤经验和戒严年代的命运遭际,连缀了台湾的历史、政治、文学乃至广阔的生活视野,为你展示出台湾的社会地图和文化的百科全书。

杨逵,一部脊梁挺直的大书,碑石一般铭刻着中国人的抗争精神,给你以无穷尽的人生动力。杨逵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抗争精神情有独钟,透过伯夷、叔齐、司马迁、杜甫、岳飞、文天祥等古代先贤和文学大家,他延续了中国历史上的抗议文学传统;承接鲁迅的现实反抗道路,他又与赖和一同开创了台湾抗议文学的先河。以“放胆文章拼命酒”的抗争姿态,抒写出乡土台湾的灵魂和风骨,这就是杨逵永恒的历史定格。

杨逵,一部意境高远的大书,不断打开你思想视域。太深的历史忧患,孕育出太多的美好心愿;曾经的亚细亚孤儿记忆,让杨逵充满渴望民族团结、两岸统一的愿景。在他眼里,有形的澎湖沟或许可以割断两岸一时,而文化血脉的传承,文学力量的互动以及人性精神的濡染,却坚忍不拔地推动着时代的潮流,创造出民族历史进程的新

高。杨逵一生梦寐以求的，是自由、民主、幸福的台湾新家园，是统一、和平、繁荣的中国新前景。

杨逵，一部意犹未尽的大书，让你久久徜徉，品味再三。文章素朴而内蕴丰饶，生活平凡却极见深刻，心语倾诉则意怀诚挚，人格的魅力令人肃然起敬。更何况，做真人，说真话，写真文章，凡小说、诗文、戏剧、评论，皆出自真情；一路走过去，身后留下的是一座文学的宝库，生命的长卷。

永远的杨逵，一部读不尽的大书。

附录： 杨逵文学活动年表

1905 年(出生)

生平与文学事迹

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一),出生于旧台南州大目降街三百四十七号(1921年改称新化镇),父杨鼻、母苏足之三男,本名杨贵。

时事与文坛纪要

4月30日,笞刑处分自去年5月实行以来,一年间被处笞刑者计四千零六十八人。

5月29日,总督府设置临时户口调查部。

6月24日,公布台湾土地登记规则施行细则。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为总理。

9月5日,日俄媾和,签署《朴茨茅斯条约》。

1906 年(1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3月4日,在1902年以来林痴仙、林幼春叔侄倡导恢复栎社活动的基础上,有组织的栎社正式成立。

4月11日,日本陆军大将佐久间左马太取代儿玉源太郎,继任第五任台湾总督。

11月3日,后藤新平民政长官卸任,改任总督府顾问,殖产局长祝辰己继任。

12月,明治制糖株式会社成立。

本年,台南南社成立。发起人为连雅堂、赵云石、谢籁轩等,蔡国琳任社长。

围绕“击钵吟”的评价,台南南社与台中栎社发生关于“台湾诗界革新论”的论争。

1907年(2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1日,制定公布律令审议会章程。

2月10日,东洋制糖株式会社成立,本社设在台湾。

5月22日,中国同盟会在广东发动黄花岗起义。

11月15日,北埔事件爆发,新竹北埔支厅被义民袭击。

1908年(3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4月20日,台湾纵贯铁路全线开通。

5月31日,鼠疫猖獗,初发以来患者逾千人,死亡八百余人。

11月14日,清光绪帝歿(38岁),11月15日,西太后歿(63岁)。

12月2日,溥仪即位(宣统),醇亲王摄政。

本年,蔡启运、蔡汝修刊行《台湾击钵吟集》,书收新竹县竹梅吟社诗稿四百余首。

1909年(4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21日,台北台南间直通电话开通。

5月1日,总督府批准手巾寮(旗山)土地二千甲与爱久泽直哉

开垦。

9月30日,派遣“蕃地”之军队全部撤回,标志佐久间总督之“讨蕃”政策全面失败。

10月25日,公布地方官制,改原来二十一厅为十二厅,设台北、宜兰、桃园、新竹、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阿猴(屏东)、台东、花莲港、澎湖十二厅。

10月26日,日本任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赴哈尔滨与俄藏相会谈,被韩国青年安重根刺杀。

10月30日,新高制糖股份公司创立。

本年,台北瀛社成立,首任社长洪以南。

1910年(5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6月,台中、松岗、协和三制糖厂合并,设立帝国制糖株式会社。

7月27日,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大岛久满次卸任,内田嘉吉继任。

8月20日,日本吞并韩国,改称朝鲜,置朝鲜总督府。

10月30日,公布“台湾林野调查规则”。

1911年(6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8日,阿里山铁道开通。

2月8日,梁启超由日本来台游历,同台湾各地、各诗社广泛接触,著有《海桑吟》一卷。4月2日,栎社以台中林家公馆瑞轩为会场欢迎梁启超,宾主三十余人,极一时之盛况。

4月1日,公布台湾施行货币法。

10月10日,武昌起义。

10月26日,始采用本岛人为巡警。

1912年(7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3月23日,义军领袖刘乾之徒袭击林杞埔之厅顶林派出所,世称林杞埔暴动事件。

7月30日,日本明治天皇歿,皇太子嘉仁践祚,改元大正元年。

本年,全台诗人联唱大会在新知县北郭园举行。台中栎社、台北瀛社、台南南社等社诗人八百余人与会。

1913年(8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20日,废止官厅所发布命令、告示、谕告等文件向来所附之汉译文。

2月16日,台南制糖株式会社召开创立大会。

11月20日,苗栗罗福星组织“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抗日革命事件事发,被检举者九百二十一人,被起诉者二百二十余人,被处死刑者二十人。

12月19日,林本源制糖会社举开创立总会。

1914年(9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入学之前,最远到过新化附近的棒口外祖父家。

因疾病困扰与家境贫穷,一姊二妹一弟于数年间相继死亡。

时事与文坛纪要

5月7日,六甲抗日事件主谋罗臭头与其同志袭击台南县六甲支厅,被围困后壮烈自戕。

5月17日,讨伐太鲁阁原住民行动开始,佐久间总督任司令官。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

1915年(10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进入大目降公学校读书。因体弱多病延迟入学,被同学取笑为“鸦片仙”。

噍吧哖事件发生,长兄杨大松被征为军伕。当台南开往噍吧哖(今玉井)镇压义军的炮车从家门前通过时,从门缝间窥见并深为惊骇。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之要求,以最后通牒强迫接受。

1月21日,总督府迫使全岛各厅长(公吏)辞任台湾同化会评议员;2月26日,命令解散台湾同化会。

2月3日,公布台湾公立中学校官职。台中中学校设立。11日,发布台湾公立中学校规则。

3月28日,台北县新庄人杨临,密谋起义抗日。事泄后,与同志七十人被捕,判处极刑。

5月1日,佐久间总督退任,日本陆军大将安东贞美新任台湾总督。

8月3日,余清芳、罗俊、江定谋起事于台南西来庵,率领数千民众起义。安东总督调军队赴援残杀无辜,因此事件被检举者一千九百五十七人,八百六十六人处死刑。是为台湾人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日起义,世称噍吧哖事件或西来庵事件。

10月20日,内田民政长官辞职,传与噍吧哖事件有关。下村宏(大藏省为替贮金局长)继任。

本年止,留日学生约五百人。

1916年(11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4月16日,噍吧哖事件首领江定自首。

6月6日,袁世凯歿,次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代理。

7月13日,江定等三十七人被判死刑,噍吧哖事件告一段落。

1917年(12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父亲友人之女梁盒(十二岁)进门为童养媳。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一月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在《新青年》二月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运动开始。

5月26日,台南高等女学校开办。

6月25日,广东召开非常国会,9月10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宣布成立广东军政府。

12月8日,公布台湾新闻纸令。

1918年(13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25日,总督府举开高山“蕃”归顺典礼。

6月6日,安东总督罢官,日本陆军中将明石元二郎继任台湾总督。

6月11日,公布总督府医学校规则。

7月19日,栎社社员蔡惠如、林幼春倡议创立台湾文社,出版《文艺丛志》以图普及汉文。

7月,蔡惠如与留日学生林呈禄、彭华英等,联络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部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创立声应会。

1919年(14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目睹受父亲照顾的小贩杨傅被日本警察殴打致死,心中备感凄惨。

时事与文坛纪要

3月6日,全岛实业大会在台南召开。

5月4日,北京学生为抗议山东问题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爆发。

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0月29日,日本上院议员田健治郎继任台湾总督,是为首任文官总督。

本年,台湾新文学先驱者赖和从厦门回到台湾。

1920年(15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次兄杨趁考上台北医学校,因无力筹措学费,接受父执辈劝说,入赘大营陈家。

在大目降公学校读书期间,除了一年级升二年级时是第三名,其余每学期皆为第一名。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1日,在东京台湾留学生于涩谷的蔡惠如寓居成立新民会,推举林献堂为会长,是为台湾民族运动的指导团体。

7月16日,新民会机关刊物《台湾民报》前身之《台湾青年》创刊,是为台湾民族运动惟一之言论机关。

7月27日,公布地方制度大变革,实施州制市制街庄制,划分为五州、二厅、下辖三市、四十七郡、一百五十五街庄。

12月15日,林呈禄发表《六三问题之归著点》,主张设置台湾特别代议机关代替六三法,遂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展开。

11月5日,连雅堂著《台湾通史》上册刊行。

1921年(16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新化公学校毕业,投考中学失败,进入新化糖业实验所当临时工,日薪三毛八分。所里日本人戏称之“杨贵妃”,遂不喜杨贵本名。

时事与文坛纪要

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上海。

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举开创立大会于台北静修女学校,推选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林幼春为协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11月28日,《台湾文化协会会刊》创刊,凡八期。

11月12日,连雅堂完成《台湾通史》。

1922年(17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考进新设立之台南州立第二中学,老师多来自日本。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20日,《台湾青年》发表陈端明《日用文鼓吹论》,这是台湾最早提倡白话文的文章。

4月1日,开始实行日台共学制。

4月10日,《台湾青年》发行十八期后,改名为《台湾》。

1923年(18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阅读大杉荣被虐杀的新闻报道而大受冲击。作文课批评新渡户稻造博士《修养论》之保守观点,受老师赞赏。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8日,公布实施《治安警察法》。

1月15日,黄呈聪、黄朝琴在《台湾》杂志第四年第一号发表《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及《汉文改革论》,二论文开创台湾白话文运动之先河。

4月,《台湾民报》创刊。同月,白话文研究会在台南成立。

4月6日,日本上院议员内田嘉吉继任台湾总督。

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焚毁及倒塌房屋四十六万五千户,死者九万一千三百四十四人。

12月16日,检举“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成员于全岛展开,即治警事件。

1924年(19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8月,为解决童养媳问题,也为在思想上寻求出路,退学于台南二中,前往日本东京,入补习学校,做零工。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日,公布施行刑事诉讼法。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4月21日,《台湾民报》发表张我军《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之后陆续发表多篇文章,向台湾旧文学发动猛烈攻击。新旧文学论战随之登场。

5月10日,《台湾》杂志以第五卷第二号结束前后五年之历史,宣布废刊。

9月1日,日本上院议员伊泽多喜男出任台湾总督,内田嘉吉被罢免。

12月20日,二林庄由李应章、詹奕侯、刘崧甫、蔡渊腾等人提倡,成立农民讲座,是为台湾农民运动之滥觞。

1925年(20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通过检定考试,考入日本大学专门部文学艺能科夜间部,日间当送报伙、泥水工等其他杂工,过着“九工一读”的留学生活。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20日,治警事件定讞,蒋渭水等十三人入狱,多数同志送至狱门。

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享年五十九岁。

3月,杨云萍、江梦笔创办第一家白话文文学杂志《人人》,发行两期。

6月28日,二林蔗农组合召开成立大会,组合员总数约五百人,选出李应章等十人为理事,谢党等六人为监事,另选代议员五十人。

7月12日,凤山公学校同窗选举简吉为会长(一般均由校长充任会长)。

9月27日,彰化二林庄举开农民大会决议对林本源制糖会社之条件,抗议其对蔗农的剥夺,后酿成二林蔗农事件,为台湾第一起农民抗争运动。

11月15日,凤山农民组合成立,选举简吉为组合长,黄石顺为主事,陈振贤为会计,梁国等十四人为委员。

12月25日,张我军的《乱都之恋》出版,是为台湾第一本新诗集。

1926年(21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组织文化研究会,参加劳工运动和政治运动,参加日本左翼剧作家佐佐木孝丸举行的演剧研究会,投稿于报章杂志的读书栏。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日,《台湾民报》发表赖和《斗闹热》、杨云萍《光临》两篇中

文白话小说,台湾新文学运动进入创作阶段。

3月,日本劳动农民党成立。

6月28日,台湾农民组合在凤山农民组合办事处召开成立大会。推选简吉为会长,赵港、黄石顺、陈连标等为各部部长。

7月16日,伊泽多喜男罢官,日本上院议员上山满之进继任台湾总督。

1927年(22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3月28日,东京的台湾青年会决议设置社会科学研究部,4月24日正式成立,为该组织重要成员。

5月,参加朝鲜人的游行和演讲,第一次被捕,第二天释放。

9月,以杨贵本名,处女作《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样办才不会饿死呢?》发表于东京记者联盟机关杂志《号外》,首次领取稿酬七元五角。

9月,中断日本大学未完成的学业,听从台湾农民组合的召唤返回台湾。在台北文化协会见连温卿,参加民众演讲会。于凤山农民组合支部造访简吉,结识叶陶,随即巡回各地参加演讲会。

10月,加入台湾文化协会。

12月4日,台湾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大会在台中召开,杨逵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2月5日,起草台湾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大会宣言,第二次被捕。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3日,台湾文化协会假台中市公会堂召开临时总会,左右两派分裂,连温卿等左派获胜。

2月5日,诗人杨华因“治警事件”被捕入狱,在狱中写成《黑潮集》,计52首。

7月10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聚英楼召开成立大会。

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

10月12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召开第一次全岛代表大会。

本年,高雄机械工会、台北木工工友会、台北料理店员会、台北土木工友会、新竹木工工友会、台南总工会等组织纷纷成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1928年(23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2月3日,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委员会组织特别活动队,入选并担任政治、组织、教育三个部长。

2月至5月,担任竹林争议事件负责人,为发动组织农民,先后于竹山、小梅、朴子、麻豆、新化、中坜等地六次被捕。

5月7日,台湾文化协会在东京创办机关报《台湾大众时报》,7月9日,第十号之后停刊;受聘为此报记者。

6月至7月,在台湾农民组合召开中央委员会时,因为竹林争议事件与简吉发生分歧,被解除在农民组合中的一切职务。

本年,当选台湾文化协会的中央委员,在彰化、鹿港等地组织读书会。于彰化始与叶陶同居。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19日,蒋渭水组织二十九个工会团体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假台北蓬莱阁召开成立大会。

4月5日,台湾共产党(日共台湾民族支部)在上海成立。

4月20日,台北帝国大学开校。

6月16日,韩人赵明河于台中行刺日本皇族久弥宫邦彦,未成。上山满之进引咎辞职,日本上院议员川村竹治继任台湾总督。

7月7日,总督府为取缔思想犯,新设高等警察。

本年,张深切组织台湾演剧研究会。

1929年(24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10日,台湾文化协会本会事务室举行中央委员会,被推为议长。

2月12日,与叶陶一同出席台南举办的台湾总工会大会演讲后,是日凌晨双双被捕,关押监狱十七天。

4月,与叶陶于新化结婚。暂住新化杨家后,转往高雄定居。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26日,第十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由林献堂领衔,得一千九百三十二人签名,提出于日本帝国会议。

4月1日,日本共产党遭遇大检举。

5月5日,叶荣钟在《台湾民报》二百五十九号发表《为剧伸冤》,引发第二次新旧文学论战。

7月30日,日本上院议员石塚英藏出任台湾总督,川村竹治退任。

12月24日,全台日语演讲大赛开于台南。

1930年(25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在高雄经营成衣加工生意失败。长女秀俄出生。

二哥杨趁在新化行医,不堪女家虐待而自杀。杨逵深受刺激。

时事与文坛纪要

3月20日,《台湾民报》改称《台湾新民报》。

6月21日,陈两家、王万得、江森钰、周合源、张朝基等创办《伍人报》。

8月17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于台中市醉月楼酒家举行成立大会。

8月,谢春木、白成枝等创刊《洪水报》,发行十期。郭德金、杨克

培等创刊《台湾战线》，发行四期全部被查禁。

8月16日，《伍人报》发表黄石辉《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开展关于乡土文学的讨论。

10月27日，台中州下能高郡雾社原住民不堪日本殖民压迫而起义，杀日人一百三十四人，是为雾社事件。日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并派飞机投弹及毒瓦斯，滥加空袭，义民惨不忍睹。

本年，农民组合、文化协会、总工会等运动屡受政治高压，濒临崩溃。

1931年(26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在高雄内惟暂为樵夫，艰难度日。

7月，翻译并发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6日，台湾总督石冢英藏，因为雾社事件负咎辞职，日本上院议员太田政弘继任台湾总督。

8月，郭秋生掀起“台湾话之论争”。

2月18日，台湾民众党举行第五届代表大会当场为台湾总督府下令解散。

6月至11月，遭大检举的台湾共产党受到毁灭性打击。

9月18日，日军突袭东北侵占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12月，台湾文化协会部分成员在彰化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文化协会，组织大众党。

1932年(27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经赖和介绍，《送报伕》(日文原题《新闻配达伕》)发表于《台湾新

民报》(5月19日至27日),首度使用杨逵笔名。后半部遭殖民当局查禁,只刊出前半部。

6月1日,《新闻配达伏》(后篇)完成。

本年,写成《贫农的变死》(长篇小说《立志》第一节),未发表。

本年,在家中仅有四分钱的窘境中,长子资崩出生。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日,郭秋生、叶荣钟、庄遂性、黄春成等人创办中文杂志《南音》半月刊,出版十二期后停刊。

1月,《台湾新民报》获准发行日刊,并于4月5日发行第一期。

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国民政府宣言否认。

3月2日,日本上院议员南弘就任台湾总督,前任太田政弘因批准《台湾新民报》发行日刊而辞职,督府所辖官吏大调动。

5月27日,台湾总督南弘去职,日本上院议员中川健藏继任。

11月8日,台湾总督府下令禁止开设汉文书房,台人不能再公开学习中国语文。

1933年(28岁)

时事与文坛纪要

雾峰一新会所办汉文研究所被总督府禁止。

7月15日,《福尔摩沙》杂志创刊,共出刊三期。

10月25日,郭秋生、廖汉臣等人在台北成立台湾文艺协会。

11月1日,“米谷统制法”施于日本全国,唯台湾、朝鲜、桦太三地区实施公定价格。这是日本为农业恐慌转嫁灾难于殖民地之政策,台湾蒙受巨大打击。

1934年(29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0月,《送报伏》全文入选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第一奖从

缺),这是台湾作家首度进军日本文坛,当月号却在台湾被禁售。

在何集璧的介绍下会见张深切,成为《台湾文艺》编辑委员,负责日文版的编辑,月薪十五元。

通过赖和的帮助,举家前往彰化。

12月15日,与张深切往大东信托会见林献堂,请其补助《台湾文艺》每月十元,以六个月为限,获其同意。

10月,小说《灵签》发表于李献璋编《革新》(大溪革新会发行,日文)。

12月至1935年4月,小说《难产》刊登于《台湾文艺》第二卷第一号至第四号,未完,日文。

12月,《台湾文坛一九三四年的回顾》刊登于《台湾文艺》第二卷第一号,日文。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11日,台湾樟脑公司成立。

5月6日,首次全岛性规模文艺团体台湾文艺联盟成立。

7月15日,台湾文艺协会机关刊物《先发部队》创办。

11月,台湾文艺联盟机关杂志《台湾文艺》创刊。

1935年(30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任杨肇嘉秘书,并代为写回忆录;叶陶在雾峰吴家当教师,月薪皆为20元。后移居台中。

胡风中文翻译的《送报伙》,开始在祖国大陆广为流传。

6月,报导文学《台湾震灾地慰问踏查记》,刊于东京《社会评论》第一卷第四号,日文。

11月13日,《“台湾新文学社”创立宣言》,发表于《台湾新闻》,日文。

11月,因不满于张星建的选稿作风,退出《台湾文艺》。12月28

日,与叶陶独资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6日,台湾文艺协会出版《第一线》杂志,“台湾民间故事特辑”中刊载十五篇民间故事。

4月21日,台湾中北部地区大地震,死亡三千人,倒塌房屋一万二千五百间。

10月10日,台湾总督府庆祝在台“始政”四十周年。

1936年(31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田园小景——摘自素描簿》,发表于《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五期。

杨逵与叶陶双双病倒,《台湾新文学》杂志自第八期始,由台北的王诗琅负责编辑。第十号之“中文创作特辑”遭当局查禁。

4月,次男杨建出生。

5月,《送报伙》刊于世界知识社编《弱小民族小说选》。

6月,《蕃仔鸡》刊登于《文学案内》(东京)第二卷第六期。

11月,《鬼征伐》刊登于《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九号,日文。

时事与文坛纪要

6月17日,林献堂3月随台湾新民报考察团游历华南各地,受到热烈欢迎,席上致词有“林某归还祖国”之语。5月,《台湾日日新报》揭发其事,对林献堂大加挞伐。日本流氓卖间于6月17日在台中公园“始政”纪念日庆祝会上殴辱林献堂,造成“祖国事件”。

9月2日,日本海军大将小林跻造继中川健藏任台湾总督。

12月,会见访台作家郁达夫。

12月12日,西安事变。

1937年(32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6月15日,《台湾新文学》自第二卷第四号之后停刊。

6月,赴日,会见东京《日本日日新闻》、《星座》、《文艺首都》等杂志负责人,寻求设置台湾新文学栏目的合作。后因七七事变发生未能实现。其间宿本乡旅社被捕,由《大势新闻》主笔保释。

返台后积劳成疾,患肺病,咯血数月,因欠米店二十元被告上法庭。得到日本警官入田春彦捐助一百元,还清债务,租用二百坪土地创建首阳农园。

时事与文坛纪要

4月1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三报停止汉文栏。《台湾新民报》被限于6月1日全部废止。

4月,龙瑛宗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获日本《改造》征文佳作奖。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8月15日,台湾军司令部宣布进入战时体制。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9月,台湾青年被强征充大陆战地军伕。

9月22日,国民党、共产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

11月20日,蒋介石发表宣言迁都重庆。

1938年(33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5月5日,好友入田春彦因思想左倾,遭日本当局处分驱逐出境,遂自杀。留遗书给杨逵夫妇,托付其料理后事。

5月18日,《入田君二三事》刊于《台湾新闻》,日文。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23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发表关于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加紧推行“皇民化运动”。

5月5日,实施国家总动员令。

5月28日—6月1日,日本政府积极移民来台,各地次第成立日本移民村。

6月20日,台银开始收购民间黄金。

8月,《台湾文苑》在嘉义创刊。

11月3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声明。

1939年(34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本年,母病歿。

本年,次女素绢出生。于困顿中坚守首阳农园。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1日,惟一民营大甲凤梨工厂被并入台湾合同凤梨公司。

3月,《台湾新民报》发表吴漫沙长篇小说《韭菜花》。

5月19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于赴东京旅次对记者称:“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即南侵以台湾为据地)三政策,及时开始。”

10月,公布米配给统制规则。

12月1日,日本陆军中将牛岛任台湾军司令官。

12月1日,台湾诗人协会的《华丽岛》杂志创刊,仅出一期。

12月19日,台中州开始实行所谓“米谷供献报国运动”,实为强行征粮以支援其侵略战争。

1940年(35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本年,父病歿。

逐渐恢复健康,首阳农园经营步入轨道,扩大到约一千坪。

本年,第十次被捕入狱。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2日,李献璋编成《台湾小说选》一书,杨云萍作序,年底排版后被日本当局查禁。

1月,日人作家西川满发起创立“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机关杂志《文艺台湾》。

1月,《台湾新民报》开始连载张文环长篇小说《山茶花》。

2月11日,公布台湾户口修改政策,规定台民改日本姓名法,斥不改者为“非国民”。

3月30日,伪南京政府成立。

5月1日,《台湾新民报》开始连载吕赫若长篇小说《台湾的女性》。

7月22日,日本第二次近卫文磨内阁成立,提倡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以及“新体制”。

11月25日,台湾精神总动员本部公布“台籍民改日姓名促进要纲”,强制台民改日本姓名。

11月27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总务长官森岗联袂辞职;29日,日本海军大将长谷川清继任台湾总督。

1941年(36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5月27日,张文环、黄得时等人退出西川满的《文艺台湾》,成立启文社,创刊《台湾文学》,杨逵加入其阵营,共发行十期。

7月9日,在台南佳里吴新荣家,与启文社同仁陈逸松、张文环、黄得时、王井泉、巫永福等人讨论《台湾文学》的编辑方针。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11日,《台湾新民报》被迫改称《兴南新闻》。

3月26日,公布修正台湾教育令,废止小学、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

4月19日,日本当局成立“台湾皇民奉公会”,发行宣传杂志《新

建设》，推行“皇民化运动”。

7月1日，《南方》半月刊创刊，林荆南、吴漫沙主编，从第一百三十二期改名《风月报》，为本时期惟一的中文杂志。

7月10日，《民俗台湾》创刊，末次保、金关丈夫编，1945年1月1日停刊，共发行四十三期。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原住民被编成“高砂义勇队”，派往南洋各地参加战事。

12月8日，赖和第二次被捕入狱。

1942年(37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7月14日，与张文环、吕赫若、中山侑、张星建、杨千鹤、王井泉等人聚餐山水亭，举行《台湾文学》评论会。

1月至3月，戏剧《父与子》刊于《台湾艺术》第三卷第一号至第三号，日文。

2月，小说《无医村》刊于《台湾文学》第二卷第一号，日文。

4月，小说《泥娃娃》刊于《台湾时报》第二六八号，日文。

7月，《台湾文学问答》刊于《台湾文学》第二卷第三号，日文。

10月，《鹅妈妈出嫁》刊于《台湾时报》第二百七十四号，日文。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皇民奉公会”设立台湾文学奖，第一届得奖作品为西川满《赤崁城》、滨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张文环《夜猿》。

4月，台湾特别志愿兵制度实施，强迫台籍青年到南洋战场打仗。

5月26日，“日本文学报国会”在东京成立。6月，派人来台举行“战时文艺讲演会”。

6月，川合三良、周金波获得第一回文艺台湾赏。

12月，“台湾文艺家协会”在台湾各城市举行大东亚文艺讲演

会。

12月,日本东京召开“第一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西川满、滨田隼雄、龙瑛宗、张文环作为台湾代表赴会。

1943年(38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剧本《扑灭天狗热》发表于《台湾公论》第八卷第一号。

3月,《三国志物语》第一卷至第三卷由台北盛兴出版部出版。(此书共四卷,出版时间分别为1943年3月、8月、10月以及1944年11月。)

4月,《忆赖和先生》发表于《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二号。

7月,《拥护粪便现实主义》以“伊东亮”笔名发表于《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三号,日文。

夏,《插秧比赛》,未发表,日文。

本年,改编和策划演出俄国剧作家特洛查可夫原作《怒吼吧!中国》,于台中、彰化、台北三地以日文演出时,颇受好评。

本年,三女杨碧出生。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31日,台湾新文学先驱者赖和逝世。

2月17日,成立“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推派长崎浩、齐藤勇、杨云萍、周金波等人参加8月25日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4月18日,《台湾文学》出版“赖和先生悼念特辑”。

4月29日,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

6月21日,第二批台陆军志愿兵共一千零三十人。12月1日,日本政府强行抽学生兵入伍。

9月2日,厚生演剧研究会在台北永乐座公演林博秋根据张文环小说改编的闽南语话剧《阉鸡》。

10月,《文艺台湾》和《台湾文学》同时停刊,由“台湾文学奉公会”发行《台湾文艺》。

1944年(39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小说集《萌芽》排版中被查禁。

6月,《解除〈首阳园记〉》发表于《台湾文艺》第一卷第二号,日文。

8月,总督府情报课委托视察石底炭坑。撰写《增产之背后——老丑角的故事》,发表于《台湾文艺》第一卷第四号,日文。

12月,改编之剧本《怒吼吧!中国》,由台北盛兴出版社出版,日文。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20日,公布“皇民炼成所规则”,决定设立五十所“皇民炼成所”,强制执行皇民化政策。

3月,台湾全岛六家日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兴南新闻》,台南《台湾日报》,高雄《高雄新报》,台中《台湾新闻》,花莲《东台湾新闻》)合并为《台湾新报》。

5月1日,台湾文学奉公会发行《台湾文艺》。

6月,“台湾文学奉公会”组织作家分赴工厂、农场、矿山、兵团、铁道参观,撰写报告文学。

8月20日,台湾全岛进入战争状态,开始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

10月23日,台湾神宫新神殿例祭时,为日本旅客机失事冲撞,发火焚烧,台人普遍认为日本即将败战之征兆。

11月12日,“第三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中国南京召开,台湾未派代表参加。

12月30日,台湾总督长谷川清辞职,由台湾军司令官路军大将安藤利吉兼任台湾总督。

1945年(40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以“台中艺能奉公会”名义,私下在首阳农园组织焦土会,计划演出闽南语的《怒吼吧!中国》。排练中因日本投降而停演。

8月15日,台湾光复,首阳农园改称一阳农园。

9月,创刊《一阳周报》,宣传孙文思想,介绍大陆白话文作品,11月17日出版第九期后停刊。

10月,《犬猴邻居》发表于《一阳周报》第七至第九号。

本年,组织新生活促进队,帮助台中市清理垃圾,着手于战后台湾的重建工作。

时事与文坛纪要

8月15日,全台由收听无线电广播得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台湾归还中国。

9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台湾行政长官署组织大纲,任命陈仪为首任行政长官。

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台湾地区受降典礼。

10月25日,原日据时期《台湾日日新报》改名《台湾新生报》,这是光复后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家公营报纸。社长李万居,日文总编辑吴金鍊,中文总编辑黎烈文,编译主任王白渊。

10月26日,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庆祖国收复失土。

本年,公布台湾省民姓名恢复办法。

1946年(41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3月,由台北三省堂出版日文版小说《鹅妈妈出嫁》,为其第一本作品选集。

4月21日,担任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副总干事。

5月,《台湾新文学再建的前提》发表于《和平日报》“新文学”第二期,日文。

5月起,担任台中《和平日报》“新文学”栏编辑。

5月24日,《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发表于《和平日报》“新文学”第三期,日文。

7月,参与《台湾评论》杂志社的工作,中日文对照本《送报伏》由该社出版。

8月,《为此一年哭》发表于《新知识》创刊号。

10月19日,《纪念鲁迅》发表于《和平日报》。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定。

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各县市设国语推行所12处。

5月1日,台湾省参议会成立,选举黄朝琴、李万居为正副议长。

6月16日,台湾文化协进会成立。

9月3日,吴浊流日文小说《胡太明》第一篇出版,由台北国华书局总发行。第二篇《悲恋之卷》、第三篇《大陆之卷》、第四篇《桎梏之卷》陆续于同年10月、11月、12月以单行本印行。

10月24日,光复一周年之际,行政长官公署通令全面废止报刊杂志之日文版。

10月25日,实行日语禁止令。

11月21日,《中华日报》“新文艺”副刊创刊,苏任予主编,共出三十六期。撰稿人多为大陆来台作家。

1947年(42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10日,赖和著、杨逵编《善讼人的故事》,由杨逵创立的民众出版社发行。

1月15日,《文化交流》在台中市创刊,任杂志编辑。翻译鲁迅《阿Q正传》,列为“中国文艺丛书”第一辑,中日文对照。

3月9日,《从速编成下乡工作队》发表于台中《自由日报》。

4月,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逃亡。期间夫妻双双被捕。

8月,释放出狱,继续“中国文艺丛书”翻译刊行计划。

10月,胡风译《送报伙》由台北东华书局出版,列为“中国文艺丛书”第六辑,中日文对照。

11月,翻译茅盾《大鼻子的故事》由台北东华书局出版,列为“中国文艺丛书”第二辑,中日文对照。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台湾文化》推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辑》。

2月28日,因查缉私烟官员之暴行,引发台北民众公愤,二二八事件发生。

3月,台北《大明报》、《民报》、《人民导报》、《中外日报》、《重建日报》,台中《和平日报》、《自由日报》等,因二二八事件被当局封闭。

3月2日,台湾人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3月8日,陈仪拒绝处理委员会所提之三十二条要求;3月9日,开始镇压暴动人士;3月17日,在台北实行的戒严令扩大到全国。

4月,许寿裳《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由台北台湾书店出版,为其主编的“光复文库”之一。

5月4日,《台湾新生报》“文艺”周刊创刊,主编何欣,共出版十三期。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成立,魏道明为首任主席。

6月,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由台北台湾书店出版。张我军之编著五卷本《国文自修讲座》,由台中联合出版社自本月起陆续出版。

8月1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创立,歌雷(史习枚)任主编。1949年3月29日停刊,共出二百二十三期。

1948年(43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3月28日,应主编歌雷之邀,参加《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第一次作者茶会,陆续参加有关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

3月29日,《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发表于《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第九十六期。

6月25日,《“台湾文学”问答》发表于《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第一百三十一期。

6月27日,《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发表于《中华日报》“海风”第三百一十四期。

7月12日,独幕剧《知哥仔伯》由林曙光翻译,发表于《台湾新生报》“桥”第一百三十八期。

8月1日,杨逵译郁达夫《微雪的早晨》,列为“中国文艺丛书”第三辑,中日文对照。

8月2日,主编《台湾力行报》“新文艺”栏。

8月10日,创刊《台湾文学丛刊》杂志;12月25日,出版第三期后停刊。

8月29日,参加银铃会第一次联谊会。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18日,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寿裳在台北寓所遇害。

5月,吴浊流日文小说《波茨坦科长》,由台北学友书局出版。

1949年(44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是年,起草《和平宣言》。

1月21日,《台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宣言》(即《和平宣言》)登载于上海《大公报》,触怒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

2月4日起,麦浪歌咏队利用寒假举行了环岛演出。杨逵四处奔波,联合台中文化界进步人士,帮助歌咏队解决演出场地和住宿问题,并在麦浪歌咏队与文艺界、媒体之间搭桥牵线,大力宣传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活动。

2月10日,杨逵安排麦浪歌咏队员和银铃会成员,在台中图书馆举办“文艺为谁服务”的座谈会。

2月15日,《介绍“麦浪歌咏队”》发表于《中华日报》“海风”第三百九十七期。

4月6日,被捕入狱。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5日,陈诚正式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2月4日,陈诚宣布在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

4月6日,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大学发生学潮,陈诚勒令学校停课整顿,并逮捕有关学生,是谓四六事件。

5月20日,台湾省政府及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台湾全省实行戒严,从此台湾进入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时期”。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台湾新生报》展开关于“战斗文艺”的讨论。

12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台北。

1950年(45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军法审判,处徒刑十二年。

时事与文坛纪要

3月1日,“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于台北成立,至1957年7月

结束,由张道藩担任主任委员。

5月4日,“中国文艺协会”于台北成立,陈纪滢担任主席。

5月23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完毕。

6月18日,原台湾省行政长官(离职后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以叛乱罪,枪毙于新店。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46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5月17日,离开台湾本岛,移监绿岛。

时事与文坛纪要

4月14日,“内政部”颁发予已逝的赖和褒扬令,并入祀忠烈祠。

7月25日,台湾省政府宣布自光复以来第一次征兵令,首次征兵一万五千人入伍。

9月16日,《联合报》创刊。由《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三报合并,副刊有《联合副刊》、《综艺》、《联合周刊》等。

1952年(47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8月,《八月十五那一天》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光复节特刊”。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反共抗俄总动员令”。

3月1日,《中国文艺》创刊,发行人唐晓风,社长唐贤龙,主编王平陵。

6月1日,《文坛》创刊,发行人穆中南,社长王蓝,主编刘枋。

8月5日,“中国文艺协会”发动会员作家在各电台举办对大陆文艺界“指名喊话”,号召反抗。

1953年(48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8月,《光复活当年》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国父纪念周刊”。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5日,台湾“行政院长”陈诚宣布,实行耕者有其田与生产建设计划为本年两大施政。

2月1日,《现代诗》季刊创刊,纪弦任发行人兼主编,共发行四十五期,至1964年2月停刊。

8月1日,“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成立,刘心皇担任第一届总干事,宣建人为副总干事。

11月1日,林海音开始主编《联合副刊》。

1954年(49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5月,歌舞《国姓爷》在绿岛街头演出。

10月13日,《谚语四则》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光复节特刊”。

10月15日,《家书》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

12月25日,《捕鼠记》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

本年,独幕喜剧《猪哥仔伯》在绿岛狱中晚会演出;歌舞《驶犁歌》在绿岛街头演出。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25日,《皇冠杂志》月刊创刊,初由吴照轩为发行人,主编平鑫涛等。

3月29日,《幼狮文艺》创刊,由“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主办,初期采取轮流编辑制。

3月,蓝星诗社于台北成立,发起人有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夏菁、邓禹平、蓉子等。

5月28日,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主办“北部新文学、新剧运动座谈会”,邀请吴新荣、杨云萍、龙瑛宗、吴浊流、郭水潭、黄得时、王诗琅等二十一位作家出席,主席王白渊。

7月16日,台湾当局设立“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

8月9日,“中国文艺协会”发起“文化清洁运动”,要求清除所谓“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

10月10日,《创世纪》诗刊在高雄左营创刊,由罗夫、张默主编,自第二期痖弦参与编辑。

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字。

1955年(50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永远不老的人》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

9月3日,街头剧《胜利进行曲》在绿岛街头演出。

10月,《半罐水叮咚响》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

11月,《谚语的时代性》、《谚语漫谈》,为新生笔记簿之手稿。

本年,歌舞《渔家乐》在绿岛街头演出。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7日,廖文毅等人在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从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

3月15日,台湾“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与美国国外业务署驻台共同安全分署宣布:1955会计年度美国援台款项增加四千八百万美元,连同原额援款共计一亿三千八百万美元。

5月5日,“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成立,1969年起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

10月10日,文坛出版社出版“战斗文艺丛书”十种,包括王集丛

《战斗文艺论》、王蓝小说《咬紧牙根的人》等。

1956年(51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童谣《百合》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

1月,歌舞《丰年》在绿岛新年晚会及街头演出。

1月至4月,《我的小先生》、《春天就要到了》、《谈街头剧》、《青年》、《好话两句多》、《谈青年》等,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

4月,《太太带来了好消息》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月刊》。

7月,歌舞《争眼的瞎子》在绿岛狱中晚会上演出。

11月,《园丁日记》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月刊》。

6月至12月,创作《作者与读者》、《十月好风光》、《检讨与批评》、《文化战士》、《我要克难一把琴》、《新年又要到了》等,未发表,为新生笔记簿之手稿。

本年,话剧《牛犁分家》在绿岛中正堂演出。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9日,“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举办“四十四年度全国青年最喜阅读文艺作品测验”,选出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各十部。

9月2日,《文学杂志》创刊,发行人刘守宜,主编夏济安。共出刊四十八期,至1960年8月停刊。

9月8日,民族运动领导人林献堂在东京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1957年(52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至4月,《谈写作》、《什么是好文章》、《文章的味道》等7篇,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活》壁报。

4月,创作相声《乐天派》。

5月至12月,《智慧之门将要开了》、《春光关不住》、《自强不息》

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月刊》。

12月5日至7日，参加绿岛狱中运动会。

本年，创作《季节风侵袭之下》、《抬红土记》、《科学与方法》、《怎样才能把一个家弄得好》、《轻公差》、《贫血的“新生月刊”》、《中秋过后》、《父子游泳赛》、《乌龟与兔子的赛跑》、《上山砍茅草》等11篇，未发表，为新生笔记簿之手稿。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蓝星》月刊创刊，主编朱家骏，由宜兰青年月刊社印行，1957年7月至第七期停刊。

4月，钟肇政以油印方式印行《文友通讯》，共出刊十六期。

11月5日，《文星杂志》月刊创刊，发行人叶明勋，社长萧孟能，初期主编何凡，第四十九期开始由李敖编。1965年12月至第十六卷八期停刊。

1958年(53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借提至台北，被不断威胁利诱，台湾当局欲将其派往日本做特务。未果，5月押返绿岛。

1月，《新春谈命运》发表于绿岛监狱《新生月刊》。

7月，话剧《大牛和铁犁》以“公羊”笔名，刊登于《东方少年》第五卷第七期，为杨逵被羁押台北那段时间向外投稿之作品，这是绿岛时期惟一在监狱外发表的作品。

本年，创作《宝贵的种子》、《麻雀战胜了老鹰》、《花瓶的故事》、《台风小姐》、《胜利之歌》、《月光光》等6篇，未发表，为新生笔记簿之手稿。

时事与文坛纪要

5月10日，正式成立台湾警备司令部。

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金门、马祖驻军实

施警告性炮击。

9月3日,赖和遭检举为左派,被驱逐出忠烈祠。

1959年(54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3月20日,《青春赞美》,未发表,为新生笔记簿之手稿。

4月1日,《不做就不会错吗?》,未发表,为新生笔记簿之手稿。

11月中,话剧《牛犁分家》在绿岛监狱晚会演出。

本年,《黎明曲·公鸡叫》、《双十赞歌》等,未发表,为新生笔记簿之手稿。

时事与文坛纪要

4月,《创世纪》改版,转而提倡超现实主义。

11月,言曦在《弘扬日报》副刊发表《新诗闲话》,翌年陆续发表《新诗余谈》,引发一场关于现代史的论争。

1960年(55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创作四幕喜剧《猪八戒做和尚》,被禁止演出。

时事与文坛纪要

3月5日,《现代文学》双月刊创刊,发行人白先勇,主编王文兴、陈若曦等,至1973年9月的五十一期停刊后,于1977年8月复刊。

8月4日,作家钟理和去世,享年四十五岁。

9月4日,《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涉嫌叛乱,被提起公诉,判处徒刑十年。

1961年(56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4月8日,刑期届满释放,回到台湾本岛。先于高雄乌松购买果

园,后因无法解决土地纠纷而放弃。之后代撰杨肇嘉回忆录。

5月,叶陶当选为模范母亲。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0日,余光中英译的《中国新诗选》,由台北美国新闻处出版,这是台湾第一部译成外文的现代诗选。

9月,吕诉上《台湾电影戏剧史》由银华出版部出版。

12月1日,台湾当局通过第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自1961年起实施,该计划投资总额为新台币五百亿二千万元。同日,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第一座原子反应器装置启用。

1962年(57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本年,与杨肇嘉在史实撰写方面发生分歧,遂辞。

2月22日,《园丁日记》发表于《联合报》。

3月30日,《春光关不住》发表于《台湾新生报》。

4月14日,《智慧之门》发表于《联合报》。

7月,经由侯朝宗担保,以信用贷款方式向华南银行借款五万元。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大度山上,买下一片约有三千坪的荒坡地,开始经营东海花园。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0日,台湾省十年农地重划首期工程开始。

2月24日,学者胡适病逝台北,享年七十二岁。

3月11日,外商在台湾投资的第一家工厂——台湾氟胺公司正式开业。

6月1日,《传记文学》月刊在台北创刊,发行人刘绍唐。

7月15日,《葡萄园》季刊创刊,发行人王在军,主编文晓村、陈敏华。

10月10日,台湾电视公司今日起开播。

1963年(58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本年,隐居东海花园耕读。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日,郭良蕙长篇小说《心锁》,被台湾省政府新闻处查禁。

2月16日,台湾省政府宣布加速实施六项农田水利建设计划,预期十年内增产糙米十万吨。

9月25日,文星书店第一批《文星丛书》出版,包括梁实秋《秋室杂文》、余光中《左手的缪斯》、林海音《婚姻的故事》、聂华苓《一朵小白花》、於梨华《归》、李敖《传统下的独白》等十种。

10月10日,诗人覃子豪病逝于台北,享年五十二岁。

1964年(59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本年,华南银行以信用贷款超期为由,催还贷款。杨逵夫妇到处筹措,先还借款一万元。

10月14日,将剩下的四万元改成抵押贷,签具“抵押权设定契约书”,抵押借款四万元,以每百元按日息四分三厘计算,按月付息。

时事与文坛纪要

4月1日,《台湾文艺》创刊,由吴浊流独自创办,钟肇政、廖清秀、郑清文、赵天仪帮助其编务。

6月15日,《笠诗刊》创刊,发起人为吴瀛涛、林亨泰等十二人,以后成员增至八十人,包括本省籍老中青三代诗人。

1965年(60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0月,《园丁日记》、《春光关不住》收入钟肇政编《本省籍作家作

品选集1》，由台北文坛社出版。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吴浊流在《台湾文艺》第六期宣布设置“台湾文学奖”，以奖励在该刊发表的小说佳作。

1月30日，台湾当局宣布实施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目的是促进投资，发展外销，增加产品及劳务输出，多创外汇收入。

7月1日，美国从今日起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

10月3日，日据时期作家王白渊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10月25日，钟肇政主编《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十册，由台北文坛出版社出版。

11月8日，日据时期作家张深切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1966年(61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东海花园耕读。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7日，台湾当局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7月3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台，重申支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支持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

8月25日，文星书店出版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包括张晓风《地毯的那一端》、舒凡《出走》、康芸薇《这样好的星期天》、隐地《一千个世界》等。

10月10日，《文学季刊》创刊，尉天骢主编。

12月3日，高雄加工出口区初步建成。

1967年(62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2月,《谚语四则》发表于《台湾风物》第十七卷第七期。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日,《纯文学》月刊创刊,由林海音主编,马各任执行编辑。

3月27日,日据时期作家吴新荣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6月25日,文星书店陆续出版年轻作家的作品,包括白先勇《滴仙记》、王文兴《龙天楼》、水晶《青色的蚂蚱》、孟丝《生日宴》、欧阳子《那长头发的女孩》等。

7月28日,台湾当局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开展所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8年(63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9月13日,银行催促偿还抵押借贷的四万元。向出版商叶先生借贷十万元,以借据为担保。还清四万元的银行抵押,余款用来扩建东海花园,以改善生产条件。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3日,因艾枚主编的《中华日报》家庭版刊登“大力水手漫画”,台湾当局以“侮辱元首”给负责专栏的柏杨定罪,于3月4日被捕,判刑十年。

1月27日,台湾当局颁布《九年国民教育实施条例》。

7月,美国新移民法生效,台湾对美移民每年可达二万人。

1969年(64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3月12日,《垦园记》发表于《台湾新生报》。

时事与文坛纪要

3月25日,隐地主编《五十七年短篇小说选》,由仙人掌出版社出版,此为第一本年度小说选。

7月20日,吴浊流文学奖基金会成立,由钟肇政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年底,因叶先生周转不灵,遂向台中朋友郭顶顺借款十万元。

1970年(65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羊头集》发表于《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3月,向叶荣钟先生借十万元,部分还清所欠他人利息,余款仍然用于花园建设。

8月1日,叶陶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年底,经由钟逸人先生介绍,杨逵向商界朋友蔡伯勋借款十万元。

时事与文坛纪要

4月21日,《台湾文艺》主办第一届吴浊流文学奖颁奖。

8月12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宣称,钓鱼岛“是琉球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归还日本”。

11月11日,第五届中山文艺奖颁发。

1971年(66岁)

8月8日,坂口禊子带领日本女记者观光团访问台湾,专程到台中看望杨逵夫妇,而叶陶去世已有一年。

生平与文学事迹

11月,坂口禊子《杨逵与叶陶》发表于《亚细亚》第六卷第十期,为其消息在战后披露于日本文坛的第一次。

时事与文坛纪要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1972年(67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5月,日本《中国》杂志重刊《送报伙》。

年底,变更东海花园的土地所有权,并与蔡伯勋、叶荣钟、郭顶顺三人达成一项协议:以割地还债方式割让三分之二的东海花园土地产权,由他们共同持分,自己则留下三分之一,并承诺若此地将来成为文学园地的文化村,则同意无条件归还。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台湾《大学杂志》发表由王文兴、包弈洪、许信良、陈鼓应联合署名的《国是九论》。

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9月29日,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2月4日,台湾大学师生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宣传中国统一等主张。

1973年(68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东海花园逐渐步入轨道。

11月,《模范村》重刊于《文季》第十二期。

时事与文坛纪要

2月17日,台湾当局拘捕参加“民族主义座谈会”的陈鼓应。

7月,《龙族评论专号》出版,由高信疆主编,对现代诗进行严厉批评。

8月1日,《中外文学》刊登唐文标《僵毙的现代诗》,对现代诗进行总清算。

1974年(69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鹅妈妈出嫁》载于《中外文学》第二卷第八期。

2月,《冰山底下》载于《台湾文艺》第四十三期。

9月底,《幼狮文艺》派人到东海花园访问。

时事与文坛纪要

3月10日,第五届吴浊流文学奖颁发。

6月1日,《中外文学》诗专号出版。

1975年(70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张良泽编《鹅妈妈出嫁》由台南大行出版社出版。

时事与文坛纪要

4月5日,蒋介石去世,终年八十八岁。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邀访华。

1976年(71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春光关不住》收入国中国文课本第六册,改题为《压不扁的玫瑰花》,为日据时期作家之作品收入教科书第一人。

5月,作品集《鹅妈妈出嫁》由台北香草山出版社出版。

10月,作品集《羊头集》由台北辉煌出版社出版。

12月25日,由吴宏一、尉天骢推荐参加的“第二届国家文艺奖”选拔失败。

时事与文坛纪要

3月1日,《夏潮》创刊,总编辑彭坤进。

8月25日,洪范书店成立,由杨牧、痖弦、叶步荣创办。

9月16日,《联合报》举行第一届联合报小说奖颁奖典礼,由王惕吾主持。

10月7日,作家吴浊流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1977年(72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东海花园失火,幸而及时扑灭。

10月,于台北青年公园义卖花朵,主办单位为其祝寿。

时事与文坛纪要

3月1日,《仙人掌杂志》创刊,发行人许秉钦,社长许长仁,主编王建壮。

8月17日,由彭歌文章发难,乡土文学论战爆发。

9月23日,蒋经国在台湾“立法院”提出为期十年的“十二项建设计划”(1978—1988年)。

11月9日,中坜事件发生。

1978年(73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9月,林梵《杨逵画像》由台北笔架山出版社出版。

10月8日,参加《联合报》举办的“光复前的台湾文学”座谈会。

时事与文坛纪要

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交。

12月30日,台湾“国防部”与“内政部”共同发布“国民申请出国观光规则”,自1979年1月1日起生效。

1979年(74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7月,钟肇政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由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收录杨逵四篇作品。

10月,杨素绢编《杨逵的人与作品》,由民众日报社台北管理处发行。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3月15日,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共五册,由明潭出版社出版。

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

1980年(75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7月,提交书面意见给《联合报》于7月2日举办的《永不熄灭的烽火——光复前台湾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抗日精神》座谈会。

9月15日,参加《时报文学》“三代同堂谈小说”座谈会。

本年,高雄大荣高工在高雄、台中演出话剧《牛犁分家》。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失效。

2月10日,《台湾文艺》杂志社举办第一届巫永福评论奖。

11月20日,第三届吴三连文艺奖揭晓。得奖人林怀民(艺术奖舞蹈类)、黄春明(文学奖小说类)、马水龙(艺术奖音乐类)、田源(文学奖小说类)。

1981年(76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3月9日,因感冒药物引起痰阻塞症送医急救。

3月12日,迁居外埔次子杨建家中休养。

时事与文坛纪要

10月15日,张良泽主编《吴新荣全集》共八册,由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

10月,《宝刀集——光复前后作家作品集》,台北联合报社出版,收入黄得时、杨逵等人作品。

1982年(77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1月,移居大溪长子杨资崩家中静养。

5月7日,应邀到辅仁大学草原文学社,演讲《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

8月22日,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邀请,由长媳萧素梅陪同赴美。

10月30日,台湾文学研究会在洛杉矶正式成立,成为该会荣誉会员,并到会致辞勉励。

11月1日,由美返台途中重游日本,日本各界为其举办座谈会。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5日,《文学界》季刊在高雄创刊,发行人陈坤仑,执行主编许振江。

11月16日,第五届吴三连文艺奖揭晓,散文得主林清玄,戏剧类本届从缺。

1983年(78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4月至5月,在大溪接受王丽华专访。

8月24日,移居莺歌整理回忆录,由孙女杨翠照顾生活。

11月8日,《怀念东海花园》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1月,荣获第六届吴三连文艺奖及第一届台美基金会人文科学奖。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5日,《台湾文艺》杂志内部改组,由陈永兴医师接办。

5月,应凤凰主编《1980年文学书目》,由大地出版社出版,收入台湾地区本年文学书目三百六十三本,这是近年第一本年度文学书目。

8月7日,钟理和纪念馆正式成立。

1984年(79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2月,《送报伏》收入施淑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析2》,由台北长安出版社出版。

2月12日,应耕莘文教院举办的“庆贺赖和先生平反演讲会”上致词,演说《希望有更多的平反》,此文发表于《中华杂志》第二百四十八期。

3月,担任《夏潮》名誉发行人。

7月《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经验》发表于《中华杂志》第二百五十二期。

8月9日,获盐分地带文艺营颁发的“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

时事与文坛纪要

1月19日,“内政部”正式承认赖和蒙冤而给予平反,后重新入祀忠烈祠。

5月20日,蒋经国连任第七任“总统”,李登辉任“副总统”。

10月23日,第七届吴三连文艺奖揭晓,散文类余光中、戏剧类黄美序获奖。

11月1日,《联合文学》创刊,痲弦任总编辑,发行人张宝琴。

11月6日,日据时期作家王诗琅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1985年(80岁)

生平与文学事迹

2月,重返台中,由幺女杨碧照顾其生活。

3月10日,于YMAK举行的戴国焯教授欢迎会上发表简短致词。

3月12日,凌晨五时四十分,在杨碧家中与世长辞,享年八十

岁。

3月13日,《老牛破车》发表于《联合报》;《沉思、振作、微笑》发表于《自立晚报》;《我的回忆》发表于《中国时报》。

3月,作品集《压不扁的玫瑰花》、《鹅妈妈出嫁》,由台北前卫出版社出版。

3月29日,葬于东海花园叶陶墓旁。

补记

2001年12月,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十四卷(中日文对照),由(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全部出版。

2005年11月,(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杨逵文集》七卷(中文版)。

2005年11月27日,“杨逵文学纪念馆”在杨逵故乡台南县新化镇正式开馆。

《杨逵文学活动年表》的辑录,主要参考了河原功编、杨镜汀译《杨逵生平写作年表》,黄惠祯编《年表》、《杨逵作品目录》,林梵编《杨逵对照年谱》,李昫阳、申惠丰、欧阳瑜卿整理《杨逵年表》,叶荣钟著《日据下台湾大事年表》,台湾“行政院文建会”编《光复后台湾地区文坛大事纪要》,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上下册),李祖基《战后台湾四十年》,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等,在此谨表谢忱!

参考书目

金坚范主编:《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北京,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

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

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上下),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

包恒新:《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3月。

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

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

公仲、汪义生:《台湾新文学史初编》,南昌,江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汪景寿:《台湾小说作家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

赵遐秋主编:《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北京,台海出版社,1999年11月。

赵遐秋、曾庆瑞：《“文学台独”面面观》，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12月。

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

朱双一：《台湾文学思潮与渊源》，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2月。

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3月。

徐学主编：《台湾研究25年精粹·文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6月。

萧成：《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图谱》，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9月。

王晓波：《台湾史论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6月。

张禹：《从心随笔》，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6月。

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

陈昭瑛：《台湾儒学的当代课题：本土小说与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

杨若萍：《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1652—1949），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

秦风编：《岁月台湾（1900—200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光复纪实》，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郭志刚、李岫主编：《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

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1980年11月。

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1—14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

张恒豪主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

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

林梵:《杨逵画像》,台北,笔架山出版社,1978年9月。

静宜大学:《杨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中,2004年6月。

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

黄惠祯:《杨逵及其作品研究》,台北,麦田出版社,1994年7月。

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2月。

李南衡:《日据下台湾新文学》(1—5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

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

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5月。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

王晓波:《被颠倒的台湾历史》,台北,帕米尔书店,1986年11月。

施懿琳等著:《台湾文学百年显影》,台北,玉山出版社,2003年10月。

台湾文学研究会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

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7月。

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

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北,人间出版社,1993年11月。

王诗琅:《日本殖民体制下的台湾》,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0年12月。

王诗琅:《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问题》,台北,海峡艺术出版社,2003年5月。

林柏维:《台湾文化协会沧桑》,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年6月。

施淑:《两岸文学论集》,台北,新地出版社,1997年6月。

施淑:《理想主义者的剪影》,台北,新地出版社,1990年4月。

施淑:《日据时代台湾小说选》,台北,前卫出版社,1992年12月。

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作品选读》,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11月。

许俊雅:《台湾文学散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

陈昭瑛:《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北,正中出版社,1998年4月。

彭小妍主编:《“历史有很多漏洞”:从张我军到李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12月。

方孝谦:《殖民地台湾的认同摸索——从善书到小说的叙事分析

(1895—1945)》，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6月。

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台北，全华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

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年8月。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春晖出版社，1993年5月。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8月。

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中，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

陈建忠：《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论：现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8月。

高天生：《台湾小说与小说家》，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5月。

黄武忠：《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小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8月。

黄武忠：《亲近台湾文学》，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3月。

江自得编：《殖民地经验与台湾文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2月。

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10月。

黄英哲编，涂翠花译：《台湾文学研究在日本》，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年12月。

中岛利郎：《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

中岛利郎：《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年3月。

中岛利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杂志》，台北，前卫出版社，1995年3月。

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年10月。

《光复后台湾地区文坛大事纪要》(增订本),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5年6月。

陈映真、曾建民主编:《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文集》,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

曾建民主编:《清理与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12月。

曾建民主编:《噤哑的论争》,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

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2月。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5年7月。

范泉:《遥念台湾》,台北,人间出版社,2000年2月。

焦桐:《台湾战后初期的戏剧》,台北,台原出版社,1990年6月。

杨渡:《激动一九四五》,台北,巴扎赫出版社,2005年9月。

曾建民、横地刚、蓝博洲合编:《文学二二八》,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

叶芸芸编:《证言二二八》,台北,人间出版社,1993年2月。

杨渡策划:《还原二二八》,台北,巴扎赫出版社,2005年5月。

蓝博洲:《麦浪歌咏队》,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4月。

古瑞云:《台中的风雷》,台北,人间出版社,1990年9月。

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

柳书琴:《战争与文坛——日据末期台湾的文学活动(1937.7—1945.8)》,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6月。

许诗萱:《战后初期(1945.8—1949.12)台湾文学的重建——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为主要研究对象》,台湾,中兴大学硕士论文,

1999年9月。

林安英:《杨逵戏剧作品研究》,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6月。

叶荣钟主编:《南音》,全11册,新文学杂志丛刊复刻本①。

廖汉臣主编:《先发部队》,全2册,新文学杂志丛刊复刻本①。

苏维熊主编:《フオルモサ》(福尔摩沙),全3册;新文学杂志丛刊复刻本①。

苏维熊主编:《第一线》,全1册;新文学杂志丛刊复刻本①。

杨云萍主编:《人人》,全2册;新文学杂志丛刊复刻本①。

张星建主编:《台湾文艺》,全15册,新文学杂志丛刊复刻本③④⑤。

杨逵主编:《台湾新文学》,全14册,新文学杂志丛刊复刻本⑥。

杨逵主编:《台湾文学丛刊》,全2册,复印本。

后 记

走进杨逵的世界，一次次被他的伟岸人格和高远境界所震撼，肃然起敬的情感油然而生。我心里清楚，要写出这位台湾“不朽老兵”的全人格和真世界，恐怕远非拙笔力所能及。在杨逵这部读不尽的大书面前，那些由衷的感动，那些写作的遗憾，都将变成我持续研究的动力和不断探讨的空间。

本书付梓之际，心中感念多多。

记得那个早春二月，中国作家协会在风景秀丽的南宁召开“杨逵文学作品研讨会”，为两岸学者构建起学术交流的平台。这次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杨逵的家人。杨逵的次子杨建先生多次写信寄书通电话，认真仔细地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为本书写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人文情怀带给我的，是颇多的感动与感慨。

记得那个繁花五月，在紧张忙碌的会议空隙，陈信元先生带着我和几位朋友穿行于台北的书店，寻找洋洋十四卷的《杨逵全集》。在最后五卷无法如愿以偿的情形下，陈先生又把自己手头珍藏的书籍慷慨寄我，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文本基础。

记得那段写稿的日子里，来自两岸学者和朋友们的热情相助。吕正惠教授、陈映真先生、齐益寿教授、施淑教授、叶芸芸女士、徐秀

慧助理教授,以及作家蓝博洲先生、诗人台客先生、赖益成先生,都从不同角度为我提供了急需的资料。大陆学者周青先生、张禹(王思翔)先生、范宝慈老师,也在百忙中帮助复印和邮寄相关资料,前辈学者的人格风范令我敬仰。

赵遐秋先生、金坚范先生、吕正惠先生、陈映真先生为这套丛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诸多心血汗水。他们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的悉心指导和认真督促,都化为我写作的一种动力。

作家出版社的冯京丽编辑,为丛书的编辑出版投入了辛勤劳动。她的敬业精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上述学者、作家、编辑,还有那些未能一一提及的朋友,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期待得到方家学者的指教。

樊洛平

2006年4月于郑州